

· 原著 奥斯特洛夫斯基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复活节前到我家里来复考的人，站起来！”

一个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笨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看着全班的学生。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好像要穿透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牧师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你们坐下。”

女孩们舒了一口气，快活地坐下去。瓦西里神父那对又小又亮的眼睛，便倾注在其余四个小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旁边。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是抽烟的？”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全不抽烟。”

牧师满脸通红，大声叱道：

“混帐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酵里的烟丝是谁撒的？你们真的不抽烟吗？好，让我们来瞧瞧！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快！我和你们说什么来的？赶快掏出来！”

他们中有三个，把各自袋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面。牧师小心地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线缝，想找出一点烟草，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他转向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穿着灰衬衫和蓝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的孩子。

“你干什么像木头一样的站在那儿？”

那黑眼睛的小孩心里恨透那牧师，瞪着他粗声回答道：

“我一只口袋也没有，”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着那缝上了的口袋。

“哼，没有口袋，是吗？你想这样我就不晓得谁会做出那下贱的恶作剧，把复活节的面酵糟蹋了吗？你想此后还能够做这里的学生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会那样便宜。上次只为了你的母亲恳求，我才没有把你开除，这回怎么也不能饶你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拧着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就把门碰上。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谁也不晓得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要这样子给开除出去。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薛尔基·布鲁克才知道这事情。当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人，在牧师家里等着复试时，他亲眼看见保尔拿了一撮烟丝，撒在牧师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酵上。

保尔走出去，在直通学校大门的台阶的下面，坐了下来。他想，他要怎样回家去呢？他对在消费税监督家里当娘姨，每天由早忙到晚，对大小各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要怎样说呢？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现在我要怎么办呢？一切都为了这该死的老牧师。我当时干什么要把烟丝撒在面酵上呢？那是薛尔基怂恿我干的。他这样说：‘喂，让我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牲撒一把吧。’这样，我们就把烟丝撒下去。现在薛尔基倒逃过去，而我大概是准要给开除了。”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是老早就有了恶感的。有一天，保尔和米士加·列夫楚诃夫打架，给先生罚了“不准回家吃饭。”先生为着不使他独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他坐在教室里后面的凳子上。

那教师是一个瘦个子，穿着黑色的短褂，正跟学生讲着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

巴，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跟地球也差不多。他听了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先生，这跟《圣经》上所说的完全两样呢？”但他怕人家笑话他，所以没有站起来。

保尔的《圣经》课，牧师总是给他一百分的。《祈祷书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也清楚地知道上帝那一天创造了那一种东西。因此他决心把这件事问问神父。到了下一次的《圣经》课，神父刚坐下去，保尔马上就举起手来，等到得到了允许时，他便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四年级的先生说地球已存在了几百万年，不像《圣经》上所说，五千……”

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沙嘎的喊声阻止了：

“混帐东西，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保尔还没有开口回答的机会，牧师已经拧住他的两只耳朵，开始往墙壁上猛撞。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给推到走廊上去了。

隔天，他的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复学。从那天起，保尔便恨死了牧师。又恨他又怕他。他从来不忘记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牧师给他的这顿不当的敲打，因此他变得愠怒和阴沉。然而他以后还得受瓦西里牧师无数次较小的侮辱。为着极小的事情，牧师便罚他几个礼拜天天在教室的角落里站立，而且从来不曾问过他一次问题，因此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不及格的人，到牧师家里去复试。就当他们在厨房里的时侯，他便把烟丝撒在预备蒸复活节糕用的面酵上。虽然谁也没有看见，但牧师马上就猜出这是谁干的。

下课后，孩子们成群的涌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但保尔一句话也不说。薛尔基·布鲁克留在教室里；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但无法帮助他的朋友。接着校长埃弗林·瓦西里耶维齐在教职员室的窗口出现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怀着一颗猛跳的心，朝教职员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中年人，向站在一边的保尔看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的，让他留在这儿试试看。条件是这样：现在我每月给他八卢布，值班的时候管饭，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隔天早上七点，两天有一天休息，可是不许偷东西。”

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保尔不会偷东西，我可以担保。”

“好吧，那么让他今天马上开始。”他转过去，向他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店员说：“姬娜，带这小孩到盘碟洗藏室，叫佛露茜亚安顿他，顶替格里斯加的工作。”

女店员放下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膳厅朝通到盘碟洗藏室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一面急急地和他并着走，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现在要尽力做活，别叫自己丢脸呵，亲爱的。”

母亲说了之后，就用着忧郁的目光送着他，并向出口走过去。

盘碟洗藏室里的工作非常紧张：在一张桌子上，堆着好大的一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拭。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点的小伙子，有着一头金黄色的蓬乱的头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壶，一大锅洗盘碟用的开水，正冒着水汽，把整个洗藏室里弄得雾茫茫的，所以保尔初时看不清那些女工们的脸。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中央，不晓得他应当做什么，也不晓得应站在什么地方才好。这时候姬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碟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佛露茜亚，这是刚给你雇来的小崽，预备顶替格里斯加的。你告诉他做些什么吧。”

接着他转向保尔，指着那个叫做佛露茜亚的女人说：“她是这里的工头，她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随后就转身走向食堂去。

保尔点了点头，疑惑地注视着站在他前面的佛露茜亚，佛露茜亚正拭去前额的汗水，好像在估量他称职不称职似的，从上到下的端详他；接着，她便卷起一只滑到肘节下面的袖口，用一种非常愉快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工作是挺简单的：你看见那座大的铜锅了吗？好，看到了，你每天早上准时的烧热它，把整锅的水烧开。自然，木头要你自己劈，那两个大茶壶也要你对付。另外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帮着擦拭刀叉，把脏水提出去。”

“不过，我现在要做些什么呢？婶婶？”保尔说。他刚刚说完，洗藏室里的女工们，因为他临末那称呼，发出了哄然的笑声，特别是佛露茜亚笑得更厉害。保尔因为蒸气的关系，看不清她的脸庞，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有点难为情，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年纪不小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吧，你好帮我擦刀叉。”她给他一条毛巾。“看好，拿住这东西，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撑住它，再把叉子在这上面来回的擦，每个叉尖都要擦得干干净净。我们这里对这件事是挺认真的。绅士们时常要看看他们的叉子，要是他们找到一点点的齜齜，那就麻烦了，你会莫名其妙的给老板娘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人老板呀。”

女工们又发笑了。“呵，你说的不对，小朋友，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家具，一个傀儡，这里真正的老板是老板娘。不过她今天出去罢了，等会你就会看到的。”

通洗藏室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捧着一大叠脏盘子进来。其中有一个阔肩、斗鸡眼和三角脸的家伙说：

“要上紧些呵。十二点钟马上就到了，可是你们还在寻开心呢。”他说着看见了保尔，便问道：

“这小家伙是谁？”

佛露茜亚回答：“这是我们新来的小学徒。”

“啊，”他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小学徒。那么——”他那粗大的手按在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大茶壶那边，“这两个大茶壶你得时刻准备妥贴，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一个只有一点儿火光。今天我们饶了你，明天要是这样，你就得吃耳光。明白吗？”

一句话也没说，保尔预备烧水壶去了。

他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保尔从没有一天像他第一天那样的卖力气。他晓得这跟在家的時候完全两样，家里母亲的话是可以不听的。那个斗鸡眼的堂倌已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光。于是保尔脱下长靴，把它放在烟囱上面。木炭吹红了，十加仑的大肚茶壶，开始迸射出点点的火星。接着他提走了一桶脏水，把它倒在垃圾堆里，还把湿木柴堆在铜锅下面的火旁边，让湿的衣裳披在滚开的茶壶上面，叫他做的事情——全都做了。到了那天深夜走进厨房的时候，他已累极了。那个年纪最大的洗盘碟佣妇，名字叫安妮莎的，看着他走后关上了门说：

“这小鬼的头脑准有点儿毛病，岂不是吗？他的举动就像疯子似的。他的形迹有点可疑，我看，他躲他们追到这里来的。”

“呵，他倒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工人，用不着老挑剔他的。”佛露茜亚说。杜妮亚也表示同情：

“他们做了一会就累死了，开头全是这样的……”

隔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给通宵不息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终于把两个滚开的茶壶交给那个替班的，圆脸凶眼的小伙。当这个小伙子看看一切都弄停当，茶壶的水也已滚开之后，随即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吐出一口唾沫来，翻着白眼看一看保尔，然

后用一种 决不容许任何反抗的声调说：

“喂，瘪三，听好，明天早上准六点接班。”

“为什么六点？换班是在七点。”保尔说。

“谁要七点接班，让他七点接班好了，但是你可要在六点到这儿来。要是你 口
嗦，我立刻揍的叫你爬下，你要当心，今天刚到就搭架子。”

刚换了班的洗盘碟的佣妇们，满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那孩子的挑战的声音和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走近一步，正想揍他，只因恐怕在头一天便给开除，方才没有动手。他满脸 气得通红，说道：

“火气别太大，当心点，别给火烧死啦！明天早上七点钟我才来，论起打架，我们两个是半斤八两。要是你想试一下，我等着你。”

那小伙子吃了一惊，往大锅子那边倒退一步，眼睛瞪着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的保尔。他全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大的钉子，现在他有点手足无措了，只好低声的说：

“呵，好的，咱们等着瞧吧。”

保尔跟女佣们一道走出车站，慌忙跑回家去。第一天便这么满意地过去了，当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得到他的休息的人了，现在他也是一个工人，谁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自立的人了。早晨的阳光爬上了火锯工场的屋脊。过一会，只要走过了李士真斯基家的别墅，他的家，那小小的村屋，便会现在他的眼前。

他的母亲正在院子里弄着茶壶。一看见她的儿子，她便关切地问道：“事情统统不错吧？”

“还不错。”

他猜想他的母亲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从那敞开的房窗望进去，他可以看见他的哥哥阿尔青那宽大的肩膀。这使他的心情烦乱起来。他问他母亲：

“什么，阿尔青哥哥回家了吗？”

“是的，昨天晚上刚到，往后他就住在家里。他就要在火车工场里作事情的。”

保尔有点踌躇的推开门，走进房里去。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他坐在桌畔的人，就回过头来，从他那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锐厉的目光。

“呵，你就是那撒烟丝的小孩吗？呵，算了，算了，你好吗？小弟弟。”

保尔知道，跟这位突然回家来的哥哥再说下去，是不会听到好话的。他心里想，看样子这回的事情别人全晓得了，要是阿尔青不揍他的话，也免不了要骂他一顿；保尔是有点怕阿尔青的。

但是阿尔青显然不想揍他，他还是肘子靠着桌面的坐在条凳上，用着不是嘲弄便是憎恶的眼神注视着他。接着就说：“你只挣八卢布，我呢，我也过得不是很好、受苦受累，因此你千万别把这些钱喝掉或花光。”

“我晓得你已经念完了学校里的功课，要学的事情统统学到了，所以才做了洗盘碟的伙夫，在那些女招待们面前要是和人前不一样，我揍扁你。”

保尔的眼睛注视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仔细地研究那个突出的钉头。突然，阿尔青站起来说要出去，保尔舒了一口气，对自己说：“看样子，这回倒用不着挨打便可以过去啦。”

在吃茶的时候，阿尔青平和地叫保尔把开除的经过告诉他，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母亲这时进来倒茶，十分忧郁地说：

“自从你变成了这么一个小流氓之后，你往后的事情真是不堪设想呵。”她停了停又说：“唉，估摸得他往后要成个什么样的人。说句实话，一切的麻烦都是这小无赖给我惹来的。”

“算了，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小兄弟，牛乳既然泼了，哭也没用。不过从现在起，你

可要当心，做事别耍鬼把戏，应该做的你统统得做。你已经叫母亲受尽麻烦了。等到你目前这件事情做了一年之后，我将设法把你荐到车厂里当个学徒，因为你不应当一辈子老给人家洗盘碟。你必须做一个人，学会一种本事。目前你岁数还轻，再过一年，我一定设法，也许能够把你带进厂去。我已给调到此地来了，往后就在此地作活。母亲现在已不能再做工了。她在任何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所以，保尔，我的好弟弟，你要认真的，好好的做一个人呵！”

他直站起来，又高又大，把挂在椅子上的短褂穿上，对他母亲说：“我有一件事要办，出去一会儿。”他弯腰跑过门楣，走了出去。当他穿过天井，走到窗口时，他大声的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柄小刀，等会母亲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是日夜营业，从不打烊的。

有五条铁路线在秀彼多夫卡交轨站会合。总站里，人的潮流不停地汹涌着，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二三个钟头稍为清静点儿。车站上时常有几百队的兵士集合或是散开，由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无数受伤的兵士，由前线载回来，而穿着单调的灰色军用外套的新兵，就像一股洪流，不断地向各战线流去。

保尔在食堂里做了两年，每天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藏室。在那巨大的地下室里，厨房的工作异常紧张——二十几个掌厨和十个堂倌无时不在来回走动。在这两年间，保尔的工钱由八卢布增到十卢布，人也已长得又壮又高。他经过了许多的事情，曾经在厨房里当厨子的助手，过了六个肮脏的月份，后来又给调到洗藏室来，因为那权力极大的掌厨长，不喜欢这阴沉的、不声不响的青年人，生怕他真会为了一点点事情暗害他。要不他是有着无穷的精力，比任何人都能耐劳吃苦，他老早就为了他的沉默失业了。

在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狂人一样的工作着，不是搬着盘碟由食堂跳下厨房来，就是捧着菜盘，由厨房跃上楼梯走上去。入夜，当食堂这两部份的工作稍为轻松的时候，堂倌们便集合在楼下厨房的堆栈里，开始玩着“么”“九”，有许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但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晓得他们每个人做了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之后，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帐，然后把这些钱喝光或是玩光。保尔很憎恶他们。“这些都是该死的混蛋，”他时常对自己说。“就像阿尔青，一个头等的旋盘匠，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我呢，只挣十卢布，然而他们只一天功夫就挣这么多——怎样挣来的呢？来回的捧着菜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保尔认为他们跟他老板一样，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物。他也晓得洗盘碟的女佣们和女招待们，要是不答应以几卢布的代价，把她们出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们，她们就会给撵出去。

这样保尔已窥见了人生最深的底层，和它的沉淀的渣滓了。也闻到了腐烂的臭味，热烈地渴求着一切新鲜的东西。阿尔青曾设法把他推荐到车站工厂里去当个学徒，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一向不雇用十五岁以下的孩童。于是保尔唯有梦想着能够摆脱这地方的那一天，因此，他觉得他好像已给石头被熏黑了的大建筑物吸住了一样。他时常跑去看阿尔青，同他一道去视察路轨，竭力帮他的忙。

当佛露茜亚离开食堂之后，情形更加惨淡了。保尔已见不到这个嘻笑的愉快的少女了，他觉得这少女曾经使得他对她那么的亲近呵，现在呢，当他早上到洗藏室来，听到佣妇们的刻薄的争吵时，他的生活正是一片空虚，他感到迷惘和寂寞。

入夜，添了铜锅下面的火，保尔便蹲在敞开的炉门外边，凝视那闪动的火光，温暖是多么的舒适呵。洗藏室空无一人。不知不觉地，他的思想转到最近的一些事情，他想起了佛露茜亚，于是种种的景象便生动地涌现在他的眼前。

是星期六，天刚黑透，保尔走到楼下的厨房来。在楼梯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看看那些时常聚在栈房里玩纸牌的人们。他们正赌得很起劲，查里瓦诺夫是庄家，脸孔兴奋得血红的。

接着保尔听见了楼梯上的步声：那是蒲罗霍士克在走下来。只尔躲到楼梯的下面，等蒲罗霍士克走下厨房去。楼梯下面是阴黑的，蒲罗霍士克看不见他，当他转弯走下去时，保尔看见他那巨大的头和宽阔的肩膀。接着又有人脚步轻轻地匆忙走下楼梯，保尔听见一个听惯的声音说：

“蒲罗霍士克，等一下子。”

蒲罗霍士克停了步，转过身来，朝上面的楼梯望去。

“什么事呀？”他不高兴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保尔看出她是佛露茜亚。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口，用一种哽咽而微弱的声音说：

“蒲罗霍尔，亲爱的，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蒲罗霍尔粗暴地摔开他的手臂，声音深沉而严厉：

“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了你吗？”

“但是，蒲罗霍尔，他给你三百。……”保尔听见佛露茜亚的声音中，带着强自抑制的呜咽。

“三百卢布？”蒲罗霍尔讥笑她。“你想全数都拿去吗？好太太，难道你想一个洗盘碟的女工能值这么大一笔钱？我可以给你五十卢布就足够了。这还算是你的好运气，那些比你干净一点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你拿了这么些，照理是应当感谢的。只睡一个晚上，就有干干净净的五十卢布拿到手。这世界的人们并非都是傻子，你要晓得，现在我再给你十卢布，不，给你二十吧，我是很慷慨的，可是再多就不行。要是你不再胡缠，你往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会代你找主顾的。”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蒲罗霍士克便转身走进厨房去。

“你这猪猡，你这肮脏的猪猡！”佛露茜亚在他后面大声的咒骂，接着便靠着柴堆，开始哭泣了，她的身子因啜泣而战颤。

当保尔站在楼梯下面阴暗处，听到了这对话，眼看着佛露茜亚在那儿因哭泣而颤抖，还用头碰那柴堆的时候，他的感情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但他并没有跑出来，只一声不响地使劲挣住那扶梯的铁柱，同时，有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而且不断地在燃烧着：

“就是佛露茜亚，就是佛露茜亚，也给他们出卖了……佛露茜亚呵，佛露茜亚！”

在他的胸怀中，他对蒲罗霍士克的憎恨，是更加强烈了，这憎恨咬啮了他，而他周围的一切也显得更加阴森和嫌恶。

“呵，要是我有力气，”他想，我一定打死这流氓！”他希望他能跟他的哥哥阿尔青一样强大和有力。

炉里的火在闪动，小小的火舌灭了后，又颤颤地升上来，合成为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卷的火焰，在保尔看来，它好像正在讥笑他，对他吐着舌头，向他挑战。房里异常静寂，只有炉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那平匀的水滴的响声。

克林加跑了进来，把擦得晃亮的炒锅搁在架上之后，不住搓着双手。厨房里再没有别的人了，值班的厨师们和女助手们都在外套间里睡觉。夜里三点钟，厨房里静寂的，克林加一向就在这时候跟保尔一道消磨过这时间。这厨房小厮现在跟保尔是要好的朋友。他一上来，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便说：

“你究竟在干什么呀？在向老火炉施魔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停止对火焰舌头的注视，他那闪亮的眼睛直视着克林加，克林加看出他的眼睛正蕴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从他这好同伴的眼睛里，看到这么一种表情，这在克林加还是第一次，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惊愕地问道：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有了什么事情吗？”

保尔站起身来，走近克林加，坐在他的旁边，用一种阴郁的声音说：

“没有什么事情，只是觉得不痛快，克林加。”他把双手放在膝头上，使劲地紧挣着。

克林加用肘节支起身来，说“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不是？”

“你说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吗？不，从我到这儿做事情之后，我就碰到了。只要你看看这里的情形吧。我们就是做到死了，结果得到了什么呢？挨打！谁高兴，就揍你一顿，而且不准回手。老板们雇我们替他们做事情，但是谁力气大，谁就可以随便敲倒你。不是吗？不管你怎样卖力气，你不能统统讨好他们，这样，你就得受罪。不管你怎样起劲做事，应做的事情统统做了，使得别人无从责备你，尽管你三头六臂，结果还是讨好不了人家，毕竟你活该要倒霉。……”

克林加吃了一惊，阻止他说：“别那样高声，要是谁进来，一定听到你说的话。”

保尔跳了起来。

“就让他们听见吧，横竖我是不愿再干了。当个清道夫比在这里做事还要强些。这儿是一座活坟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他们把我们当作废料，对女人们要怎么就怎么，要是有一个恰好长得漂亮一点，又不愿意答应他们，那么，她马上就给滚蛋。他们搜罗了一大批无家的、饥饿的、急急想挣一口饭吃的女人们呢，她们呢，为了害怕饥饿，只好什么事情都做。”

他说的时候是这样的愤恨，克林加真的害怕有人会听到这些话。所以他跳起来，把厨房的门关上。保尔还是不断的把心里要说的话倾泻出来。“就像你自己，克林加，当你挨了一顿打，你一声也不响。我问你，你干什么不作声？”

保尔坐在桌畔的条凳上，双手托着他那倦乏了的头。克林加把一些木头添进炉里之后，也在桌边坐下来。接着，他便问保尔道：

“今天读书吗？”

“我们没有东西读了，书店已经关门了。”

克林加吃了一惊。

“什么，今天它不是开着门吗？”

“宪兵把卖书的人捉去了。他们在里面搜到一些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呢？”

“他们告诉我，说是政事。”

克林加现出迷惑的样子。

“什么叫政事呢？”

保尔耸一耸肩膀。

“老实说，我也不晓得。就我所听到的说来，政事的意思就是反对沙皇。”

这话使克林加着惊，他倒退了一步，问道：“不过，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那倒说不定。”保尔回答。

接着门开了，有一个女佣睡意朦胧地跑进洗藏室来，她看见他们，便说：

“你们干什么不睡觉呢，孩子们？现在没有火车，你们可以歇歇一个钟头。走吧，保尔，我代你照顾那锅子。”

保尔的事情比他所预期的了结得快。而且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正月里很冷的一天早上，保尔已到了换班准备回家的时候，但是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跑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去，老板娘不答应。因此他虽然疲倦，还是不能不再做另外二十四个小时的工，到了当天晚上，他实在已经精疲力竭了。天快破晓的时候，他还得灌满铜锅的水，把它烧开，给三点钟的火车到时应用。他开了水龙头，没有水，显然是唧筒坏了。所以他让水龙头开

着，自己倒在柴堆上睡了起来，这时候疲劳已战胜了他。

几分钟后，水龙头骤然咯咯地流出水来，顷刻水槽便注满了。水已升到了边缘。接着就开始流到洗藏室的砖地上。一向，洗藏室夜里是一个人也没有的。缓缓地，流出的水越来越多，砖地上已积满了，水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厅。小股的水流流过了在那儿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只有到了水浸醒了一个在地板上睡觉的旅客，他跳了起来，大声呼喊，才使所有的旅客们慌忙抢着他的或她的行李。这样，餐厅里便混乱起来了。

但同时水还是在增涨着。在隔邻房间里揩着桌子的蒲罗霍士克，听到了喊声，连忙跑了出来。他一步一步的跃过了那水池，冲到门边，使劲把门推开。这一来，给门阻住了的水便泻进了膳厅，闹声也越来越大了。这堂倌走进了洗藏室，朝酣睡的保尔扑去，立刻像雨点的拳头落在这少年人的头上，直到他痛得周身完全麻木，动弹不得。

他还没有完全清醒，始终糊里糊涂；他觉得眼睛冒着火星，周身痛得难受。因为给打得厉害了。他几乎回不了家。

隔天早上，脸色异常阴沉的阿尔青，叫保尔把经过告诉他。他用一种深沉的声音问：

“谁敲你呢？”

“蒲罗霍士克。”

“好的，你再躺下去。”

阿尔青披上他的皮短褂，一声不响的跑出去。

一个陌生的工人问着格拉莎：

“我要见见走堂蒲罗霍尔。”

那女人回答：“请等一下，他过一会就会来的”

那高大的陌生人靠着门柱。“好的，我就等他。”

蒲罗霍尔踢开门，捧着一大叠盘子走进洗藏室来，那女人便指着他说：“那就是他。”

阿尔青走进一步，一只重重的手放在那侍者的肩膀上，眼睛直视着他，说：

“你干什么打我的小弟弟保尔？”

蒲罗霍尔想避开他，但一记可怕的拳头已把他打下去。他想爬起身来，但第二记拳头，比第一记更有力，把他钉在砖地下，怎也爬不起来。别的侍者们都吓呆了，挤在一边，阿尔青却转过身跑出洗藏室去。脸孔给打坍了和淌着血的蒲罗霍尔，正在砖地上抽搐着。

那天晚上，阿尔青散工后并没有回家，玛丽亚晓得他已给关在宪兵站里。六天后，他方才回家来，那是在晚上，他的母亲已经睡觉了。保尔正坐在床上，阿尔青跑过去，坐在他旁边，问道：

“小弟弟，觉得好了一点吗？”

经过几分钟的沉默之后，他接着又说：

“弟弟，你别着急，你可以到电力站里做事，我已给你找到了一个位置。你可以在那里学会一点本事的。”

保尔两手捉住阿尔青一只巨大的手掌，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二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冲破了小镇上的沉寂：

“人们把沙皇推翻了！”

秀彼多夫卡的人觉得这消息是难以相信的。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车站，接着两个大衣外面背着步枪的学生，和一队缠着红臂章的革命兵士，走下车来，拘捕了站上的宪兵，和那个指挥当地防军的年老的陆军上校。镇上的人现在相信这个消息了。几千的住民经过雪盖的大街，走到广场，贪婪地听

着那些新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好几天过去了，这几天是骚动的日子，充满着兴奋和喜悦。沉寂接着到来，一切都恢复了前时的景象，只有一面红旗，在孟什维克和叛变者的代表们所住的镇公署上面，高高飘扬着。

到了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队骑卫团开到镇上驻扎，每天早上派出队伍到车站，逮捕由西南前线开小差的逃兵。骑卫兵们的气色挺不错，面孔红润，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肩章是金色的，裤子的滚边是银色的，跟沙皇时代的并没有两样，——仿佛没有经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缓缓溜过去了，保尔，克林加，和薛尔基的生活都毫无改变，各自的主人仍然是前时的老主人，到了雨雪连绵的十一月里，怪异的事情出现了，许多陌生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着，——逃离战壕而来的兵士是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着一个奇特的名称：“布尔什维克”。但镇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粗浊而生硬的称呼究竟是什么意思。

骑卫团要捕捉开进来的逃兵，已是格外困难了，车站上的窗子，给子弹打破的越来越多。由前线来的兵士都成群结队，要是有谁想阻挠他们，他们便用刺刀对付。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一车一车的开到镇上了。

骑卫团在车站上筑起障碍物，想阻止这类事情的出现，但他们反而吃了机关枪的子弹，那些不怕死的人，从车上倾泻下来，把骑卫团赶回镇上。击退他们之后，这些穿灰制服的人，重又回到车站，而载着逃兵的车辆，便一列车一列车的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某一天，那三位好朋友在薛尔基家里玩完了“六十六”以后，跑了出来，顺路走进柯察金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休息。他们都觉得无聊，那些惯常的玩艺已给他们弄腻了，所以大家开始绞着脑筋，想想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消磨过这日子。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马蹄的声音，一个骑马的人正在路上出现。那马一跃便跳过了分开道路和篱笆的小沟，马背上的人用马鞭指着保尔和克林加说：“喂，你们这两位小朋友，到这儿来。”

保尔和克林加跳起来，跑到篱笆那边去。那陌生人浑身蒙着一层灰土，那便帽、茶色的制服和短裤上，都沾上一层厚厚的灰色的尘埃。在他那紧束着的士兵皮带上，系着一支盒子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榴弹。

“对不起，小朋友们，给我一点水喝吧！”他这样喊。当保尔跑去倒水时，他转向正在瞪视着他的薛尔基说：“告诉我，小弟弟，这镇上现在是归谁管辖的？”

薛尔基慌忙把镇上所有的消息告诉他：“这里两礼拜来已没有人管了，只有本地的自卫团，老百姓每晚轮流守夜。你是属于那一方面的？”

那陌生人微笑着说：“呵，往后就会晓得的，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易老啊。”

保尔带着一大杯水跑出来，那陌生人一口气喝完它，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便拉着马缰，朝斜坡上的矮松林缓弛过去。

保尔迷惑地问着克林加：“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啊？”

“我那能晓得呢？”克林加耸着肩膀回答。

薛尔基接着彻底而肯定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他说：“这一定是说，本地的政府要来一次新的变动，所以李士真斯基他们才在昨天逃走了啦。要是有钱有势的人们开始逃命，那一定是革命者要到镇上来。”这推论是那样的合理，保尔和克林加立刻接受它。

孩子们的讨论还没有完了，马蹄的声音又再度传来了，这三个人马上跑到篱笆旁去。

在他们刚刚看得见的地方，在树林那边，在林务官的房子后面，许多的人以及车子出现了。在很近的路上，有十五个人背着枪骑在马上。两个领头的人，一个是中年人，穿着灰色的紧身制服，佩着军官的皮带，胸上挂着一只望远镜，另一个就是他们刚才看见的人，那中年人臂上有着红色的臂章。

“哦！我刚才和你说什么来的？”薛尔基用肘节推着保尔说。“你瞧，他带着红色的臂章，他们是赤党啊！”他欢喜地呼喝着，像小鸟一样的跃过篱笆，跑到路上去。

两个朋友也跟着他，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注视着这些朝镇上开去的人。不一会，他们已离得很近，那个刚才他们看见过的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李士真斯基的房子问道：

“那家是谁住的？”

保尔竭力跟上那骑兵，边走边说：

“那是律师李士真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已经逃了，好像害怕你们似的……”

“你怎会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说。

保尔指着那红色的臂章，说道：

“这是什么呢？谁都可以看出来的……”

住民们从各自的房子里跑出来，和这开进市镇的队伍说说笑笑。那三个小孩站在路边，注视着浑身尘土的疲倦的红军士兵开过去。而当队伍里唯一的一架大炮，和那些架着机关枪的马车辘辘地轧过石子路之后，他们便跟在红军队伍的后边，直到他们停在市镇的中心，分散到各驻扎场所之后，方才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在改为指挥部的李士真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四个人围着一只四脚刻着花纹的大餐桌坐着：一个是指挥官，头发已经斑白，名字叫布加可夫，其他三个是他的参谋人员。

布加可夫在桌子上打开一张本省的地图，用着指甲在上面划着线路，向那个坐在他对面的颧骨高高的，有着一口坚固的牙齿的人说：

“耶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地方打它一仗，但照我的意思说，我们倒应该退却。我甚至提议就在今天晚上撤退，因为士兵们还不怎样疲乏。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在德军还不能到达之前开回喀查丁。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力量：一架炮，三十发炮弹，二百支步枪和六十把刺刀，要和德军打仗，那是笑话。……德国兵现在正像一股铁流一样的开过来。只有在和其他撤退的红军取得联络之后，我们方才能够作战。何况除开德军之外，此地还有着许多反革命的武装部队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放弃这个市镇，明早第一桩事，就是在我们开拔以前，先把车站对过那架小桥炸毁。这将使德国军队费去三两天架造起临时的桥梁，并将阻止他们沿铁道的前进。来吧，让我们决定吧。”

坐在布加可夫斜对过的史特罗兹可夫，正咬着嘴唇在研究地图，接着，他抬起头来看看布加可夫，费劲地用力使哽在他喉咙里的话语说出来：

“我……我……赞……赞成布加可夫的意见。”

那年青的穿着工人罩衫的人也说：

“布加可夫的意见很合理，我也同意。”

只有耶马琴科，那个白天跟小孩们说过话的人，仍然摇头表示不赞成。他说：

“那末，鬼晓得我们组织这队伍是干什么用的？为着在德国人面前不打一仗便撤退吗？依我说，这里正是我们应该抵抗他们的地方。我已跑得厌倦了。……要是照我的决定，我一定毫不踌躇地说：‘我们就在这儿抵抗他们’……”他用力地把椅子推开，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

布加可夫不赞成地望着他。

“乱打一通是没有用处的，耶马琴科同志。明知打败仗，而叫士兵们去牺牲，这是决不允许的。我们的敌手是一整师团，而且附有重炮和装甲车等配备。……耶马琴科同志，我们不能那样做。”接着他便转问他们全体说：“就这样决定——我们明天早上退出本镇”

“第二个问题是联络的问题，”布加可夫继续的说：“因为我们是最后撤退的，我们就负有在敌人后方，在德军的阵线后面进行组织工作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道交轨点，

而且这可怜的小镇，居然还有着两个车站。我们应该委派一个负责的同志在这交轨站上工作。让我们决定谁留在这儿，你们有什么提议？”

耶马琴科走近桌子说：“我想我们应该留下能干的水手朱赫来在这儿。第一，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是一个机械匠和旋盘工，所以可以在车站里找到事情；第三，他并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看到他，他非得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而且他是很机灵的，做这事情很能称职。依我的意见，他是顶合适的。”

布加可夫点头表示同意。他说：

“很对，耶马琴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转问别的两位：“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么，就这样决定。我们要留下一笔钱和工作的指示给他。”

“现在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同志们，”布加可夫继续说下去。“这是关于处置本镇所有的军械的问题。镇上藏有沙皇战争时遗留下来的二万支步枪，藏在一个农民的仓库里，他们把这完全忘了。那仓库的主人告诉我这消息，他很想尽快把这些东西弄出来。……自然，这些枪支不应留给德国人，这是不用说的。我的意思是把这些烧掉，而且应该立刻就做，要在早上把一切都弄妥。不过这是一桩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这仓库是在市镇的旁边，周围都是穷人的房子，恐怕火要延烧到别的房屋上去。”

史特罗兹可夫，一个强壮的人，满脸长着胡须，好像很久没有剃过似的，他说：

“为……为……为什么毁掉它们？我想……想我们应该把……把它们分给市……市民们。”

布加可夫立刻朝向他，问道：“你的意思是说，把枪械分给民众吗？”

“一点也不错！”耶马琴科非常热烈地喊起来。“把枪械分发给工人和其他的民众，谁就给谁，要是德军真的到了这儿，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麻烦。而且到了环境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就会用起这些东西来。史特罗兹可夫的意见很对，我们应当把那些东西分发出去。即使把它们弄到邻近的乡村里去，农民们也会好好地把他们藏起来的；到了德国人开始残酷地压迫民众的时候，这些东西将有多么大的用场呵！”

布加可夫笑了。“你们说的满对，不过要是德军发出命令征收一切枪械，他们会交出来的。”

耶马琴科完全不同意他的话。他说：

“不，不会全都缴出来的。”

那年青的工人也赞同耶马琴科和史特罗兹可夫的意见，“让我们把那些步枪发出去吧，只有这样办。”

“好的，我们就把它们分发吧，我们就这样决定。”布加可夫说。他站起身来。“我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上，朱赫来到了的时候，请他来看我，我有话要对他说。请你查查哨兵去吧。耶马琴科同志。”

大家都散了，只留下布加可夫一人，他走进旁厅旁边的卧室里，把外套铺在褥子上，便躺了下去。

天亮的时候，保尔下班，由电力厂回家。他在厂里当火夫的助手已经一整年了。

这时候小镇上的景象非常活跃激动，只要你一张眼，便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路上看见许多人手里带着来福枪，有的人还拿着两支或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地跑回家，在李士真斯基别墅的外面，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个人，正跨上马。

他跑回家，慌忙洗了脸。他的母亲说阿尔青还没有回来，于是他立刻跑到镇上尽头的地方去找薛尔基。薛尔基的父亲是一个副司机，家里有点积蓄，自己也有一间小房子。

薛尔基并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白脸妇人，满腹牢骚的瞪着保尔，说道：

“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你用不着问我，只有鬼晓得。他已经着魔了。天还没有亮，他就起身出去。他听见人家说什么地方要分发枪支，我想他一定到那地方去。你这鼻涕将军，

最好还是躲起来吧，像二尺高的瓶子似的，也想着来福枪哩。你告诉我那小流氓，要是他带回一点 弹药跑进我家里来，我一定把他的头敲碎……”

但保尔早已听不见这发怒的妇人的骂声，急急地跑到街上来了。在路上，他遇见一个两肩膀 各斜托着一支枪的人，他跑过去问他：

“叔叔，告诉我，你从那里得到这些枪的？”

“他们在维尔霍维那大街分发的。”

保尔拚命朝他说的那地方跑去。当他走过了两条街的时候，他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从那里得到它的？”

“赤党在学校前面分发的呵。现在统统发光了，一支也没剩。我连这已拿到了两支。”那小孩得意地说。

保尔想了一会，就转过身，抢上三步，捉住那个比他小得多的小孩子，把他手里那支枪强抢 过来。他用一种不许反对的声调说：

“你已拿到一支，够了，这支让我拿走！”

那小孩给这白昼的抢劫激怒了，向保尔扑了过去，但保尔马上后退一步，横摆着那支带刺刀 的枪，瞪着他喊道：

“你不走开，我就戳死你！”

那小孩气得大哭，转身跑开，一边走一边绝望地咀咒着，但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他跳 过篱笆，直冲到木棚里，把那支枪搁在屋顶下面的木椽上，然后吹着愉快的口哨跑进屋里去。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美丽的。像秀彼罗夫卡这样的小镇，镇的中央实在像一个小小 的集镇，但四周却全是乡村；一到夏季幽静的夜晚，年青的人们，全都跑到街上。女孩们有 的倚着门廊，靠着篱笆，有的站在她们的庭园中，有的则成对成群的走到路边，坐在造房子 用的木堆上，笑声和歌声不停地震响着。

颤抖的空气充溢着那么浓馥的花香；星星，就像萤火虫，永远是那么幽微地在天空的深处闪 耀着；而人声呵，又是传得那么遥远。……

保尔挺爱他的手风琴。把他那双键的、声音动听的“真维也纳，”放在膝头，让灵活的手 指在键盘上移动，由上面按到下面，由这边跳到那边，时而发出低沉的叹息，时而疾转，发 出愉快的清音，那是多么的愉悦呵。……随着手风琴这样的颤动，谁能不想跳舞？你的脚步 不禁舞蹈起来，而手风琴的声音也越来越显得热情，因为生命是优美的呵！

这特殊的夜晚特别畅快。一群年青人聚坐在保尔家外面的木头上，他们都很开心，而笑 声最响的是保尔的邻人嘉莉亚。她是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道跳舞歌唱，她唱的是 中音，声音嘹亮又柔润。保尔有点怕她，她的口舌非常伶俐，她坐在木板上，靠着保尔， 双手紧紧地搂着他，大声的说笑着：

“呵，你和你的手风琴，都挺不错。真可惜，你为什么这样年轻，要不然，你是我多么 喜爱的小丈夫呵！我挺喜欢玩手风琴的人，他们把我的心都溶化了。”

保尔满脸通红，他高兴的是幸亏在夜晚，谁也看不见。他稍稍离开这神经质的女孩，她 却紧紧地抱住他，不让他避开。

“呵，我的心肝，你往那去，往那去呢？你想逃开么！呵，多么叫人疼爱的宝贝啊！”

保尔觉得她那结实的胸脯正紧挤着他的肩膀，这使他战颤，使他昏乱，而他周围的笑声 也冲破了夜晚那惯常的静寂。保尔用手按着她的肩膀，把她推开，说：

“你闹得我不能玩了，坐开一点吧。”

这又引起一阵笑声，嘲弄和玩笑。

接着玛洛茜亚对保尔说：

“保尔，给我们拉一只忧郁一点的，真正动情的歌吧。”

于是风琴拉长了，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爬动着。他们都晓得这是乌克兰的民歌，是他们本地的民歌。嘉莉亚最先唱，玛洛茜亚他们马上附和她：

Zibralissia bourlaki

流浪的人们集合起来……

青年们的嘹亮的歌声，传到遥远的森林里去。

“保尔！”

那是阿尔青的声音。保尔慌忙折起手风琴，扎紧皮带。

“他们在叫我。我要走了。”

“不，再停一会儿，给我们再玩一会，用不着急急忙忙的。”玛洛茜亚请求他。

“不。”保尔匆忙地说。“要是你高兴，明天再玩。现在我非走不行，是阿尔青叫我呀。”

他跑过马路，走进屋里去。

当他推开门，他看见阿尔青的同志罗曼正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

“你叫我吗？”他问。

阿尔青点点头，对那陌生人说：“这就是我的弟弟。”

那陌生人伸出一只结茧的手。

“听好，保尔，”阿尔青对他说，“你说过厂里有一个机匠病倒了。明天你去看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的人来代替他。要是他们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陌生人换嘴说：

“呵，不，我跟他一道去，我有几句话跟那个工头说说。”

“自然，他们是要雇人的。今天机器是停了，因为斯丹科维齐害了病。那工头来过两次，看看有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但一个也找不到，他们不愿意单靠火夫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的机匠是害伤寒病的。”

“要是这样，那就这么辨吧，”那陌生人说。“明天我到这里来找你，咱们一同去。”

“好的，”保尔说。他自己那双灰色的凝定的眼睛，正和陌生人那对留神地考察着他的眼睛碰在一起。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短褂，从上到下扣着钮扣，紧紧地绷住他的双肩。它实在是太紧了，在头和肩膀中间，现出一股很粗大的脖子。这个人就像结实的木树一样的有力和坚定。

当他临走的时候，阿尔青对他说：

“好吧，再见，朱赫来，明天我弟弟跟你一道去，你就把这事情定下来吧。”

红军别动队离开这小镇三天之后，德军开到镇上来了。在荒凉了三天的车站里，鸣着汽笛的列车，报告了他们的到达。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虽然所有的人早已晓得德军迟早总要来的，可是镇上却像搅乱了蚁穴一样的纷乱，而且还有一些人不大相信它。现在，那些可怕的德国军队并不是快要开来，他们已经开到镇上了。

人们只沿着花园的篱笆，傍着大门站着，没有一个敢走到街上。德军沿着马路的两边走，留着中间的石铺路。他们穿着暗绿色的制服，提着插上宽边的刺刀的步枪，头上戴的是沉重的钢盔，背上挽的是巨大的粮袋，像一条无尽的长带。他们由车站开进镇上来，行动非常小心，准备随时应付抵抗，虽然实际并没有一个人准备加以抵抗。在他们的队伍前头，是两个手里拿着盒子炮的军官；负责翻译的哥萨克军官，则走在路的中间，他们都穿着蓝色的乌克兰外套，戴着高高的皮帽。

德国军队在镇中央的大市场上，列成方阵，鼓手开始敲起号鼓，集聚了一小群大胆的市民。穿着蓝色大衣的哥萨克军官的代表，站在药房入口的高高的台阶上，大声宣读着本镇

司令官 科尔夫少校所发出的布告。布告上这样说：

第一条：本镇所有居民，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一切火器及其他各项武器缴交，违者处决。

第二条：本镇实施戒严令，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本镇司令官 科尔夫少校

那个前时曾作过镇公署，革命后曾作为工人委员苏维埃的办公处的建筑物，现在成了德军的司令部。在入口的台阶上，站着个哨兵，头上戴的已不是钢盔，而是缀着鹫章的军帽。天井上划出一个地方，专用来堆积缴交的武器。

人们为了怕被枪毙，整天不断的把武器缴给他们。成年的人不敢露面。把枪械送出去的大都是些小孩，同时谁也没有被拘留过。另一些人，因为不愿意给人看见，夜里偷偷把枪丢到街上，所以早上就有一个德国巡兵把这些捡起来，装在军用卡车上送到司令部。在晚上一点钟的时候，规定的二十四小时已经完了，德国兵士数一数他们的战利品，统共是一万四千支步枪，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在民众的手里。他们搜索着每一家人家，但一点痕迹也没有。隔天黎明，在镇外靠近老犹太墓地的地方，有两个铁路工人给他们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屋里搜出了来福枪。

阿尔青一听到那命令，慌忙回家。在天井里，他遇到了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地但又郑重地问他：

“当他们分发的时候，你带过东西回家没有？”

保尔开头打算把步枪的事情瞒住，但不知怎的，他无法对他哥哥撒谎，所以把经过说了一遍。

他们一道跑到仓房里去。阿尔青把木椽上的枪拿下来，卸下刺刀，抽出枪机，接着就是提着枪筒，用尽全力往篱笆的柱子上猛碰，把枪柄碰个粉碎，其余的部份便丢到花园外远远的荒地上，阿尔青还把刺刀和枪机丢在粪坑里。

事情做完了，他就向保尔说：

“保尔，你已经不是小孩了，要晓得火器不是好玩的。我是在说真话，你以后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回家来。你要晓得，这样的东西是要你的性命的。往后你不要瞒着我。要是你带这样的东西回家，给他们查了出来，第一个捉去枪毙就是我，你倒不会有什么，因为他们把你当做一个小孩。要晓得现在正是风险的时候啊！”

保尔答应往后不带这样的东西回家。

当他们穿过天井回到屋里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停在李士真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妮莉和维多——正走下车来。马尔青狠狠地说：

“呵，这好人儿现在又回来了，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他说完就走进屋里去。

保尔整天为了他的步枪而伤心。就在这时候，他的好朋友薛尔基，正在一座荒废的披屋里，用着锄头使劲挖掘墙根，最后，他终于挖好了一个土窖，把他得到的三支新枪放下去。他不愿意把这三支枪交给德国人；在前一天晚上，他整夜的心绪非常不安，因为他准备和这些心爱的东西分别，在埋藏之前，他早已用破布好好把它们包扎了。现在他用泥土填满土窖，用力把它压下去，然后用一堆垃圾和一些旧的用具盖住它。当他严格地把他的工作检查了一番之后，他自己觉得十分满意，开心地摘下帽子，揩去头上的汗珠。“好吧，现在就让他们来查好了，”他自己这样想。“要是他们当真查了出来，谁能够指出这是谁家的房子呢！”

保尔不知不觉地已和沉默的、在电力厂里做了一个月的机匠朱赫来，结成好朋友了。机匠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这打下手的火夫，叫他慢慢懂得这一行。他很喜欢这伶俐的小孩，有空的时候，时常到他们家里闲谈。朱赫来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态度庄重的退职水手，他

时常倾听着柯察金家各种小事情的唠唠叨叨的叙述，甚至她老人家关于保尔小时种种恶作剧的诉说，也耐心听下去。每逢玛丽亚恼怒的时候，他总有法子叫她平静下来，这样她也渐渐忘掉了她的不幸，使大家显得格外愉快。

有一天，朱赫来当保尔走过电力厂里的天井时，微笑着拦住他说：

“你的母亲告诉过我，说你喜欢打架，像小斗鸡一样的好斗。”他笑着，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似的。接着他又说：“打架倒不是坏事情，不过只要你晓得为什么打和跟谁打。”

保尔不晓得朱赫来是不是在开他的玩笑，所以他说：

“我不是平白无故就打架的，我只有在有道理的时候才打架。”

接着，朱赫来完全出其不意的问道：

“你愿意我把打架的正当的方法教给你吗？”

保尔惊异地注视着他：

“你说‘正当’——是什么意思？”

“哦，你听听吧。”于是他把拳斗的方法简略地告诉他。

保尔不是容易地就学会这本事的，但他倒也学得不错。有好几次朱赫来的拳击把他摔开去，他还是不断地耐心的学下去。

有一次，天气很热，他由克林加家里回来，在屋子里来回地闲踱着，找不出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决定到他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就是房子后头的披屋的屋顶上去。他穿过天井，走进小花园，到了披屋的跟前，便从墙壁上爬到屋顶。他用力拨开笼住披屋的樱桃树的枝丫，一直爬到正中的地方，方才面向着可爱的阳光横躺下去。

这披屋的一面朝对着李士真斯基的花园，要是你爬到屋顶的顶上，便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他们的房子的一面。保尔把头伸过屋脊，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一部停在那儿的四轮马车。那个住在李士真斯基家里的德国上尉的马弁，正在刷着他的主人的衣服。保尔时常在他们的 大门旁边，看见这位德国上尉。他是一个矮子，脸色红润，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口髭，夹鼻眼镜，戴着漆皮帽遮的便帽。保尔也晓得这上尉是住在厢房里的。它的窗子正朝着花园，这些可以由屋顶上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上尉正坐在桌旁写着东西，接着他就拿着他写好的东西跑出去，他把那信交给他的马弁之后就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到通马路的边门去。当他走到那凉亭时，他停了下来，显然正在跟谁说话。李士真斯基的女孩妮莉跑了出来，上尉拉着她的手，两人就一同走出花园到马路上。

这些保尔全看见了。当他正打算睡一会的时候，他看见那马弁走进上尉的房间里，把脱下的军服挂上，推开窗子，将屋子收拾一遍。接着他又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一分钟后，保尔看见他已在满系着马的马厩里。

保尔向那敞开的窗户望进去，整个房间都看得很清楚。傍窗的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他给好奇心引诱着，悄悄地攀上樱桃树，跳到李士真斯基的花园里。他弯着身子，急急走了几步，便到了那敞开的窗前，他看见房间里的一切。在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条带着鞘子和枪套的皮带，枪套里面，正装着一支可爱的十二响的满利赫尔牌手枪。

保尔屏住气息。有几秒钟，他的内心发生剧烈的战斗，但随即给不顾死活的大胆激动了。他弯着身子，握住那枪套，抽出那支崭新的手枪，随即就跳进花园里。他匆忙回身一望，小心地把那支手枪插进口袋匆忙的穿过花园，像猴子一样的攀上樱桃树爬到了屋顶。这时候他又回头看一看，那马弁正无事地跟着马夫在闲谈，花园还是静悄悄地……他马上溜下披屋走向家里。

他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没有注意到他。他把箱子后面的破布藏进口袋里，悄悄地溜出房门，穿过花园，越过篱笆，沿着到森林里的大道奔去。他一面握住那时时碰着的他的

大腿的沉重的手枪，一面飞一样的跑向荒废了的砖窑去；他的双脚简直没有触着地面，风在他的耳畔不停呼啸。

老砖窑里死寂无声，屋顶有几处已经倒塌下来，堆积的碎砖和毁了的炉灶，现在凄惨的景象；遍地满长着荒草。只有他们三朋友时常到这里来玩儿，所以保尔，晓得有许多既安全又秘密的地方，可以藏着他偷来的宝贝。

他从一个破洞攒进灶里去，随后就伸出头来，小心地向四周注视；路上空无一人。松树飒飒地在低诉，微风荡起了路畔的灰尘。四处充溢着浓烈的松脂的气息。

保尔把那只用破布包扎好的手枪放在灶底，再用一堆小砖块盖住它。他攒出灶洞后，还用砖块塞住灶门，做个记号，然后悄悄地沿路回家，他的膝盖一路不断的战抖。

为着早点儿离开家，还不到上班的时候他就上厂里去。他从看门人那里拿了钥匙，打开大门，走进了机器间。当他揩着风箱，抽水入锅，和生起火来的时候，他不断想着李士真斯基家里的情形不晓得是什么样子。

在午夜快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朱赫来跑来找保尔叫他到外面，小声地问道：

“今天军警为什么到你们家里搜查呢？”

保尔吓得浑身发抖：“搜查什么呢？”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说：

“他们在搜查着，事情并不好。你真的不晓得他们搜查什么吗？”

自然，保尔知道得很清楚，但他觉得最好不要把偷手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因此他虽然浑身战颤。只这样问道：

“他们捉了阿尔青吗？”

“谁也没有捉去，但已把你们家翻得一塌糊涂了！”

听到没有人给捉去，他稍为感到宽慰，但仍然非常害怕。有几分钟，他们两人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一个心里害怕，因为晓得他们要搜索的是什么东西——一个心里害怕，却因为他不晓得。朱赫来心想：“也许他们正在搜索我吧？我的事情，阿尔青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他们干什么拣他的家来搜查呢？”于是他决定将来应该格外小心一点。

三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忧虑地望着她那熟悉的家园，和那些绕着花园的正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着的杨树。她真不相信她离开故乡已经整整一年了；看起来，好像离开这从幼年时候就熟悉的园景，只是昨天的事情。而她就在今天趁着早班车回来似的。一切没有半点儿改变。还是那整洁的花卉的行列，还是那几何线条一样的，两旁植着母亲她喜爱的三色堇的花径。花园里一切都是整洁的，连一根野草也没有，到处可以看见那老练的林务官——冬妮亚的父亲——那勤勉的手的劳绩，然而这却引起冬妮亚的厌烦。

她拿着她正在阅读的小说，打开了通向走廊的门，踏下台阶走进花园里。她又推开花园的边门，走向秀彼多夫卡轨站的小塔旁边的水池。

她踏过小桥，缓缓地走到路上。这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沿着池塘种着白杨和垂柳；左面过去，是一片森林。她正想走到池边古石堆砌的地方，但她看见一支钓竿在水面上飞动着，于是她站住了。

她弯着腰，站在弯曲的柳树下面，用手分开杨柳的枝条，于是她看见一个黝黑的赤足的孩子，裤筒卷到膝盖上，一只生锈的，盛满虫子的马口铁听子，放在他旁边。这少年正聚精会神做着他的事情，没有注意到冬妮亚的注视。

“这里难道可以钓到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一望，他看见一个不认得的女孩挽着柳条，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她穿着白色的水手装，领子上滚着蓝边，短短的裙子是灰色的。一双脚踝上绣着花朵的短袜，

紧紧地套在她那晒黑了的健壮脚上，下面着的是茶色的皮鞋。她那栗色的头发编成一股粗大的辫子。

拿着钓竿的手轻轻地放下去，鹅毛的浮子沉进了水里，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层层的波纹。他听见在他后面的柔润的声音说：

“咬钩了，你瞧，咬钩了。……”

保尔的心情紊乱了，他迅速地拉起绳子，把插着蚯蚓的钓钩提上来，溅起了一大阵水花。

“多讨厌呵，”他对自己说。“满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原来却钓到了这妖精。”

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笨拙，他用力把钓钩向远远的水中抛去，结果落在两个牛蒡中间，这恰恰是他不应当抛到的地方，因为这样鱼钩就会搭到牛蒡的根上。一看出了这一点，他便头也不回的向坐在后面上边的女孩咕嘈说道：

“你别吵了吧！这样把鱼都吓跑了。”

立刻，他听到上面传来了一阵嘲笑和挑战的声音：

“呵，它们一看见你那丑脸孔，早就逃了。再说，谁在下午钓鱼呢？你是个多出色的渔夫呵！”

保尔虽竭力保持他的礼貌，但已经忍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气愤的表示——然后选着他最文雅的语句说：

“呵，小姐，还是请你走开一点吧！”

冬妮亚的眼睛眯成一条线，接着便含笑的张开来，说道：

“我真的打扰了你吗？”

她的声音里已没有嘲笑的成份，只带着友谊和诚恳，所以真要马上动火的保尔终给解除了武装，他说：

“呵，要是你喜欢这样，那也无妨。你坐在那地方，我是不会介意的。”于是他重新坐下去，小心注视着他的浮子。这一次钓钩又落在牛蒡旁边，而且显然已挂在它的根上了。保尔不想把它拉出来，他对自己说：“要是挂住了，便无法叫它掉开来。那女孩一定要笑我的。她干什么不走开呢？”

冬妮亚却更加愉快地坐在摇动着的垂柳下面，把书放在膝头，不再注视着那黑眼睛的和晒得黝黑的小流氓，他曾经给她这么个粗暴的欢迎，现在他却理也不理她。

保尔呢，他可心里清楚地看见水上那女孩的倒影。她正在读书，因此他缓缓地，开始轻轻拉着他的绳子，浮子沉下去了，绳子也给拉得紧紧的。“挂住了，妈的，”他心里这样想，同时，他一斜视，便看见水上现出一对笑着的眼睛。

就在这时候，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二个年青人走下来，他们是公立学校里大概快要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是站长兼机师苏哈尔科的孩子。他是一个道地的蠢材，年纪十七岁，白头发，麻子，满脸雀斑；手里拿着一付美丽的钓竿，嘴唇上放荡地刁着一支香烟。同他一道的是维多·李士真斯基，一个高身的柔弱的青年。

苏哈尔科弯着身子，向维多眨着眼睛说：

“你瞧，那是一个桃花样的少女，本地没有一个比得上她，她是十足浪漫的。她在基辅上学——现在已经六年级；是回家来消夏的。她的父亲是本地的林务长。我的妹妹丽沙认得她。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她，这样的事情你是晓得的，其中尽是些美丽的字句，我说我不顾一切的狂爱着她，我战栗地期待着她的回信。……”

“哦，她回信怎么说呢？”维多满有兴趣地问。

苏哈尔科很有点狼狈。他说：“你晓得，是一大套女性的撒娇胡闹。真的，你不能讨厌这些，这种麻烦的殷勤是需要的。要不，便还是在夜里到铁路修理厂附近，只消三个卢布，你就可以弄到一个你一想就要吊口水的美人。一点也用不着这些浪漫的恋爱的把戏。我曾

经和瓦里亚——你认得他吗？他是铁路上的工头。——一道去过。”

维多·李士真斯基轻视地皱着眉头。

苏哈尔科双唇咬着纸烟，吐了一口痰。他正想说别的什么，维多却阻住他说：“那么，你可以把这朵桃花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让我们快点去，别给她溜跑了。昨天早上，她正在这儿钓鱼呢。”

这两个人走近冬妮亚，苏哈尔科扔掉唇上的纸烟，非常恭敬地鞠了一鞠躬。

“您好吗，杜曼纳夫小姐。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接着，苏哈尔科拉着维多·李士真斯基的手臂：“你们两位都不认识吗？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多·李士真斯基。”在手足无措的情形下，李士真斯基把他的手伸给冬妮亚。

苏哈尔科想引起话题来，于是问道：

“今天，您自己为什么不钓鱼呢？”

“我忘记带钓竿来。”

“我给您去拿一支来，”苏哈尔科慌忙说，“暂时用我的好了。我马上给您拿来。”他已经照李士真斯基的意思给他介绍了，现在他急想离开，好让他们两人在一起。

但冬妮亚却阻住他说：

“不，那样我会打搅别人的，已经有人在钓鱼了。”

“打搅谁？呵，那家伙吗？”现在他方才看到保尔坐在茂密的树林下面。“让我马上叫那家伙滚蛋。”

冬妮亚来不及阻止他，他已跳了下去，走到保尔跟前，对他说：

“喂，把钓竿收起来，赶快滚开，听见吗？”他说完了，看见保尔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于是接着喊：“快点，滚蛋！”

这时候，保尔抬起头来，用着充满恶意的眼色，斜睨着苏哈尔科：

“你别捣乱；你那厚嘴唇叽哩咕噜什么？”

“什——什么！”苏哈尔科动火了。“你这可怜的恶棍，还敢回嘴！我叫你——马上滚蛋！”他狠狠地用脚踢开那装满虫子的铁罐。铁罐子飞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几转，随即就掉落水里，激起了一大阵浪花，把冬妮亚全身溅湿了。

“苏哈尔科，你怎么不害羞呀！”她叫喊着。

保尔跳起来了。他知道苏哈尔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而阿尔青又在机车库里做工，要是他现在打了这面色像老鼠的麻子，苏哈尔科肯定要告诉他的父亲，那么一切的麻烦都要堆在阿尔青身上。就是为了这唯一的理由，他才没有马上惩戒他。至于苏哈尔科呢，当他觉得保尔正要打他时，他立刻扑过去，用双手推着站在池边的保尔。保尔扬起双手，向前弯一弯腰，但毕竟无法恢复身子的平衡，终于掉到水里去。无论如何，苏哈尔科比保尔要大两岁，而且是一个出名的打架好手和莽汉。这打击已把保尔激怒了。

“呵，正好，正好，”保尔喊起来，“来罢！”

他挥起小拳头，横里就给苏哈尔科脸上一拳，正当苏哈尔科还来不及加以招架的时候，他已挣住他的短褂，猛力拖着他跌进水里去；这时候，苏哈尔科已站在深达膝盖的水中，把发亮的皮靴和裤子都浸湿了。

苏哈尔科竭力想挣脱保尔的铁手，但保尔已把他拖进水里去了。一分钟后，保尔已跳到岸上。掉进水里的苏哈尔科，发狂似的追着他，好像要把他撕成碎片似的。当保尔一站在岸上，回转头看着他时，他马上想起：“左脚顶住全身，右脚稍弯，使之易于伸屈。不仅用手及臂，且须运用全身，猛击对方下巴，打时先用足踢，然后用手。”于是他依着这方法做去了。

随即，是一阵牙齿吱吱作响的声音。苏哈尔科因为舌头咬破了，下巴挨了可怕的打击，

一面哀叫着，一面举起双手，在空中乱抓，最后终于倒到水里去。

在岸上的冬妮亚正嘻嘻哈哈地在大笑：

“好啊，好啊！”她拍着手喊。“打得真好啊！”

保尔拿住钓竿，拉断了钓线，朝路上跑去。当他走的时候，他听见李士真斯基对冬妮亚说：

“这是最凶狠的恶棍，他的名字叫保尔·柯察金。”

接轨站上开始不安起来了。

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快要开始大罢工。邻近某大车站车厂里的工人们，已经实行了。德国人捉了两个司机，因为他们有传送叛变命令的嫌疑。同时，德军的征发和地主们的返回农村，在那些与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工人们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哥萨克卫兵团的马鞭，已在农民的背上刻上了伤痕。本省的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增长中，有十队以上的游击队在活动着，其中一部分是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

在这些日子里，朱赫来简直完全没有休息。自从他到镇上来了之后，他已完成了大规模的组织工作。他认识了许多铁路工人，做了许多青年人的晚会的客人，而且在接轨站的铁路工人和本地的锯木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组织。他竭力想叫阿尔青参加，当他问阿尔青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主义有什么意见时，这健壮的铁路工人却这样回答：

“哦，非奥多，你晓得，我对于党的认识是很浅薄的。但是如果需要我，我随时都准备尽力，你是可以信赖我的。”

这回答使朱赫来很满意。他知道他可以信赖阿尔青，只要他把工作分给他，他没有不做的。至于参加党呢，他觉得阿尔青还不是一个很合格的人。“不要紧的，”他对自己说，“只要有机会，他可以马上把起码的ABC念会的。”

同时，朱赫来已离开电力厂，开始在铁路工厂里做事情了。这是比较有利的，他以前可以说跟铁路方面完全没有联络。现在，接轨站上的运输已变得格外繁忙，德国人正急急把由乌克兰征发来的东西运回德国，几千辆的车子上满装着裸麦、小麦、和牲畜。……

有一天，哥萨克的军官们突然逮捕了车站的电报员巴诺马连科，他们把他解到司令部里，并且施用了骇人的酷刑。显然，他已把罗曼的煽动工作告诉他们。（罗曼是阿尔青在火车工厂里的知心同志。）因此两个德国兵和一个哥萨克官员——车站司令部的副官，在罗曼上工的时间内来捉他。他们走到他做活的长桌前面，一句话也不说，那副官举起马鞭抽他的脸。

“畜牲，一道走！有话要跟你说。”他随后便做了个可怕的鬼脸，使劲拖着他的臂膀。“到我们那儿去煽动吧。”

这时候阿尔青正在邻近的钳砧上工作；他看见这光景，立刻放下锉刀，走到那副官跟前，双眼直视着他，竭力抑止胸中沸腾的愤怒，用一种吵的声音说：

“你怎敢打他呢，你这猪猡！”

那副官倒退一步，伸手解开他的枪套，同时一个矮矮的短腿的德国人，立刻拿下挂在肩上的插着宽边刺刀的步枪扳着枪机，大声叱道：

“站住！”他站定，准备阿尔青一动就开枪。

这巨大的铁路工人，绝望地站在这可怜的小兵面前，失去了一切活动的力量。

两个人都给捉去了。过了半点钟，阿尔青已被释放，但罗曼却给他们关在行李间里。十分钟后，机车库里的全体工人开始罢工，大家聚集在车站的公园里，别的许多人，如司机、岔道夫和行李房的工人也一齐参加。所有的人都极度兴奋，当场拟就了要求释放罗曼和巴诺马连科的请求书。但副官和他的一队兵士，已在小公园外面出现，那副官摇着他的手枪，高声喊道：

“马上散开，要不，我就把你们每一个都捉起来，有的还得枪毙！”

群众至此更加愤激了。工人们凶猛的叫喊，迫得他退回车站去。这时候奉车站司令部的召唤而来的德国兵车，已经出动了。工人们这才分头回家。他们全体都离开车站，就是那些值班的也一齐退出。朱赫来的工作已收到实效，这是车站里第一次的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月台上架起机关枪来了。它看起来很像一只套着皮带的站着的狗。一个德国伍长蹲在它旁边，手指正扳着机枪的枪机。

车站上立刻空无人影。

夜间的逮捕开始了，阿尔青也在里面。朱赫来那天晚上没有回家，他们也找不到他。被捕的人全拘留在大货仓里，德军向他们提出哀的美顿书：——开始工作呢？还是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实际上全线的铁路工人都已罢工，那天晚上，一辆车子也没有到，同时七十五哩外的沿线的正有激战，一部分革命游击队已切断了铁路线，还炸毁了几座铁桥。当晚有一队德军开到车站，但机师、助手和火夫都跑了，只留下空的军用列车，所以他们无法开出。除这一队之外，还有两队也在车站里等候开放。

货仓的铁门开了，车站司令，他的助手德军上尉，和一队德国兵走了进来。

那副官喊道：

“柯察金、波力道夫斯基、布鲁克，你们三个人马上随车出发。如果拒绝，立刻枪毙！你们去不去？”

那三个工人悄然地点着头表示允诺，在监视之下走上列车；接着副官又念起另三个人——一机师，副机师，和火车——的名字，把他们派到另一列车去。

机车愤怒地喷出一阵阵发光的火星，沉重地喘息着，在夜的浓黑中，飞速地沿着铁路线开去。阿尔青添好了煤炭，用脚把炉门碰上，从箱子上面那矮鼻的茶罐里呷了一口茶，然后转身对着那上了岁数的机师，波力道夫斯基说：

“老伯伯，我们就这样地运送他们吗？”

老机师愤怒地眨着浓眉下面的眼睛。

“谁也没有法子的，拿刺刀的人在后面押送着呀！”

“我们冒险跳出机车去怎样呢？布鲁克说，偷偷地看着那个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

“我也这样想呵，”阿尔青咕嘟着。“就是这个家伙在背后监视着呢。”

“是——啊，”布鲁克说，犹豫地凭着车窗往外看。

老波力道夫斯基移近阿尔青，在他耳边低声的说：

“我们不能运送他们的。那边正在激战呢。我们那些暴动了的伙伴们已把桥梁炸坏了，我们却运送这些猪猡；使他们在转眼间，有结果我们的同伴的机会。别忘记，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我也从不曾在罢工的时候开过车子的。现在更加不愿意。如果我是帮别人打败自家中间的一个，这实在太丢脸，比死还要难受。不是吗？开车的人们都逃光了。他们虽然拼着性命，但达到了目的。我们决计不应把这一列车子开到目的地去，你们说对不对？”

“我同意，但我们怎样对付他呢？”他看一看后面那个兵士。

老机师皱着眉头，用一撮棉屑擦去前额的汗水，还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看一看气压表，好像他希望从那里得到这难题的解答似的。过一会，他又带着失望的怒容，恶狠狠地咀咒着。

阿尔青又从茶壶呷了一口水。两个人都想着同样的事情，但谁也不肯首先说出来。突然，阿尔青记起了朱赫来的问话：“老兄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什么意见？”他又记起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随时都准备尽力，你是可以信赖我的。”好出色的尽力——运送着讨伐自家弟兄的敌兵！……

“波力道夫斯基弯腰伏在工具箱上，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他紧靠着阿尔青，苦痛地对他

说：

“我们只有用这东西结果他，看见吗？”

阿尔青大吃一惊，但波力道夫斯基咬紧的牙齿吱吱地在响，继续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用这东西使劲敲他的头，然后把调节器和杠杆投进炉里去，再把蒸汽阻住，大家马上跳下车去，”

阿尔青感到好像把肩膀上的重负放了下来似的，他说：

“好的。”

他走近布鲁克，弯着身子，把他们的决定告诉他。

布鲁克并没有马上答复他。他们都在冒着可怕的危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尤其是波力道夫斯基，家里有九个人靠他活命。然而每个人又都晓得他们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布鲁克终于说：

“好吧，我完全同意，除此以外，没有旁的法子；只不过谁做……”他没有说完，阿尔青已懂得他的意思。

阿尔青转身对着正在转着调节器的老头子，点了点头，表示布鲁克也同意这意见。但他给另一个苦痛的还未解决的难题所激动，终于弯身靠近波力道夫斯基，对他说：

“但是，我们要怎样动手呢？”

他注视着阿尔青。

“由你动手呀，你比我们都有力气。只消用铁杆狠命敲他一下，就行了。”这老头子说时现出非常昏乱的样子。

阿尔青紧皱着眉头。

“这个我是不成的。无论如何，我不能干这事情。只要你想一想，他毕竟是个小兵，并没有罪过。他也跟我们一样是刺刀迫着他到这儿来的啊！”

“什么，没有罪过？这话是你说的？”波力道夫斯基张大眼睛瞪着他。“难道我们也有罪过吗？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运送一队去讨伐我们自家人的敌兵，这些家伙是会无情地射死我们的革命兄弟的。他们没有罪，难道我们的弟兄是有罪的？……喂，你这傻瓜，力气像一头牛，但性子却像……”

“好吧，”阿尔青沙沙地低语着，一面提起了那铁杆，波力道夫斯基接着低声说：

“算了，让我拿吧，我比你靠得住此。需要的话，你再用铁铲干他一下。我装做用铁杆去敲碎煤块。”

“你说的对，老伯伯。”布鲁克听见了他说的话，点了点头说，一面坐到调节器旁边的座位上。

那个德国兵士，戴着一顶无遮的镶红边的布帽，两腿夹着步枪，坐在煤水车的边沿上，抽着方头的雪茄烟。他只是偶而抬起头来，望一望机车里的工人们。

当阿尔青爬到煤水车上面去抓取煤块的时候，那兵士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而当波力道夫斯基好像要把旁边一些较大的煤块抓下来，作着手势，请他走开一点的时候，那德国兵倒十分顺从地溜下身子，走到机车的门边去。

骤然，阿尔青和波力道夫斯基已听到铁棒猛击着德国兵的头盖骨的短促而沉重的声音，这使他们像给火烧着了一样的惶惧。德国兵的身子无力地滚到煤水车和机车中间的走道上去。

无遮的帆布帽立刻渗出血渍，他的步枪在铁站台上哒哒地震响着。

“完了，”波力道夫斯基低声地说，把铁棒丢在一旁。他耸一耸肩膀，然后战颤地弯低身子，继续说道：“现在，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三个人都悄然无语，但他接又着喊起来：

“来吧，赶快把调节器拧掉！”

十分钟后，一切都做完了，没有人驾驶的列车，缓缓地开动。

沿路树木那黯黑的轮廓，在机车的火光笼罩下显现，接着又消失在无边的浓黑里，车头的亮光想透过夜的黑暗，但只能射到前面十二码的地方。现在火车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似的，它的呼吸逐渐的缓下来。

“跳下去，孩子！”阿尔青听见背后的波力道夫斯基的声音，于是他松开那紧握着的车棒的手。惰性使他笨重的身子跃下，直到他的双足触着急速往后移动的地面。他颠了两步，便直栽下去，翻了一个筋斗。就在这时候，另外两个个人已各各从机车的一边跳下车去。

布鲁克家里是非常阴郁的，安东妮娜·娃西里耶夫娜——薛尔基的母亲——这四天来的心神非常错乱。她完全得不到她丈夫的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曾叫他和柯察金、波力道夫斯基两人一道去开一列军用的专车。昨天晚上三个哥萨克的宪兵曾到她家里，粗暴地讯问她，想知道她的丈夫的消息。

她从那些问话里，隐约猜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所以当宪兵们走了的时候，这个一肚子惊骇的可怜的妇人，便结着头巾，决定到柯察金的母亲那里，打听她的丈夫的消息。

她的大女儿娃莲，正在厨房里洗扫，一看见她的母亲要出门去，便问道：

“妈妈，您要到远的地方去吗？”

“安世妮娜双眼满含着泪水，看着她的女儿说：

“我到柯察金家里去，也许可以在他们那里听到你父亲的一点消息。要是薛尔基回家来，你告诉他到车站上波力道夫斯基家里去一趟。”

娃莲感动地拥抱着她的母亲，送她到门口，竭力的安慰她说：

“妈妈，您用不着焦急啊。”

保尔的母亲跟平常一样热烈地招待安东妮娜。这两个妇人都希望从对方听到新的消息，但刚一交谈，她们各自的希望便消失了。柯察金家里昨夜也给搜查过。他们是要捉阿尔青的，临走时还告诉保尔的母亲说，她的儿子一回家来，她就应当马上向司令部报告。

宪兵夜里的搜查，使保尔的母亲非常惊骇，因为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保尔夜间一向是在电力厂里做工的。

保尔在天亮的时候回家。当他听到母亲说宪兵昨夜到家里检查和搜索阿尔青之后，他整个的心，都为了担心他的哥哥的命运而绞痛。不管他们性格的不同和阿尔青外表的粗鲁，兄弟两人相互间的友爱，还是十分亲密的。这是一种粗莽的爱，并不表现在外表上，保尔十分清楚地知道，只要他的兄弟需要他时，他什么都可以牺牲，而且毫不踌躇。

他一刻也不停，马上走到车站上去找朱赫来。但他找不到他，他认得的人也都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就是波力道夫斯基家里的人也什么都不知道。在他们家的天井里，保尔碰见了波力道夫斯基的幼子波力斯，晓得宪兵昨天晚上也到他们家里搜查，想捉他的父亲。

保尔并没有给他母亲带来什么新鲜的消息，他疲乏地倒在床上，沉溺在恼乱不宁的睡眠中。

娃莲听到敲门的声音。

“谁呀？”她转过身来，一边问一边把门门拉开。

在敞开的门外出现的，是金黄色的头发蓬乱的克林加。他显然是跑着来的，满脸通红，不断在呼呼地喘气。他问娃莲：

“你妈在家吗？”

“不，她出去了。”

“到那儿去了？”

“我想，大概是到柯察金家里去。”克林加正想跑开，娃莲却一把挣住他的领子，把他

拉回来。他呆呆地望着她说：

“有紧要的事情，我得马上找她去。”

“什么事情呢？”娃莲还是拉住他不放，而且用命令的口气说。“赶快告诉我，你这黄毛小熊，赶快说，我忍不住了。”

克林加忘记了预先的一切警告，忘记了朱赫来曾严格地命令他只能把条子交给安东妮娜本人。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污秽的纸条，把它交给娃莲。他是不能不理睬薛尔基的姊姊的，因为每当他接触到她时，他的态度总是局促不安。自然，这老实的厨房小厮，无论如何，是决不承认他正爱着她的。

现在她匆忙地读着那张纸条：

“亲爱的东妮娜！请你不要忧虑。诸事平安。我们全都活着，而且过得很舒服。详细情形，你马上就可以晓得。请你转告其余的两家说，他们也都安好，用不着挂念。把这条子烧掉。查哈尔”

娃莲一念完这张条子，便跳着冲到克林加跟前：

“黄毛熊子，亲爱的，你这条子是从那里拿来的？告诉我，你这结舌的小熊！”她用尽全力摇着克林加，但克林加以为他又做错了事情，心里莫名其妙，只回答说：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接着他想起了他不应该说出这句话，因此又补添一句：“不过他告诉我，不要把它交给别人家。”

“呵，好的，我不告诉别人家，”娃莲笑了。“现在，小熊，请你送到保尔家去，我的妈妈就在那儿。”她轻轻地往他的背上一推，于是克林加那金黄色的头，又在门外消失了。

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回家。当天晚上，朱赫来到柯察金家里，把他们在车上的经过告诉保尔的母亲，而且尽力安慰那吓坏了的老妇人，说他们三个都很平安，住在僻远的乡村里的布鲁克的一位叔伯家中，只是此刻不便露面，不过德国兵的处境很窘迫，变动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所有这些，使这三家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读着那宝贵的纸条，接受了极大的喜悦，因为他们的家庭是非常惨淡和寂寞的。

有一天朱赫来装着顺便的样子，去看看波力道夫斯基老太婆，把两张克伦斯基钞票交给她，说道：

“老太太，这是你丈夫寄来家用的，不过你要当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家。”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呵，谢谢你。我们近来真是穷得要命，连小孩子们都没有东西吃了。”

这钱是从布加科夫留下的经费中提出来的。当朱赫来离开了那老妇人之后，他一路走一路想：

“哦，哦，将来的事情让我们等着瞧吧。大罢工虽然被破坏了，工人们却仍然在死刑威胁之下，继续工作，大火正在闷烧，他们是永远不能把它扑灭的。至于这三个人，正是所谓英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在瓦洛比奥·巴尔加村村外大路上，一家简陋颓败，四壁熏得乌黑的老铁工场里，波力道夫斯基站在融融的火炉旁边，对着旺烧的煤火，微微地眯着眼睛，用一只铁钳翻着一段烧得通红的铁棒。阿尔青则弯着身子，伏在由横柱子吊下来的风箱上面，用力地在吹火。

那火车司机的满腮的鬃发的脸上，闪出衷心的微笑，他对阿尔青说：

“我想，在这村子里，我们这工场的生意决计不会差，活计已多到我们做也做不过来。再过一两个星期，我们要设法寄点腌肉和一两袋面粉回家去。孩子，你别小觑这桩行当，农民们对铁匠一向是很尊敬的。这么着，我们在这里倒要像道地的资产阶级一样得法啦，”——他又笑起来。“说到查哈尔呢，他的情形是特别的。他跟本地的生活十分接近，现在正

同他的叔父一道在种地。自然，我不是在非难他。阿尔青，你我两个，没有车子也没有谷仓，全靠额上的汗水过活，你可以说，我们是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但老查哈尔却脚踏两板桥，你可以说，他一脚踏在火车上头，一脚却站在牛栏里面。……”他又转动那段铁棒，随后十分认真地说下去：“不过，孩子，我们可不能太过放心，要是德国兵不能很快的给赶出去，咱们还得逃到耶卡特林诺斯拉夫或是托斯托夫去，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提着我们的腮巴，用绳子穿起来，像晒鱼一样的把我们吊在半空上。”

阿尔青咕噜地回答：“是的，你说得对。”

“我们家里的人又怎样呢？他们怎能对付那些警察的压迫呢？”

“老伯伯，要是提起这桩事情，咱们还是摊开被窝，上床睡觉去吧。”

那老工人从火炉里钳出那段烧成蓝灰色的铁棒，马上把它放在铁砧上面。

“来，好孩子，使劲捶吧！”

阿尔青挣起那只斜靠着铁砧的锤子，用力地把它举过头顶，向下猛捶，发光的铁滓发出嘶嘶的响声，向铁工场的四面飞溅，于是一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黯黑的角落。波力道夫斯基不断地在每一捶击之后，转动着那火热的铁条，而它也就像蜡一样服贴地渐渐给打平了。

温暖的夜晚的风，由敞开的门口一阵阵的吹了进去。

冬妮亚坐在花岗石的岸边，在它下面是一片湖塘，阔大而且深沉；环池的松树摇点着它们那高矗的头。她正一心一意地读着李士真斯基借给她的书本，没有注意到有人已爬过那隔开松林和池岸的短墙。当那个闯入的人掷出一块小石头，落在她的书本上之后，她才惊讶地抬起头来，看见保尔遥站在她的前面。这偶然的邂逅也使他感到惊异和狼狈，他一面转身走开，一面说：

“呵，我惊动了你吗？我不晓得你在这儿。我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

“你并没有打搅我。要是你高兴，我们还可以谈谈一会儿。”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你跟我有什么话可以一道谈谈呢？”

冬妮亚笑了起来。

“嗯，你为什么老站着呢？瞧，你可以坐在这儿，”——她用手指着一块石头——“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保尔·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唔，现在我们已经互相介绍了。”

保尔很害羞，不自然地弄着他的帽子。

“这样我可以叫你保尔了。”冬妮亚打破了刹那间的沉默。“你时常到这里来……”她本来想说“洗澡吗？”因为不愿意对方晓得她看过他洗澡，于是就改着说——“散步吗？”

“不，不常来，只是偶然在有功夫的时候才来的。”

“那么，你在什么地方做事吗？”

“我在电力厂里当火夫。”

保尔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回答那女郎的问话，直到她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多念几年书呢？”

“我给学校开除的。”

“为什么呢？”

保尔的脸红赧起来。

“因为我在神父的面酵上撒了烟丝——因此他们把我赶了出来。他是一个性情极坏的老畜牲，我们全都吃过他的苦头。”保尔把整个的经过都告诉她，她也好奇地倾听着。

渐渐地保尔已不觉得害羞，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好像他们是老相识的朋友似的。

他还把他的哥哥阿尔青怎样没有回家来的经过说给她听。他们两个一心一意地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已经谈了几个钟头。后来，保尔骤然想起了，立刻，跳起身来，说道：

“哎呀，已经到了我上工的时候了。我们谈了多少话呵，我全没有顾到时间，我应该立刻去生火了。说不定达尼罗此刻正在动气哩。”他非常兴奋地对她说道：“哦，再见吧，小姐，现在我不得不跑到城里去了。”

冬妮亚立刻也站起身来，穿起外衣。

“我也应当走了；我们一道走吧。”

“哦，不，我是要快跑的，你赶不上我。”

“跟不上吗？我们可以一道赛跑，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着她问：

“赛跑？你跟我赛跑？”

“是的，让我们看看吧，现在先走出这儿再说。”

保尔跳过那面石墙，又帮着冬妮亚过去，于是他们走到松林里那条通到车站的宽平的大路上。冬妮亚站在大路中央，喊道：

“现在起跑：一，二，三……”

他们一起向前飞跑。她那双小靴子的后跟，像电一样迅速地闪亮，她那外套的衣带在风中飘舞着。

保尔跟在她的后边，他对自己说：

“再过两秒钟，我就可以追上她。”他拼命追着她那飘动的大衣，但只有到了树林里的大路的尽头处，快要到车站的地方，他才追上了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地圈住她的肩膀，胜利地高喊道：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歇一息吧，你已跑累了。”她说。

两个人停步了，全都怀着一颗急跳的心，呼呼的喘着。冬妮亚因为疯狂地跑，乏得厉害，因此无意间稍稍挨着保尔，这么一来，使他们成了更亲密的朋友。虽然只是一刹那间，但已深深地刻在保尔的记忆里。

接着冬妮亚解开保尔的双臂，对他说：

“你是第一个赶得上我的人。”

现在他们分手了。保尔一面对她摇着帽子告别，一面向城里跑去。

当保尔走进汽锅房时，老火夫达尼罗气忿的转地身来，狠狠地说道：

“你用不着这么早就来的！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代你生火吗？”

但保尔却愉快地拍着他的肩膀，和气地说：

“别着急，老头子，火一子就升着起来了。”他说着马上朝柴堆走去。

到了午夜，当达尼罗躺在床上，像猪一样打鼾时，保尔已把整个发动机注上了油，随使用拭布擦好双手，从口袋里把第六十二卷的《求斯壁·加里波的》拿出来，这那不列斯“红衫党”的传奇式的领袖的冒险故事，马上使他入迷了。“她用举世无双的蓝色的眼睛，瞟了公爵一眼……”——于是保尔便对自己说：“是的，她也有一对蓝眼睛。她还有着特别的东西，不跟别的富家女孩一样。而且她不是跑得像魔鬼一样快吗？”

保尔沉醉在深思里，他追忆着当天下午的邂逅的每一情景，完全会没有注意到发电机因紧张而发出了越来越大的闹声；那巨大的飞轮正在狂速地旋转，他踏着石台，也在激烈地震颤。过了一会，他无意中看一看那汽压计——指针已越过了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哟，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下来，扳开放汽的龙头，把它转了两圈；从汽锅房里，他已可以听到由放汽管排出去的水汽，正嘶嘶地流到河里去。于是他把龙头关上，又把皮带套在抽动唧筒的轮子上面。

到这时候，保尔方才看一看达妮罗，他正裂开大嘴的酣睡着，鼻子里不断哼出可怕的鼾声。半分钟后，汽压表的指针已回到原处了。

一种初度的、和仍然是不自觉的爱情，已偷偷地窜进了青年火夫的生活里，它是极端新鲜的，又那样富于难以说明的激动；这顽强的野孩子的心神，已给弄得非常不宁静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在保尔看来，林务官跟律师李士真斯基是同样的人物。保尔是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起来的，他对每一个被他叫做“阔人”的人，都十分仇视。因此，他对目前这种感情，就怀着警戒和疑惧，他晓得冬妮亚跟石匠的女儿嘉莉亚完全不同，不能把她当做他认得的、自己一样的人看待。这心理使他防备她，准备随时加以报复，因为像她这样漂亮和受过教育的少女，对一个可怜相的火夫，也许会有嘲弄和侮蔑的举动的。

保尔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她了，现在他决心再到湖边去一趟。他故意穿过她家前面的小路，希望能够碰见她。就当他缓缓沿着屋外篱笆走去的时候，他已窥见花园尽头处那熟识的水手服装了。他拾起篱笆旁边的一颗松子，朝那白色的衣服投过去。

冬妮亚慌忙转过身来。一看见他，她马上带笑的跑到篱笆跟前，把她的一只手伸给他：

“毕竟你终于来了。这些时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曾经到池滨去，把书忘掉在那儿。我想你是会来的。进来，到花园里来。”

保尔摇着头。

“不，我不进去。”

“为什么不进来呢？”她惊疑地皱着眉头。

“没有别的，我想你的爸爸会为这事大发脾气，给你惹来许多麻烦。他们会问你，干什么要把这小无赖带进花园里来。”

冬妮亚生气了。她说：

“保尔，你别瞎说。马上进来吧。我的爸爸决不会说半句闲话，等下你自己就晓得了。进来吧。”

她走过去开了园门，保尔踌躇地跟在她后面。当他们两个坐在花园里的圆桌旁边的时候，她问保尔道：

“你喜欢看书吗？”

“非常喜欢。”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书呢？”

保尔想了一会，接着就说：

“《求斯巴·加里波的》。”

“是《求斯壁·加里波的》，”冬妮亚纠正他——“你很喜欢它吗？”

“是的，我现在已念完了六十二卷。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它五卷。呵，他是怎样一个人啊！”他非常热情地说。“他真是一个英雄。这是我顶喜欢的。他虽然同他的敌人们斗了多次，但他终究是胜利的。他游历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我愿意告诉你——要是他还活着，我一定要跟着他。他是一个手工业工人，他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为着穷人们而战斗。”

“你愿意看看我们的小图书馆吗？”冬妮亚问他，一边拉住他的手。

“哦，不，我不想到屋里去。”保尔缩回手，拒绝她说。

“你为什么这样倔强呢？你真的害怕吗？”

保尔俯视着他那赤裸的双脚，它实在太脏了。他搔着后脑袋，对她说道：

“你的妈妈或是你的爸爸不会把我赶出来吗？”

这使她动怒了。“哦，你别瞎说吧，我真要生气了。”

“唔，不是我在胡说。李士真斯基就不答应我们这样的人走进他屋里去，顶多只让我们

到他的厨房里。他就在厨房里跟我们这样的人说话。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到他家里去一趟，他的女孩妮莉，死也不许我走进她的屋里。我想，她大概怕我弄脏他们的地毯，这鬼东西。”保尔笑着这样说。

“走，走吧！”她双手按住他的肩膀，很友爱地推着他走上阳台去。

她领着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摆着一只很大的橡木橱子的房间。冬妮亚拉开了橱门，里面有几百本书整齐地排列着。这丰富的藏书使他吃了一惊。

“让我们一道找出你顶喜欢看的书吧。往后，你还可以按时到这里来，把你喜欢看的书带走。你愿意吗？”

保尔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我是最爱念书的。”

他们在一起过了好几个钟头，全部十分快乐，十分满足。她还介绍他同她的母亲见面，这在他已不是怎样害怕的事情了，保尔倒喜欢她的母亲。冬妮亚又领着他去看看她的房间，以及她的书籍和学校里的课本。在她房间里，有着一只镜子不很大的梳妆台，冬妮亚带他去到镜子跟前，笑着对他说：

“你为什么把头发弄得这样乱呢？你从来就没有剪过梳过吗？”

这问话使他窘住了，但他还装着镇定的样子回答道：

“当它长得长了的时候，我就用剪子把它剪短；除此之外，叫我怎么办呢？”

冬妮亚只是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只木梳，很老练地把他那纠乱的头发梳个整齐。

“哦，现在你完全是另一个人了。”她看了看，觉得梳得很满意。“头发是应当梳剪整齐的。你呢，就像个野孩子似的。”

接着冬妮亚又用批评的眼光，看一看他那褪色的发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她对这一切没有说什么，保尔已注意到她的眼睛，所以心里觉得有点惭愧。

临走时，冬妮亚反复叮咛他要时常来，而且要他守约，别忘了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意穿过屋里，再碰到她的母亲，所以从窗口一跃跳到花园里去。

因为阿尔青离了家，柯察金家渐渐难以支持了。保尔的工资是不够家用的。

玛利亚最后决定同她的儿子商量，是否可以让她自己再找一点工做做，因为她恰巧听到李士真斯基家里要雇一个娘姨，但是保尔不答应她。

“不，妈妈，还是让我再找额外的工做吧。火锯工厂里正要雇人搬运木板，我可以到那里做它半天，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过下去。我不愿意你再到外面做活，要不然，阿尔青准要生我的气，骂我不想法子，反而叫母亲去做活。”

玛利亚竭力说明她为什么应当去做工的理由，但是保尔完全不听她的话，临末她终于放弃了她的主张。

第二天，保尔已经在火锯工厂里做工了。他把刚锯开的木板搬到晒木场去。在那里，他遇到学校里的老同学米士加和伊凡。他们三个人都讲定论块算钱，收入倒也不坏。保尔每天早上到木厂里上工，晚上则上电力厂。十天之后，他把初次在木厂挣到的工钱带回家来，交给他的母亲。当他交钱的时候，他红着脸孔，踌躇了一会，终于说：

“妈妈，你要给我买一件蓝布衬衫，就像你去年买给我的那样。这还花不到一半的我钱呢，而且，往后我还可以多挣，你别怕，妈妈，你看我这一件多么旧了。”

“呵，亲爱的，自然，自然，我今天马上就给你买去，”她亲切地看着她的孩子说。“你说的很对，这一件实在太不像样了。”

保尔在理发馆的前面停住了，他摸一摸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匠助手是一个活泼的青年，一看见客人进来，照例总是恭敬地点着头让到椅子上。

“请坐吧！”

保尔坐在一只宽大舒适的安乐椅上，刚抬起头，就看见镜子里那狼狈的、有点惊慌的脸

孔。

“平剪吗？”理发匠这样问。

“是的。不，是这样。我是说：要剪齐一些。你们叫这做什么呢？”他用手指做出一个姿势，帮着说明。

“我明白了，少爷。”理发匠笑着说。

一刻钟后，保尔带着满脸的汗珠和惶乱的心情走出了理发馆，头发总算梳剪得整齐了。他那头纠乱的头发，着实叫理发匠花了好大的功夫，但热水、刷子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一走到外面，他不觉呼了一口大气，把帽子往下一拉，心里想着，当他母亲见到他的时候，她会就说什么吗？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心里不高兴了。

“这肮脏的小火夫，好不客气呵。”她有点气愤，但是一连几天没有看到他，她渐渐感到难受。

有一天，她正想出门，她的母亲半拉开房门的说：

“冬妮亚，有个客人来会你，让他进来吗？”

在大门跟前站着的，就是保尔。冬妮亚开头认不出他，他穿着一件簇新的衬衫，一条黑色的裤子。鞋子也揩得干净，闪闪地发着亮光。他的头发——冬妮亚一开头就注意到——也已剪过了，不像早先那样蓬乱。这黑黝的火夫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冬妮亚差一点泄露出她的惊讶，但她不愿意叫他难堪，这年青人一向总是十分敏感的。她对这惊人的变动，故意装出不注意的样子，只是责难他说：

“你不害羞吗？为什么你不来钓鱼？你是这样守约的吗？”

“我这几天到火锯工厂里去做工，没有闲功夫。”

他不能向她说明为着要给自己买这件衬衫和裤子，他这几天已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冬妮亚已猜到这一点，所以她的怨恼完全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到花园里去吧。”他们两人一道走进花园里，又从花园转到外面的路上去。

就在这时候，保尔已把她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把他那极大的秘密——他怎样偷了那上尉的手枪的经过，统统告诉了她，并且约好她再过一些天到树林里去放枪去。

“你要当心，别把这秘密泄露了。”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当他说的时侯，已把“您”字改做“你”字了。

冬妮亚很得意的回答道：“我决计不对别人提起这件事。”

四

阶级与阶级间的猛烈而残酷的战斗，已渐渐在全乌克兰展开了。武装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而每一次战斗都产生了许多新的战士。恬静的日子及其停滞的生活，早已成为过去，而且离得非常遥远了。

暴风雪在疯狂地飞舞者。舒适的人们所住的颓屋，已在暴风雪中震颤；他们全都紧贴着地窖的墙根，或是躲在室内的防洞里面。

像崩雪一样倾泻入整个省份的，是彼得留拉(Petlioura)将军属下的各式各样的匪帮：他们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领袖，有种种的派别，如高鲁布，奥山吉尔，安吉尔和果底斯，以及别的无数的名目。其中有些是道地的绿林强盗，有的是退伍军官，有的则是左翼的或右翼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员——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冒险家，他们招集一批恶棍，展开黄蓝大旗，宣言自己是真正的哥萨克将军。“拥护彼得留拉”的队伍，因此他们就获得了他们的才能与党徒所能获得的权力。事实上，就是由于这些杂色队伍，以及富农，柯诺瓦里兹将军占领军中的加里西亚部队等的协助，才使“大头目彼得留拉”得以创建他的“旅团”和“师团”在社会革命党与富农的骚乱的汹涌海洋中，由赤热与钢铁结成的布尔什维克的

游击队，正在不断的战斗着，万千的马蹄以及辎重车与炮车，使乌克兰的大地，起了颤颤的战栗。

在一九一九年这狂乱的年头的四月里，那些给吓得半死，因而变得痴呆的舒适的人们，睁开惺忪的眼睛，打开自家的小窗，畏缩地问着那些比他稍为早起的邻居：

“阿夫托诺，今天本城是在那一派手里的？”

那个阿夫托诺，就提着裤子，怯怯地望着他说：

“我还没有确实知道啊，阿法那。昨天夜里，有一些兵士开进城来。我们等一会看看，要是他们抢掠犹太人，我们就可以晓得它是彼得留拉的队伍，要是他们是‘同志们’的，那么马上就可以从他们的说话中听出来。我正在留心观察，不晓得今天应该挂起谁的肖像，弄错了可就糟糕。你听过泽拉辛的经过没有？这笨家伙眼睛还没睁开，就糊里糊涂地挂起列宁的肖像，恰巧有三个人——后来晓得他们是彼得留拉的人——跑了进来，一看见那肖像，泽拉辛可就倒霉了。他们在他身上抽了二十鞭子，对他说：‘你这狗养的，我们立刻把你这张红色的共产主义者的皮剥下来。’不管他怎样哭喊分辩，他还是吃足苦头。”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一队武装的人，在石子路上行走，他马上关上窗门，躲了起来。

多么骚动的日子啊。……

至于工人们呢，他们看见彼得留拉匪帮那黄蓝色的旗子就痛恨，但又无力反抗沙文主义的(C chauvinistic)“乌克兰独立”运动的狂潮，只有当在城厢一带活动的赤色游击队，像木楔似的突进城里，与那些由四面八方围攻他们的彼得留拉匪帮，进行猛烈战斗的时候，他们方才活跃起来。每隔几天，他们自己那面工人阶级的红旗，就在市政公署上飘荡着，但游击也有再度退却的时候，于是黑暗又返回来了。

目前本城的主人，是■第尼泊师团的“华丽与荣耀”的高鲁布上校。昨天傍晚，他那二千多恶汉，举行了胜利的入城式。上校老爷骑着一匹硕大的黑色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在四月天炎热的阳光下，他还穿着一件由脖子罩到足跟的高加索式的厚外套，戴一顶镶红边的查波罗兹哥萨克式羊皮小帽，一身捷加沙的军服，腰上束着皮带，并携带全副的武装——一柄弯的短剑，一柄长的柄上镶银的指挥刀。高鲁布上校老爷是一位美男子，眉毛漆黑，脸孔雪白，只因经过无数次的饮宴，白中稍微带黄。上校老爷一向研究着查波罗兹人的风俗习惯，对当地的查波罗兹人的一切风尚，全都知道得清楚，现在他扮起真正的查波罗兹人来，就跟流动戏班里的戏子一样逼真，口里也一样咬着一支烟斗。在革命前，上校老爷是一家炼糖厂的甜菜农场和经理，但这种生活有点无聊，不能跟哥萨克将军的地位相比，因此这甜菜种植场的经理先生，就在泛滥全国的混流中，摇身一变，成为高鲁布上校老爷了。

在城里唯一的剧场里，为着庆贺这新来的部队，正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彼得留拉派的智识阶级的“名角，”全都聚在这儿——乌克兰的教师们，牧师的两个女儿——大的是个美人叫安娜，小的叫金娜，许多卑贱的贵妇，波多斯基伯爵前时的用人，和自称为“自由的哥萨克”的一大群中等阶级，最后就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渣滓。

剧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娘儿们——女教员和别各种女儿——的打扮，全照乌克兰特有的风尚，穿着色彩鲜丽的绣满花朵的衣服，戴着杂色的珍珠缀成的项圈，围住她们的，是一大群高级的军官，他们的马刺得得地在响，装束完全模仿古代的图画，而且酷似“查波罗兹的哥萨克人。”

部队里的乐队像响雷一样的奏起乐起，舞台上正狂热地准备着上演“民族”戏剧《诺查尔·斯托多里》。但没有电灯，因为没有电流。这事马上报告给在总司令部里的上校老爷。上校今晚本来想亲自出席，使宴会锦上添花，现在听到他的副官——乌克兰称号为骑兵少尉巴里扬，其实是陆军少尉波里扬——的报告，就傲慢地但又坚决地说道：

“电灯无论如何是要亮的！要是想留你这条命，那么找机械匠去，把发电机开动！”

巴里扬少尉并没有死，他毕竟把机匠找到了。

一点钟后，他的两个兵士领了保尔到发电所来，同样，他们也找到了机匠和机师。巴里扬冷冷地对他们说：

“要是到今晚七点钟灯还没有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他用手指着一根铁梁。

这简短和命令已经奏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那天晚上，当上校老爷和他的女人出现的时候，晚会热闹得如醉如迷。他的女人是他所住的酒馆老板的女儿，有着丰满的胸部和麦色的头发。那酒馆的老板，曾经花钱使他的女儿，在省里最大的高级学校里念书。

他们坐在台前的荣誉席位上。接着上校老爷表示好戏已可以开场，于是帷幕立刻揭开，观众看见那慌忙走进后台去的舞台监督的背影。

在演戏的时候，高级长官和他们的“太太们”，高傲地喝着酒。不惮奔走的巴里扬，早已用征收的方法，预备好大批的好酒和精美的食物。到了戏快终场的时候，他们全都喝得酩酊大醉。

这时候，巴里扬就摆着酷肖演戏的姿势，跃上舞台，挥着双手，用乌克兰语喊道：

“诸位老爷，跳舞立刻就开始了。”

在座的人们一齐鼓掌，并且起身走到天井里去，以便调动士兵们保护晚会，和搬开座椅腾出剧场来。

半点钟后，剧场里开始响起了嘈杂的声音。醉得一塌糊涂的彼得留拉的军官们，正疯狂地跟那些热得满脸通红的当地美人，跳着“哈巴”舞。他们那笨重的脚步，把老戏院的墙壁都震动了。

就在这时候，一队武装的骑兵，正从风车磨坊那边向城里驰来。

城外一个配有机枪的彼得留拉哨岗，注意到了前进的骑队，兵士们慌忙跑到枪位的后面，咯咯地扳动枪机，尖锐的喊声冲破了深夜的静寂：

“站住！来人是谁？”

两个乌黑的人影，从黑暗中走上前来，其中有一个走近哨位，用着沉醉的沙哑的声音吼喊道：

“我是头目巴夫力和我的队伍——你们是高鲁布的队伍吗？”

“是的，”走在前头的军官回答。

“我的部队驻扎在那儿好呢？”巴夫力问。

“我立刻用电话问总部去，”哨岗当值的军官这样回答，便隐入路旁那狭小的望室去。

一分钟后，他跑出来，喊道：

“弟兄们，把路上的机枪拉开，让头目巴夫力进城去。”

巴夫力一直拉着马缰，走到灯光辉煌，外面有许多人在来往走动的戏院门口。

“啊嚏，”巴夫力说，“这里倒满舒服哩，呃，”他转身向着同他并骑的副官说。“下马吧，老兄弟。让我们也进去喝一杯，再找一两个女人玩玩，这里有的是，让我们随便挑拣吧。喂，斯太科，你照料兄弟们好好驻下来。我们全停止这里，卫兵跟着我。”于是他用力地跳到地上。

在戏院的入口处，两个武装的卫兵问他说：

“票子？”

他轻蔑地看他们一眼，用肩膀把一个查票员推开，他随身的十二个卫兵也这样跟着挤进了剧场，他们把马都系在场外的栅栏上。

这些新到的人们，马上被人注意了，尤其是巴夫力更加触目——他身材高大，穿着头等

布料 的紧身军服，青色的近卫军制裤，戴一顶毛茸茸的高皮帽，肩上斜挂着一支毛瑟枪，一颗手榴弹结在他的腰带上。

“这些人是谁？”那些跟跳舞者站在一边的人中，有谁这样问。这时候高鲁布的副司令正在跳着疯狂的舞蹈，他的对手是校长的大女儿，因为她旋转得太快，裙子像扇子一样的展开，把她的丝衬裤完全显露了，这使周围的武士们非常快意。

巴夫力用肩膀挤过人丛，走到圆圈子的中央，一面翘起舌尖舐着干燥的嘴唇，一面不住用阴沉的眼睛注视校长女儿的大腿。过了一会儿，他直走到乐队那里，靠着栏杆，挥动他那支编成的马鞭，粗声喊道：

“奏‘哈巴舞’曲啊，再闹猛一些！”

乐队的指挥并不注意他。于是巴夫力伸着手，在那指挥员的后背抽了一鞭。指挥员像被针刺了似的，吃惊地跳了起来。

音乐立刻骤然停止了，大厅里像死一样静寂。

“多么莽撞呵，这个人！”酒馆老板的女儿激愤地说，一面神经质地挣住坐在她旁边的高鲁布的胳膊，“你不应该宽容他！”

高鲁布愤愤地站起身来，踢开他前面的椅子，跨了三大步，走近巴夫力。他紧站在他的面前。他马上就认出他，这就是和他争夺本地政权的敌手，高鲁布有好一笔旧帐还没有和他清算呢。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巴夫力曾经用最卑鄙的方法暗算了高鲁布。当高的所部，正和屡次阻遏了他们的红军游击队酣战时，巴夫力不袭击布尔什维克的后背，反而把他的部队开进本城，肃清了少数的红军，在周围筑起坚强的防御工事，从事空前未有的劫掠。自然，被牺牲的都是犹太人，这是很合彼得留拉部下的胃口的。就在他们肆行抢杀的时候，红军把高鲁布的右翼杀得个落花流水，随后才全师撤退。

现在，这无耻而傲慢的骑兵上尉，竟闯进这里来，还动手鞭打上校老爷的乐队指挥。这自然是高鲁布不能容忍的。高鲁布心里非常明白，如果他不能很干脆的了结这件事，往后他在部队里的声威就不值一文钱。

这两个人呆站了几秒钟，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互相虎虎地注视着。

接着，高鲁布一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指挥刀的刀柄，一只手捉住袋里的手枪，大声喊道：

“混蛋，你怎敢动手鞭打我的部下？”

巴夫力的手，缓缓地移动到毛瑟枪的后柄上：

“站稳些，呵，高鲁布上校阁下，请你站稳些，要不然，你会摔跤的。我告诉你，你别赌气伤了感情啊！”

这已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捉住他们，扔到外面去，每人给他五粒卫生丸！”高鲁布高声的喊。

他的部下立刻像猎犬似的，从四面八方围捕巴夫力那一群人。

有人拍的一声放射了一枪——恍惚像电灯泡摔破似的——于是撕打的人们开始像狗群咬架一样，在地面上翻滚着，他们用军刀胡乱对砍，这个揪着那个的头发，那个扼着这个的喉咙，妇女们像猪一样吱吱地嘶叫着，朝各方面奔跑。

几分钟后，他们踢着敲着，把解除了武装的巴夫力和他的卫兵，由剧院拖到天井，再由天井拖到大街。在格斗的时候巴夫力失掉了高皮帽，鼻子也给打塌，武装也给解除，他简直气得发狂，他和他的部下一到外面，便跨上马，向着街上疾驶而去。

晚会停止了。在这样的事件之后，谁都没有作乐的兴头。妇女们坚决拒绝跳舞，要求陪送她们回家，但高鲁布现在非常固执，他下了命令：

“不准任何人离开剧场，加强门口警卫！”

巴里扬慌忙执行了他的命令。高鲁布呢，他对许多人的抗议只给予一个回答：

“诸位，我们一直跳到天亮，现在由我开头跳一次华尔兹舞。”

音乐又开始演奏了，然而快乐已不能返回。当上校和酒馆老板的女儿合跳的华尔兹舞，还没有跳完一周，哨兵们已跑了进来，高声喊道：

“巴夫力的兵士把剧场包围了！”

就在这时候，戏台旁边那些朝着街道的玻璃窗，已克拉克拉地碎落在地上，机关枪的钢铁的鼻子，已从这空洞的窗棂上伸了进来。它呆笨地左右转动，像在选择散落的人群，而所有的人都在亡魂丧胆地避开它，恍惚它是吃人的亚魔似的。巴里扬突然朝屋顶那一千支烛光的大电灯泡，开了一枪，它像炸弹一样的爆开，碎了的玻璃屑细雨一样的落在各人的头上。

剧场里完全黑暗了。外面有人喊道：

“大家全到天井里去呀！”接着是一阵丑恶的可怕的骂声。

女人们昏狂的歇斯底里的叫喊，黑暗中来回的奔突，竭力想召集散乱的部属的高鲁布的狂乱命令，以及场外那喊声和骂声，汇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谁也没有注意到巴里扬已像泥鳅似的，从剧场后面的窗口跳到静悄悄的后街上，直奔向高鲁布的总司令部去。

半点钟后，城内便发生了正式的战斗。连珠的枪声和机关枪的哒哒声震破了深夜的静寂。惊呆了的舒适的人们，全跳出温暖的被窝，潜伏在他们的窗子底下。最后，枪声渐渐寂灭了，只有一架机关枪像哀乞的狗一样固执地断续地在城外遥吠着。

战争已经完结了。晨光正朦胧……

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城。

这风声爬进了河畔斜坡上的犹太人住区。在那些挤在一起，湫隘、简陋、带着歪斜的窗户的，也称为住屋的箱子里面，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密密地住着许多贫穷的犹太人。

在薛尔基做了两年工的那家印刷所里，所有的排字工人的和别的工人都是犹太人。薛尔基跟他们非常熟识；大家像一家人似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那名叫布伦斯丁的大腹便便的自私的厂主。在这印刷厂里，工人们与厂主时常不断的发生斗争。布伦斯丁唯一的目的是尽量榨取劳力，少付工资，因此有许多次，印刷所一停就是两三个礼拜。厂里一共有十四个人，薛尔基年纪最轻，但他摇起印刷机来，一次就是十二小时。

在最近这几个骚动的月份里，印刷所已失了常态，事先全不晓得它要印的是什么东西；这一回它印的是哥萨克“领袖”们的告示。

今天，在这特殊的日子，薛尔基已注意到工人们的不安。患肺病的排字工人孟德尔，把他拉到旁边，用忧郁的眼光注视着他，说：

“我想你已经听到城里将发生大屠杀的消息了，是不是？”

薛尔基惊骇地瞪着他：

“不，我没有听到。”

孟德尔把他那干瘦的黄手，按在薛尔基的肩上，像父亲似的信任地说：

“没有错的，屠杀一定要来，一定的。他们要虐杀我们犹太人。我想问你，你究竟愿不愿意在这不幸的时候，帮忙你的同志们？”

“自然，我很愿意，只要我办得到。要我怎么办呢，孟德尔，你说吧。”

排字工人们都在倾听他们俩的谈话。

“薛尔基，你是个好青年，我们都信任你。”孟德尔说。“毕竟，你的爸爸也是一个工人。现在你马上回家去问你爸爸，看他是否答应让几个老人和老太婆到你们家里避一避；至于谁到你们家里，让我们大家再商量。此外，你找找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躲一躲。这些强盗

到底还不骚扰俄国人。快跑吧，薛尔基，时不宜迟了。”

“好的，孟德尔，别怕，我马上到保尔和克林加家里去——我相信他们也一定答应收留几个人。”

但孟德尔显然不很放心。他慌忙阻住薛尔基，问道：

“等一下，你说的这两个人是谁？你真的知道他们靠得住吗？”

“自然，我晓得的，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薛尔基自信地点头说。“保尔的哥哥阿尔青是一个机械匠呀。”这使孟德尔放心了。

“呵，阿尔青，我认得阿尔青的。我们曾经住在一起过。好的，你马上去，赶快带信给我们。”

于是薛尔基风也似的朝大街奔去。

在巴夫力和高鲁布双方部队交战后的第三天，虐犹的大掠夺和大屠杀便开始了。

巴夫力的部队结果吃了败仗，他后来另外占据一处较小的市镇。那天混乱的时候，他损失了二十几个人，高鲁布方面的损失也与这相等。死者当天匆忙地给带到墓地去，毫无举行葬典便加以掩埋——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足以夸耀的地方。两个哥萨克“领袖”一见到了就像野狗一样对咬起来，这不是体面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这冲突在高鲁布的联队里，引起了某种的不满，特别是他的卫兵中队，因为它的损失比别的部队来得多。为着消除这种不满和“鼓舞士气”起见，巴里扬向高鲁布建议给士兵们一点“消遣”——这就是大掠夺和大屠杀的冷酷的暗示。他力言当士兵们心里不满的时候，这“消遣”是十分必要的。上校老爷本来不愿在他刚要和酒馆老板的女儿举行婚礼之前，扰乱了本城的治安，但在巴里扬这威胁的言辞之下，他只好答应了。

骚动在很早的晨间便开始，城里还蒙着一层拂晓的灰色的薄雾。绕着破落的犹太人住区的荒凉的街道，像一条条湿透的帆布，死沉沉地没有半个人影。所有的窗户都挂上窗帘，百叶窗也紧闭着，不见一点亮光。在表面上看来，这些人家好像都在做着甜蜜的朝梦，但在可怜的屋子里面，人们却彻夜未眠。家家的人们都穿好衣服，挤在一间房子里面，准备着不幸事件的到来，只有不懂事的小孩们，在他们的母亲怀里，静静地酣睡着。

那天早上，高鲁布的卫队长沙罗美，一个黑脸孔、样子很象吉卜赛人、腮巴上有一块紫色的军刀疤痕的家伙，为着喊醒巴里扬，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一时还不能够从最痴呆的梦中醒转过来，因为一个咬牙露齿的驼背恶鬼，整夜都在搔着他的喉咙，直到现在，它还是无法把它打退。

“醒醒呵，瘟神爷！”沙罗美边喊边摇他的肩膀。“时候不早了，再缓就来不及啦！你昨晚不该喝的那么多！”

现在巴里扬完全清醒了，他坐了起来，疲乏地歪着腰，吐了一口苦痰。

“什么来不及了？”他用无神的眼睛瞪着沙罗美。

“你问的‘什么’是什么意思？干犹太人去呀！怎么，你忘了？”

这回巴里扬想起来了。是的，他的确完全忘了。昨天晚上上校和他的未婚妻，以及许多好伙伴们曾一同到郊外的别墅去，他们喝了许许多多的酒。

在进行掠夺和屠杀的时候，高鲁布最好是到城外去，往后他就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他离开的时候引起的误会，而巴里扬也就可以彻底的大干一下。呵，巴里扬倒真是“消遣”的专家啊！

此刻，他把一桶冷水倒在他的头上，思想的能力是恢复了，于是他大踏步走到总司令部，发出种种的命令。

卫兵中队早已骑在马上，办事精明周到的巴里扬，为着避免引起一切纠纷，他发下命令，在工人阶级住区，铁路工人住区和犹太人住区之间插一面旗，以作记号。同时在李士真斯基的花园里，又架设一支机关枪，把大路控住，这样，如果工人们出来干涉，就可以用铅

丸迎接他们。

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沙罗美和副官两人便跨上马背。当他们刚刚出发的时候，巴里扬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等一会，我忘记了。要准备两部车子呀！我们应当给老高鲁布找一些嫁妆才对。哈……哈……哈……首先获得的战利品，照例是归我们的司令官。其次——哈，哈，哈——第一个美人呢，是属我副官份下的。你明白吗木头。”——这最末的称呼，是沙罗美的绰号。

沙罗美用黄色的眼睛怒视着他说：

“让你说吧，往后再算帐！”

于是他们沿着石铺路出发了。在队伍前头的，是副官和沙罗美，后面就是纷乱的豺狼似的队伍。

天已透亮，晨雾消散了。当他们走到一家两层楼的，外面招牌上写着“福克斯——布匹服饰 杂货号”的店铺门口，巴里扬便拉住马缰，他那细腿的灰色牡马，不安地踩着路面的石头。

“上帝保佑，我们就在此处开始吧！”巴里扬跳下马来。接着他转对后面的士兵们，喊道：“喂，你们下马吧！好戏就在此地开场。伙计们，别敲碎人家的脑袋，要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多着呢，至于娘儿们，你们忍到今天晚上再说吧。”

兵士们中有一个露着牙齿，抗议道：

“哦，阁下，要是他们自己要干一下呢，那又怎么办？”

这话在周围引起了一阵哄笑声。巴里扬对那个说话的人，投过一个衷心赞成的眼色：

“自然，要是两方同意，尽管干好了，谁也没有权利禁止这样的事情。”

接着他就走近那紧锁着的店门，使劲地踢了一阵，但门是用橡门做成的，它连动也不动。

他又转过一个拐角，到福克斯的住宅那面去，开始用刀劈门。沙罗美也跟着他做。

屋子里面的人骤然听到马蹄的声音，而当这声音在店外消失之后，又听到一阵号喊的人声，他们的心，似乎快从体内迸裂出来了，他们的肉体仿佛也要死去一样。屋里一共有三个人。大财主福克斯本人，昨天已同他的妻子和女孩们离开本城，只留下女仆李娃看顾家产。李娃是一个忠实的不喜说笑的十九岁的女人，福克斯怕她一个人不敢住在这大房子里，就叫她把她的双亲接来同住，直到他们回家。这狡猾的老商人用种种话语欺骗这懦弱的女仆，叫她放心，还说回来的时候会带衣服送给她。

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满怀痛楚的希望，倾听着店外的每一动静。也许他们已走过去了，也许他们听见的这些人，并不是停在他们的店前，也许这只是一桩通常的事。接着，好像一下子整个打消了他们的希望，外面传来了一阵轰打店门的声音。

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毕沙，瞪着小孩样的惊惧的眼睛，站在通店铺的门边，开始喃喃地做他的祷告。他以一个最虔诚的信徒的热情。祈求万能的耶和华将不幸引离他这屋子。站在他旁边的老太婆，因为他在祈祷，不能立刻辨出渐来渐近的脚步声。李娃早已藏匿在最里面的房间里一只橡木橱子后面。

接着，住宅的门上响起了激烈而粗猛的撞门声，这使两个老人的身子起了一阵痉挛的颤。

“开门！”撞门的声更厉害了，外面激怒的人们正在厉声咒骂。

但这两个老人，此刻连抬起手来抽开门闩的气力也没有。外面的枪托像雨点一样不断打在门上，给门闩抵住的门板，开始暴跳起来，最后门终于哗啦一声的崩裂开了。

屋子里立刻挤满了武装的人们，纷纷朝各方面跑去。由住宅通店铺的一只小门，给枪托一撞就击碎，他们一窝风冲进店里，把大门的门闩拉开。掠夺至此便开始了。

最后，两部车子已装满了布匹、靴子以及别的各种脏物，沙罗美马上把它送到高鲁布的

公馆里去。在他刚回到福克斯家来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叫声。

巴里扬让他的部下洗劫店子，独自回到住家这边来。他用绿色的野猫似的眼睛，凶恶地向他们三个看了一眼，接着对两个老人说：

“你们滚出去！”

但那老头子和老太婆一动也不动。

巴里扬向前掠上一步，缓缓地开始拔剑出鞘。

“妈呀！”那女儿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声，这就是沙罗美所听到的。

巴里扬转过身，对那些听到喊声而进来的同伴，挥着手说：

“把他们拖出去！”他指着那两个老人。他们连拖带打把两个老人拉出去之后，他告诉刚刚进来正站在门口的沙罗美道：“我有几句话要跟这娘儿说说。”

当那老头子，重新喊了一声，冲到房门去的当儿，一个沉重的拳头打中他胸口，把他掷到墙上去。他虽然痛得昏晕，但当托依巴婆婆，这向来是温柔沉默的老妇人，像只牝狼一样，紧紧地抱住沙罗美的时候，老毕沙马上冲过去帮助她。

“让她走呀，让她走呀，呵，我的女儿啊！”

他们两个把沙罗美从门口推开去。沙罗美皱着眉头拔出了手枪，用枪柄在老沙的头上致命的捶一下，这样，那老头子便一声不响的瘫倒下去。

就在这时候，房里的李娃，发出了惨厉的哀叫。

他们把昏狂了的托依巴老婆婆拖到街上去。惨厉的哀叫和求助的祈祷，在荒凉的街心震荡着。

房里的叫声现在是停息了。巴里扬由房间里走出来。他看也不看沙罗美一眼——他的一只手正按住门的把手，预备推门进去——说道：

“别进去，她已经完结了；我用枕头把她闷死了。”他说着跨过老头子的尸首，踏进那面紫色的浓浊的血泊里。

“一开头就错了。”他咬紧牙齿嘟哝着，朝街上走去。

其余的人们默默地跟着他，在他们走过的地方，在地板和楼梯上，留下了腥红的血的足印。

城里已陷入绝望的混乱中。匪帮与匪帮间，为分赃不均而起的残忍的冲突，随处开始了，到处有徒手的格斗，到处有军刀在飞舞。

他们又从酒厂里滚出一桶桶的啤酒。随后再洗劫犹太人的住家。这洗劫丝毫没有遭到反抗。在那些龌龊矮小的房子里，他们找遍每个阴暗的角落，夺得了无数的物品，遗留下来的是一堆堆破旧的衣裳，撕裂的枕头，和赤裸的睡床。第一天只有两个死者——李娃和她的父亲，但即将到来的黑夜，却带来惨重的牺牲。

在天黑之前，这一群恶汉已喝得酩酊大醉。在酒性发作之后，他们变得格外残忍，而现在就在等着黑暗的到来。夜使他们的手更易伸展，越是黑暗越易杀死同类的人。就是胡狼也喜欢黑夜，但毕竟胡狼侵袭的不是同类，而是死尸。

许多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两个夜晚和三个白天。无数的生命已遭杀戮，已成残废；无数的眼泪为它流洒；无数青年的头发，在这血污的时日里，已由黄色变成苍灰；而那些幸存的人们，受了无可洗刷的羞辱与侮辱，留下被蹂躏了的灵魂，忍着难以形容的心痛和失去了亲人的悲哀，他们是否比死者更为快乐，也大成疑问。被侮辱和伤害的少女的尸体，歪扭地躺在小胡同里，也成为习见的事。

只有在城角小河旁边，当这些匪贼走进铁匠纳安的小屋里，企图抢夺他的妻子莎拉时，他们才遇到猛烈的抵抗。这身体健强的铁匠，充溢着二十四岁的壮年的体力，以他那双挥动铁锤的钢样的臂膀，誓死卫护着他的妻子。在他那矮小的屋子里，立刻发生一场凶猛而短促的格斗，有两个恶汉的头颅，就像烂西瓜一样的飞溅在地上。怒火燃烧的纳安，显得

格外可怖，他明知可怖的命运已经到来，但仍然凶暴地保卫他们俩的生命。因此在河岸附近、久久地响着尖脆的枪声，闻到了危险的气味的彼得留拉匪徒们，统统躲到那面去。当纳安的子弹用完了的时候，他先杀了妻子莎拉，然后拿着刺刀，预备冲出去作决死的厮斗，但他刚刚走下屋外的第一级石阶，一阵雨样的枪弹已把他射倒，连地面都给他那沉重的躯体压碎了。

临近四乡那些愚昧的农民们，骑着养得肥胖的马匹，挽着一车车他们心爱的东西，由高鲁布部队里自己的儿子或亲属们护送着，两三次地带着赃物返回他们的老家去。

薛尔基和他的父亲，早把一半的印刷工人藏在他们的阁楼上和地窖里。有一次他正经过菜园回家，看见一个人沿着石铺路在跑。这是一个老犹太人，穿着一件满是补钉的长褙的外衣，一边跑，一边绝望地挥舞双手。在他后面的，是一个骑在灰色马上，立刻就可以追到，正弯着身子准备加以痛打的彼得留拉的士兵。那老人一听到蹄声已经迫近，就翻过身来，就举着双手，仿佛在防卫自己似的。薛尔基随即冲到路上，直走到马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那老头子，大声叱道：

“猪猡，强盗，你敢动他！”

骑在身上的彼得留拉匪徒，并没有放弃用刀杀他的念头，于是他在这美丽的少年人的额子，顺势的削了一刀。

五

红军已开始猛烈压迫哥萨克大头目彼得留拉的各个部队了，因此高鲁布的联队也被调上火线，只有司令部和少数的后方警备队仍然留在城里。

人们开始活动了。犹太人住区那些矮小的屋子里，已现出苏生的景象。有许多人利用暂时的安静，来掩埋死者的尸骸。但每天一到夜静的时候，便可以听到一阵阵由远处传来的模糊的枪炮声——战事正在什么地方进行着。

铁路工人成群离开车站，到各乡村里找寻工作。中等学校已经关门。城里已实施戒严令了。

是黑漆一团的忧郁之夜。

在这样的夜里，不管你怎样睁大眼睛，依然无法克服当前的黑暗。人们都是盲目地摸索着走路，随时都会跌入壕沟，把头摔破。舒适的人们都知道在这样的夜晚，只好在家里静坐，而且不要点灯；屋子里最好是黑洞洞，愈黑愈加安全，因为灯光将招来一些不速之客。

就在这样的黑夜里，有一个人正在黑黑的路上，独自向前走着。

他走到柯察金家的外面，小心敲着玻璃窗。听不见应声，他再敲了一下，比前一下更响更坚决。

这时候保尔正梦见一个完全不像人的怪物，拿着一柄机关枪，向他瞄准，他很想逃，但四处无路，那支机关枪已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

窗上的玻璃，在坚决的敲击之下，咯咯地震响着。

保尔跳下床来，走到窗边，竭力想辨认出敲的人是谁，但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阴黑的影子。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母亲已到她姊妹——姊夫是制糖工厂里的一个机匠——的家里去。阿尔青则在邻近一个乡村里当铁匠，挥着铁锤过活。在窗外的一定是阿尔青。保尔已决定打开窗子。

“谁呀？”他向着黑暗问道。

于是窗外那个暗影开始晃动，用沙哑而低沉的声音回答：

“是我呀，我是朱赫来。”

他把两手放在窗槛上，这样，朱赫来的脸便高高地出现在保尔的前面。

“我是到你这里借宿一夜的，小弟弟，你答应我进来吗？”

“当然可以的，还用着这样问吗。”保尔十分亲切地回答。“就请你由窗口爬进来吧。”

朱赫来的笨重的身子，从窗口挤了进来，随后就顺手把窗门关上。他在窗畔站了好几分钟，静听外面的动静。这时候月亮恰好掠过云层，把路上照亮了。他小心地注视着沿路的情形，然后转过身来，对保尔说：

“我们不会扰醒你的母亲吧？我想她是睡了吧？”

保尔告诉他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这使朱赫来更加放心，说话的声音也稍稍提高一些。

“那些猪猡都在追捕我，追得好凶。他们查究车站最近发生的事件。本来，要是大家在排犹屠掠的时候，能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准可以干他们一下，但是你晓得，坏就坏在民众还没有战斗的决心，所以事情完全失败了。现在他们四处兜捕我。有两次，他们已经布置妥贴，差点把我捉去，今天早上，我又几乎遭了他们的毒手。那时候我正回家，自然打后门走，在披屋的旁边站了一会——你猜我看到什么，一个家伙正在花园里等候我，他紧贴着树身，可是刺刀露在外头。不用说，我马上翻身就跑。现在我就带着这双泥足到你这儿来。我想最好还是在你这里逗留几天。你反对吗？……呵，那好极了。”

这里，朱赫来就坐下去，一边喘气，一边脱下那双满是污泥的长统靴。

保尔看见朱赫来是十分高兴的。最近发电厂已经停工，保尔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觉得非常无聊。

这两个人上床睡觉了。保尔马上入睡，朱赫来却躺了好久，不断的在抽烟。接着他又下来，赤脚用趾尖走到窗边，朝街上窥视了好一会，然后方才上床。因为十分疲乏，他马上睡熟了。他的一只手搁在枕下，按住那支沉重的科尔特手枪，使枪柄老是温暖暖的。

朱赫来意外的夜访以及两人八天来的共同生活，给与保尔极大的影响。青年火夫初次从水手口中听到了许多新鲜的，重要的和激动的话语，这几天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的意义。

像铁笼里的老鼠一样地被关在那儿的水手，利用了这强迫休息的时间，把对压迫他们的乌克兰的“黄蓝色军队”的火样的愤怒和灼热的嫉恨，完全传给了保尔，保尔也如饥似渴地把他的每一句话吞咽下去。朱赫来用简短的字句，说得非常生动易懂。一切他都明白，他对他所要走的道路也十分明了，而保尔也开始懂得那一大堆名字很好听的党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全部是劳动阶级的死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不屈不挠的，跟富人作着顽强斗争的政党。以前，保尔就给这些名字弄得胡里胡涂。

就这样地，这波罗的海舰队的壮健的水兵，这壮大、坚定、久经海洋风霜的，自一九一五年即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的老布尔什维克非奥多·朱赫来，对着这青年火夫，讲述着残酷的生活的真理，这青年火夫，也用迷醉的眼睛，紧紧地对他凝视着：

“啊，小弟弟，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跟你一式一样。”他开始说。“我充满着反叛的热情，但不晓得把浑身的生命力向何处施展。我是在贫穷中长大起来的，当我一看到城里阔人们那些养得肥白的小孩，我晓得我为什么对他们那样仇视。我时常同他们斗殴，但除了挨我父亲一顿毒打之外，毫无结果。用那种简单的斗争，你是丝毫不能改变现状的。保尔，我亲爱的小弟弟，你可以成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优秀的战士，一切都具备，只是年纪还轻，而且对阶级斗争的意义不大明了。现在，小弟弟，我愿意引你走上正路，因为我晓得你富有革命的和反抗的精神。眼前的情形我实在看不下去，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燃起熊熊的大火了，奴隶们都已起来，他们快要把旧生活完全推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

必须有一个团结被压迫者的组织。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见到战斗就像蟑螂见到阳光一样逃匿起来的人们，而是坚决作战的勇士。”

他用握紧的拳头，使劲敲着桌子。接着，他站起身来，双手插进口袋里，皱着眉头在屋里来回踱着。

这幽囚的生活对他的压迫实在太重了。他很后悔停在这腐烂的小城里。当他想到再停留下去，还是没有好处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穿过战线，加入红军的部队。

他决定把九个党员组成的小组留在城里，让他们负起继续进行工作的任务。当他来回踱着的时候，他心里这样想：“你们没有我可以继续工作，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无所事事的停在这儿。我已这样地浪费了九个月了。”

有一天，保尔突然问道：

“非奥多，你究竟是什么？”

朱赫来一时不明白这问话的意思，便反问他：

“你还不知道吗？”

“我想你是个布尔什维克，也许就是共产党。”保尔沉静地说。

朱赫来扑哧大笑起来，用手拍着他那结实的胸脯，对他说道：

“小弟弟，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事实，正如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是同样东西的事实一样的明显。”接着，他突然非常认真的说：“你既然懂了这许多，记住——除非你想割破我的肚皮，要不然，这事行万不要向旁人提起。知道吗？”

“我知道的。”保尔坚决地回答。

就在这时候，他们突然听到外面一阵人声，还没有听见敲门，门已呀的一声开了。朱赫来慌忙把手伸到袋里，但立刻又抽了出来。进来的是薛尔基，他非常瘦削苍白，头上缠着绷带。跟着进来的是娃莲和克林加。

“小家伙，你好吗？”薛尔基握住保尔的手，作着鬼脸的说。“我们三个一道来看你。娃莲不让我独自来，她担心我，克林加又不让娃莲独自来，因为他提心她。他虽然是个金色头发的人，他至少还懂得一个人独自出门是危险的。”

娃莲笑着，用手掩住嘴巴的说：

“你真会饶舌呵。他今天一直的捉弄着克林加。”

克林加也和蔼地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我们应当原谅他。这可怜虫的脑盖挨了一刀，所以才这么可怜相啊。”说着，大家都笑了。

薛尔基因为伤口没有十分复原，所以躺在保尔的床上，这样朋友们间马上活泼地交谈起来。薛尔基以前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很愉快的，现在他却非常沉默和悒郁。他把彼得留拉兵士砍他的经过告诉了朱赫来。

朱赫来全认得他们。他时常到薛尔基家里去。他很喜欢这些少年人，他们虽然还没有在斗争的漩涡中发现他们的道路，但对于自己阶级的一般的号召，却是十分同情的。他入神地倾听着他们每个人怎样帮助犹太人，把他们的家人窝藏在自己家里，救活了他们的性命。那天傍晚，他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话，并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发生的事情。当这些小客人回家时，天已经很晚了。

朱赫来每天总是黄昏出去，直到深夜方才回来；他在忙着和那些留在本城的党员布置他们应做的工作。就在这天晚上，他一去就没有回来。

当隔天早上保尔醒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只空床。他骤然怀着模糊的预感，慌忙穿衣出门。他把房子反锁，将钥匙藏在平常的地方，立刻去找克林加，希望从他处听到一点关于朱赫来的消息。克林加的母亲是一个矮胖宽脸的妇人，满脸麻子，正在洗涤衣服。当保尔问她是否晓得朱赫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她紧接着回答说：

“你的头脑发昏了啦，好像我别的事情不用做，只管看顾你们的朱赫来似的？佐朱里卡的屋子给人翻个一塌糊涂，活该，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且问你，你找他干什么？你们纠缠在一起，究竟是什么意思？真是一队好伙伴呵，克林加跟你们这些小鬼。……”她说着狠狠地把她的衣服浸入水里。克林加的母亲一向就是这样子的。保尔接着到薛尔基家里，把他心头的烦恼告诉他。娃莲也参加他们的谈话，她说：

“烦恼什么呢？说不定他在朋友们处过夜呢。”她虽然这么说，语气可没有那样确定。

保尔心里非常烦躁，再也不能停在薛尔基家里，不管他们怎样留他吃中饭，他还是走了。快到家的时候，他满望能够看到朱赫来，但门还是反锁着。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心里十分阴沉；他不想走进那静悄悄的屋子里。

他在庭前踱跚了好几分钟，接着在一种捉摸不定的冲动驱使之下，他走向披屋里去。他爬到屋顶下面现在藏着满利赫尔手枪的地方，拨开蜘蛛网，把那支沉重的，用破布包扎的手枪拿下来。当他离开披屋，感到袋里的手枪的重量时，他已朝着车站走去了。

他依然得不到关于朱赫来的消息。在回来的路上，当他走过那熟识的林务官的家园时，他放缓脚步，怀着一种自己也不甚了然的希望，凝视着那屋子的各个窗门。然而，不论是屋里或是园里，丝毫没有人的踪影。已经走过之后，他还回头望一望那花园里的小径，它们仍然深深地淹没在去年的枯叶之下，现出荒凉失修的景象。显然，那位关心花草的主人的手，已好久没有动过它们了。这高大的老屋的冷落悄寂，更使他感到凄凉。

他与冬妮亚最末一次的会见，是他们认识之后最难忘的一次。这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偶然发生的。

当保尔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衫袋里，向城里走去的时候，他回想起他们争吵的经过。

有一天，他们两个偶然在街上见到了，冬妮亚请他上她家玩去。她对他说：

“爸和妈都上波山斯基家参加命名礼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家。保尔，亲爱的，到我家来吧。我们可以一同读读安特烈夫那非常有趣的小说《沙土卡·徐古利夫》。我已经念了一遍，但我很想同你再读一遍。我们将有着一个最愉快的夜晚。你愿意来吗？”

在束住密密的栗色头发的小白帽下面，她那对大眼睛，现出期待的神色，专注地凝视着保尔。于是，他回答道：

“我一定来的。”

这样他们两人就分手了。他慌忙回到机器房来，一想到他可以跟冬妮亚一块儿过着一整个傍晚，炉火便格外辉耀，木头也发出了更愉快的爆裂的响声。

那天黄昏，他敲着那宽大的正门，应声而开的是冬妮亚。她稍稍现出狼狈，对他说：

“我有几个客人。保尔，亲爱的，我不晓得他们今天晚上会来的，但你用不着走。”

他翻转身想走，但她拉住他的手臂，说：

“来吧，保尔，让他们认识你，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她用一支手臂钩住他，走过膳厅到她的房里去。一踏进房里，她便笑着对那些青年人说：

“你们曾见过面吗？这位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

有三个人正坐在房子中央的小桌子旁边，他们是丽莎·苏哈尔科，一个肤色浅黑的少女，有着古怪的小嘴，头发的妆扮——虽然她是一个女学生——非常卖弄风情；一个是保尔从未见过的长脸的小伙子，有可憎的样相和灰色的眼睛，穿着整齐的黑上衣，头发十分考究，服服贴贴地闪着生发油的亮光；在这两个人中间的，是穿着非常时髦的中学制服的维多·李士真斯基。当冬妮亚把门推开的时候，保尔一眼就看见他。李士真斯基也马上认出保尔，惊诧地耸起他那对稀疏的矢形的眉毛。

保尔一声不响，在门口静静地站了好几秒钟，用着蔑视的眼色烧着李士真斯基。冬妮亚急想打破这沉闷的静默，因此请保尔进来，又转身对丽莎说：

“给你介绍吧……”

丽莎本来正奇怪地注视着保尔，现在就站起身来。

保尔疾速翻转身子，大步走开，经过半暗的膳厅，走向大厅的门口。当他到了走廊的时候，冬妮亚赶上了他，一手挣住他的肩膀，非常惊讶地说：

“你干什么走呢？我的确要他们同你认识认识。”

但他把她的手由肩膀上掷下来，粗率地回答：

“毫无理由，为什么我非得在这些家伙面前展览一下不可？他们不是我能够结交的人。你尽管喜欢他们，我却憎厌他们。我从没有想到你是他们的朋友，要不然，我决不愿上你这儿来。”

冬妮亚抑住气忿，截断他的话头说：

“你凭什么权力跟我这样子说话？我从来就没曾问过你，谁是你的朋友，或者是谁到你家里去。”

保尔走下花园里的石阶，边走边说：

“他们上这儿来，跟我毫无关系，只是我可不再来了。”说着他就走出大门去。

从此之后，他们俩一直没有会过面。在虐犹的大屠杀中，他和厂里的机匠，正忙着收容电灯厂里的犹太人，把这次的口角完全忘掉了。但是现在他又觉得很愿再看一看她。

朱赫来的失踪，以及他今后在家准定要感到的孤独，使他此刻感到怅惘。在春雨之后到处泥泞的，低洼和车辙里尚积满着褐色泥浆的公路，像一条狭长的灰色的带，朝右边转了过去。那里有一座颓毁的房子，座落在路转角处，墙壁已经剥落，像长着癣疥一般，大路就在它这拐角的地方分岔。

就在大路分岔处那座门窗败坏，写着“出售矿泉”的招牌倒竖着的凉亭旁边，维多·李士真斯基正和丽莎告别。他紧握住她的手，满怀情意地凝视着她的眼睛说：

“你一定要来呵，你没有骗我吗？”

“我一定来的，一定。请你等我，”丽莎风骚地回答。临走时候，她还对他媚笑，那双出神的红褐色的眼睛蕴含着允诺的表情。

当她走了十几步，她看见由路的拐角处走出两个来。在前面走的是一个强壮宽胸的工人，上衣解开，里面穿一件有条纹的紧身衬衫，黑色的帽子低低地罩住前额，但她还可以看出他的一只眼睛已经黑肿。这工人穿着一双黄皮靴，沉着地迈着步子，脚腿稍微有点弯曲。

在他后面三步的，是一个彼得留拉士兵。穿着灰色军服，两排子弹带又在胸前，手里握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刀尖几乎刺着那工人的后背。在他那毛茸茸的羊皮帽下面，一对眯视的警戒的眼睛，直视着那被捕者的后脑。他的黄色的，给香烟熏得褐黑的小胡子，朝两边分开。

丽莎稍微缩缓脚步，走到路的那一边，在她后面的保尔现在已走到大路上来。当他向右转弯朝家走去的时候，他也就看到那两个人，他的双腿马上软酸，因为他认出那个被捕的人正是朱赫来。原来他是因为这样才没回家来啊！

朱赫来缓缓走近，一股可怖的力量在保尔心里猛撞着。各种思想像电一样骤然掠上心头，以致一时茫无头绪。但是他再也不能稍有踌躇了。只有一点是已经明白的：朱赫来是被捕了。

保尔注视着他那个士兵，在混乱的心境中，他已失却控制的能力，他不断想着：“应当怎样办呢？”

最后，他骤然想起了他衣袋的手枪。……当他们走过他的时候，他可以用枪射击那兵士的后背，这么朱赫来便可以得到自由！这刹那间的决定，立刻止住了他混乱的思潮。他紧紧地咬紧牙根，直到隐隐作痛，因为朱赫来上一天曾告诉过他说：“我们应当把倔强的人们组织起来。……”

保尔立刻回头看看后面。往城里去的路上静悄悄地空无行人，前面虽有一个穿着短的春外套的女人独自在走，她大概不会阻拦他们。在十字路侧面的那一条路，他不能看见，只有远处通至总站的那条路上，才有几个人影在走动。

保尔走到石铺路的一旁。当他们相离几步的时候，朱赫来已看到他，用一只眼睛斜睨他一眼。他那浓密的眉毛刹那间颤动一下。他一认出保尔，忽然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因此他的后背触到后面的刺刀的尖锋。那个护送的兵士用激怒的喉音叱道：

“走呀，走呀，别叫老子用枪柄揍你！”

朱赫来又迈开脚步。他本来想跟保尔说几句，但他强自抑住，只用一只手做着告别的姿势。保尔生怕引起那个卫兵的注意，转身躲到一旁，让朱赫来走过去，好像他对这两个人一点也不关心似的。

但是，恐怖的思潮现在又冲击着他——要是他的枪开得不准，子弹也许要射中朱赫来。……但当那彼得留拉士兵走到他旁边与他并列的时候，他还能够思想吗？

于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有着褐色小胡子的护送兵已跟保尔并列，就在这一刹那，保尔冲到那人跟前，抓住他的步枪，死命往地面猛按下去。刺刀括着地面的石头，锵锵地响着。那彼得留拉士兵给这猝不及防的暗袭吓呆了一会，但立刻就竭尽他的力量把枪拉回。枪“啪”的一声响了，弹丸打中石头。嗡的一声跳入壕沟里。

朱赫来听见枪声，躲到旁边，回过头来。看见那兵士扳着枪支转了个半圆，绞扭那少年的双手，但保尔还是握住不放。这气昏了的兵士便猛力一推，把保尔摔到地上，但他还是不能把枪夺回，而保尔一倒下去，也就乘势把他拖下，压在他自己的身上。卧倒的人是没有气力的，因此那兵士还是无法把他的枪在这瞬间夺回去。

朱赫来掠进两步，蹦到他的近旁，挥着两只铁拳，朝那兵士的脸上打去。一秒钟后，这脸上挨了两记铅样沉重的打击的护送兵，已放开保尔，颤颤地像笨重的袋子似的，滚到路边的壕沟里去。

也就是这双强有力的手臂，把保尔从地上扶起来。

维多·李士真斯基离开岔路口已有一百多步。他用口哨低声吹着流行的歌曲——“自古红颜多薄幸。”他心里一直迷醉在这次与丽莎的会晤，和她答应明天到荒废的工场里会他的诺言中。

中学校里那些喜欢吊膀子的学生们一向认为丽莎是个富有风情的女人。那傲慢不要脸的西美安，有一次曾告诉李士真斯基说，她早就属于他了。李士真斯基虽然不十分相信，但丽莎无论如何倒是个狡猾的和有诱惑性的“骚货，”因此李士真斯基的目的就是在明天看看西美安的话是否是假的。他自己心里想：“要是她果然来了，那么我就一点也不踌躇。毕竟她让你吻她。而且要是西美安措施谎……”

他的默想被阻断了，他闪到路旁，让两个彼得留拉兵士走过去。其中一个骑一匹截尾的小马。摇着一只帆布做的戽斗——显然是引着马去饮水的。另一个穿着一件农民的无袖的短褂和非常宽大的蓝裤，一只手放在那骑马的人的膝头上，正在叙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

李士真斯基让他们过后，正要往前走去，忽然听到后面什么地方响起了步枪的枪声。他回身一看，那个骑着小马的人恰正挽起马缰，朝发出枪声的地方驰去，另一个则舞着刀子跑在他后头。李士真斯基也在后面跟着他们跑，当他快跑到大路时，他又听到一声枪声。接着那个骑马的人已闪过拐角，边用足踢边用戽斗敲着小马，疯狂地向他直驰过来，当他刚走进兵营第一道门，便高声对井里的伙伴喊道：

“兄弟们，快拿枪去，他们杀死我们一个弟兄了！”

一分钟后，一队兵士已跑了出来，枪支在他们走的时候咕咯咕咯地响着，他们把李士真斯基逮住了。

这时候大路上已聚拢了一群人，李士真斯基站在他们的中央，丽莎也是一样，给他们留做见证。

当朱赫来和保尔从丽莎身旁跑过的时候，她看了不觉大吃一惊，以致呆呆地站在那儿。她看出那个袭击彼得留拉士兵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冬妮亚介绍给她的那个生客。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越过一堵花园的围墙。就在这当儿，那个骑马的人已驰到公路上，恰好看见朱赫来拿着步枪逃走和那个护送兵正用力由地上爬上来。已跑到围墙旁边的朱赫来便回转身，朝他开了一枪，那个骑马的人听见枪声，连忙掉头就跑。

护送兵微微地动着打破了的嘴唇，把他的遭遇叙说一遍。

“你这木头，你晓得把近在眼前的囚犯放走了该当何罪？你的背上该抽二十五下鞭子！”

护送兵恶狠狠地嘟噜着：

“得了，只有你懂得。把近在眼前的囚犯放走！谁晓得有一个小混蛋，像疯子一样骤然向我扑过来？”

丽莎被审讯了。她说的跟那个护送兵一样，但故意不说出她认得那个袭击护送兵的少年。他们接着被解到卫太戍司令部，直到晚间卫戍司令发令之后，方才释放。那司令提议亲自陪送丽莎回家，但她加以拒绝。他满嘴是伏特加酒的气味，这提议是不怀好意的。

最后是李士真斯基陪她回家。由司令部到车站去是很远的，他勾着丽莎的手腕，心里十分感激这偶然的遭遇。

“你晓得谁放走那个囚犯吗？”丽莎在快到家的时候，这样问他。

“我怎样会晓得呢？”

“你记得有一天晚上，冬妮亚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少年人吗？”

李士真斯基站住了。

“你是说保尔·柯察金吗？”他吃惊地问。

“是的，他的名字仿佛是这样。你记得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多么古怪吗？是的，这就是他。”

李士真斯基给这话吓住了。他追问丽莎：

“真的吗，你的确没有认错？”

“一点也没错，他的脸相我记得很清楚。”

“那你干什么不告诉卫戍司令呢？”

丽莎心里生气，愤愤地说：

“你以为我会做出这种卑鄙的勾当吗？”

“你说的卑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把袭击护送兵的人告诉卫戍司令是卑鄙的吗？”

“哦，那么在你看来，这是光荣的！你把他们干的那些事情忘记了。你真的不晓得学校里有那么些犹太人的孤儿，而你还想把保尔·柯察金的事告诉他们？老实说，我从来还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李士真斯基没有想到她会给与这样的回答。然而他不想跟丽莎吵嘴，所以竭力把话题岔开。

“别生气，丽莎，”他说。“我只是在跟你开玩笑。我不晓得你是这样富于高贵的节操的。”

“嗯，你开的这玩笑倒很不到家。”她简略地回答。

当他们走到她家的门口，正要分别的时候，李士真斯基说：

“丽莎，你一定来吗？”

他听到是个不肯定的回答：

“还没有一定。”

在回到城里的路上，他心里这样考虑着：“哦，要是您小姐说这是不光荣的，我可不赞成。自然，谁放走谁，在我全是一样。……”

在他，这出身波兰名门的贵族，两方面都是讨厌的，波兰军队不久一定可以开来，那时候将成立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真正的贵族的政府，一个真正的列岐波士波利达(Rzeczpospolita 大法典)的政府。但现在他之所以这样关心，为的是他有绝对地结果小流氓保尔·柯察金的机会。他们——彼得留拉的部队——马上就会绞死他。

李士真斯基是一个人留在城里的。他住在他的姑母家中，姑父是一家砂糖工厂的副经理。他的父亲母亲和妮莉都在华沙，果蒙·李士真斯基(他的父亲)正在那里占有很重要的职位。

他到了城里的卫戍司令总部，由大门口走进去。过了一会，他便带着四个彼得留拉士兵到保尔家里去。

“这就是了，”他指着那有帝光的窗子说，随后便问那个站在他旁边的骑兵少尉：“我想，现在我可以走开了吧？”

“哦，请便，”那少尉回答，“别的事情由我们办理好了，谢谢你的帮忙。”

李士真斯基立刻大踏步走了开去。

当保尔背上挨了最后一拳时，他伸开两臂，朝那暗黑的房间的墙壁扑倒下去。他摸到一只板床一样的东西，在殴打的痛楚和极度的难堪之下，他坐了上去。

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被逮捕了。他们怎么会晓得他呢？这是什么道理，压根儿就没有人看到他！现在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朱赫来又在那儿呢？他在克林加家里和朱赫来分手，随后就到薛尔基家，让他在那里等到天黑的时候出城去。“哦，好得我早就把手枪放在老鸦的窠里去，”他心里这样想。“要是他们找出它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这问题使他感到苦楚和迷惑。

彼得留拉兵士从他家里得不到什么东西，阿尔青早把他的衣服和手风琴带到乡下去，他的母亲也把他的箱子带走，不管他们怎样搜索，结果还是拿不到什么东西。可是保尔没有忘记他从家里到司令部去一路的经过。夜是那么黑漆一片，天空裹着云层，他盲目地昏迷地沿路颠簸，而左右和后面的拳头脚尖，不住踢打着他。

一阵阵的声音由门缝送进来，守卫的兵士都在隔壁的房间里。门的下面透出一条亮光。保尔站起来，顺着墙壁摸索。他走了一圈，在板床的对面，摸着一面窗子，嵌着牢固的齿形的铁栏。他用手试推一下——那东西很结实，一动也不动。显然这房子是曾经做过仓库的。

他走到门边，站在那儿倾听一会。接着他轻轻地转着门的把手。把手讨厌地吱吱响起来。

“妈的，没有上过油。”他这样诅咒着。

当他推开的时候，他从门缝里看见一只长着硬茧的脚，五个脚趾分开，在床沿摆动着。他再握住把手轻轻一推，门又是无顾忌地发出吱呀的响声。于是一个头发蓬乱睡眼惺松的人从板床上坐起来，一边不住用五个指头搔着多蚤的头，一边破口大骂。当那单调和有节奏的骂声停止之后，他伸伸手去拿步枪，迟钝地叱道：

“把门关上，下次你再把狗鼻头伸进这房子来，老子就揍死你。……”

保尔把门关上，从那房间里传来了一阵笑声。

他在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的想起起了许多事情。参加斗争的第一次的尝试，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刚一开头，就像老鼠一样，给人家捉住了，关在铁笼里。

当他坐着，沉在迷乱的半睡眠状态下时，他的母亲的脸色——那瘦瘦的皱纹满面的脸，和那双这么熟识和可爱的眼睛——便浮现上来。他心里想。“好得她老早就离开家，无论如何，她已少吃好些苦头。”

现在，一片灰色有的棱角的光芒，由窗口射到地板上。黑暗正渐渐退却，而曙光已开始到来。

六

在那幢巨大的老屋子里，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光。锁在院子里的狗儿托列左尔，骤然用低沉的声音吠起来。

冬妮亚从半睡中听到她母亲的低低的话声：

“不，她还没有睡啊。请进来吧，丽莎。”

她听见一阵轻轻的步声，接着，那友爱而热烈的拥抱，把她的朦胧的睡意完全赶走了。

冬妮亚显着疲倦的笑容，对她说：

“丽莎，你来得正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十分开心——爸爸昨夜已过了危险期，今天整天平平稳稳地睡着。妈妈和我这几天夜里都忙个通宵，刚刚才歇了一会。呵，丽莎，新近外面有什么事情吗？”冬妮亚说着拉她的朋友坐到身边的长椅子上。

“呵，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不过有些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丽莎笑着，狡猾地看一看冬妮亚的母亲。

她的母亲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是一个很标致的妇人；她的举动像小女孩一样活泼，有一双贤慧的灰色眼睛和虽不算美丽，却叫人喜欢的和精力丰满的面庞。她听了笑着说：

“自然，再过几分钟我就会走开，不过你还是先讲一些我们大家全可以听的消息吧。”她这样揶揄着丽莎，一面把坐椅移近长椅子。

“第一桩事情就是学校放假了。校务会议决定把等于入学证的修业证书发给七年级生。这真叫我开心死了，我顶讨厌那些代数和几何。我们要念这些唠什子干什么？男生们还有继续求学的可能，虽然他们还不晓得要进哪儿的学校，现在到处都在打仗。真是可怕。……我们将来是要出嫁的，哪个男人要他的妻子懂得代数呢？”丽莎说到这里，大声的笑起来。

冬妮亚的母亲跟他们坐了几分钟，便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去。接着丽莎靠近冬妮亚，双手拥抱着她，把她在岔路上遇到的事情从头到尾的叙说一遍。

“呵，亲爱的冬妮亚，请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怎样的惊讶……你猜猜，那个人究竟是谁？”

听得出神的冬妮亚，只是十分迷惑地耸一耸她的肩膀。

“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丽莎突然的说。

冬妮亚吃了一惊，像受伤了一样的缩着身子：

“保尔·柯察金？”

丽莎对她所唤起的印象，感到满意，于是她接着说叙说她与李士真斯基吵嘴的情形。她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冬妮亚的苍白，和她那拉扯着蓝色罩衫的手指的战颤。丽莎完全不晓得可怕的痉挛正绞痛着冬妮亚的心，也不晓得她那可爱的睫毛，为什么那样地在抖动。冬妮亚呢，她完全不理睬那喝醉的彼得留拉军官的故事，她只想着一——“维多·李士真斯基知道了。……为什么丽莎要告诉他呢？”于是她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你说什么呢？”丽莎不明白她的话意，这样问她。

“你为什么把他的事情，我是说，把保尔的事情告诉李士真斯基呢？因为他一定会出卖他。……”

丽莎有点不服气，反驳道：

“呵，不，他不会的！我不同意你的话。到底他为什么要出卖他？”

冬妮亚骤然坐下，双手使劲地抓住膝头，直到她隐隐作痛。

“丽莎，你恰恰不晓得这里头的底细！你要明白，这跟别的情形是不同的，柯察金和李士真斯基正是死仇。……你把他的事情告诉维多·李士真斯基，已经铸成大错了。”

丽莎现在才注意到冬妮亚是那样的烦乱，而且因为她无意间说到“他”字，使她看出了一向从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她也好像认出自己的过错，羞怯地一声不响。

“呵，原来是这样，这样，”她心里想。“多么奇怪，冬妮亚竟会这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她心里巴不得和她谈论这一桩事情，但慎重的念头阻住她。她想设法矫正自己的过错，便握住冬妮亚的双手说：

“冬妮亚，亲爱的，你很难过吧？”

冬妮亚心神恍惚地回答道：

“不，也许维多·李士真斯基比我所想的还要堕落得多。”

几会钟后，粗笨而诚实的同学底米耶诺夫，走了进来，但在他进来之前，他们间还是默默地不说一句话。

最后，当她的两个同学走了之后，冬妮亚独自靠着便门，遥望着那阴暗的通镇上去的道路，呆呆地站了许久。风，永远不息的风，带着春晚的蒙雾和潮湿的冷气，向她吹拂。在远处，镇上许多人家的窗户，正闪着黯淡的惨红的灯光。她所憎恨的可怜的市镇，就在那儿，而在那镇上，在某一座屋脊之下，为不可知的危险威胁着的，正是她那难以控制的心爱的人儿。也许他早已忘记了她。从他们俩最末一次的会见到现在，已有那么多天过去了！那时候，他是错的，但她对这些早已完全遗忘，假如明天她再看到他，那旧的友谊，那如此可爱又如此激动的友谊，就会恢复过来，冬妮亚是深信这一点的。但愿这黑夜不会出卖他。然而，这凄清的黑夜，好像正在蹲伏着等待跳跃一样……而且，它又是寒冷的。冬妮亚向大路作了最后一瞥，然后走进屋子里。在床上，裹着被子，她竭力以这样的思念使她入睡——这黑夜不会出卖他。

隔天清早，家里的人还在睡梦里，冬妮亚已经醒来了，她急忙起身穿好衣服，然后不想惊醒别人的悄悄地走到外边，解开了特列左尔，拉着它走向镇上去。在柯察金家的外面，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她就推开门，走了进去。特列左尔摇着尾巴，走在她的前头。……

在这同一个早晨，阿尔青也从乡下回镇上来。他是跟他的铁匠师傅坐着车子一道到来的，他用肩膀顶着他赚得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里，那个铁匠则拿着余下的东西，跟在他后边。当他走到洞开的门口，他把面粉袋从肩上卸下来，喊道：

“保尔！”

但是没有人答应。

那铁匠走了上来，对他说：

“拿进屋里去吧，等在这儿做什么呢？”

阿尔青把东西放在厨房里，然后走进房间去。他吓得眼睛凸出来；房子里一塌糊涂，破旧的 衣服凌乱地扔在地板上。

“怎么回事呀！”他对着铁匠惊讶地喊。

“嗯，实在乱得可以，”那铁匠附和着说。

“那小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阿尔青开始动气了。

但家里空空洞洞，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跑到院子里，朝四周看了看。结果他还是看不出道理来。这是什么意思——大门洞开，保尔又不在。

隔了一会，他听到后而有足步声，他转地身，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牝狗，竖着耳朵站在他前面，还有一个陌生的少女，正从便门朝屋里走来。

那少女上下的打量着他，很文静地对他说：

“我要见见保尔·柯察金。”

“我也是来看他的。鬼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还是刚到，进来一看，房门洞开，他却连影子也没有。你是来看看他的吗？”

他听到代替答语的问候：

“你是他的哥哥阿尔青吗？”

“是的，有什么事情不是？”

那少女并没有回答他，只恐惧地张望着洞开的房门。她心里想着：“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来呢？难道，难道真的会那样么？”她心头的重压越来越发沉重了。她询问一直瞪视着她的阿尔青：

“你说你回来的时候，房门开着，看不见保尔吗？”

“请缓一会儿，”阿尔青说。“你究竟有什么事情找我的弟弟？”

“我不大知道。不过要是保尔不在家，他一定是被捕了。”

“为什么呢？”阿尔青吃了一惊。

“到屋子里来吧，”冬妮亚说。

阿尔青一声不响地跟着她。当她把她所晓得的统统告诉了他之后，他感到万分的失望。

“啊，作孽，真是作孽！”他伤心地喃喃着。“好像不这样，事情就不算糟似的。……现在我明白房子里为什么这样一塌糊涂，这孩子是给鬼迷住了，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情来。现在，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不过，小姐，你到底是谁？”

“我是林务官杜曼诺夫的女儿。保尔是我的朋友。”

“啊——啊——”阿尔青拉长着声音，语气非常暧昧。“这孩子从小就在麻烦里长大，现在，又得到这样的结果。……”

冬妮亚和阿尔青默默地互相对视着。

“我走了，说不定你会找到他。”冬妮亚低声地说。“晚间我再到此地来，听你的消息。”

阿尔青一声不响地点一点头。

一只由冬眠里醒转来的呆笨的苍蝇，在窗角营营地攒着。在城防司令部的办公屋里，一个年青的农妇，坐在破旧的沙发边沿，双手支着膝盖，茫然地望着那肮脏的地板出神。

城防司令官嘴角刁着一支香烟，刚以花式的字体结束他的书写，随后就在“秀彼多夫卡城防司令官”的印章下面，非常得意地加上一个花体的、在字尾任意地挥了一个勾儿的签名。接着，门口传来了马刺的响声，他抬起头来。

沙洛美加，一只手扎着绷带，站在他的前面。

“什么风吹得你来呀？”司令官欢迎着他说。

“是好风吹得来的，连臂膀都给吹断了啦。”

沙洛美加也不管旁边坐着一个妇人，龇龇地臭骂了一顿。

“哦，那么你是到这儿来医治的，是不是？”

“下辈子才有功夫医治哩，他们在前线上紧紧地压迫我们，简直连烟斗也要给压碎啦。”

司令官朝那妇人点一点头，对沙洛美加说：

“这些等会再谈吧。”

沙洛美加一屁股坐在条凳上，摘下有着帽徽的制帽，那帽徽是三支交叉的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高鲁布派我来的。”他开始低声的说。“有一师近卫狙击师团快要开过这儿。此地应办的事情，我得向你说一说。大头目自己那时说不定也会来，因此这里的人，最好都不要提起那次小规模排犹事件。你在写什么呢？”

司令官把嘴角刁着的香烟，抹到嘴角的另一边。说道：

“我捉到了一个小家伙。你记得我们在车站上逮捕到的那个恶棍朱赫来——那个煽动铁路工人起来反抗我们的家伙吗？”

“哦，哦，怎么样呢？”沙洛美加兴奋地移近前去。

“咳，车站上的指挥官奥美琴科那混蛋只派一个哥萨克兵押解他到这儿来。我刚捉到的这个小鬼就公然在大白天里拦截他，两个人解除了他的武装，打落了他的门牙，一道逃跑了，现在我们寻不到朱赫来，却捉到了这小恶棍。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看吧——”他把写好的 一束文件推到他面前。

沙洛美加用完好的左手翻着纸张，急忙地看下去。随后就直视着司令官的脸孔，说道：

“这不是说你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口供吗？”

司令官神经质地扯着他的帽遮。

“一直到现在，我已拷问他五天了。他始终不肯招供，只说：‘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没有放走他。’真是一个地道的恶棍。你晓得，那哥萨克兵是认得他的，他差一点把那小猪罗绞死。后来经我制止，方才把他拉开。又因为奥美琴科在那哥萨克兵回车站之后，打了他二十五下鞭子，所以那兵士对这件事十分留神。现在已用不着再继续把他关下去，所以我正呈请总司令部准许我结果他。”

沙洛美加轻蔑地啐了一口，说：

“要是他在我手里，包准他什么都说出来。老实说，你还不晓得怎样去拷问。谁听说过一个道学先生当了城防司令官呢？你用棒子敲过他吗？”

司令官发火了。

“别太放肆，还是嘲笑你自己吧。我是本地的司令官，所以还有资格请你只管你本份的事情。”

沙洛美加看一看雄鸡一样的司令官，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得，用不着这样摆臭架子。管你妈的臭事情，还是告诉我到那儿弄点瓦特加酒喝喝哩。”

“这倒是可以的。”司令官笑着说。

“至于那小家伙呢，”沙洛美加指着保尔的名字，“要是你真的想结果他，应该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你瞧，只消把六字上面那一划拖下来就行，要不然，他们就不定不肯批准它。”

库房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留着长胡子，穿着褴褛的外套和宽大的帆布裤子的老头儿，他正蜷着双腿斜躺在板床上。他被捕的原因是住在他的家里的一个彼得留拉士兵的马匹，在他的马厩里不见了。蹲在地板上的，是一个中年的妇人，有一双细小狡猾的贼眼和尖细的下巴。她是一个私酿瓦特加酒的女人，因为偷窃时表和别种贵重东西而被捕。在窗子底下的角落里，戴着一顶折叠的小帽，昏昏迷迷地躺着的，是保尔·柯察金。

一个包着农妇式样的花头巾的少妇，睁着一双惊呆的大眼睛，被引进这仓库里来，她站着朝四面看了看，然后在那妇人的旁边坐下去。

酿私酒的妇人仔细地从上到下的打量她一番，随后就用轻快油滑的语气问道：

“阿姐，你是——”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她就追问下去：

“你为什么给捉进来？是不是私造瓦特加酒呢？”

那农妇站起身来，注视着这固执的老妇人，低声回答道：

“不，我是因为我弟弟被捕的。”

老妇人又问下去：“你弟弟干了什么事呢？”

睡在床上的老头子就干涉她：

“你干什么尽是纠缠她呢?也许她心里正很难过,你却一味麻烦人。”

那老妇人立刻转向板床那边:

“谁指派你来教训我?我是同你说话吗?”

老头子当她啐了一口。

“听我说,别再纠缠她!”

仓房里静寂无声。那少妇把她的大头巾铺在地板上,枕着手臂躺下去。酿私酒的妇人开始吃东西了。老头儿把脚垂到地板上,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吸了起来。浓臭的烟圈子,在房子里盘绕着。

老妇人吞下满口的食物之后,恶狠狠地嚷道:

“别喷出那些臭烟,让我安静地吃顿饭吧。一天到晚,不干别的,只管抽烟。”

老头子暗笑的说:

“怕给熏瘦了吗?哦,再过些时,你恐怕连那座门也挤不过去了。你也应该让那小孩子吃一点,只一味塞满自己的肚皮。”

老妇人动怒了,反驳道:

“我要他吃,是他自己不要吃。还是闭上你那张老嘴罢。我不是吃你份下的东西。”

年轻的农妇转对着老妇人,指着保尔·柯察金问道:

“你晓得他为什么被捉进来吗?”

那老妇人一听到有人对她说话,心里乐了起来,她高高兴兴地回答说:

“他是娘姨玛丽亚·柯察金的小儿子”接着弯低身子耳语道:“他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水手。这个人寄住在我的邻居马沙·左朱里卡家里。”

那少妇随即想起司令官所说的话来——“因此我正呈请总司令部,准许我结果他。”

兵车一列接一列的开进车站,近卫狙击军(哥萨克)的战队三五成群地由站外拥进来。装甲列车查波罗日支号——由四辆包着钢皮的客车组成——缓缓地沿着铁轨上下行驶。大炮由敞开的货车卸下,马匹由运马车上拉下,骑兵们就在当场整鞍上马,挤过杂乱的步兵之群,开进车站的庭院里,在那儿集合整队。班长们到处奔走,喊着各自的部队的番号。

车站上像一窝胡蜂那样嗡嗡地在嚷。从混杂纷乱的人群里,许多长方形的战队逐渐组成了。随即,一股武装的人们的洪流,就朝着城里泻去。从白天到黄昏,辎重马车一直不断地沿街震响,还有一大股狙击军的随军人员跟着车队一道行进。

最后,就是司令部卫队连的密集队伍,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只喉咙,一边走一边歌唱:

为什么骚动?

为什么呐喊?

是首领彼得留拉

已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起身,走到小窗跟前,透过黄昏的薄暗,他听到沿街的车轮的辘辘声,无数沉重的前进的脚步声。以及接续不断的歌唱声。

在他后面,有一个人在说:“哦,这样看来,军队已经进城了。”

保尔转过身来。说这话的是昨天带进来的那个女人。

她把她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们,私造瓦特加酒的老妇人已经达到目的。这少妇是由离城五里的乡村里来的。她的哥哥格里柯是一个赤色游击队员和贫农的委员会的领袖。当红军撤退的时候,格里柯也束起机关枪弹带跟着退走。因此现在全家一刻也不安宁,他们仅有的一匹马被牵走了;她的爸爸给捉到城里去,在牢里吃尽了苦头。村长是一个吃过格里柯的亏的人,现在就故意领着各种的人们住到他们家里,结果全家弄得一贫如洗。上几天,秀彼多夫卡的司令官到村里来招集兵员,村长又带着他到他们家里来。他在饱看了她一顿

之后，便带她到 城里来“审问。”

保尔不能入睡。他一刻也不安宁。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无法摆脱的念头：“往后他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的被殴伤的身体到处疼痛。那哥萨克护送兵曾带着酷毒的愤恨痛打了他。为着忘却这些难堪的想念，他开始倾听监房里的同伴们的谈话。那少妇十分低声地叙说司令官怎样看中她，怎样威逼和企图说服她，后来，当她还是不答应的时候，他又怎样气得像发狂一样。“我要把你关进地牢里，”他说，“你一辈子也别想出来。”

黑夜开始笼罩牢房里的每个角落。窒息的不宁静的夜向他们袭来了。保尔的相信想念又再转到不可知的明天。这是他入狱的第七夜，看来仿佛已过了好几个月似的；疼痛始终不停，使他难于安睡。现在地牢里又只有他们三个人了。那老头子正在床板上呼呼打鼾，好像睡在家里的炕旁一样。酿私酒的老妇人，已被军官放出去，代他们去找些瓦特加，克丽丝娜和保尔都睡在地板上，几乎是并排地躺着。前天保尔曾看见薛尔基在街上站了好些时候，悲惨地眺望着地牢的小窗。显然他们已晓得他是在那儿了。

一连三天送来了好些酸的裸麦面包。究竟是谁送来的，他们不知道。司令官曾经一连两天的拷问他。他在被拷问的时候，一味否认，从不曾供出什么来。他为什么老是一句话也不肯说呢，这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要做得勇敢，做得倔强，像他在书本中看到的那些人一样。但当他们押解他，领他走过黑暗的地方，或是当他们在庞然出现于黑暗中的风车旁边，有一个护送兵说道：“老爷，干什么老是押解他，惹这麻烦。还是从后面给他颗子弹，一干二净。”这时候，倒是很可怖的。不错，十六岁就夭折，那真是可怕的事情。因为死亡就是人的生命的终结啊！

克丽丝娜也一样为各种思念所烦扰，她所知道的事情，比她旁边的那少年来得多。显然的，他还没有想到……但她却早已听见过了。

他没有入睡，整夜老是翻来覆去。克丽丝娜很怜惜他，但她又有她自己的忧愁——她脑海里老想着司令官那可怖的话语：“明天我要和你解决这件事。要是你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给卫兵们，他们决不会说不要。现在由你自己决定吧。”

呵，想起了这种事情，是多么的难熬，而且决不会得到怜悯的饶恕。格里柯跟了红军，为什么是她的过错呢？生活是多么的悲惨啊！沉默的痛苦扼住她的喉咙，无助的绝望抓紧她，恐惧鞭挞她，克丽丝娜呜呜地哭泣起来了。她那青春的身子，因疯狂的悲愤和失望而战颤。

一个黯淡的影子，在墙壁的一个角落里蠕动着。

“你为什么这样哭泣呢？”

从克丽丝娜处流过来一股热烈的低诉，好像她正把她的悲惨，倾泻给那缄默的同命运的少年。他沉默地倾听着，同时把他的手放在克丽丝娜的手上。

“那些该死的畜牲，他们想污辱我！”她咽着泪水，怀着几乎使她昏迷了的恐惧低语说。“我现在已落在他们手中，我要给毁了呵！”

保尔能对这位少女说些什么呢？他找不到适当的话语。他有什么话可说呢？生命正紧紧地压住他们。明儿早上，将阻住她走出这囚牢，为了这而争斗吗？那么，他们一定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或者用军刀砍他的头，至此一切全都完结。但是，他至少已稍稍抚慰了这个被囚的可怜的女人。他温柔地抚着她的臂膀，直到她停止哭泣。门口的哨兵，时时向走过的人们叱喊：“谁在走动？”随后又是静寂。老头儿睡得正香。不可捉摸的几分钟缓缓地溜过去了。当她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他，把他抱过的时候，他开头对这举动，还是莫明其所以然。

“听呀，亲爱的，”她那热烈的嘴唇在低诉着，“我无论如何是要失身了。假如不是那军官，那么别的那些人也将污辱我。我给你吧，亲爱的伙伴，我给你吧，这样，那畜牲才得

不到我的处女宝。”

“克丽丝娜，”他喊道，“你说什么呀？”

但她那双有力的臂膀紧抱住他。她的双唇热烈而且丰满，实在难于逃避。那少女的话语是简单而温柔的，到底，他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说这话了。

眼前所有的苦痛全消失了，他忘却门上的锁，黄色头发的哥萨克人，残酷的司令官，兽性的鞭挞，和七个窒息的不眠的夜晚，而且一时有的只是温暖的双唇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但接着，他突然间想起了冬妮亚。他不明白他怎能一直忘记她和她那双奇丽的可爱的眼睛。

于是他已有了摆脱克丽丝娜的力量。他像喝醉了一样的站起身来，一直挣住窗子的铁条。克丽丝娜伸手摸索着他，一面对他说：

“为什么不来呢，你为什么不来呢？”

这问话是有着多么深沉的感情呵！他弯腰对着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

“克丽丝娜，我不能够。你是多美好啊……”他还说了别的话，但他立刻就忘记了。

他站起身来，为着打破那难堪的静寂，他走到板床旁边，坐在床沿上，摇着那老头儿说：

“我说，老伯伯，请你给我抽口烟吧！”

那少女缩着身子，坐在角落里悲泣。

黎明时候，司令官走进仓房里来，几个哥萨克兵把克丽丝娜带了出去。她用眼睛向保尔告别，双眼现出羞怨的神情。仓门在她走后砰然关上，于是世界对他更是空前地惨淡和可憎。老头子整天无法从他嘴里引出一句话来。

卫兵换班了，当值的官员也已更换。傍晚时候，又带来一个新的犯人，保尔认出他是砂糖工厂的木匠杜林尼克。他是一个结实矮胖的人，穿着褪色了的黄衬衫和褴褛的短外套，进来的时候，用着清查存货的神情环视地窖一遍。

保尔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里认识他的，那时候革命刚初次波到城里来。在那许多次喧扰的示威中，他只听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那就是杜林尼克。他爬到沿马路的墙头，向士兵们发表演说。保尔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结语：

“弟兄们，请始终信赖布尔什维克，他们决不会出卖你们！”

自从那时候以来，保尔一直没有见过他。

老头儿见到了生人十分高兴；显然，他觉得整天老是坐着一声不响是很难过的。杜林尼克坐在他的板床的边沿，跟他一道抽烟，询问他各种事情。接着他又坐到保尔旁边。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他问。“你为什么关进来的？”

因为他只得到非常简单的应签，杜林尼克感觉到保尔是在怀疑他，但当他晓得保尔的罪名之后，他惊讶地瞪着眼睛看他，问道：

“那么，是你放走朱赫来的，是不是？哦，我真该死，我还不晓得他们已捉了你呢。”

保尔十分惊讶，他靠着肘节撑起身子来说：

“你说那一个朱赫来呀？我不认得叫这名字的人，你用不着把这罪名加在我身上。”

但杜林尼克笑了，更加靠近他。

“不错的，孩子，”他说。“你用不着老隐瞒我。这事情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

他把声音放得更低，这样那老头子才不会听见。他接着说：

“是我亲眼送走朱赫来的，现在，他已通过各条战线到别地方去了。他把所有的事情全告诉我。”

经过一分钟的静默，他想了又想，继续说道：

“看来你是一个满好的孩子。但你要晓得，既然被捕了，他们又晓得这事的始末，这决不是好事情。老实说，这事真他妈的遭透了。”

他脱下外套，铺在地板上，靠着墙根坐下，开始卷另一支纸烟。他未了所说的那些话，已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保尔。显然杜林尼克是可以信任的。既然他送走了朱赫来，这就表示……

黄昏时候，他得知杜林尼克是在彼得留拉兵士中间进行煽动时被捕的，当时他正在散发地方革命委员会号召兵士投降和加入红军的传单。杜林尼克很机警，他告诉保尔的仅只一点点。“谁说得准，”他心里想，“他们说说不定会用枪杆子殴打他，他年纪还轻呢。”

晚间，当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用简短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不安来。他说：“柯察金，你我的处境都是一样危险的，结果如何，我们等着瞧就是了。”

隔天，地窖里又添了一个犯人，是全城闻名的理发匠梭罗门·西吉尔，一个大耳朵瘦脖子的家伙。他十分兴奋地指手划脚的对杜林尼克说：

“你瞧，福克斯，布鲁夫什金，特拉赫金堡那些家伙都准备客气地欢迎他。我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愿意这样，尽管做好了，但谁会答应援助所有的犹太人呢？对不起，一个也没有。得到好处的是他们。福克斯得到他的店铺，特拉赫金堡得到他的磨坊，但我得到了什么呢？别的犹太穷光蛋得到什么呢？那些穷光蛋什么也得不到。我至少有一根长舌头。今天，我正给一个军官修脸，他是刚到不久的新家伙。‘告诉我，’我问道，‘大头目彼得留拉晓不晓得上次的排犹事件呢？他会接待犹太代表团吗？’唉，天晓得，我这长舌头老是给我惹来许多麻烦！你想想，当我代那军官修完了脸，揩完了粉，什么都弄妥贴之后，他怎样对待我。他不仅不给我工钱，反而说我煽动反对政府，当场把我捉起来！”

西吉尔用拳头捶着胸脯，说道：

“煽动？胡说！究竟我说了什么来？我只是问那个人一个问题——他们倒因此把我关起来。……”

西吉尔十分激动，他说话的时候，不是扭着杜林尼克衬衫上的纽扣就是拉着他这只或那只臂膀。

杜林尼克听着气愤愤的西吉尔的谈话，不觉笑了。当西吉尔说完了之后，他就对他说：

“唉，梭罗门，你原是一个聪明人，现在却把你自己弄成一个傻蛋。你偏偏在这时候哗里哗拉的嚼舌头。我觉得你为了这样的事情而被捕，实在不值得。”

西吉尔认真地注视着他，眼睛现出醒悟的神色，接着，又做出了失望的姿势。这时候地窖的门开了，保尔认得的那个私酿瓦特加的老妇人，又给推进来。她气狠狠地咀咒那个押着她的哥萨克兵，但他却随手把门碰上；他们都听到下锁的响声。

她坐在木板床上。老头儿又开她的玩笑，欢迎她说：

“怎么，又回来了吗，长舌老太婆？”

她狠狠地眨他一眼提着包袱走开，坐在杜林尼克的旁边。那些兵士从她家里拿到了许多瓦特加之后，又把她押回来。

骤然，人们听见门外卫兵室里，传来了一阵呼喊声，和迅速走动的声音，一个粗嘎的声音在发着命令。地窖里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儿凝神地谛听着。

在简陋而有着老钟楼的小礼拜堂旁边的广场上，正发生着本城罕见的新奇事情：近卫狙击军的许多部队带着合副武装，排成跟方场一样大小的四方的空阵。前面由教堂的台阶起，后面直到学校的篱笆，有三个步兵大队列成棋盘式的四方阵形。战斗力最强大的彼得留拉“执政”师团的士兵，是一群肮脏的灰色人群。步枪挨着大腿，头上戴着粗劣的像是切成两半的南瓜似的俄罗斯钢盔。

这师团穿的是前沙皇皇军余下的很好的制服和靴子，其中大半是有意反对苏维埃的富农，现在调到秀彼多夫卡来，保护这非常重要的铁路接轨站。闪耀的铁轨由这城镇向五处伸去，如果彼得留拉失去这地方，就无异失去了一切。老实说，余留给“执政者”的地盘

是很狭小的，也就因此，除了丑陋的小城温尼萨之外，再没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可做都城了。

大头目决定了亲自检阅他所有的部队。为着接待他，城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了。

新编的部队被安排在广场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那些不是给夜里巡查队从炉火旁拉来，就是从街上给捉来的年青新兵们，全都光脚，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他们没有一个愿意作战，全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是没有敌人的。”大部份彼得留拉军官的成就，就是押送他们到镇里来，分成了中队和大队，并把枪械分给他们。

但是，就在第二天，有三份之一的人已经不见了，以后新兵的人数一天少过一天。

要是发靴子给他们，那是再蠢不过的事，无论如何，余下的靴子也没有那样多。一道命令颁发了，要他们带各自的靴子赴检阅。结果是惊人的。天晓得他们从什么地方收集了那么些破靴子，全都用铅线或麻绳把它缚在脚上。因此，他们只好光脚来参加这阅兵典礼了。

在步队的后面，横列着高鲁布的骑兵。骑队不住阻退张着嘴巴的密集的人群，因为所有的人都想看看阅兵典礼，而且大头目自己要亲自出场，这样的事情在秀彼多卡是少有的，谁都愿意参观这免费的表演。

在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军官和参谋将校，牧师的两个女儿，一群乌克兰的学校教师，一队“自由的”哥萨克人，和稍微有点驼背的市长——总之，是秀彼多夫卡所有的头儿尖儿，是秀彼多夫卡“社会”的构成者，而在他们中间，穿着捷尔启沙外套的，是步兵总监，阅兵典礼的指挥官。

在教堂里，瓦西里神父穿起复活节的法衣。大家都准备好给彼得留拉一个真正盛大的欢迎。蓝黄色的旗帜升起了，因为新兵要举行效忠的宣誓。

师团长乘着一辆残破的生肺病的福特车，到车站上去迎接彼得留拉。同时，步兵总监传召了捷涅克上校——一个身躯健美，有两拨捻得很考究的胡子的人——对他说：

“随便带一个人同你一道去检查司令部和后防部队，看看一切是否都清洁整齐。假如有囚犯的话，就查问一下把那些无赖全都赶出去。”

捷涅克扣着脚后跟敬礼后，就拉着身边一个哥萨克副官，匆忙地跑出去。

步兵总监接着就非常温雅地转对牧师的大女儿说：

“宴席怎么样，是不是已弄妥贴了？”

“哦，是的，”她回答，“城防司令官正在监督这件事呢。”她向美男子的总监眨了一眼。

骤然间，人们扰动起来了。一个骑兵伏在马背上，沿着石铺路飞驰而来。他挥着手臂呼喊道：

“他们来了呀！”

总监大声喊道：“各回原位！”

所有的军官慌忙跑回各自的部队里去。

当福特汽车在教堂的正门口喘息的时候，军乐队开始奏起乌克兰的国歌。

大头目彼得留拉本人走下车来，蠢头蠢脑地跟在师团长的后头走上去。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大块头方方正正地栽在紫红脖子的上面。他穿一件近卫兵蓝绒的乌克兰外衣，上面束着黄色的皮带，佩着一支精巧的、藏在软皮袋里的勃朗宁手枪，头上戴的钢盔嵌着一只三叉枪的帽徽。

西蒙·彼得留拉的风度完全不像军人，倒很像个道地的老百姓。当他倾听步兵总监那简短的报告时，他因某一事而现出不满的神情。市长接着便对他致欢迎词，他边听边望过他的头，眺望着排列的兵士。

“让我们开始吧。”他对总监点着头说。

他走上旗帜旁边的小检阅台，做了十分钟的演说，大意是说他们应当与布尔什维克奋战到底，因为布尔什维克毁坏了自由的乌克兰，而他，彼得留拉，是乌克兰唯一的防卫者——自然，连同他们，他的士兵们。这演说并不动人，他演说时没有一点特殊的热情。显然他因长途的旅行而感到疲倦。

士兵们在他的演说结束时，高声喊着——不用说，这是依照长官的命令的——“万岁！万岁！”随后他就走下检阅台，用手巾揩去前额的汗水，并在总监与师团长陪伴之下开始检阅各个队伍。当他走过新兵的队伍的时候，他气忿地咬着嘴唇，眼睛轻蔑地眨视着。

检阅快结束的时候，新兵一队接一队地打旗子从旁边走过，牧师瓦西里就站在这旗子的旁边，手里拿着一本《新约圣经》，他先吻着《新约》，接着又吻着旗子的一角，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一队代表团在当场出现了，并且走近彼得留拉，谁也不晓得他们是怎样来的。富有的木材商人布鲁夫什金走在代表团的前头，按着惯例，双手捧着一盘面包和食盐——这些是款待的象征——跟在他后面的，是杂货商人福克斯和别的三个大商贾。

布鲁夫什金像仆役一样的弯着腰，把面包和食盐献给彼得留拉。站在彼得留拉旁边的一个军官，代他收起了这些献物。于是布鲁夫什金说：

“敝镇的犹太民众，对阁下，国家的元首，敬表深切的感激和敬意。不晓得阁下愿意接受犹太人签名的祝贺书吗？”

“好的，”彼得留拉哼着说，双眼对祝贺书投了一瞥。

接着福克斯说话了。

“我们极端质朴地央求阁下，让我们有开店营业的可能，并能保护我们免受排犹的掠夺。”——福克斯艰痛地挤出这难以说出口的话来。

彼得留拉狠狠地皱着眉头，回答道：

“我的部下从不进行排犹的掠夺。这一点你要好好记住。”

福克斯双手做出绝望的姿势。

彼得留拉激动地耸一耸肩膀。他对代表团恰在他不快的时候出场，很感到气忿。他转过身子，高鲁布正站在他的后面咬着他的小黑胡子。

“上校，这些人正在控诉你的哥萨克兵。请你调查一下，加以适当的处置。”接着他又转向总监，“让我们开始举行阅兵式吧。”

倒霉的代表团全没有料到会碰上高鲁布，因此他们赶快的溜开去。

现在每个人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准备检阅巡行上面。尖锐的号声到处震响着。高鲁布赶到布鲁夫什金面前，面色非常安静，很清楚地低声的说：

“给我滚出去，你们这些该死的异教徒，要不然，我就把你们砍成肉块。”

军乐队演奏了，部队的行进开始了。士兵们一走过彼得留拉站着的地方，就一齐机械地高喊“万岁！”然后由石子路转到旁边的小道去。在各个队伍的前头，是昂视阔步，穿着崭新的茶色军服，装模做样地挥着指挥棍的军官们。这种挥着指挥短棍的派头，跟用棍子殴打士兵一样，都是近卫狙击军的部队首先采行的。

接着，是新兵们的赤足发出的那柔软而沙沙的步声。军官们出尽死力使他们保持秩序，但是完全失败。当第二队走近来的时候，右边一个穿麻布衬衫的家伙，竟那么入神地张着嘴巴呆视大头目；猛不提防踩进泥坑，就歪着身子摔倒下去，枪支摔在石头上克拉克拉的响着。他拼命想爬起来，但后面的人又把他推倒。旁观的人群响起了一阵阵哗啦的笑声。队伍混乱了，兵士们好不容易才通过广场，那倒霉的家伙也已拾起步枪，慌忙赶上自己的队伍去。

彼得留拉转过身子，不愿看这不快意的景象。他没有等队伍过完，径自向汽车走去。总

监跟 在他后头，谨慎地问道：

“长官阁下，不留在这儿吃午饭吗？”

“不！”彼得留拉愤愤地说。

在高高教堂围墙后面，薛尔基，娃莲和克林加杂在旁观的人群中，薛尔基紧紧地握着铁栏杆，用充满着憎恨的眼睛眺望下边的兵士们。

过了一会他离开栏杆，转向娃莲，用故意的挑衅的语调高声喊道：

“走吧，娃莲，这杂货店快要关门了！”

别人的人们呆视着他，他毫不搭理他们，只管带着娃莲和克林加朝便门走去。

捷涅克上校和哥萨克上尉副官跑到城防司令部门前，就从马身上跳下来。他们把马勒交给一个勤务兵后，大踏步走了进去。

捷涅克严厉地问着勤务兵道：

“司令官在那儿？”

“不知道，老爷，他走出去了，老爷。”

捷涅克看一看肮脏的卫兵室，这地方从未洗扫过。床上一塌糊涂，守卫的哨兵随便躺在上面，连长官进去也不想站起。

“你们叫这做什么呀？这儿简直是猪圈！”捷涅克咆哮着说。“你们这样翻来覆去，是什么意思呢？跟一群猪猡一模一样。”他说着就朝那些躺着的人走去。

有一个卫兵坐了起来，很舒适地打了一口噎气，然后用简慢的声音对他说道：

“谁叫你到这里来摆臭架子的？”

“你说什么？”捷涅克掠近前去。“你晓得你在跟谁说话吗？我是捷涅克上校，听说过没有？你这混——蛋。马上给我站起来，要不，我就打死你，”发脾气的捷涅克，在卫兵室兜了个圈子。“这龌龊屋子马上给我打扫干净，床铺也要整理好，还要把你们那脏脸孔收拾得像人一样。你们说你们像什么样子？你们不是哥萨克人，是叫化子。”

他的脾气是发不完的，他用脚踢翻摆在走道上的一只脏水桶。那副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还附和他臭骂他们一顿，同时又不停地挥舞着他那支带着三根皮带的马鞭，把那些懒虫赶下床来。

“大头目正在行阅兵礼，他也许要上这儿来。赶紧做起来呵！”

那些哥萨克兵看出事情是很严重的，说不定要挨鞭子——他们全都晓得捷涅克这名字——于是像发狂一样东冲西撞的拼命打扫，工作沸腾起来了。

“我们最好去看一看囚犯们，”副官提议道。“谁知道他们这里禁着一些什么人呢？要是大头目看见了，那是很糟糕的。”

捷涅克对管钥匙的哨兵说：“马上把门打开。”

班长急忙走上去，把门打开。

“司令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你以为我会成天在这儿等他吗？马上去找他，叫他到这儿来。叫卫兵在院子里站队。……枪上干什么不上刺刀？”

“我们是昨天才换班的。”班长解释着，随后就冲出门外找司令官去了。

副官踢开地窖的门，有几个站起身来，有些仍然躺着。

“把那些门打开，”捷涅克命令着说。“这儿太黑了。”

他熟视着囚徒们的脸孔，然后严厉地问那个坐在板床上的老头子道：

“你干什么给捉来的？”

老头儿扯着裤子半站起来，因为给严厉的叱问吓昏了，呐呐地说：

“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啊。我只晓得，他们捉了我，有一只马在我的院子里失掉了，但这不是我的过错。”

“谁的马呢？”副官插问道。

“是公家的马呀。借住在我家里的人，把它赶走了，却把罪名加在我头上。”

捷涅克迅速地由头到脚的打量那老头子一番，轻轻地耸一耸肩膀，喊道：

“收拾你的东西，赶快给我滚出去！”

接着他转向酿私酒的老太婆，但那老头子还不相信他真的是被开释了，因此转向副官，眯着那对半瞎的眼睛，问道：

“我真的可以走吗？”

副官点了点头：“是的，赶快滚出去，越快越好。”

老头子慌忙由板床上收起他的袋子和酒瓶，打从边门溜了出去。

现在捷涅克审问那老妇人：“你为什么被捕呢？”

那老妇人刚吃着肉包子，于是咕咯咕咯的说：

“老爷，真不公平啊，听我说，老爷，我是一个寡妇，他们喝了我家酿的瓦特加，随后又把 我押到这儿来。”

“哦，你是卖私酒的吧？”捷涅克问。

“老爷，你说卖？”那老太婆愤慨了。“老爷，你不能叫这做买卖。他们拿了我四瓶酒，却不给我半个铜板。你说这是什么买卖？他们全都这样，吃了我的酒不付钱。你叫这是什么买卖呀？”

捷涅克阻住她说：“够了，够了，滚出去吧。”

老太婆不再诉说，抢起篮子，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一边倒退一边说：

“好老爷，祝你长寿百岁！”

杜林尼克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这出喜剧。囚徒们谁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只明白这些陌生人大概都是拥有实权的高官。

捷涅克接着便问杜林尼克：

“你犯的是什么罪名呢？”

“上校对你说话，你应该站起来。”副官叱责他。

杜林尼克慢条斯理地由地板上爬起来。

“我问你，你犯的是什么罪名？”上校再说一遍。

杜林尼克有好几分钟呆呆地注视着上校光滑的脸上那捻得很考究的口髭，随后又凝视他那新帽子的遮阳和三叉枪的帽徽，突然间，一个茫乱的思念闪进他的脑海——“要是能够放出去呢？”

“我是因为夜里八点钟以后在镇上动被捕的。”他把他首先想到的这样说。

他在苦痛的紧张中期待着。

“你为什么要在深夜里去动呢？”

“不是深夜呀，那时候还不到十一点呢。”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简直不相信他会有天大的幸运。他的膝盖不住打颤，当他听到这简短的判决：

“滚出去！”

他甚至没有想到拿回他的短套，径自大踏步地走了出去。这时候副官已在审问另一个犯人了。

保尔是在最后。他仍然坐在地板上，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茫然，甚至连杜林尼克已被释放也没有看清楚。他们都被释放了。但是杜林尼克，杜林尼克……他竟说是在戒严之后出外被捕的。……最后，保尔明白了。

上校开始用老套审问枯瘦的西吉尔：“你为什么被捕的？”

苍白而激乱的理发匠放声直说道：

“他们说 我进行煽动工作，但我不明白我做了什么煽动工作。……”

捷涅克立刻小心起来：“什么？煽动？煽动什么呢？”

西吉尔用手做出失望的姿势，说：

“我不知道。我只说有人正招集犹太人，在给大头目的请愿书上签名。”

捷涅克和副官全都走近西吉尔。

“你说的是什么请愿书呢？”

“是恳求停止排犹屠掠的请愿书。你晓得这儿有过惊人的排犹屠掠。镇上的人全很害怕。”

“我明白了，”捷涅克截断他的话说，“我们曾代你们，你们这些肮脏的犹太人，起草请愿书的。”于是，他转向那哥萨克副官说：“这家伙最好关到最安全的地方。把他带至总司令部。我自己有话同他说，看看谁想召集犹太人签名。”

西吉尔想要分辩，但副官愤怒地场着手，用马鞭在他背上抽了一鞭。

“住口，你这畜牲！”

西吉尔痛得扭转身子，倒在后面的角落里；他的双唇不住战颤，好不容易才抑住歇斯底里的啜泣。

就在这时候，保尔站起身来。现在只留着他和西吉尔。捷涅克站在他前面，他那双黑眼睛上下的打量他。

“喂，你为什么关进来的？”

上校的发问得到迅捷的回答：

“我把马鞍的一边割下来做鞋底。”

“谁的马鞍呢？”

“有两个哥萨克人住在我们家里，我把他们的一只老马鞍的皮子割下来，做我的鞋底，那哥萨克人便把我带到这儿来。”因为满怀着可能释放的狂热的希望，于是他添着说：“要是我知道这是不许可的，我就不会……”

上校轻蔑地看了看他，他心里想：“我真不明白这个秀彼多夫卡的城防司令官做的是什么事情，关了这么多犯人，真是天晓得！”于是他转向门口，喊道：“你走吧。告诉你父亲好好地管教你，赶快走吧！”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运气，但却怀着几乎要进出胸口的一颗心，抓起了放在地板上的杜林尼克的外套，直朝门口走去。他穿过卫兵室，从刚走出来的捷涅克后面溜进天井里，再由此跑出便门走到大街。

现在只剩下不幸的西吉尔留在地牢里。他怀着难堪的苦痛环顾四周，不经心地朝门口走了几步，但是就在这时候，一个哨兵走进卫兵室里，关上了门，横了铁栓，坐在它旁边的条凳上。

捷涅克很得意地转对哥萨克副官说：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多少古怪事情啊。你瞧，他们竟关了那么多的废料……我们应该把这司令部关两个星期。得了，我们走吧。”

班长已在院子里把他的队伍站好了。一看见上校出来，慌忙跑到他跟前报告道：

“上校老爷，什么都就绪了。”

捷涅克把他的一只脚踩上马蹬，轻快地跳上马鞍去。副官在跨上他自己那匹踞傲的马时，却多少有点麻烦。捷涅克紧紧地拉住马缰，对班长说：

“告诉司令官，说我已把那一群无所谓的流氓放走了。并且对他说，他在这儿做了这些事情，他本人得关上两个礼拜。把方才扣留着的那个家伙，马上给我送到总部来。注意步哨。”

“是的，上校老爷。”班长向他敬礼。

上校和副官用马刺驱着马，猛弛到广场上来，但那儿的阅兵礼早已完结了。

当保尔爬过庭院里的第七道栅栏时，他停步了，因为他已没有气力再往前跑了。在那叫人窒息的地窖里，饥饿的日子已消蚀了他所有的力量。

他不能回家；但要是薛尔基家里，而又被谁知道的话，那么薛尔基全家就要遭殃。他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他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于是他茫然地走过秀波多夫卡——这是一个乡村风味十足的市镇——边界各个果树园、花园与别墅的后院，直到他走近一面熟悉的围墙，他的心神方才清醒过来。

他晓得在这高高的围墙后面，就是林务官的花园。这就是他那疲乏的双腿带他到来的地方！是他自觉地跑到这儿来的吗？不。但怎么不到别处，恰恰到了这儿呢？他可不知道。

现在，他最需要的是到什么地方休息。然后再想想以后的事情。他知道花园里有一座消暑的草亭；谁也不会看见他。

他纵身一跳，一只手抓住围墙的墙头攀援上去，再跳进花园里。他望一望那隐现在树林外的房子，随后就朝草亭走去。草亭周围差不多是空旷的。夏天还有攀援在它上面的山葡萄掩住它，现在却一无东西遮拦。

他正要转向围墙去，但已经迟了：他听到后面有着激烈的吠声，在通至屋子的树叶遮掩的小径那边，一只大狗正迎面冲过来。

保尔防御了。

第一次的进攻被他一脚踢回去。但那只狗准备作第二次的猛扑。谁晓得这战斗要对什么时候才结束，假如没有保尔非常熟识的铃样的声音：

“回来，特列左尔，回来！”

这时候，冬妮亚由小径上跑过来。她拉住特列左尔颈上的皮带，面对着背靠围墙站立的保尔：

“你怎么到这里来呢？这狗也许会咬你，好得我——”

她突然站住，她的眼睛睁大了。这由荒径跑进花园里来的少年，跟她熟识的保尔，是那么的酷肖呵！

那个靠着围墙的少年人动了动，低声地说道：

“你……你认出了我吗？”

冬妮亚喊了出来，冲动地朝保尔走去。

“保尔，亲爱的，是你吗？”

特列左尔把她的叫声当作袭击的信号，狠狠地跳上前去。

“回去！”冬妮亚踢了它几脚，那狗不高兴地挟着尾巴，向屋子里走去。

冬妮亚紧紧握住保尔的双手，问道：

“你自由了吗？”

“你莫非已经知道了吗？”

一点也没有理会她自己的激动，冬妮亚继续说：

“我全都知道，丽莎告诉我的。但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呢？是他们放你出来的吗？”

保尔懒洋洋地回答：

“只因他们错放我，我就逃走了。我相信他们已在寻觅我了。我无意间跑到这儿来，心想我可以草亭里歇一息。”接着，像是在辩解似的说：“我着实累极了。”

她注视了他好一会，接着就倾泻出对他的无限的怜悯与温暖的柔情。喜悦已征服了她，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保尔，我亲爱的，保尔，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爱你。……你听见吗？……你这顽强的孩子，那天你为什么还要逃开呢？现在你跟我们，跟我住在一道吧。我决不让你跑开。这儿很清静，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保尔摇了摇头。

“要是他们在这儿找到我呢。我不应该住在这儿。”

她把他的手指儿握得更紧，她的眉毛在战颤，她的双眼在闪亮。她坚决地说：

“要是你不来，你永远别再见我。阿尔青已不在这儿，你晓得，他已被押去开车了。所有的铁路工人都已被征调。你要上那儿去？”

保尔了解她的烦恼，但阻止他的，无非是他害怕牵累及他所爱的这个姑娘。连日的遭遇已使他无法支持，饥饿又在折磨他，结果他终于答应了。

当他坐在冬妮亚房里沙发上的时候，冬妮亚和她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开始如下的谈话：

“听我说，妈妈。保尔·柯察金现在在我房间里。你记得他吗？我一点也不想瞒你。他因为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水手，被捕了。现在他逃了出来，没有可休息和躲藏的地方。”她的声音战颤。“妈妈，我求你，让他在我们家里呆一会儿。”她的眼睛在恳求着。

她的母亲却想探出她孩子的心思，说道：

“很好，我一点也不反对。不过你打算怎样安顿他？”

冬妮亚满脸绯红，非常狼狈地回答：

“在我房里长沙发上。不过，我们暂时不必告诉爸爸。”

母亲凝视着冬妮亚的眼睛：

“哦，这就是你哭得那么厉害的原因吗？”

“是的。”

“但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呢。”

冬妮亚怯怯地扯着她的罩衫的衣袖：

“是的，但要是他没有逃出来，他们会跟对付成人一样的枪毙他。”

保尔出现在他们家里，使冬妮亚的母亲很烦恼。保尔的被捕和冬妮亚对他的确定的情爱，都使她烦恼；况且，她的确一点也不晓得他。

冬妮亚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她对母亲说：

“妈妈，他无论如何应该洗个澡，我马上去办这件事情吧。他实在跟地道的火夫一样的肮脏。他好久没有机会洗澡了。”

她跑出去收拾浴室，准备衣服和烧水去了。接着，就跑进她的房间里，说也不说地握着保尔的手，把他拉到洗澡间去。

“你把身上的衣服都换下来，这套是给你穿的。你的衣服都得洗过，穿这一套吧。”她指着椅子上那折得很考究的白领的水手罩衫和裤子。

保尔迷惑地望望四周。冬妮亚笑嘻嘻地说：

“那是我化装的衣服，你穿起来刚好合适。你就洗吧，我走了，给你准备吃的东西去。”

她随手带上了门，这时候保尔只好脱去衣服，走进澡盆。一点钟后，三个人——母亲、保尔和冬妮亚——开始在厨房里吃午饭了。

保尔因为饥饿，毫不留神地吃完第三盘。开头，他对冬妮亚的母亲很觉得难为情，但看到她对他的态度十分亲热之后，他才自在一些。吃过了午饭，他们一齐到冬妮亚的房间里。经了她母亲的询问，他把经过的情形源源本本的叙说一遍。

“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杜曼诺太太问。

保尔思索了一会，这样回答道：

“我想见见我的哥哥阿尔青，然后离开这儿。”

“你决定到那儿去呢？”

“我想到乌曼或是基辅去。这个我自己还对于知道，只有一点是定了的，我必须离开秀彼多夫卡。”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环境变化得这样快——早上他还在地窖里，而现在，他却与冬妮亚同坐，穿着洁净的衣裳，特别是，他现在已经自由了。生活就是如此——开头是满天重雾，转眼间又现出了鲜丽的太阳。要是他没有再度被捕的威胁，（甚至在这宽大而和平的家宅里，他还很有被逮的可能。）这时候他真是万分快乐的。

他不能停在这儿，他必须离开。可是他又觉得，他自己一点也不愿意离开这儿！以前，读到英雄加里波的传记，那是多么的有趣呵，他是那样的羡慕他，然而加里波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在全世界各处流浪着。而他，保尔，仅仅经过了一星期的可怖的痛苦，就好像过了一年似的。显然他自己是不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的。

“你在想什么呢？”冬妮亚弯着身子问他。她的眼睛似乎是无底的，它是那样的碧蓝呵！

“冬妮亚，让我把克丽丝娜的事情告诉你吗？”

“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她说。

他很难过地讲完那故事，最后这样结束：“这样，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

屋子里的钟响亮地滴哒滴哒的响着。冬妮亚低着头，紧紧咬住双唇，几乎哭了出来。保尔注视着，说道：

“我应当马上离开，就在今天。”

“不，不，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能走，什么地方都不许去。”

她那温情的纤手静静地抓着他的纷乱的头发，梳着它，抚摸它。……

“冬妮亚，你应该帮助我。”他说。“我要找找阿尔青，并送一张条子给薛尔基，我有一支手枪藏在一只老鹰的窝里，我不能把它拿下来，薛尔基倒可以去拿它。这些你能代我做吗？”

冬妮亚立刻站起身来，说：“我马上就去；我要找丽莎，跟她一道到车站去。你就写给薛尔基的条子吧。他住在那儿呢？要是他要见你，我可以告诉他你住在那儿吗？”

“让他今天晚上到花园里来吧。”保尔想了一会这样说。

冬妮亚回来时天已很晚了。保尔睡得正香。她的手一触到他，他立刻就醒了。她快乐地微笑着说：

“阿尔青随时都可以到这儿来。他刚刚回来呢。丽莎的父亲正代他说情，所以他们让他出来一个钟头。车头正停在车库里。我不能告诉他说你是在这儿。我只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他。你瞧，他就在这儿！”

冬妮亚跑到门外去。阿尔青惊愕地站在门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冬妮亚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这样，她的患伤寒病刚好，正躺在房间里休养的父亲，才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

当阿尔青的双手紧抱着他的弟弟保尔时，保尔的骨节咯咯地响起来。他茫然地喊道：

“弟弟！保尔呵！”

最后，他们决定了：保尔就在明天动身，阿尔青说他设不地，让他跟着薛尔基爸爸开的车子到喀查丁去。生性那么刚强的阿尔青，现在也失去了常态；他曾经为着他的弟弟吃了那么些苦头，老是担心着他的命运，此刻他实在说不出多么的快乐。

“就这样，”他说，“明天早上五点钟你到堆栈那里，当他把木柴搬上煤水车的时候，你就走上去。我还要跟你长谈一番，但是现在我必须走了。明日早上我送你上车。他们正把我们编成一个铁路员工大队，跟在德军占领时一样，我们是始终在武装警卫兵监视之下工作的。”

他向保尔告别后就走了。

天色迅速黑透了，这正是薛尔基到花园来的时候。保尔一面等他一面在花园里上下的踱着。冬妮亚和她的母亲，一同伴陪着她的爸爸。

在黑暗里，他同薛尔基会见了，互相紧紧地握着手。他们低声地谈着。薛尔基说：

“我没有把手枪带来。你们院子里尽是彼得留拉的士兵，他们把马车停在你们那儿，而且还点着灯火。要爬到树上去是不可能的，真倒霉呵！”

“算了吧，”保尔说，“说不定这反而好些哩。在路上，他们可能查出它来，这样我就完了。不过，往后你自己要把它找出来。”

“你什么时候动身呢？娃莲问。”

“明儿早上天亮的时候。”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告诉我们吧。”

保尔低声地把经过告诉他们。

他们互相亲切地告别。薛尔基不能处之淡然，他心里十分难过。娃莲苦痛地说道：

“保尔，祝你一路平安，并且不要忘了我们啊！”

他们转身走了，黑暗立刻吞没了他们。

屋里静悄无声。只有时钟继续在进行，他们的步伐清切地记录着时间的运动。两个年轻人此刻都没有睡眠的心思，因为六个钟头后，他们就要分离，说不定将永远不能相见。在这短短的时间中，他们两个人想说的万千思念和话语，难道能够说完么？

呵，青春，无限美丽的青春啊！当情欲还未被知晓，只有从心房迅速的跳动而漠然地感到的时候，当无意触及对方的胸脯而使手儿战颤和迅速移开，同时青春的友情又阻住了最后的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搂着颈项的爱人的手臂，和像触着电流一样的热吻更为可亲可爱的呢！

在他产们整个的友情中，这是第二次的亲吻。谁也没有抚爱过保尔，除开他的母亲，别人给予他的，乃是殴打。但冬妮亚的爱抚却更加愉快。在他那残酷的被压迫的生活中，他从不晓得人世竟有这样的欢愉。这个在人生的途上遇到的姑娘，乃是个无限的幸福呵！

在黑暗中，他可以闻到她的发香，又似乎看见她的双眼。他说：

“冬妮亚，我是这样爱你。我说不出我多么爱你——我不晓得要怎样告诉你。”

他的思念散乱了……她那柔软的肉体是多么的诱惑呵……但青春的友情却比别的一切更贵更高。他对她说：

“冬妮亚，当眼前所有的战乱结束了的时候，我自信可以成为一个装配师。如果你不拒绝我，如果你对我的爱是真诚的，不是儿戏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好丈夫。要是我做了伤害你的事情，我就死掉。”

他们不敢拥抱着睡觉，恐怕她的母亲看见了不高兴。因此他们分了开来。当他们临睡前互相发出庄严的两勿相忘的誓言时，天已经渐渐透亮了。

大清早，冬妮亚的母亲叫醒了保尔。他跳了起来，当他在浴室里换由他自己的衣服和杜林尼克的外套时，冬妮亚的母亲也唤醒了冬妮亚。

他们匆忙冒着潮湿的朝雾走到车站，又绕过车站走到木堆旁边，阿尔青在装满着木材的煤水车附近，正等候得不耐烦。巨大的车头已给吐出的蒸气蒙住，正缓缓地朝他们开了过来。

老布鲁克在车头的窗子上张望。阿尔青和保尔慌忙互相告别。保尔紧握住车头的扶梯，由旁边的铁栏杆爬了过去。他回头一望，看见站在岔道上那两个熟识的人影。晨风猛卷着冬妮亚的罩衫的领襟，摇着她那栗色的卷发。她在向他挥手。

阿尔青转身注视着好不容易抑住了啜泣的冬妮亚，心里想：“除非我是个十足的傻瓜，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倒有点变态。保尔，保尔，你这不安分的小流氓呵……”

当列车已转了弯的时候，他转对冬妮亚：

“嗯，我想我们两个可以做朋友了，是吗？”冬妮亚的小手，接着便消失在他的大手掌中。

这时候，从遥远的彼方，传来了增加了速率的火车的轰隆声。

七

整整有一个星期，这个给壕沟和蛛网样的铁蒺藜围绕着的镇，总在隆隆的野炮声和清脆的步枪声中惊醒或入睡。只有在夜深时候，它是静寂的，不过有时一方为着窥探对方的秘密，仍然响起几响惊动的枪声，冲破了黑夜的死寂。每天天一刚亮，兵士们就麇聚在各架大炮的周围，大炮的黑鼻子开始忿忿地激烈地咳嗽起来，随后，新的炮弹又慌忙给装上去。每当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便浑身震颤；炮弹嘶嘶地飞过村庄，落在离小镇二哩外被红军占领的村庄上，轰隆地爆炸开来，把无数的泥块往空中抛去。

红军的炮队设在一座老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修道院恰在高岗上的村落的中央。

炮兵队军事委员查莫斯丁同志，骤然从睡梦中跳起来——他睡的时候是用炮身做枕头的。他把结着沉重的毛瑟枪的皮带束得更紧，然后侧着耳朵倾听炮弹的飞驰，等候它的爆炸。接着他锐厉的呼喊声在院子里震响着：

“同志们，起来，明天我们再好好睡觉吧。是时候了，起来吧！”

炮兵们都在大炮周围睡觉。大伙全像军事委员一样立刻跳起来。只有西道尔察克懒懒地不愿抬起他那昏沉的脑袋。

“你们这些混蛋，天刚刚亮，就乱七八糟吵起来——真是一群畜牲啊！”

查莫斯丁哈哈大笑起来，说：

“是的，西道尔察克，弟兄们还不大懂得睡觉，他们对你这样的人，那会佩服呢？”

西道尔察克起身了，但仍然咕嘈了半天。

几分钟后，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开始怒吼，炮弹在镇上爆炸上。白军在镇上糖厂里那极高的烟囱上，用木板搭了一只 NB072 望台，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传达员，由烟囱里面的铁梯爬了上去。全镇都在他们眼底，他们已可以由这里指挥炮队的炮火了，因为围城的红军的每一动作，他们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今天，红军方面表现得特别活跃。他们可以用望远镜看到红军部队的移动。一排装甲车，缓缓地沿着铁路，朝波多尔斯基车站开去，不停地发出炮火，成队的步兵则跟在它的后头。红军一连作了几次进攻，想在风暴样的冲击之下攻下这个市镇。但白军却掩蔽在近效斜坡上的战壕里。各个战壕喷出了猛烈的炮火，空气中充满着密集的枪声。当进攻迫近了时候，这声音更变为不断的怒吼。在这弹雨之下，红军敌不过这非人所能忍受的紧张，战线又撤退了，留下了许多死尸在他们的后面。

今天直接加之本镇的轰击，比先前凶猛得多，而且更加频繁，更加坚决。空气因大炮不断的轰击而震颤。从糖厂的烟囱上头，可以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战线正在向前推进，兵士们虽然颠扑摔倒，仍然执拗地上前。他们已差不多占据中央车站了。近卫兵把所有的后备队悉数调去，还是无法堵塞战线的裂口。因此，那些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冲进车站周围各条马路上了。守卫车站的彼得留拉近卫狙击军的第三大队，终于被迫退出他们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与果园——狼狈地三五成群的逃到镇上来，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坚决地继续挺进，用枪刺的尖端占夺白军后卫的防寒，像崩雪一样地冲到镇上那部分的街道上。

薛尔基和他全家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道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世上的任何力量，都已不能阻止薛尔基跑出地窖了。这时他不理他母亲的责骂，径自跑出那阴森森的地下室。一只铁甲车正辘辘地从他们门口开过，向四方八面扫射，还有许多彼得留拉的残余部队，慌乱地跟在它的后头。其中有一个跑进薛尔基的天井里，慌忙抛下钢盔、步枪和子弹带，然后爬过篱笆，跳到外面的菜园里。

薛尔基决心窥看马路上的情形。许多彼得留拉士兵，正沿着通西南站的大道奔去；有一

只铁甲车在掩护他们退却。直通本镇的大道上，空无一人。骤然，一军红军的士兵出现了。他迅速地卧倒，向大路的彼方射击。接着又一个出现了，第三个又……薛尔基看见他们一边跑一边弯身追击。基中有一个面皮晒得黝黑的红眼睛的中国人，胸口交束着机关枪的子弹带，又手紧握住手榴弹，一点也不回避地直追过来。跑在他们最前头的红军，年纪很轻，手里握着一架机关枪。这是冲进镇上的红军的先锋队。一种愉快的感情控制了薛尔基，他直跑到大路上，尽力高声喊道：

“万岁！同志们，万岁！”

他的出现是这样突然，弄得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那中国人开头疯狂地想向薛尔基扑去，但后者那热烈的表情终于阻住他。

“彼得留拉的士兵，向那里去？”呼呼地在喘着的中国人这样问。

薛尔基没有听到他的发问。他早已迅疾地跑进了天井里，拣起那白军丢下来的步枪和子弹，飞一样地跑去追赶散兵去了。红军士兵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大伙进了西南站，方才发觉。他们截断了一部份白军和他们的枪械与弹药，把残敌赶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息，整理队伍。这时候一个机关枪手跑到薛尔基面前，现出惊讶的神气问道：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住在这小镇上。”薛尔基回答。“我一直等候着你们开来。”

红军的士兵们围拢着他。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嘻嘻的说。“在我们进城的时候，他高声喊着，‘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青的好朋友！”他拍着薛尔基的肩膀补充说。

骄傲使薛尔基的心猛跳着，因为他们已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会同他们一道参加车站的肉搏战的。

小镇现在活跃起来了。苦恼的市民们爬出地下室与地窖，成群结队的跑到城门去看进城的红军。薛尔基的母亲和娃莲，看到光头的薛尔基，挽着步枪，束着子弹带的走在红军中间。这使他的母亲火了起来，她狠狠地摇着双手，心里想，薛尔基，她疼爱的儿子薛尔基，竟公然参加打仗啦！唉，这还了得！试想一下，他竟在全镇的人面前，挽着步枪，大摇大摆的走，以后将怎么办呢？这样想着，她实在忍抑不住了，于是大声喊道：

“薛尔基，马上回家去！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你这小鬼，你要打仗，先跟我来打吧！”她跑到她儿子跟前，心想把他拉出来。

但薛尔基，曾吃过她许多记耳光的她的小薛尔基，满脸给羞愧和愤怒弄得血红，只冷冷地瞪她一眼，干脆地回答说：

“别吵了，我不管你那一套。”

这可叫他母亲受不住了，她高声嚷道：

“哦，你对你母亲说话是这样子吗？好，你以后别再回家来。”

薛尔基头也不回的答道：

“你放心，我不回去的！”

这可怜的妇人呆呆地站在路上，这时候，大队脸色黝黑的满身灰尘的战士们，正打她身旁走过。一个嘹亮的嘲笑的声音响了起来：

“别哭呀，老太太，我们要选你的儿子做军事委员的。”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笑声。应和着前面的中队的雄壮的歌唱，他们开始唱道：

同志们，迈起你的脚步，
抖擞你的精神上战场，
踏上自由的大路，
挺起你自己的胸膛。……

从这合唱的歌声中，可以听出薛尔基那尖锐的高音。他已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了，而在这家庭所有的刺刀中，有一支正是他的呢。

在李士真斯基的大门口，贴着一张纸头，上面写着一个缩短的名称：“革委会”(Revccm)。

在它旁边，又贴着一张用火样的彩色绘成的标贴。一个红军的眼睛和指头直指着你，上面写道：

“你加入了红军吗？”

昨天夜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把那些无声的煽动者贴了出来。同时，革命委员会对全秀彼多卡夫的劳动者们的第一次的告示，也贴在那儿：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占领秀彼多夫卡了。苏维埃的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切望所有的市民保持镇静，那些组织排犹运动的吸血的匪徒们，虽已被逐，但为着保证他们不再卷土重来，必须把他们全数歼灭，因此请你们加入红军。用你们所有的力量来维护这劳动者的政权吧，秀彼多夫卡的军权，归于卫戍司令官，政权则隶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命主席杜林尼克”

李士真斯家已被一种新的人们占领了。“同志”这字眼——这是昨天用许多人的性命换来的——到处可以听到。这字眼实在是万分动人的。

杜林尼克忘记了什么叫做睡眠和休息；这木匠正忙碌地组织着本城的革命政府。在屋里一间小房子的门口，贴着一张纸和，上面写着“党委会”的字样。这一部份的负责人是伊娜茜夫同志，一个安静而谨严的女人。政治部已委派杜尼克和伊娜茜夫进行组织苏维埃政府的各个必需的机关。

仅仅过了一天，已有许多合作的人员，坐在桌子旁边，哒哒哒哒在打字了，同时，一个粮食委员会也已建立了起来，主其事的就是机警而神经质的德瑞兹基同志。德瑞兹基以前是糖工厂的助理机师。在秀彼多夫卡的苏维埃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他的最初的工作，就是以波兰人所有的顽强，去摧毁工厂管理处那处贵族的上层人员，因为他们背地里都痛恨布尔什维克政权，偷偷摸摸地企图乘机而动。

在工厂里的工人全体大会上，德瑞兹基激昂地猛打着讲坛的栏杆，对他周围的工人们，发出像爆流一样的激烈而坚决的话语：

“多少年来，”他喊道，“波多斯伯爵和桑古兹基子爵不是老骑在我们的父亲，和骑在我们自己身上吗？我们为他们造了宫殿，然而伯爵大人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饿肚皮，迫我们半生不死的给他们做下去。请想一想，波多斯基伯爵们骑在我们身上，已经多少年了？难道在我们波兰人中，在我们乌在兰人和俄罗斯人中，被他们奴役的只有很少的几个？然而现在那些拍伯爵大老爷们的马屁的人，却散播谣言，说是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击死工人们！同志们，这是顶无耻的中伤，因为各民族的工人们，就从不曾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阶级，都是兄弟，”他说着用手在空中描了一个弧形，然后又放在讲台的栏杆上。“然而谁离间我们各民族呢？谁使我们的弟兄们流血呢？在几世纪以前，国王和贵族就已唆使波兰的农民们和土耳其人做对头。不论那一个时候，总是这一个民族侵略和掠夺别一个民族。已经有多少的民族被消灭了！已经发生过多少的不幸了！这是谁造成的呢？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造成的吗？可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完结了。这些爬行的畜牲们，都已到了他们的死期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资产阶级最害怕的话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我们的救星，这是我们对幸福的生活的希望。打倒资本家，同志们，加入共产党去！”

“现在，波兰已成了共和国。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波多斯基们的根拨出来。在波兰共和国里，我们自己是主人了。有哪一个不晓得布洛尼克·普达申斯基的吗？革命委员会已派他当我们的工厂委员了。谁是被压迫的穷人，谁就有一切。我们必定有快乐幸福的一天，只要我们不听信那些狡猾的毒蛇们的鬼话。要是我们工人们相互间能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全世界所有各民族的工人弟兄们，完全组织起来！”

瓦兹拉夫从他的心底里，从一个坦白的劳阶动级的心底里，发出这新的热烈的呼声。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年青的伙伴们赞成地高声喝彩。只有老头子们是怕说话的。谁说得定——也许布尔什维克明天就退出去，那时候，每一句话都得付出代价来，假如不是上断头台，那么也会被赶出工厂去。

伊娜茜夫同志正到革命委员会去，在门口，她看到一个年纪很轻的红军。

“同志，你今年几岁？”

“快十七岁了。”

“你是本地人吗？”

“是的，”他笑嘻嘻地说。“我刚在昨天的战斗中加入红军的。”

伊娜茜夫紧盯着他。

“你爸爸做什么的？”

“火车上的副司机。”

杜林尼克跟一个红军由便门走进来，伊娜茜夫转对着他说：

“你瞧，我花了许多功夫，想给区委员会找一个青共团员，现在终于找着了，他是本地人。”

杜林尼克用灵敏的眼睛打量薛尔基：“你是……”

“哦，是查哈尔的孩子。那末，你走吧，尽你的力量去召集团员。”

薛尔基十分困惑地，望着他们两个。

“可是，我中队里的事情怎么办吗？”

走上门廊的台阶的杜林尼克回过头来说：

“这个我们会替你办的。”

两天之后，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便已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已意外地迅速地冲到小镇上来，它拥抱着一切的活动，又在它那急湍的漩涡里颠覆了一切。薛尔基已把他的家庭完全丢在脑后了，虽然它是离得那么近。

薛尔基现在已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不只十次地，由他的衣袋里掏出那张盖着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印章的白纸条，在它上面写着：薛尔基·布鲁克，共产党青年团团员，区委员会书记。要是谁怀疑这一点，那么在他的紧身制服外面，结在斜皮带上，藏在手制帆布枪袋里的，正是一支满利赫尔手枪——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这是最权威的证据。哦，保尔没有跟他一道，他是多么的难过啊！

薛尔基整天都在执行革命委员会的训令。现在伊娜茜夫正在等候他，因为他们要一道上车站里的政治部去，领取发给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和报纸。他急忙跑到街上，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备好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因为到车站去的路是很远的。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和第一师团的参谋部和政治部，是在车站的一列车子上。伊娜茜夫利用乘车的时间，询问薛尔基许多问题：

“你那一部门已做完了些什么工作呢？你已经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了吗？你应当在你的朋友中间——在那些工人阶级的儿童们中间，进行煽动工作。我们需要一个结实的工产主义青年团，而且越快越好。我们明天应当起草一张青年团的宣言，把它印出来，然后在戏院里召开一个巨大的青年大会，我得介绍你同乌斯金认识。我想她正在你们青年人中间进行工作。”

乌斯金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一头乌黑的短发，穿一件新的茶色的紧身制服，腰上紧紧地束着一条皮带。薛尔基从她那里晓得了许多新的东西，而她还答应帮助他进行工作。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她拿了一束文件给他，其中特别是包括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到了很晚才回到革命委员会来。娃莲一直在花园里等待他。她十分抱怨地跑到他面前，说道：

“你自己应当害羞呀！你究竟怎么打算呢？你完全脱离了家庭吗？妈妈天天为着你哭泣，爸爸也十分生气。家里乱得一塌糊涂。”

“不，娃莲，”他说，“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过没有功夫回家罢了。说真话，实在没有功夫。无论如何，今天我不能回去。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到我房间里来吧。”

娃莲认不出她的弟弟来，就像给通上了电流似的，他已经完全变了，他叫他姊妹坐在一把椅子上，接着就直入本题的说：

“我要向你说的就是：加入共青团吧。你晓得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主席。你不相信吗？那么，你自己看一看吧。”

娃莲看完他的证书，羞怯地注视着他，说：

“我加入共青团有什么用呢？”

薛尔基兴奋地摇动着双手：

“有什么用？我的好姊妹，你一点事情也不能做吗？呵，我甚至晚上也没有功夫睡觉呢。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宣传。伊娜茜夫说我们应当召集所有的青年，到戏院里开个大会，正确地给他们解释什么叫做苏维埃政府。他们说我必须作个演说。我想了想，觉得不成，因为我显然不晓得怎样说法。这样只给人家笑话。现在，你说，你的意思是怎样？”

“我说不出来。要是我这样做，母亲一定要气疯的。”

“你别想妈妈吧，娃莲，”薛尔基说。“她完全不懂这些。她只晓得叫她的孩子们坐在她身边。她是不会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恰恰相反，她倒同情它。但她要别人到前线打仗，却不答应她的儿子们参加。你说这是对的吗？请想想朱赫来一向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请看看保尔，他的母亲也阻不了他。现在轮到我们头上了，我们也有了生活的和过着真正的生活的权利了。那么娃莲，你会说个不字吗？呵，你想想，这是多么有味道的事情，你在女孩子们中间，我在少年们中间工作。黄头发的克林加现在也转变了。娃莲，你参加不参加我们呢？我这里有着关于所有这事情的小册子。”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来交给她。娃莲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弟弟，低声地问道：

“要是彼得留拉士兵们再打回来了呢？”

薛尔基初次感到困惑。接着他就说：

“自然，我要跟别的人们一道走。但是，那时候，你怎么办好呢？你说的不错，妈妈那时候一定是很痛苦的。”他停止了，沉默起来。

“薛尔基，你把我的名字秘密填下来吧，”娃莲说。“这样，除了你我之外，母亲和别的人们都不会知道。我要尽力帮着做一切的事情，这就是顶好的办法了。”

“很对，娃莲。”

伊娜茜夫走了进来。薛尔基对她说：

“同志，这是我的姊妹娃莲。我刚刚和她谈着青年运动的问题。她是一个很适当的人，但是，你晓得，我们的母亲是个不马虎的人。我们可以让她秘密参加吗？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的话，不用说，我将拿起枪来一同离开，然而她将叫我们的母亲十分难过。”

伊娜茜夫坐在桌子的一头，入神地倾听薛尔基的话。接着她说道：

“是的，这办法最妥当。”

剧场里挤满吱吱喳喳地谈说着的青年们，他们都是被贴在镇上各处的开会布告招引来

的。糖厂工人的乐队演奏了。正厅里大部分都是学生——男女的中学生和高初级小学校的小学生们。他们之参加大会，与其说是来开会，不如说是来看戏。

幕终于开了，刚到秀彼夫卡来的县委员会的书记长拉金同志，出现在舞台上。这个有尖鼻子的瘦小的人，立刻吸诱了全场的目光，大家非常有兴趣地倾听着他的演说。他说到全国各地的斗争，号召青年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当他结束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现在轮到薛尔基讲话了。拉金因为有事情先走。

薛尔基心里十分焦急，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说。“说些什么呢？拿什么事情来说呢？”为着找寻话头，他忍受了难堪的痛苦。伊娜茜夫在讲台后边解救了他，小声地说道：

“你就说关于组织支部的工作吧。”

薛尔基立刻跳到实际方法的问题。

“同志们，你们什么都已经听到了，现在让我们组织起支部来吧。谁赞成这提议呢？”

剧场的大厅里死寂无声。

乌斯金跑过来帮忙薛尔基，她把莫斯科的少年们怎样组织起来的情形告诉会众们。薛尔基独自狼狈地站在一旁，他看到大会对他的组织支部的提议如此冷淡，心里很觉气忿。他憎恶地眺望着下面的会众们，他可以看到查里凡诺夫一边轻蔑地斜睨着乌斯金，一边正跟丽莎在咬耳朵说话。全场的前排，是那些小鼻梁上扑着白粉的中学高级班的女生，她们那狡猾的小眼睛东张西望，不停地互相低声说话。在剧场入口的角落里，却坐着一排年轻的红军士兵，薛尔基看见那少年机关枪手也在那儿。他坐在剧台的旁边，脸上现出焦躁和愤慨的神情，憎恨地注视着穿着挺时髦的服装的丽莎和安娜，她们正毫不羞惭地同她们的爱人在窃窃说情话。

乌斯金同样也感到人们并没有倾听她的演讲，于是她就赶快结束，让伊娜茜夫说话。伊娜茜夫说得非常安详，会场上的喧笑声终于寂静下去了。

“同志们，青年们，”她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们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到不是仅然旁观，而是积极参加革命的同志来。只要你们下决心。革命的门是洞开的，我们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谁要说话的，请跑上来。”

剧场里又是死寂无声。接着，有一个声音突然从后排发出来：

“让我说几句话吧。”

说这话的，是米士加·列夫楚诃夫，一个眼睛微微地斜楞着，样子很像小熊的人，挤过人丛走到舞台上来：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如果布尔什维克需要我们帮忙，我决不会说个不字。薛尔基知道我。我要加入青年团。”

薛尔基脸上现出笑容了。他立刻走到舞台的中央，高兴地喊道：

“同志们，你们瞧吧。你们看看米士加，他是咱们中间的一个，因为他的爸爸是铁路的岔道夫，他给火车轧死了，因此米士加没有机会进学校。然而他虽然不像你们一样进过中学，却立刻就认识了我们的事业。”

剧场里这时候起了一阵哗声，有些人则装着猫叫。接着一个名叫奥古什夫的中学生，药铺老板的儿子，是个头发考究地梳成鸡冠形的小家伙，他走上前来，拉直了紧身衣后，就开始说：

“抱歉得很，同志们，我不大懂得究竟要我们干什么。他们要我们干政治吗？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毕业呢？我们是必须念完我们学校里的课程的。要是他们提议组织一个体育会，或是一个俱乐部，让我们年青人一块儿读书，那是另一件事情。但政治呢——结果你会给缢死的。不，同志们，谢谢你们。我不相信会有一个人赞成这件事的。”

大厅里发出了一阵笑声。奥古什夫跳下舞台走回原处去。现在年青的机关枪手上来说话了，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用愤怒的眼睛扫射下面座位上的人们，高声喊叫着说：

“你们哄笑，笑什么呢，你们这些猪猡。”

他的双眼像两颗烤红的煤球。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遍身因愤怒而震颤，接着又说下去：

“我的名字叫查基，伊凡·查基，我从未看见过我的爸和妈，我是一个流浪的孤儿；求乞过活，睡在人家围墙的旁边。我挨饿，无家可归，地狱一样的生活，这全不是你们这些有妈妈宠爱的人过着的生活。接着苏维埃政府建立了，我加入了红军。全队接纳我，给我饭吃，给我衣穿，教我读书写字，而特别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个我到死也不会改变的。我十分明白我是为什么而战——是为着我们，为着穷人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政府！你们这些坐在那儿，像驴子一样哼着叫着的人们，不会晓得在这城镇的外面，我们已损失了两百个人，已有两百个人被杀了……”他的声音就像乐器上绷紧的弦线。“不用说，他们是为我们幸福，和我们的事业而牺牲的……而且全俄罗斯都是如此，当全国各战线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的当儿，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现在，同志们，”他转过身对着干部的席位说，“你们跟他们说话，询问他们——你以为他们都懂得这些吗？不。像我们的老话所说：肚饱不交肚饿人。他们里面，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个穷人，是一个孤儿。”于是他愤怒地对着大会喊：“我们用不着他们，我们不要再作请求了。我赌咒，我们决不需要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只好用机关枪扫一扫。”这是他最后一击；他简直喘不过气来，立刻他头也不回地下了舞台走出戏院去。

干部席上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参加音乐会。在回到革命委员会的路上，薛尔基苦恼地说：

“真是糟糕。查基说得对，以那些中学生作对象，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反而不讨好。”

“这没有什么惊奇的，”伊娜茜夫对他说。“那里面简直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我们应当在工人阶级的青年中进行工作，把目标移向火锯工厂和砂糖工厂去。不过这大会也一样地有意义。在中等阶级中也一样有着很好的同志的。”

乌斯金赞成伊娜茜夫的意见，说道：

“薛尔基，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倦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注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党要使所有的劳动者们，注意每一种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组织许多大会，会议和代表会议。车站上的政治部正着手开办一个夏天剧场。几天后，一列特别的宣传列车也会开来，那时候，我们应当好好认真展开我们的工作。别忘记列宁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万的工人大众参加斗争，我们是不会胜利的。”

当天夜晚薛尔基送乌斯金回车站去。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好久不放。乌斯金双唇现出了薄薄的笑容。

薛尔基在回来的时候，顺便到他家里看一看亲人们。

他一声不响地静听着他母亲的怨骂。当他父亲开始骂他，他就立刻加以进攻，完全把他窘住了：

“爸爸，听我说，当德国兵驻在这儿，你们进行罢工，并打死机车上的守兵的时候，你想起家中的我们吗？你想过的，但你却依着工人阶级的良心做去。同样，我也想到你们，想到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的时候，你们要为了我吃苦头。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赢了，我们却占了上风。无论如何，我不能坐在家里，我不能放弃工作。爸爸，你一定看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唠叨地说这些无意义的话呢。我做着正经的事情。你应该赞成我，帮助我，然而你却和我吵闹。爸爸，让我们和解吧，那么妈妈也就不会瞎吵了。”他那双深蓝的眼睛

直视着他父亲，脸上现出亲切的笑容，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是对的。

他的父亲局促不安的坐在条凳上，接着他微笑了，两排黄牙透过密密的口髭露出来：

“你就用阶级的良心来责备我吗？你这小流氓。你以为你一带起手枪来，就不会再吃我的皮鞭了吗？”

但他的口气一点也没有威胁的成份。他踌躇了一会，似乎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接着，他突然拉着他儿子的粗糙的手，继续说道：

“就继续干你的吧，薛尔基，我的孩子。我不愿意在你上坡的时候绊住你。不过你要常回家，让我们多多看到你。”他怀着果决的心情，摇着他儿子那起茧的手。

夜，由开着的房门口，透出一幅长方形的亮光，横在入口的台阶上。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革命委员会的五个委员，正围着那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坐在柔软的天鹅绒沙发上开会。他们是杜林尼克，伊娜茜夫，邓摩臣科，一一地方特务委员会（反革命肃清委员会）的主席，穿着哥萨克的服装，像是启尔基兹人一样。别的两个是瘦弱的铁路工人苏狄克和机车厂工人，有着矮而大的鼻子的奥斯达楚克。

杜林尼克凭着台子，现出倔强的精神，直视着伊娜茜夫，他那沙哑的声音一句一句的挤着说：

“前线急需给养。工人们需要食粮。我们刚开到这里来，那些小商人和摊贩便把他们的价格提高。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卖买都用尼古拉票或是凯急格票。今天我们应当规定物价。我们十分明白，他们谁也不会按平价出售。他们要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我们就应当进行搜查，征发这些奸商的货品。

我们不能让工人们饿肚皮的。伊娜茜夫同志警告我说，我们不要太过激烈，我告诉她，她还带着知识份子的怯懦性。要注意，问题不仅仅是在小商人身上。例如，我今天得到一个消息，旅馆老板波里司·钟恩就有着秘密的地下室的堆栈。而且所有较大的商家，甚至在彼得留拉占领秀彼多夫卡以前，早已有了大量的囤积。”他浮着冷冷的笑容，特别注意地望着邓摩臣科。

“你怎样晓得的呢？”邓摩臣科不假思索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感到羞恼，因为侦查出这一类的事情，原是他的责任，但杜林尼克却比他早得到这消息。

杜林尼克冷冷地笑着说：

“别焦急吧，你这老家伙，我的眼睛什么都看得到。我不仅知道那些地窖，我还晓得你和师团长的汽车夫，昨天拿着一个瓦特加酒瓶。”

邓摩臣科坐着局促不安，苍黄的两颊泛红了。

“而且瓶里面还有好些酒！”他自己添着说。

“这地窖的事情，”杜林尼克接着说，“是薛尔基告诉我的。他显然有一个朋友，在那车站饭店里当伙计，他从那些厨师口里，知道他们店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前一向是钟恩大批供给的。昨天，薛尔基又得到确实的报告：的确有这么一个地窖，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它。邓摩臣科，请你就在今天夜里，带着弟兄们和薛尔基，把它找出来吧。要是找着，我们就能够供给工人们和师团的给养委员会了。”

半点钟后，八个武装兵士走进旅馆老板的家里，留下两个守住大门。

老板是一个矮肥的人，样子很像酒桶，脸上长着几天未剃的红毛，他一面踏着木腿出来迎接这些陌生人，一面堆着谄媚的笑容，用带喘的声音问道：

“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呀？干什么这么晚才光临呢？”

站在钟恩后面的，是他的女孩子们，身上穿着慌忙披上去的睡衣，给邓摩臣科的手电筒的亮光射得张不开眼。同时在隔壁的房间里，肥胖的老板娘一面穿衣一面在嘟哝着。

邓摩臣科只作简单的解释：

“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寸，都检查过了，但找不到秘密地窖的痕迹。在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大姐，她睡得很香，连他们进去都不知道。薛尔基仔细地叫醒她，问道：

“你是谁？是做女工的吗？”

她拉着被头盖住肩膀，脸孔避开手电筒的亮光——她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惊疑地回答道：

“是的，我在此地做工。你们是谁呀？”

薛尔基向她解释，叫她穿上衣服走开去。

邓摩臣科在那宽大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气得发昏，溅着唾沫激动地回答说：

“你们要我怎样呢？我就只有一个地窖。你们是在浪费时间啦。从前我开过旅馆，现在已成穷人了。彼得留拉的兵士早把我抢个精光，几乎连性命也跟着丢掉。我是十分喜欢苏维埃的，但是你瞧，我还有什么东西呢？”他摆着两只滚圆的短手，用涨血的眼睛望了望薛尔基和邓摩臣科，再看看一个角落和天花板。

邓摩臣科愤愤地咬着嘴唇：

“你还想瞒我们吗！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请你把地窖的所在说出来。”

“哎，你怎么啦，武装同志，”老板娘现在插嘴了，“我们自己还挨俄呢。他们已把我们的东西抢个精光。”她很想破声大哭，但眼泪老挤不出来。

“挨饿，你们还养着大姐哩！”薛尔基说。

“唉，那怎么能说是丫头呢？只是收留一个穷女孩子罢了。叫克丽丝娜把她的身世告诉你们吧。”

“让我们自己动手吧。”邓摩臣科已忍不住了。

外面天已透亮，他们还继续在老板的旅馆里和住宅里搜查。邓摩臣科因为搜了老半天没有结果，心里十分气愤，已经决定停止搜查了，就在这时候，正要走出那丫头的小房间的薛尔基，听到她低声说道：“

“一定是在厨房的壁炉子里面呢。”

十分钟后，那个巨大的俄罗斯壁炉已给打破了，里面现出一个活动的铁板门。再过两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装载着许多的桶子和袋子，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由旅馆里开了出来。

在一个热天里，玛丽亚·柯察金带着一个小包袱，由车站走回家来。当她听着阿尔青叙说保尔吃官司的经过时，她哭得十分伤心，悲惨的日子一直的折磨她。她实在没有法子过活了，只好给红军洗衬衫，士兵们则设法代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晚上，阿尔青的足步比平常来得快，他刚推开房门，就在门限上喊道：

“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

亲爱的阿尔青哥哥：

哥哥，我应当告诉你，我还活着，虽然不很健康。我腰上吃了一颗枪弹，但现在已快治好了。医生说，骨头并没有损坏。所以你不必担心，它就会好的。我一出了医院，也许可以回来看你。我还没有见到母亲，事情变化很快，我现在已是科多夫斯基骑兵旅团的一个战斗员；不用说，你想必听到了英勇出名的科多夫斯基的名字。我从不曾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对我们这旅团司令官非常的敬佩。母亲已回家了吗？要是已回家，她的小儿子在这里顶亲热的问候她。

你的弟弟保尔

再者，阿尔青哥哥，请到林务官家里，把这信告诉她。”

玛丽亚·柯察金老太太又痛哭了一番：她那浮情燥气的儿子，连医院的通讯处都没有

告诉她。

薛尔基开始经常到车站里那门上写着“政治部宣传股”字样的绿色客车上来。乌斯金和另一个女同志梅惠杰夫的办公处，就在那小车厢里面。梅惠杰夫双唇上从没有一个时候不衔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从没有一个时候不现出古怪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员会的书记，不知不觉间跟乌斯金十分亲热起来了。在每一次简短的会见中，除开一卷卷的文件和报纸之外，他还从车站上带着一种模糊的愉快的感情返回镇上去。

政治部的公开剧场每天都挤满着工人和红军的士兵。第十二军的宣传列车停在侧线上，车身遍处贴着色彩夺目的画片。这列车从早到晚无时不在活动中。它有一个印刷部，成天忙着排印报纸，传单和告示。前线是近在咫尺的。有一天晚上，薛尔基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事情，顺便走进剧场里，就在那儿的兵士群中，他遇见了乌斯金。

夜已深了，当他送她回车站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是住在那儿的——的时候，薛尔基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对她说道：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跟你在一道呢？”他接着又说下去：“跟你一道是愉快的。我觉得受到鼓励，我觉得我可以不停地工作下去。”

乌斯金拦住他的话头，说道：

“你要注意，薛尔基同志，让我们来个约定吧，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耽溺于感情，我不喜欢这样的。”

他像个被斥责的小学生似的，满脸绯红，说：

“我对你说的，就像一个同志对别个同志说的一样，你却这样对待我……难道我说的话是反革命的吗？自然，我往后不再提起这桩事情了，乌斯金同志。”

他急促地握一握她的手，转身快步向城里去。此后一连几天，他都没有到车站上去。后来伊娜茜夫邀请了他，但他找到一个藉口，说他工作很忙。事实上，他的确是很忙的。

有一天晚上，当苏狄克回家，路过糖厂多数高级职员住宅附近时，有人对他开枪。实行住宅搜查的结果，发现了一个名叫“狙击队”的法西斯团体的枪械和文件。

革命委员会开会了，乌斯金也出席。她拉薛尔基到一旁，从容地问道：

“你怎么回事呀，你在发挥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吗？你打算把个人的事情转移到工作上去吗？同志，你不应该有这一类的举动。”

这样薛尔基又时常找个机会到绿色客车上去。

接着县代表联席会议开会了。他们举行了两天激烈的讨论。在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同带着武装，在河岸的树林里，一连二十四小时的追击着查鲁德尼所率领的彼得留拉匪帮的残余部众。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见乌斯金正在伊娜茜夫那里。他陪着她回到车站去。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他热烈地握住她的手，但乌斯金却气愤地把她的手抽回去。

自此之后，他又长远不到宣传列车上去。他忍痛地避开乌斯金，甚至在工作上需要和她接触的时候。最后，当她固执地要求解释他这种行为时，他气忿地喊道：

“我跟你讨论这种事情有什么用呢？你又要来那一套，不是说那是布尔乔亚的行为，就说那是背叛工人阶级的。”

高加索红旗师团派遣队的列车，开进车站来了。三个脸色微黑的指挥官，访问了革命委员会。其中有一个高身材的瘦子，身上紧紧地束着一条华丽的镶银的武装带，他走近杜林尼克，说道：“闲话少说，要一百车干草。马快饿死了。”

他们派薛尔基和两个红军去征发干草。在一个村庄，他们遇到了富农匪帮的袭击。匪徒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打个半死。薛尔基比别两个受伤较轻，因为他年纪轻，稍微

得到他们的宽恕。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运到镇上来。

一队兵士被派到村里去，隔天，他们便把干草征发来了。

薛尔基不愿意麻烦他的家人，所以在伊娜茜夫房间里休养。当天晚上，乌斯金来看他，他初次感到了她的握手的紧牢和抚爱，是他以前所未想到的。

在酷热的正午，薛尔基跑到车站上去，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乌斯金听，还把这同志的事情告诉她。他临走时，他无意间对她说：

“我要到树林里湖里洗澡去。”

乌斯金放下她的工作说道：

“等一下，我们一同去。”

两个人站在明镜一样的静穆的湖边，透明而微温的湖水是诱人的。她对他说：

“你到大路的入口那儿等一会，让我洗个澡。”

他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儿朝着太阳。他听到她后面的水溅的声音。

透过丛林薛尔基看见冬妮亚和军事委员会宣传列车的指挥管楚亚宁，正沿路走来。楚亚宁穿着时髦的英国式的军官制服，束着佩剑的武装带，登着吱吱作响的发亮的长筒马靴，显得十分漂亮。他挽着冬妮亚的手一边沿路走来，一边和她在说着什么。

薛尔基认出她是曾给保尔带信的少女。冬妮亚也盯着薛尔基，显然也认出他。当她走近他的时候，他由袋里掏出信来，阻住她说：

“请稍停一会吧，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份是提到你的。”

他把信交给她。冬妮亚由那个男人的手里抽回手来，接读了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中轻轻颤抖。接着，她把信交回薛尔基，问道：

“关于他的事情，你还听到别的什么吗？”

“没有。”薛尔基回答。

这时候，他听见乌斯金在他后面踏着碎石走来的步声。楚亚宁看到她，便低声对冬妮亚说：

“咱们走吧。”

但乌斯金的轻蔑而讥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楚亚宁同志，列车上整天的在找你呢。”

楚亚宁厌恶地盯着她，说：

“不碍事，他们没有我也行的。”

当他们两个走开后，乌斯金目送着他们说：

“我想这懒虫马上就会给开除出去。”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的巨叶频频点头。小湖是诱人地新鲜。薛尔基想洗澡了。

当他由水里出来之后，他在离小径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乌斯金，她正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树上。

他们一道向树林的远处走去。他们走到了野草萋萋的小径，决定在草上歇一会儿。林里寂然无声，只有橡树依然低声在说着什么。丽达躺在嫩草上，枕着她那弯曲的臂膀。她那健美的双腿和破烂的皮鞋，都没在长长的野草中。薛尔基偶然望一望她的双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他又看了看他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于是他笑了。

“你笑什么呀？”丽达问。

薛尔基指着靴子说：

“这么样的靴子，叫我们怎样打仗呢？”

她没有回答。她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楚亚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最后终于说。“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很褴褛，但他却只晓得怎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他是我们党里的投机份子。……可是前线的情形实在是很严重的，我们应当忍耐长期而且残酷的斗争，”她静默了一会，接着说：“照我看来，薛尔基，我们不仅应当用语言，而且应该用刺刀去战斗。你听过中央委员会决议动员四份之一的青年团员上前线吗？我想我们在这儿决不会长久的，薛尔基。”

薛尔基倾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她的声音里辨出一种不平常的音调来。他觉得有点惊讶。乌斯金那双黑艳艳的水汪汪的眼睛，正紧盯着他。他几乎忘却了自己，想告诉她说：她的眼睛就像一对明镜，他可以从那里看见一切。但他终于抑制了自己。

丽达用手腕支起身子，站了起来。

“你的手枪在哪儿呢？”

薛尔基摸着他的空枪袋，阴郁地说：

“在征发干草的时候，给富农的匪帮抢去了。”

她一只手插进制服的口袋里，摸出一支发亮的白朗宁手枪。

“薛尔基，看那橡树！”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那有着深的裂痕的树干，然后就举平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简直不加瞄准就开枪。被打碎的树皮，向四面飞散。

“看见吗？”她非常得意地喊，接着又放第二枪，树皮又散落在草地上。

她把手枪递给薛尔基，带着讥弄的说：

“你来吧，看你射得怎样？”

他射了三枪，只有一枪不中的。她微笑着说：

“我以为你没有我本事呢。”

她把手枪放在地上，躺了下去。她那耸现的胸脯像波浪一样起伏着。她柔声的说：

“来呵，薛尔基。”

他的身子移近她去。

“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是不好的。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像钢铁一样。蓝的颜色太过温柔……”

突然，她抱住他那美丽的头，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着。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就要来临。

黑暗的帷幕掩住了树林，夜突然到来了。师团本部的电报生，在打着电码的电信机旁边，弯着身子收着机上溜出来的狭长的纸条，一面迅疾地把那些点和短线译成了如下的文字：

“师团部指挥官并抄送秀彼多夫卡革委会主席，在收到本电报后十小时以内，将镇上所有机关一律撤退。镇上留住一个大队，归指挥作战部队之N联队长统辖指挥。师团本部、政治部、及所有各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朗捷夫车站。执行结果，即向师团长报告，签名。”

十分钟后，一架机器脚踏车，射出乙炔(Acetylene)的头灯的亮，光在镇上静寂的街道上奔驰着。它在革委会的入口咣咣地停了下来，把电报交给主席杜林尼克。别的人们聚拢了来。一张特别的单子开出来了。一点钟后，满载着革命委员会的案卷和其他文件的车子，已开过镇上的市街，朝波多尔斯基车站开去。

薛尔基听完了电报之后，情不自禁地跟着传令员走到外边。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子到车站去吗？”

“坐在后边，不过，要把牢。”

在离绿色车厢十码左右的地方，他伸着双手，勾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好像快要失掉他痛爱的无价的东西似的，他低语道：

“再见呵，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会再见的，只要你别忘记我。”他感到战栗，几乎放声哭出来，但他不得不马上走了，他不能再说话，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直到她感痛方才松开。

隔天早晨，被遗弃的小镇和车站，都显得空虚。最后列车的车头，在动轮时嘶嘶的拉了气笛，仿佛在告别似的；同时在车站外面的铁道两旁，正分列着留守本镇的大队的警戒线。

黄叶都凋零了，树木都光秃了。西风卷着残叶，静悄悄地在路上旋转着。

薛尔基穿着红军的外套，束着帆布做的子弹带，跟着别的十几个红军士兵，守住糖厂外面十字街头上的一个阵地，静候着波兰人的到来。

阿夫托诺轻轻敲着他的邻居泽拉辛的门。泽拉辛开了门，还没有穿好衣裳，就由半开的大门向外张望一下，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阿夫托诺指着那执枪走着的红军部队，向他的朋友点了点头，丢个眼色，说道：

“走啦。”

泽拉辛焦急地瞪着阿夫托诺说：

“我想你还不晓得波兰人用的旗子吧？”

“就我所知，它是一个头的鹰鸟。”

“哪儿可以找到这种旗子呢？”

阿夫托诺挠着头皮，这是他无法解答的问题。他想了一想，接着说道：

“这在红军倒也没什么；他们是可以退走的；只丢下我们留在本地，绞着脑汁，叫自己去适合另一个新政府。”

一架机关枪放射了，枪声冲破了周遭的死寂。骤然，车站上传来了列车的汽笛声。接着就是大炮轰隆的放射。大炮弹呛呛地掠过高空，落在糖厂旁边的大路上。路旁的丛林立时隐没在深蓝色的炮烟中。这时候，沿着大街走去，不断回头眺望的，就是那些顽强的红军。

一粒细小的泪珠，冷冷地流下薛尔基的面颊。他慌忙擦掉它，又向四周望一望；并没有人注意他。

走在他旁边的，是高瘦的火锯工人安提克·克罗柯托夫。他的手指板住步枪的枪机，一路缄默而且阴郁。他的眼睛碰着薛尔基的视线，于是他把内心的忧虑尽情对他倾诉：

“现在，我们家里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他们会说：‘他是一个波兰人，可是他竟对抗同种族的部队。’他们会把我的爸爸赶出木厂来，而且一定要打他。我本来叫他跟我们一道走，但这老头子自己却离不开家庭。噯，他妈的，仗越是快打越好！”安提克愤愤地把溜到前额来的红军钢盔，往头顶推了上去。

“……哦，再见吧，我的故乡，这如此质朴又如此肮脏的，有着这么些丑陋的小屋和腐臭的市街的，我的小镇与故乡。再见吧，亲爱的人们，再见吧，我的娃娃，再见吧，现在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异族的、憎恨的、残忍的白色波兰军团正在开来了！”

穿着肮脏的油垢的外衫的机车厂的工人们，用悲恻的目光送着红军的士兵。薛尔基兴奋地向他们喊道：

“我们要回来的，同志们”

在拂晓前的薄雾中，第尼伯河现着暗淡的微光，河水激荡着岸边的石子，哗啦地在响着。

在河边一条狭隘的壕堑里，他们五个，躲藏在里面，紧紧地挨着，躺在一支圆鼻子的马克沁机关枪的旁边。他们是第七狙击师团的先锋突击哨。薛尔基正朝着河斜躺着。

昨天，在波兰人那旋风似的炮火之下，他们已给不停的战斗弄得精疲力尽，终于退出了基辅，渡到他们现在扼守着的左岸来，显然，他们再不能让波兰人再进一步，渡过第尼伯河来。

这次的退却与惨重的损失，以及最后的失去基辅，对战士们们的精神，有严重的影响。第七师团曾经是那么英勇地冲破重围，通过森林，进抵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并且在猛烈的进击之下，逐走了占据车站的波兰兵，把他们赶入森林，打通了到基辅去的道路。但是，现在，这可爱的有如少女般美丽的大城，又被迫放弃了。红军士兵们的脸色都阴郁了。

波兰白军已驱逐了达尼萨城的红军，占领了左岸铁桥附近一个小的优越的据点。然而不管他们如何死力进击，还是无法前进，每次都遭到红军的猛烈的反攻。

薛尔基凝视着流动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在晌午时候，被大伙的愤怒所激动，他跟着向波兰白军反攻；他第一次地遭遇了一个波兰兵——他顶多只及那白军的上唇那样高——同他作了面对面的格斗。那家伙举着步枪，枪尖插着跟指挥刀一样的法国式的长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乱喊，一边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在这一刹那间，薛尔基看见他有一对凶猛的大眼睛，同时他的刺刀的刀尖，已把白军的刺刀击落在地上。

那波兰白军倒下了。……

薛尔基的手没有颤抖。他晓得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薛尔基，能有那样温柔的爱情，又能保持那么亲密的友谊。他不是一个狠毒的青年，他的心地也决非残酷，然而他却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所欺骗、所教唆、所驱使的士兵们，都是要像野兽一样蹂躏他们自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薛尔基，为着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快点到来而杀人了。

保尔·柯察金坐在炮架上，御着那割去一只耳朵的灰色马，周行祖国各处，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他已是一个长成的和强壮的人；他已在灾难和苦痛中长大了。给沉重的药盒擦得出血的皮肤已经复原，挽着枪带的肩膀，已长着一条厚厚的硬茧了。

在这一年中，他经历了许多可怖的事情。伴随着几千个同他一样，褴褛而且破裂——简直和裸体一样——但为着树立本阶级的政权，始终燃烧着不灭的斗争火焰的战士们，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只有两次，他才离开过这革命的风暴。第一次是因为他腰上受伤；第二次是在酷寒的一九二〇年的二月，他染了热度极高的伤寒。第十二师团的士兵们，被跳虫所传播的伤寒所害的，比死于波兰军的机关枪下的来得多。这师团当时正竭力堵挡波兰白军的任何进展，分布的区域非常广大，简直包括了整个北部的乌克兰。保尔还没有完全痊愈，便已加入了这部队。

那时候，联队已占领了喀查——乌曼支线上的弗朗多夫卡车站，大战又再度在酝酿中。正当受了极大的损失，又有一部份业已瓦解的第十二军各师，在进攻基辅的波兰白军压迫之下陆续退却的时候，无产阶级共和国，已准备着在胜利的一击中，彻底摧毁酩大醉的波兰白卫军。

身经百战的骑兵第一军团的各师，正迅速地由遥远的北高加索调来，这是军事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行军。第二、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等骑兵师已陆续地开近乌曼，在前线的后面集中了——在由高加索出发赴决战的途中，他们还清除了玛哈纳的游击匪党。呵，这一万六千五百把军刀，这一万六千五百个在酷热的草原上曝着的勇士！

红军最高司令部和西南前线司令部，都集中全副精神，务使这决战的布置不为毕苏斯基——波兰白军的将军——的部下所知晓。共和国及前线的司令部，非常谨慎地隐蔽着这些骑兵师团的集中。

当局禁止在乌曼区进行积极的战斗。由莫斯科至哈科夫的前线司令部的电线，不断营地响着——再由此发至第十四军团的和第十二团的司令部。狭长的受讯纸条上印着密码的命令：“切勿使波兰人注意到大部骑兵的集中。”只有在波兰军队的运动，结果可能把布琼尼各骑兵师团卷入战争的危险时，才能进行积极的战斗。

篝火的火焰，像破碎的红布一样，在空中抖动着，黄褐色的大股的烟柱，不住盘旋上升。坟子是不喜欢火烟的，他们密集成群地东西飞散。战士们稍离火堆，列成扇形坐着，面孔映着火光，现出古铜颜色。

几个小壶放在火堆周围的蓝色炭灰中，壶里的水开始冒泡了。狡猾的火舌从下面吐了上来，舐了那一个俯伏着的人的头，那个人慌忙向后一躲，咕噜着说：

“哎，他妈的！”

周围跟着扬起了一阵笑声。

一个穿着旧制服的，有着短短的口髭的中年人，刚顺着火光，检查了他的枪筒，深沉的发音说：

“这学生是多么的用功呀，连给火烧着了都不觉得呢。”

“柯察金，你应当把看过的告诉我们呀。”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人挠着烧焦了头发，笑着说：

“呵，它的确也是一本好书，刚看下去，就不愿意放手。”

坐在保尔旁边的那一个狮子鼻的青年，正在忙着修理背囊的皮带，他一面用牙咬着一条粗线，一面好奇地问道：

“喂，书里说的什么呀？”他又用剩下的线在军帽上缝了几针，补充着说：“要是谈恋爱的，我倒很喜欢听听他说的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哄笑起来。玛特维克，抬起他的剪平的头，用一只狡猾的眼睛斜睨着那青年人，说道：

“不错，谢利达，我的孩子，恋爱完全不是坏事情。你又是这么漂亮，跟油面里的美男子一式一样。你到了一个地方，女孩子们就成群的跟在你屁股后头。你唯一的一点小毛病，请原谅我，就是你那扁鼻子，不过，这个也不碍事，只要你把一颗十磅重的诺维兹基手榴弹，挂在鼻子尖上，包准明天早上就会变成了高鼻子的。”

突发的笑声，使拴在机关枪架上的马匹，吓得发出喷鼻的声音。

谢利达缓缓地转过身来：

“漂亮是不卖帐的，头脑才值钱。”他拍着自己的前额暗示着说。“比方，拿你说吧，你的舌头挺能挖苦人，但你是一个傻蛋，事情是半懂不懂的。”

达他里诺夫接着站起身来，阻止了他们的吵架，说道：

“别吵，孩子们，别吵呵，孩子们，干什么吵得这样起劲？还是让柯察金把他看过的告诉我们吧。”

“保尔，你就读下去吧。”周围一齐这样喊着。

保尔把马鞍移近火堆，坐了上去，然后掀开那本小而厚的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我从大队部军事委员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要是你们能静静的坐听，我就读下去。”

“读下去吧，保尔，闲话少说，谁也不会打搅你的。”

过了一会，当联队长普守列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一道悄悄地策马走来的时候，他看见十一对动也不动的眼睛，正瞪着那个念书的人。普守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那一群兵士，对

军事委员说：

“我们的侦察兵，一半就在那儿，其中有四个，都是年纪极轻的青年团员，每一个都是挺好的战士。你瞧，那一个在念书的，还有那边的一个，看见了吗？那一个眼睛像小狼的叫柯察金，那一个是查基，他们两个都是好朋友，虽然暗地里互相在争雄。柯察金一向是我顶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遇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了。你看，他们虽然暗暗地在进行着政治工作，但影响是很大的。有人甚至给他们起个绰号——青年亲卫队。……”

“那个在念书的人，是不是侦察兵的政治指导员呢？”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马尔。”

普守列夫斯基驱马上前。

“哈罗，兄弟们，”他的大声喊着。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联队长轻轻地跳下马，走到围坐的士兵们跟前。

“烤得舒服吗？同志们。”他脸上浮起了亲切的微笑。那有点蒙古人的面孔和细长的眼睛，已暂时失去了严厉的神情。他们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一个好同志那样的热烈欢迎他。军事委员还骑在马上，因为他是急想赶路的。

普守列夫斯基把毛瑟枪推到背后，蹲在保尔旁边的马鞍上，问保尔道：

“抽口烟吗？我已弄到一些好的香烟。”

他点好了香烟之后，对军事委员说：

“你先走吧，杜洛宁，我要停要这儿，如果总部里要我的话，请通知我。”

杜洛宁走了之后，普守列夫斯基就对保尔说：

“继续念下去吧，我也要听一会儿。”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面之后，把书放在膝盖上，深思地凝视着那火堆。他有几分钟不说一句。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所感动。普守列夫斯基正狂抽着香烟，等着听他们的意见。

“这个故事太悲惨的，”谢利达冲破了周围的沉默。“世界上的确有着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所不能忍受的，但当他获得了什么主义的支持时，他真的就能忍受了。”他显得非常感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安得列夫·富美捷夫，这个由贝里亚·捷克尔夫来的鞋匠的助手，忿激地叫起来。

“这个在他嘴里插着十字架的该死牧师，要是给我碰到，我一定马上揍死他，这畜牲！”

安得路斯从火堆上拿起一个水壶，把它放在两膝中间，再解开放着面包的口袋，然后发表长篇的议论。……当骑兵侦察队员入睡的时候，夜已很深。谢利达高声作鼾。普守列夫斯基也在那儿枕着马鞍睡觉，政治指导员克拉马尔还在他的笔记簿上写着札记呢。

隔天，保尔干完了侦察之后，把马拴在树上，叫刚吃完茶的克拉马尔过来，对他说：“同志，要是我转到第一骑兵队去，你认为怎样呢？他们当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我看他们集在一起不像是专为着练习骑马的。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呆在这儿。”

克拉马尔张着嘴呆视着他：

“怎么能转过去呢？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东西，看成电影院吗？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呢？要是我们大伙都转到别处，这里的事情还成什么样子！”

保尔阻住他，说道：

“难道有这么严重？我在这一个部队或那一个部队打仗，不是一样吗？我又不是逃到后方去干省力的事情。”

但克拉马尔坚决反对他：

“嘿，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很不错，不过你带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毒素。你想怎么样，就非得那么样做不可。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却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党是

高于一切的。每个同志不是想到那儿就到哪儿，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守列夫斯基反对你转到别处去吗？那么，得了，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面色苍白而孱瘦的克拉马尔因为十分激动，终于咳嗽起来了。印刷工厂的铅的灰尘，早已侵入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绯红。

当他发作的咳嗽过了后，保尔低声地但坚决地对他说：

“这是很对的，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里去，我已决定了。”

第二天的晚上，在篝火旁边，已再也看不到保尔的踪影了。

在邻近的小村里的学校附近，许多骑兵聚集在一个小丘上，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形。一个健壮的布琼尼骑兵队的士兵，小帽推到脑后勺，坐在轻机关枪的枪架上，正在抚奏手风琴。手风琴不断发出嘎哑的声音，奏琴人也时常不合拍子，但另一个穿着红色阔裤子的人，正绕着圈子跳着狂热的霍巴克舞。

村里的男女青年们都跑过来，靠着炮架或是篱笆，围看这刚开到村里来的骑兵旅团的大胆的舞蹈者。

“跳舞的老乡，使点劲吧，喂，那个拉手风琴的，加油呀！”有许多人这样喊。但那位音乐家的粗大手指，叫它扳弯一只马蹄铁倒好办，要叫它灵活地按着琴键，可真做不来。一个脸色黝黑的骑兵队员，这时候就说道：

“唉，可惜，阿芳西在玛哈纳死了，他能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他是担任骑兵中队的右翼的。可惜他已过世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战士，一个更好的手风琴家。”

保尔也在那儿，当他听到最后这句话，他就挤到炮架前面，把手放在蛇腹一样的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喘了一下就静默了。

“干什么呀？”那个奏手风琴的青年人瞪着他。

舞蹈的人立刻停住了，周围发出了愤怒的叫声：

“你是干什么来的？为什么捣乱？”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对他说：

“拿给我，让我拉一会儿。”

拉手风琴的人不信任地注视着这红军士兵，缓缓地从肩上把皮带脱下来。

保尔照例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使它平衡。风琴像扇一样展开了，从一伸一缩中，鼓着整个风箱的气，奏出了或高或低的悦耳的声音。

喂，小小的苹果，

你滚到那儿去？

特别警察，

还没有来呢？

舞蹈者在琴声中间，赶着那熟悉的节拍舞起来了；他的手臂像鸟的翅膀一样飞舞，一面用各种奇怪的花样旋转着，他的两手在上下勾成两个圆形，使劲地拍着屁股、膝盖、后脑和前额，接着又拍着鞋底和张开的嘴巴，同时，手风琴的琴声不停地鞭策着他，用急躁而热狂的旋律激励着他。舞蹈者这时候就像一只陀螺那样团团地转，伸长的飞舞的双腿，不住向四面描着圆圈，直到他完全透不过气来，“嘘，嘿，嘘，嘿！的喘着。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猛烈的不接触之后，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团，就在波兰第三和第四军团的接合点上，冲破了波军的阵线，把企图堵截它的沙维兹基将军的骑兵旅团，打个落花流水，然后一直向罗镇迫进。

波兰总司令部，为着弥缝战线的缺口，正疯狂地匆忙组织突击队，并把刚从波格勃齐军站的货车上卸下来的五辆坦克，开到作战的地点去。但布琼尼军团，已经绕过了查鲁尼萨——波军组织着反攻的根据地——向敌军的后方猛袭了。

这时候，他们急派康尼茨基统率的波兰骑兵师，去进攻布琼尼军团的后方。因为波军总

司令部，认为红军的目的一定是在喀查丁——他们后方一个极重要的战略据点。这行动仍没有改善他们的形势。虽然他们在第二天已堵塞了战线的裂口，切断了布琼尼的大军，但强大的红骑兵终于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出现，并已消灭了他们后方许多根据地，准备着袭击基辅周围的敌军。当他们继续进展时，骑兵团还毁坏了许多的铁轨和桥梁，使波军不能容易地退却。

从俘虏口里，他们晓得波兰军的总司令部设在季托米尔——事实上是前线的总司令部设在那儿，——因此骑兵指挥官决心占领重要的铁路交轨站和行政中心季托米尔与伯底捷夫。六月七日黎明第四骑兵师已向季托米尔出发了。

在右翼的某一中队间，顶替死了的雇里亚布秋保尔的，正在驱马前进。因为士兵们不愿意放走这优秀的手风琴家，在集体的要求之下，他才被编进这中队里。

骏马迅速地在奔驰。他们展开了扇样的阵形，向季托米尔进扑。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大地在怒号，战马在喘息，战士们屹立在马蹬上。

脚上的大地往后飞奔，伟大的城池以及花园树木，都冲过来迎接他们。红军已经过了城外的住宅区，闯进市中心来了。像死一样叫人恐怖和胆寒的“杀呀！杀呀！”的喊声，在空气中震响着。

茫然无措的波兰军，没有丝毫的抵抗。城里的卫戍军被击溃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愤怒地向前奔驰：在他旁边，骑在一匹瘦脚的黑马上的，是那个舞蹈者。保尔看见前面一个英勇的红骑兵，无情地挥起了军刀，把那个来不及瞄枪的波兰兵砍倒下去。

马蹄猛踩着石铺路，发出尖锐的得得声。接着，突然地，在路的正中央，出现了一架机关枪，和四个穿蓝色制服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兵士。其中有一个领上镶着金边的，看见红军向他驰来，便举起握着毛瑟枪的手臂。保尔和那个舞蹈者都不能勒住马缰，只好听马儿向死神的嘴巴驰去。那军官先射保尔，但是没打着，弹丸掠过他的面颊疾飞过去。这时候马已冲到那军官跟前，把他撞倒了，他的头猛撞着路面的石头。就在这一刹那间，像患着热病的机关枪，开始发出剧烈而野蛮的笑声。舞蹈者和他的乘马，就像给数十只大黄蜂螫了一样，一起倒了下去。

保尔的马吃惊地提起前蹄，站着嘶叫起来。但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跳过舞蹈者及其乘马的尸身，向操纵机关枪的人冲去。在空中闪耀着的军刀，描了个弧形，向那四方帽猛劈过去。

保尔的军刀又再度挥舞了，他刚要砍杀另一个，疯了的马却蹦到路旁，但中队的人马，已像一股急激的山洪，从十字路口那儿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呼呼地作响。

牢狱的狭长的走廊上，正激动着响亮的叫声。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那些脸上烦恼而困乏的犯人，发生极大的骚动了。巷战正在城里进行——莫非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进城？莫非是他们马上就可以自由了？

在近处，在牢狱的天井里，已传来了枪声。接着他们又听到人们在走廊中跑着的声音。最后，突然间，一个亲切的有着无限深长的意味的声音喊道：

“出来吧，同志们！”

保尔跑到锁着的牢门跟前，在牢门的小窗上，出现着几十对的眼睛。他不断出尽死力的用枪柄猛敲牢门。美降诺夫阻住他，从袋子里拿出一颗手榴弹来，说：

“等一等，用这个炸碎它。”

西嘉琴科把它夺过来。

“急什么？”他说。“你这傻瓜，你发疯了吗？锁匙马上就拿来了，急什么呢？”

他们已经在走廊上捉到狱卒，用手枪迫着他开门。于是走廊上挤满着褴褛的，污秽的，大喜若狂的人们。

保尔推开大门，走进牢里去喊道：

“同志们，你们统统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的师团已把本城占领了。”

一个两眼蕴着泪水的妇人，扑到保尔面前，一边抽咽，一边紧抱住他，好像他是她的亲生儿子似的。

释放了被波兰白军关在石洞里，只等着枪毙和绞杀的五千零七十一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二千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这比别的任何赏赐都要珍贵，甚至比师团士兵的胜利还要高贵。对这七千多个革命者，黑漆一团的暗夜已骤然变为炎热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在这些被释放的囚犯中，有一个黄脸孔很像柠檬的人，大喜若狂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沙木尔，秀彼多夫卡的排字工人。

沙木尔把他的遭遇告诉保尔。他的面孔蒙着一层灰色，他的故事是他们的故乡秀彼多夫卡的流血的悲剧，而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溶解的金属液一样，一滴一滴的注入他的心头。

“在一天深夜里，他们一次就把我们都逮捕了，这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这样，我们所有的人，全都落在宪兵手中。保尔，我们受的刑罚是多么可怕哟！我挨的打，比别人来得轻，因为他们只消打我几下，我已昏倒在地板上了——但别的一些同志实在太过坚强了。我们一点也用不着隐瞒，他们知道的比我们还详细，我们的每一步骤他们全晓得。”

“甚至就是在现在，我们还是不敢相信，我们中间已再没有奸细了！我不能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保尔，他们中有许多是你认得的，像娃娃莲，罗莎，她还是小孩呢，刚有十七岁，那么好的一个女孩，那么可信赖的一对眼睛呵，其次还有沙雪·邦沙特，你记得，他是我们的排字工人，是那么一个快乐的青年，时常画着讥讽老板的漫画。此外，还有中学里的两个学生——诺屋斯基和杜季兹。你一定认得他们。还有别的由各处送来的人，一共二十九个，其中六个是女的。他们残酷地虐待我们。娃娃莲和罗莎在第一天就被强奸。那些猎狗喜欢怎样就怎样的虐待她们。等到她们被解回牢里来时，全都已经半死了。罗莎那时候开始自言自语，再过几天，就完全疯了。”

“他们不相信她真的发病，以为她是装疯的，每逢审问就拷打她。当他们枪毙她时，样子真正吓人。她的面孔给打得黑一块青一块，眼睛凶恶而且狂暴，样子像个老太婆。”

“娃娃莲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好好坚持着。他们全像真正的战士那样从容就义。我不晓得他们那里来的那股力气，但是，保尔，我能够把他们被处死的情形告诉你吗？不能，我不能。他们的死是多么惨怖，我不能用言语形容。……娃娃莲是参与最危险的工作的——她跟波兰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接触，她又被派到乡村里去做侦探工作，当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他们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拿手榴弹和枪给她的，就是那个出卖我们的叛徒。整个的布置都是陷害她——说是她企图炸毁波兰白军的司令部。”

“呵，保尔，我觉得我实在说不出他们临死时的情形，要是你坚持要我说，我只得对你说。军事法庭已经判定了娃娃莲和别的两个绞杀，其余全都枪毙。”

“那些我们曾在他们中间做过宣传工作的波兰兵，比我们早两天就判决了。”

“一个年轻的班长，战前在陆兹当电料工匠的，无线电报务员史尼哥尔科，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已被判决枪毙。他并未要求减刑，而且在二十四小时以后就被枪决。”

“娃娃莲被传去作为该案的证人。她告诉我们说，史尼哥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的宣传，但坚决地否认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共和国。是的，我是一个波兰共产党的党员；我被强迫当了兵士。我一向竭力使跟我一样的，被你们派来作战的士兵们，睁开他们的眼睛。你们可以因此绞死我，但我否认我背叛自己的祖国，我这观点是死也不会改变的。不过我的祖国跟你们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老爷和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我的祖国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在我的祖国中——它就会实现的，我深深地这样确信——决没有

一个人会说 我是叛徒。’”

“判决了之后，他们把我们关在一起。在快要执行之前，他们把我们投进镇上的监牢。夜间，他们在监狱的对面，在医院的楼墙底下，竖起了好些绞架；同时，又拣定在稍远一点的树林附近，大路旁边，那座斜坡的下面，做为枪决的地方，此外又为我们掘了一个大坑。”

“行刑的告示在镇上各处张贴，因此全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又择定在下午行刑，因为他们要每个人都来看，要每个人看了都害怕。从当天早上起，他们便开始把镇上的人赶到绞刑台来。有些人则为了好奇，虽然这是恐怖的，他们也来了。因此在绞架周围，挤满了无数的人。人头一个接一个，真是一望无际。你晓得，在监狱附近，有着一排栅栏，绞架就竖在那儿，我们都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在后面街上，他们又架好一排机关枪，而且把镇上各处的步巡和骑巡都调了来。还有一整大队的兵士，在周围从事警戒。他们给那些被判绞死的人掘了一个大坑，这大坑就在绞架下面。我们默默地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有几个人偶而说一两句话。我们什么都已在昨天说过了，我们已互相道了再见。只有罗莎躲在牢里的一角，不住在喃喃地自言自语。娃莲因为挨打和遭了强奸，疲累万分，行动不得，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城里捉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姊妹，坐着互相紧抱，眼泪像断线的珠儿。这时候，斯德班诺夫，这个跟力士一样壮健的青年人，——他在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就坚决地对她们说道：‘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可别到外面哭。我们决不叫那些该死的猪猡得到额外的开心。不管我们怎样，我们已是死定了的，所以我们应该从从容容的死。让我们每一个都挺起身子来。同志们，别忘记，要从从容容的死！’”

“接着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了。卫兵的头领是什瓦尔可夫斯基，侦探局的局长，一个色情狂的暴君，一只疯狗。他自己也许不强奸，但他准叫宪兵们动手，自己就站在旁边看着取乐。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有着一一条由宪兵排成的走廊。那些“黄鬼”——因为他们有着黄色的肩章，所以我们这样称呼他们——都已拔剑出鞘。”

“他们用枪柄把我们赶到牢里的天井去，排成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赶我们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齐站在绞架的前面，让我们亲眼看看我们的同志是怎样被杀的。那些绞架都很高，全用粗木头搭成，在上面的横梁上，系着三个由很粗的绳子强成的圈套。下面是一个有着梯级的平台，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循这梯级走上绞台去。茫茫的人海，好像不停地在蠕动，发出了飒飒可闻的嘈声。他们的眼睛全注视着我们。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属。”

“好些波兰的小贵族们，手里持着望远镜，聚集在稍远一点的牢狱大门的台阶上，其中也有着波兰的军官，他们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什维克的。”

“地上的雪是柔软的，树林是一片白色，高树像披上了素衣。雪片在空中缓缓地旋转，扑在人们的热脸上，立即就溶化了。绞架的平台铺满着雪花。我们差不多都是一丝不挂，但谁也不觉得刺骨样的寒冷，斯德班诺夫甚至没有理会到他是光脚的。”

“军事检察官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的旁边。最后，娃莲和别的两个被判定绞死的同志们，已从牢狱里拖出来了。他们一共三个，臂膀扣着臂膀，娃莲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所以那个同志挽着她。同时她也竭力提起脚步，她是记着斯德班诺夫所说‘我们应该从从容容地死’的话，她不曾穿外套，只着一件织的绒绒衫。”

“什瓦尔可夫斯基那疯狗，显然不满意他们扣着臂膀走，便使劲把他们推开。娃莲说了一句什么话——那骑马的宪兵使用尽死力，扬起鞭子往她脸上猛抽。”

“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凄厉的嘶叫。她疯狂地冲上前去，竭力要挤过人丛中，走近那三个将死的人。但她终被抓住，拉到什么地方去了。那老妇人一定是娃莲的母亲。”

“当她走近绞架的时候，娃莲开如唱了。我从前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声——只有临死的人才能这样歌唱。她唱着《华沙温卡》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骑巡抽打他们，简直像发狂一样抽打他们，但他们好像没有感到疼痛。于是警察就敲倒他们，提着他们的脚像拖袋子一样把他们拖到绞架去。他们接着就草草地点完判决书，把圈子往他们的颈上套去。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方八面向我们扑过来。这时候我只看见一个兵士，从平台上，用枪托把蹬着柱子推开，这样他们三人就在绳子结着的圈套上吊起来。……”

“正当我们十个站在墙边等着就死的时候，竟听到了改死刑为无期征役的判决。别的十七个全被枪决。”

沙木尔猛扭着他的衬衫的领子，好像它使他窒息似的。

“他们整整的悬吊了三天，还有一个守兵不分日夜看守。后来新关进来的犯人告诉我们，杜波尔亭的绳子在第四天断了一一他们是他们最重的一个——他们这才把那两个解下来，在当地埋了。但绞架还是没有拆掉，当我们被押到这儿来时，我们看见那绳子还在空中虚悬，等待着新的犯人呢。”

沙木尔的话已完结了。他的目光注视着遥远的彼方。保尔没有理会到他的话已经结束。他隐约看见那三个死尸，带着鬼样的脸孔，头儿歪向一边，正在风中默默地摇动着。

骤然街上吹着“集合”的军号，这号声震醒了保尔。于是他用着低得难以听闻的声音说：

“我们到外面去吧，沙木尔！”

在大街上，散开的骑兵排成长列，波兰俘虏们正在走过。联队的军事委员站在牢狱的门边，已在阵地记事册上写完了一道命令。他把它交给矮胖的骑兵中队长。

“拿好这一张，安吉包夫同志，”他说。“准备一队骑兵护送队，把这些俘虏解到诺瓦格拉特——乌林斯基。他们负伤的，便给缚上绷带，弄到救护车上去，一齐带走。把他们送到离城十几里的地方后，就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还没有闲功夫管他们哩。注意，不许虐待任何一个俘虏。”

保尔跨上马后，转过头来对沙木尔说：

“你曾经听过这样的话吗？他们可以绞死我们的同志，我们却要好好照顾他们，把他们送到自己人的那里去，而且还不许虐待呢！这哪能办得到？”

联队长回过头来，严厉地注视着他。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被判枪决的，我们不是白军啊！”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事会议最近的命令，这命令是曾经当着全联队的兵士念过的，其中有说：

“工农的国家爱护它的红军，以它的红军为荣耀，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点污点。”

“不要有一点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地动着。

当第四骑兵师占据了季托米尔的时候，第七组击师团的第二十旅团——这是果里科夫同志的突击军的一部份——也在奥库尼诺夫村附近，侵入了第尼伯河的敌阵。

由第二十五狙击师团和巴士启尔骑兵旅团编成的部队已奉到命令，准备渡越第尼伯河，于伊尔沙车站处切断基辅至柯罗斯坦开的铁路。这次的作战计划，目的在遮断基辅波兰军团的唯一的退路。秀彼多夫卡青年团团员之一的米士加，就在此一战役中牺牲了，但是谁也没有知道。

他们正慌忙走过动摇不定的浮桥，忽然从山背后发出一声吓人的响声，一颗炮弹划着水

面爆炸了。米士加就在这一刹那间翻身附下浮桥。河水立刻吞没他，只有淡黄色头发，带着无遮破军帽的耶基明科，惊骇地叫道：

“哎哟，瞧，米士加掉下河里去了！他给淹死了，他完了哟！”

耶基明科立刻站住，呆望着那黑茫茫的水流。后面的人已跑了上来，便推着他，喊道：

“喂，傻子，干什么张着嘴巴站在这儿？走呀！”

当时实在没有思念一个同志的余闲。无论如何，旅团已落在后面了，别的同志们早已占据对岸了。

薛尔基直到四天之后，才知道米士加的死耗。那时候他的旅团已在一次激战之后，占领了布希车站，随即又攻占了面对基辅的阵地，坚拒着企图打通至柯罗斯坦的波军的屡次进攻。

耶基明科躺在薛尔基的旁边。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用力拉开步枪的枪机，然后将头靠着地面，对薛尔基说：

“步枪需要休息了，它像火一样热。”

炮火的声音是那么强烈，薛尔基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过了一会，枪声稍稍停息了，耶基明科好不容易才这样说道：

“在路上，你的那个同伴，掉进了第尼伯河，虽然我不是清楚地看见他掉下去的。”他说完后，就扳动枪机，由弹袋里拿出一排子弹来，聚精会神地把它装进枪槽里去。

企图占领伯底捷夫的第十一师团，遭遇了波军强烈的抵抗。城里的每一条街巷，都发生血腥的激战。他们建筑了阻断骑兵的障碍物，并用机关枪扫射。然而十一师团终于占领该城，败北的波军残众狼狈逃跑了。但波军所受最大的打击，是一百万颗炮弹的爆炸——整个波兰军的军火库都被毁了。粉末的玻璃屑像雨一样落遍全城，房屋仿佛厚纸糊成的一般，给炮弹的爆炸弄得摇摇欲坠。

季托米尔和伯底捷夫的相继失陷，给波兰军后方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他们慌忙分成两大股，退出了基辅，想拼死冲破围困他们的铁环，杀出一条血路。

保尔现在已失去了所有关于他个人的感觉。每一天都在狂热的鏖战之中，保尔·柯察金已溶混在大众里面了；像他们中所有每一个人一样，“我”字已不存在，而由“我们”代替了——他们说：那是“我们的”联队，那是“我们的”中队，那是“我们的”旅团。

同时，事件正以飓风一样的速率进展，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布琼尼的各骑兵队，有如狂风暴雨，给予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粉碎了和瓦解了整个的波兰军方。在胜利的狂热中，各骑兵师团怀着火灯的热情，猛攻着诺瓦格拉特——乌林斯基，这波兰白军的后方的心脏。

他们像冲激峭壁的巨浪一样后退，但稍停一息，又发出可怖的“杀呀！”的喊声，猛冲上前。

然而，不论是铁蒺藜抑或是卫戍军的拼死的抵御，都不能挽救波兰白军。在七月二十七日早上，一队骑兵像赴检阅一样整齐地渡过斯洛支河，进入诺瓦格拉特——乌林斯基，并继续追击朝果里茨退却的波军残众。同时，耶基尔领导下的第四十五师团，已在新美罗班里渡过了斯洛支河，而科道夫斯基的骑兵旅团，则在进攻留巴尔镇。

第一骑兵师团的无线电台，不久就接到了前线总司令官调动所有骑兵夺取罗夫诺的命令。红军各师团是无坚不摧的：崩溃的和士气沮丧的白军，已为着追求安全而纷纷四散了。

有一天，当保尔被旅团司令部派到停着铁甲列车的车站去的时候，他竟遇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人。他骑的马一直不停地缓驰上峻峭的土堤，到了第一节灰色车辆的跟前，方才被勒住。那坚牢的威压的车身，和那些隐在炮塔里的大炮的黑色炮口，多少是有点吓人

的。几个 满身油垢和黑渍的人，正在车旁忙着掀起一只掩护车轮的沉重的铁盖。

“请问铁甲列车队长在什么地方？”保尔向一个提着一桶水的红军这样问。

“他在那儿，”他用手指着火车头。

保尔走到火车头旁边，问道：

“那一位是队长啊？”

一个由头到足穿着皮袄，满面麻点的人，转过头来说道：

“我就是。”

保尔从袋里摸出一封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团司令官的命令。请在信封上签个字。”

队长把信封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名。在火车头的第二个巨轮上，有一个人正在加油。保尔所看到的，只是一副宽阔的肩膀；他又注意到一支七响牌的手枪，从那个人的皮裤上的一个口袋里凸出来。

“这是你的收条，”队长把信封交给了保尔。

保尔正拉着马缰，准备掉头回去，这时候那个加油的人突然伸直身子，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好像有谁把他从马身上推下来一样，他跳到地上，喊道：

“阿尔青哥哥！”

那满身油垢的机匠立刻丢下油罐，像大熊一样抱住那年青的红军士兵：

“保尔，好弟弟！你这小流氓！原来就是你呵！”阿尔青这样喊，他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铁甲列车队长惊愕地看着这一幕剧。列车的炮手们快乐地大笑起来，说道：

“看啊！弟兄两个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勒伏夫附近，保尔在激战中失掉了他的军帽。他将马儿勒住了，但前面的弟兄们正在和波兰白军作拚死的肉搏战。捷米道夫冲出柳林，一面朝河岸那边奔驰，一面尖声叫道：

“师团长被杀了呀！”

保尔吃了一惊，混身抖战。他的师团长，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李通诺夫同志，就这样死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支配了他，他狂抽着他的坐马格尼达克——它已经疲乏了，它的鞍上染着点点的鲜花——挥着钝了的军刀，直向纠在一起厮杀的人丛中冲去。

“砍死这些猎狗呀！”他尖声怒喊着，“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的小贵族呀！他们杀死了李通诺夫！”他盲目地，甚至没有看一看他的牺牲品，向一个穿绿制服的人劈去。为了他们的师团长的死，全队燃起了熊熊的怒火，把波兰军团杀得落花流水。

他们奔向荒荒的草原，追逐败残的敌军。波兰炮队对准他们发炮了。榴霰弹在空中爆裂，向四面播散死亡。

一片绿色的镁光在保尔眼前闪过，雷声震着他的耳朵，烧红的铁向他的头骨烙进去了。于是大地接着可怕地不可思议地在急转，开始失去平衡，转倒下去。

坐在马鞍上的保尔，像稻草似的在摇摆。接着他就滚过格尼达克的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夜立刻就降临了。

九

猫头的章鱼有一只突出的暗红色的眼睛，中间有点绿点，炽热而发亮。它有几十只吸管，像一群小蛇那样不停地在抽搐，鳞谷的磨擦发出讨厌的沙沙的声音。章鱼本身也在蠕动。他亲眼看着它爬过来，触着他自己的眼睛，接着那些吸管就爬到他的脸上，而且都是粘湿的和灼热的，就像有刺的蒺藜。章鱼伸出它的长刺，像水蛭一样的攒进他的头，随即就痉挛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觉得他的血液正由自己体内流进章鱼那臃肿的肚皮里去。

它的针就这样吮吸着，在他头上被刺的地方，有着难忍的疼痛。

他听见远处有着人的声音。有一个人说：

“今天他的脉搏怎么样？”

另一个人的话声，比较轻柔，像是女人声音，回答道：

“脉搏一三八。热度一〇三度一。始终热昏。”

章鱼接着消失了，虽然还是感到刺痛。保尔觉得有一个人的手指正按着他手上的脉管。他想挣开眼睛，但眼皮是这样沉重，他无法张开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呵，一定是他的母亲生了火炉。过一会，又有一个人说：

“他的脉搏现在只有一百二十二次了。”

他竭力想睁开眼睛。火正在他体内燃烧。他感到窒息。

喝水——他是多么的口渴呵。他巴不得立刻跳起来大喝一顿。但他为什么不起来呢？他刚想动一动，立刻他觉得，那不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是别人的，是他无从支配的。大概母亲会马上倒水给他喝吧。他想对她说：“我渴死了。”

在他旁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动着。说不定那章鱼又爬上来了？呵，不错，就是它，那双红色的眼睛。……”

他听见远处，有轻柔的声音说：

“佛罗茜亚，拿点水来吧。”

这样保尔就竭力回想究竟哪一个人叫佛罗茜亚。但这用力又使他掉入无边的黑暗中。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又想起：“我渴死了。”

他又听到人的声音，有一个说：

“我想他是活转来了。”

接着那和蔼的声音更近更清晰了：

“病人，你口渴吗？”

“他叫我‘病人’，难道我害病了或是受伤了？要不然，他们是在同别的人说话吗？”他对自己说。“我一定生了热病吧。”于是他第三次地竭力睁开他的眼睛，最后他终于睁开了。从那睁开的眼睛的小缝中，他最初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圆球，接着他又蒙在什么暗黑的东西中，而那暗黑的东西正俯就他，他的嘴唇触着一个玻璃杯的硬边，而且感到润湿，那使人恢复活气的润湿。他腹内的火已多少熄灭了。

他非常的满足，低声说道：

“真好呵！”

那声音问道：“你看得见我吗？”

这声音是从那俯就着他的暗黑的东西发出来的，但他随即又昏睡了，虽然他还有功夫回答道：

“我看不见你，我能够听见你。……”

那个人的声音说道：

“谁会想到他会醒转来呢。然后，你瞧，他倒挣扎着活了转来。多么强健的体格呵。妮娜，你的确可以骄傲，这的确完全是你看顾得好啊。”

那女人的声音，非常兴奋地回答道：

“呵，我是多么高兴啊！”

十三天后，保尔恢复知觉了。他那年青的身体坚拒了死亡，体力已缓缓的恢复了。这是他的新生，什么东西好像都是新奇的和陌生的，只有他的头被沉重的石膏箱压得不能动弹了。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他甚至开始伸缩着他的手指了。

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妮娜，坐在她寝室里的小桌旁边，掀动那厚厚的淡紫色的笔记簿。下面就是她那优美的斜着手所作的记录：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今天红十字列车送来了一批重伤兵。一个头部受伤的红军士兵，被安置在病室靠窗的角落里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从他的衣袋里，找出一本破皱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九六七号的团证，名字叫保尔·安特列维章·柯察金。还有一张联队司令的奖令，上面写着：“对英勇进行侦察工作的红军士兵柯察金，致其最大的敬意。”此外还有一张似乎是他亲笔书写的纸条：“拜托诸位同志们，在我战死的时候，请劳神通知我的家属：秀彼多夫卡城 火车厂铁匠阿尔青·柯察金。”

这伤兵从他受伤的时候起——八月十九日，被炮弹破片击伤——一直都在昏迷状况中。……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检验了柯察金的伤痕。伤处极深，头壳破碎，右额偏瘫，右眼发肿渗血。医生想除去他的右眼，以避免发炎，但我劝他，只要病人还有消肿的希望，暂时不必如此。他也同意。我之这样主张，完全由于爱美的观点，要是这青年可以复原，为什么要叫他破相呢？他不断说着梦呓，非常不安，须得好好照顾。……外科医生说，他是会复原的。……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已把他移到“太平间”去。看护中一个叫佛罗茜亚的，差不多成天地服侍他。她好像认识她，似乎好久以前，曾一起做工过。她是那么温存地服侍着那个病人呵！不过那病人光景是绝望了。

九月二日晚十一时

今天是多么可纪念的日子啊！我的病人，柯察金已经复活了，恢复生气了。危险期已经流过。这二天来，我一直没有回家。

现在，我的愉快是难以形容的，因为我又救助了一个人，我们的病房里又少去一个死人。在我个人的忙碌的事情中，最可喜的，是看见一个病人恢复健康。他们像小孩一样的信赖着我。他们的友情是真诚而纯洁的，在分别的时候，他们甚至要哭出来，这实在有点可笑，但这些都是真情的流露哩。

九月十日

今天我给柯察金写了一封家信。他要我告诉他的家人，说他受的是轻伤，马上就可以复原和回家看望他们。但实际上他已流了大量的血，脸色跟纸一样苍白，而且非常虚弱。

九月十四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地微笑。他有着叫人惊奇的笑容。他一向总是默默地，像老头儿似的。他的健康的恢复，快得惊人。他同佛罗茜亚已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老是看见她坐在他的床前，她好像已把我的事情告诉了他，自然，都是些夸奖我的话。所以病人逢到我进去的时候，脸上都浮着笑容。昨天他问我：

“医生，你手臂上怎么有那些黑紫的伤痕呢？”

我不曾告诉他说，这些伤痕是他热昏时双手紧挣住我的结果。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头部的伤痕已很完好。当他被包扎的时候，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所有的医生都吃惊，实在说，这是很可敬的。他时常痛得失去知觉，但从未发出一声呻吟。现在我们全都晓得，要是他喘息了的话，那就是他昏迷了。他哪里能有这样的抵抗力呢？我真不明白。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着小车，被推到阳台上去。试想想他看着花园的景物和吸呼户外的空气时那种光景啊！他有一只眼睛没有扎上绷带，但它是那么活泼，那么明亮，它眺望着

周围的景物，好像那些东西是他初次看见到似的。

九月十六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里去，我看见两个少女等在那儿。其中一个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是冬妮亚·杜曼诺夫和达茜亚娜·布朗诺夫斯。冬妮亚这个名字我时常听到——柯察金在说俄语时老喊着她。我允许她们进去。

十月八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独自到花园里。他老固执问我，什么时候他可以出院。我告诉他说快了。那两个少女一到接见日就来看他。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痛时不呻吟的理由了。当我问他时，他对我说：“请你读读《牛虻》，你就晓得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的分别很苦痛。别的一只眼睛的绷带已经揭开，只有前额还包扎着，那眼睛是瞎的，但看来倒很正常。失去这样的一个好同志，我感到十分难堪。生活就是如此。当他们一告痊愈，他们就离开我们，希望永远不再和我们见面。

“当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

“我宁愿左眼瞎掉——现在我怎能够开枪呢？”

他还是想着回火线去的。

保尔出院之后开头几个星期，是住在布朗诺夫斯基他们家里的，冬妮亚也住在那儿。

当时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亚参加党的一般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城里青年团的全体大会，她答应了。但常她由她的房间里走出来，快要动身时，保尔却咬紧嘴唇了。她是打扮得那样漂亮，带着那种特别的派头，弄得他简直不能带她去参加。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吵嘴的理由。当他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漂亮时她呕气的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的人们一个样子；要是你不愿意带我去，我就留在家。”

在青年团的俱乐部里，她的丽服在那些退色而褴褛的服装中，是那样地特殊，弄得保尔十分难堪，很难和她说话。所有的同志都把她看作一个外边人，她也感到这一点，并且用挑衅的轻蔑的态度对待她们。码头工人青年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阔肩、穿着粗帆布的制服的码头夫，把保尔叫到一边，皱着眉头，斜睨着冬妮亚说：

“这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的，是我，”保尔粗声回答。

“唔！——”潘克拉托夫拉长着声音说。“她看起来全不像我们的人哩，她的样子未免太时髦吧。干什么让她到这儿来？”

保尔的颧骨不断地蹦跳着。他说：

“她是我的同志，所以我把她带到这儿来，明白吗？她并不敌视我们，只是在服饰的问题上，的确有不大好的地方，但是你不能老凭服装来判定一个人。你要晓得，我是知道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的，因此，你用不着那么严格，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很想说出一些更激烈的话来，但他抑制住了，因为他想到潘克拉托夫的话是代表全体的意见的。这么一来，他把全部的愤怒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他对自己说：“我早已告诉过她了。妈的，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极端呢？”

那天晚上，我们俩的友情开始破裂了。

保尔已看出，一向似乎是那么稳固的感情缓缓地破裂了——他怀着惊异与苦痛，注视着这裂痕的加深。好几天过去了，每一次的遇会和每一次的谈话，都使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感到难言的苦楚，直到冬妮亚的卑贱的个人主义，已引起了保尔的憎恨。这样他们两个都晓得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终于到了这一天，他们一道到黄叶狼藉的古别捷斯基公园，去作相互间最后一次的谈话。他们凭着俯临斜坡的栏杆，第尼伯河的灰色巨流，在他们的下面闪亮。落日在杜罗哈诺夫

岛上，抹上一层金黄，对过家家的窗户，映着腥红的晚霞，像一朵朵的火。

冬妮亚怀着深深的忧愁，凝视着金黄的斜晖，说了：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的残晖吗？”

他凝神地注视着她。紧紧地蹙着眉头，他用低声回答道：

“冬妮亚，这事情我们早已都谈过了。自然，你晓得我曾经怎样的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已不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人们。”

冬妮亚悲伤地凝望着河水的闪耀的碧蓝，双眼饱含着眼泪。保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脸庞的轮廓，她那栗色的头发，在他心里，正为着这个曾经是那样疼爱又那样亲近的女人，掀起一阵怜悯的浪潮。

他慎重地将手放在她肩膀上，对她说：

“请抛开束缚你的一切吧，冬妮亚。参加我们，让我们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在我们的队伍里，正有着那么多的优秀的妇女们，他们不但和我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忍受我们一切的苦难与损失。他们也许不像你一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呢？你告诉过我，说楚亚宁曾经想用暴力来污辱你，但楚亚宁是一个堕落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都敌视你；但你干什么要像参加社交跳舞会一样，穿着那么漂亮的衣服呢？你觉得自傲，是不是？你不愿意跟那些穿着龌龊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你已有了钟爱一个工人的勇气了，然而你却不能钟爱工人阶级的主义。我本不想同你分开，我愿意好好的记住你。”

她咬着嘴唇，沉默了。

隔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告示，上面有着“乞卡”的主席的签名，那个签名的人正是非奥多·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好不容易地找到了他办公的地方，正想走进去见他，哨兵们却不许进去，当时他的吵闹，几乎被他们捉起来，但他终于进去了。

这会见是不可思议的。朱赫来已给炮弹片击伤，失去了一只手臂。他们两个把工作问题大谈了一场，朱赫来对她说：

“当你还不适合火线的勤务时，你就帮助我进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明天，你到这儿来找我。”

和波兰白军的战争已结束了。乏极的而且被鲜血浸润着的国家，需要暂时的安息。

保尔还不能回去看他的家人，因为秀彼多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而且变成了暂时的战线的前哨站。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保尔日夜在“乞卡”中工作着。朱赫来的房间成了他住宿的地方。当他听到波兰白军已占领了秀彼多夫卡的消息时，他心里非常的沮丧，对朱赫来说：

“怎么办呢，非奥多，要是这样讲和的话。我的母亲不是要成为波兰人了吗？”

但朱赫来安慰他，这样说道：

“边界可以说一定是沿着河流，经过高林城的，因此秀彼多夫卡将是我们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久就可以分晓。”

新的师团迅速由波兰前线调到南部去。当时，共和国正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上，弗兰吉尔就利用这个机会，带领他的匪帮由克里米出动，沿着第尼泊河向北推进，迫近了伊卡特林诺斯拉夫县。现在和波兰的战争既已结束，全国就把他的军队调到克里米，以消灭这新的反革命的巢穴。

列车像河流一样不断经过基辅向南开——上面满载着士兵，货车，锅灶和大炮。保尔参加的运输特别委员会，现在正忙得发昏。兵队像水流一样，不断地倾泻和集合在这儿，车站里挤得水泄不通，同时要是腾不出一条空铁轨来，一切的调动，就会完全失败：受讯机

不停地拍 出一条哀的美顿书式的电报，要委员会腾出轨道，让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师团开过去。这样的 电报简直没有个完，每一通都采用着这同样的字句，如“应较一切为先……”视为作战命令 … …”立刻腾出路轨。……”而且差不多每通命令上都带着这样的警告，说是如不执行这一命令，就要解交军事法庭，受军法的裁判。运输特别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一工作的机关。

各个战队的司令官，老是急忙的跑过来，一面挥动手枪，一面坚持着根据某某司令官所发某某号的电报，他们那特别的列车应当先开。但朱赫来那粗大的铁的身躯，那冰冷的镇定，那 坚决的不许答辩的声音，时常使那些挥舞的手枪，重又插进枪袋里。

“乞卡”的工作是那样繁忙，安损害了保尔的脑筋。他时常冒着针刺样的头痛，跑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薛尔基坐在一只堆满弹药箱的敞车上。薛尔基一跳跳下车，紧紧抱住他，差一点把他摔下去。

“保尔，你这家伙，一点也没有变呵！”

这两个朋友简直不晓得说些什么才好，因为自从他们分别之后，他们俩都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互相发问，但没有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就回答出来了。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汽笛 的响声，直到火车动轮了，他们方才分手。

这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的见面又切断了。火车已渐渐增块，薛尔基生怕掉了班，慌忙对他的朋友作了最后一次的招呼，一面沿着月台跑去，紧挣住敞车的把手。车上许多只手，把他拉 了上去，保尔则呆呆地站在那儿遥望，到了这时候，他才想到没有把娃莲的事情告诉他。薛 尔基这一向从未到过秀彼多夫卡，而保尔又给这意外的会见弄得昏头昏脑，完全忘记了告诉 他。但他对自己说：

“不如让他不知道，他反可以安静一点儿。”但他自己还没想到，这就是他和薛尔基最后一次的会面。他还没有想到，站在车顶上，胸脯当着秋风的薛尔基，正朝着死亡走去呢！

外套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兵士多洛申科，对薛尔基说道：

“坐下来吧，薛尔基。”

薛尔基笑了：

“不要紧的，风是我的老朋友，让它把蛛丝吹走吧。”

一星期后，薛尔基在某次战斗中，倒在秋的荒原上——由远处飞来的一粒流弹打中了他。他两脚站不稳，向前颠了一步。他的胸口像钉上一支火红的针子那样剧痛。接着，他响也不响的左右摇晃，双臂伸开，像拥住什么那样紧紧地抱着，随后就佝着身子，像要跳跃似的。他那铁般僵硬的身躯斜倒在地面上，一对无表情的蓝色的眼睛，不断地凝视着无垠的秋天的 荒原。

“乞卡”的伤损脑筋的工作，已开始毁坏保尔那没有恢复的健康。头痛更是时常发作了，最后，经过两天没有睡觉之后，他失去了知觉。

他已不能不和朱赫来商量这事情：

“非奥多，要是我调去做别的工作，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很想到我本行的大工厂里去工作。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我在这儿是办不好事情的。医务委员会告诉我，说我不适于军事勤务。但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来兜捕苏达尔匪帮的工作，已完全把我累倒了。我应当摆脱这不断的搜索工作。非奥多，你看我站都站不牢。就是我竭力做下去，在“乞卡”里 也办不好事情的。”

朱赫来关切地注视着他，说道：

“你的身体的确很不好。我早就应该解除你的工作，这是我的过错，我照顾得欠周到。”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张由委员会调派的证明书，到青年团的总部去。

一个把大乌帽拉到鼻梁上的机灵的青年人，看了看证书，对保尔做了一个鬼脸，说道：

“从‘乞卡’出来的吗？嘿，好差使。不消说，我们可以派你到两个重要的地方去工作。我们正急着要人呢。你愿意做那一项呢？到铁路给养委员会？还是到码头上的宣传本部去？不愿意？你错了啊。这些都是挺着实的挺好的工作，可以领第一等的口粮哩。”

保尔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要到铁路总工厂去。”

那青年人张着嘴巴惊疑地瞪着他：

“铁路总工厂吗？嘿……这地方我们刚好不要人。最好你还是去看乌斯金同志吧，她可以派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和那个脸色微黑的女人谈了一会之后，事情总算解决了，保尔充任总工厂青年团的书记，并且亲身参加生产的工作。

就在这时候，在克里米的门户的波尔科普，在连结着半岛与大陆的狭小的瓶颈上，也就是在以前曾经是克里米的鞑靼人和查波罗齐的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系的近卫军，正在构筑他们的坚固的堡垒。

在波尔科普后面的克里米本部上，被全国各地赶到此地来，而且注定要灭亡的那些旧世界的余孽，都自以为安全，自以为可以尽情痛饮他们的美酒呢。

在一个雾蒙的秋夜，千万个工人除级的子孙们，正涉着海峡的冷水乘夜渡过西瓦齐峡，去进攻设防完密的敌人的后方。伊凡·查基就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他正谨慎地把机关枪顶在头上。

在拂晓的时候，第一纵队已渡过了海峡，在里道夫斯基半岛登陆，他们立刻越过了跟人一样高的障碍物，猛袭着敌军的后方。波尔科普立刻沸腾起来了。在最先爬上岩石嶙峋的峡岸的人们中，伊凡·查基也是其中一个。

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不顾一切，向爬上岸的人们作野蛮的兽性的攻击。查基的机关枪不住向周围吐出死亡，在雨样的枪弹下，死伤的人马成批的堆积。查基用狂热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装着机关枪的弹带。

波尔科普炮台的几百尊大炮怒号了，当千百颗炮弹猛掷出来，勒索着死亡的时候，脚下的大地似乎要陷入无底的深渊，炮弹带着凄厉的啸叫划过长空，随即就炸成无数的碎片。破裂的负伤的土地给掷到半空，慢天的泥沙使阳光变成昏暗。

但毒蛇的头终被敲碎了。红军像汹涌的怒涛泄入了克里来。红军第一骑兵军团各师团的最后打击。着实是可怖的。给本能的恐怖吓慌了的白卫军，一齐挤上汽船逃出海港了。

共和国把金色的小的红旗章，别在那些褴褛的制服的胸前——就在它的后面，无数狂喜的心正在跳动。机关枪手查基的胸前，也挂着一个。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如朱赫来所希望的一样，秀彼多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边界是沿着河流划定的，它离那小城约二十二里（三十五基罗米。）

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某个可纪念的早晨，列车载了保尔回到他熟识的故乡来。他走上满盖着雪的月台，边走边看着“秀彼多夫卡总站”的路牌，接着他就转向左边的火车工厂走去。他寻找阿尔青，但他的哥哥并不在那儿。他扣紧外套，快步穿过森林，到城里来。

玛丽亚·柯察金，听见敲门声，转过身来，喊着：“进来！”一个满身挂雪的人在门口出现了，她从那个人认出了她亲爱的儿子脸孔，她双手抓着胸口，喜欢得连话都说不出。她紧紧地把自己的瘦身子挤着她儿子的前胸，用不停的亲吻和快乐的热泪抹滑他的脸孔。保尔也紧抱他的母亲，一面注视着她的因忧伤与期待而消蚀了的满布着皱纹的脸庞。同样他也一言不说，等着她的心情稍为平静下来。

这受过了无数苦难的老妇人的眼睛里现在又现出了快乐的光芒。在保尔回家那几天中，她看他看不厌，和他说也说不完；她本来就没有想到还会看到他。同样，当三天之后，夜深时候，阿尔青背着一只包袱闯进小房里来时，她的愉悦也是无限的。

这样柯察金一家又再度团聚了。兄弟两个，终于经过了可怕的折磨和长期的离散而聚合在一起了。

“现在，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她问他们两个。

“干我的老行当去，妈妈。”阿尔青回答。

至于保尔呢，他在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又回到基辅去，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待他呢。

十

如火的热气烧烤着大地，车站顶上的天桥的铁栏，正热得烫手。桥的右面已挤聚了好一群人，他们全都疲乏不堪，给热气弄得无精打采。他们多不是旅客，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到城里去的人，大半是要经过这条桥的。

保尔刚踏上天桥，就看见了丽达·乌斯金；她比他早到车站。她一面在等他，一面看着那些走下桥去的工人们。

保尔在离她三步的地方站住。她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走近。保尔怀着一种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她穿着条子布的罩衫，下面是蓝色的粗布短裙，一件柔软的外套，搭在她的肩膀上；散乱的卷发衬着她那晒黑的面庞。她头儿稍为上仰的站在那儿，眩人的阳光使她眯着双眼。保尔用着这样的神态注视着这位同志兼先生，还算是第一遭，同时，他又初次发觉到，乌斯金不仅是一个省委的委员，而且是……但当他一悟到自己这种荒唐的念头时，他马上自责起来，并且向她招呼道：

“我站在这儿看你已看了整整一个钟头，你却并没有看见我。现在该走了，火车已经近站了。”

他们穿过公事门，朝月台走去。

列车缓缓的爬行着。车辆因为缺乏修理和满载乘客，每当驶过岔着的时候，就不住的呻吟摇摆。傍晚西天那浓密的和紫色的残照，流进车厢里来；接着，夜幕又掩住敞开的窗，车里面是一片黑暗。

乌斯金非常疲乏，枕着背囊微睡了。保尔坐在座位的边沿，垂着两腿抽烟。他也非常疲倦，但没有地方可以容他躺下睡觉。夜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车身的一阵颠簸摇醒了乌斯金，她注意到保尔抽的烟卷的红光。“他是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太接近我，免得我难堪，”乌斯金心里这样想，因此她开玩笑的大声对保尔说：

“柯察金同志，请你把布尔乔亚的坏习气丢掉吧，来，一道躺下来歇一会儿。”

这样，保尔就在她旁边并排躺下，非常舒服地伸直他那一双大腿和浮肿的脚。

“我们明天的工作是忙不完的。睡吧，你这脾气古怪的家伙。”她的手臂用力搂住他，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正触着他的面颊。

保尔认为乌斯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终生的朋友，终身的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她又是一个女人。他在天桥上第一次发觉这一点，而且也是她的拥抱使他如此冲动的理由。他感觉到她那平滑的呼吸，她的嘴唇跟他十分靠近。这靠近使他产生了一种要寻出那嘴唇的强烈的愿望。然而他终把那愿望克服了。

乌斯金似乎理会到保尔的感情，所以她在暗中微笑。她早已经历过热爱的欢愉与死亡的恐怖。她曾经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不同的布尔什维克，而这两个都先后被白卫军的子弹夺去了。一个是勇敢的伟丈夫，旅团的指挥，另一个则是有着奇特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入睡，直到隔天清早，他才被汽笛尖锐的声音闹醒。

有一天下午，工厂里有人叫保尔去听电话。那是乌斯金打来的，她说晚上有空，可以谈一谈。他交给她校改的那篇不整齐的文章：《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晚上，当他走到大学路那座房子的门口，他抬头一看，丽达的窗口现着灯光。他跟平常一样奔上楼梯，在门上敲了一敲，还没有等到应声，就推进去。

在床上，在小同志们中间谁也没有资格在上面坐一会儿的床上，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和有星徽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旁边，双臂紧抱着他，正专心地和他做着热烈的谈话。……丽达那容光焕发的脸庞转向保尔。

那军官移开丽达搂着他的双手，站起身来。

“让我介绍吧，”丽达握了保尔的手说，“这位是……”

但是那位穿军装的人却不照常规，一面紧握保尔的手，热情地摇着，一面抢着说道：“我是大卫·乌斯金”。

“刚刚来的，是一阵风吹了来的。”丽达笑着说。

保尔的握手是冰冷的。他心里非常痛苦，而这种痛苦马上赤裸裸地反映在他的眼睛上。他注视着大卫·乌斯金袖口上那四颗星。丽达正想说什么，但保尔阻住她说：

“我只是跑来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正忙着到码头上卸运木材，你用不着等我的。恰巧现在你又来了客人。那末，我走了，伙伴们正在下面等候着呢。”

正如来时突然出现一样，他又突然消失了，他那迅速的脚步砰砰地沿着楼梯响下去，随即下面的大门沉重地碰了一声。一切都归静寂。

“他一定有了什么事情，”丽达回答大卫那惊疑的目光，这样含糊的说。

在他下边，在天桥的下面，一只机车深深地在呼吸着，它那强大的肺管喷出了一阵金色的火星：它们疯狂飘舞，盘旋上升，接着就消灭在黑烟里。保尔凭着铁栏杆，遥望着岔道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对自己这样说：

“柯察金同志，实在，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发觉丽达有个丈夫，你就那样伤心？到底她曾经告诉你说她没有丈夫吗？即使她曾经这样说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干什么要难过到这地步呢？何况，我亲爱的同志，你一向不是欺瞒你自己，把它只看作精神上的友谊吗？……你过去怎能够那样盲目呢？但是，假如他不是她的丈夫呢？比方说，是她的兄弟或是叔侄……要是这样，那么你已做了蠢事情，对一个陌生人竟那样的粗野。说句实话，你是个道地的粗人，一点礼貌也没有。自然，你可以打听打听究竟他是不是她的兄弟。不过我请问你，如果打听之后，他果然是她的兄弟或叔侄，请问你要怎样对她说呢？不，最好还是一刀两断的来得干净。”

汽笛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想。夜显然已经很晚，是回家的时候了。

五个人在索罗明克——一般对铁路工人住宅区的称呼——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查基，快活和金发的捷克人克拉维赤克，铁路工厂青年团书记尼古拉·奥古尼夫，铁路特务委员会（反革命肃清委员会）的委员，不久以前还是中央修理厂制锅工人的史吉巴·阿久兴，和保尔。

他们弄到一间合适的房子。下工后就洗涤，粉刷，油漆，一连忙了三天。他们的大水桶忙个不停，弄得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他们用木板搭了板床，麻袋里塞着由公园里拾来的枫叶，做了床垫；在第四天，房间里已布置整齐，在白得炫眼的墙壁上，还挂着彼得洛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他们在两面窗户之间，安着一只书架。两只铺着纸板的木箱做了凳子，另一只大木箱则充当碗柜。在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弹子台——粗呢已经卸下，——这是好容易才从公共事务处里搬来的。这东西白天是台子，晚上则是克拉维赤克的睡床。此外，他们又把各个所有的东西搬进来。富有管家天才的克拉维赤克，开就一张公社资产的清单。假如不是大伙一致反对，他还想把这清单贴在墙壁上。

现在房间里一切的东西都是公共的资产了——薪水，口量和任何偶而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只有各人的武器才被认为是私产。公社社员接着一致决定，任何社员如破坏公社所有权的规条，或是以任何方式欺瞒同社社员，都得受开除的处分。奥古尼夫和克拉维赤克还坚提在该项条文后面附加一点，即犯规者应予逐出。

区青年团的全体都参加公社的落成宴。他们从邻居借来了一只大茶壶，并把公社所有的糖精都用来下茶。当茶饮过之后，合唱开始了。香烟工厂的达丽亚充任指挥，她的戏头巾的尖角歪向一边，眼睛像傲慢的男孩的一样，谁也不曾特地从近处注视过她那对眼睛。达丽亚的笑声是富于传染性的；这年青的卷烟女工，透过她那十八岁的明亮的青春之光注视着人生。她一高举双手，歌声就像喇叭的吹奏一样响起来：

我们的歌声，缭绕四击，流传遥远——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飞场，

它飘扬，辉煌而明亮，

我们的血被火烧得沸腾。……

大伙直到午夜才散，那时候，静寂的街道上响遍着热烈的年青人的话声。

查基伸手到电话机上。

“嘘，弟兄们，我一句也听不见！”他对着那些吱吱喳喳地挤在书记室里的青年团员这样喊。话声立刻低了下去。

“喂，请说吧。啊，是你吗？是的，是的，马上。工作？啊，仍旧是那事情——从码头上搬运木材。什么？他没有被派到别的地方去。要我叫他吗？好的。”

查基向保尔招手。

“乌斯金同志要同你说话。”他把听筒交给他。

“我以为你一定是到别地方去了。今天晚上我碰巧有空，你来罢。我兄弟只是顺路就便来看我，我们已有两年没见面了。”

呵，果然是兄弟！

保尔没有听清她所说的话，因为他同时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以及他随后在天桥上所作的决定。是的，今天晚上应该去看她，把残留的根苗斩断，爱情就是那样的不安和痛苦，难道现在是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吗？

听筒里的声音在说：

“怎么，你听见我的话吗？”

“嗯，嗯，我听得见的。很好，部务会议开完后就来。”

他把听筒挂上。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紧紧地握住那橡木桌子的边沿。

“大概，我往后不能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后，立刻看她那浓密的睫毛在耸动。她的铅笔在纸上停止移动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簿子上面。

“为什么呢？”

“我觉得时间越来越难支配。你自己晓得，我们现在过的是多么困难的日子。我十分遗憾，我不得不把我的功课延到将来再说。……”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后头的话不像原来那样的坚决。他对自己说：

“为什么又推起磨来呢？呵，你真的没有勇气把心头的話直说出来吗？”

于是他便固执的说下去：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桩事情长久就想告诉你——我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你。当我和薛加尔同志读书的时候，我脑袋里当真一句记一句，但自从我跟你念书以后，我却什么都忘个干净。每次念完之后，我还不得不到托卡列夫同志那里再整理它一遍。我的头脑消化不了

它。他最好还是另找一个脑袋中用一点的学生吧。”

他避开她的惊愕的注视。接着，他还用如下干脆的话语，毁灭了一切对她回心转意的可能：

“所以，我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互相间用不着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来，用一只脚小心地把椅子挪到一边，然后俯视着她那低垂的头，和在灯光下显得苍白的脸。他把帽子戴上，说道：

“哦，丽达同志，再会了。我一向搅扰你，实在十分抱歉。我早就应该直接了当的说。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伸手给他。保尔这冷淡使她吃惊，她勉强对他这样说：

“保尔，我丝毫不怪你。要是我过去既不能够使你了解我，那么我今天的遭受是应得的。”

他的双足像铅样沉重。他悄悄地推开门。当他走出那屋子，他站住了。现在要返回去，把一切倾诉给她，还来得及。但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她那儿，像挨一记耳光那样的得到轻蔑的回答，然后又再这样的离开这屋子吗？不。

车站侧线已渐渐变成破旧的车厢与车头的墓地，在空洞的木材工场上，风正卷着木屑飞舞。

在城市的四周，在茂密的丛林与幽深的峡谷里，奥力克匪帮正以野兽一样的迅捷，随处出没。白天，他们在附近的村庄或菁密的树窠里藏匿，入晚就整队出来，毁坏路轨，然后退到原来的地方去。列车时常逸出轨道，崩倒下去；车辆摔成粉碎，睡梦中的旅客轧得不成人形，宝贵的食粮则和泥土与血液搅成一片。

奥力克匪帮时常骑着矫捷的马，突袭平静的乡村。鸡给吓得咯咯乱叫，满街奔跑。时时响着锐利的枪声。接触大半是短时的，在地方苏维埃白色房子外面的枪声，也总是又尖又脆，就像踩踏干枯的树枝一样。接着匪帮就策着壮马在街上奔驰，砍杀所有抓到的人，他们砍得呼呼作响，好像人们在劈裂木柴。这些匪徒为了节省子弹，很少将俘虏枪毙。

他们去时犹如来时一样神出鬼没。他们到处有着耳朵与眼睛。各处的神道院与富农的家宅，就是他们在苏维埃内部的眼睛，无形的线索就打从这些神道院与家宅，直通到森林的核心。子弹，鲜肉，和颜色微蓝的“原酒，”也循着同一的路线输送进去，还有各种情报，也悄悄地传给大小喽罗，再由他们经过复杂的网，送给奥力克本人。

这匪帮拥有二三百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汉，好几次想围捕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分成许多小队，而且时常同时在两三个县份里活动。白天里匪徒们似乎是和平的庄稼人，各各躲在自家的院子里喂马或说笑，或是站在大门口一边神气地吮着烟管，一边用恶浊的眼色送着打从面前经过的红军骑巡。

亚历山大·普泽列夫斯基领着自己的队伍，废寝忘食的在三个县份里实行追捕。他不停地顽强兜剿，有时还砍断了他们的尾巴。一个月后，奥力克撤出他在两个县份里的喽罗：他们的处境是越来越危殆了。

被红军驱入波兰边境的彼得留拉匪军残部，现在已开始准备参加一个计划中的暴动。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华沙某些外国代表的密切支持，并已在他们内部，秘密组成了一队暴动先锋队。

秀彼多夫卡的暴动委员会，有着它自身的分别的组织，全体一共四十七人，其中大半是从前积极的反动份子，当地的特务委员会(反革命肃清委员会，)过去因为太过相信他们，所以将他们暂行释放。

瓦西里神父是这组织的领袖之一，温尼克和一个彼得留拉军官名叫柯明科的，也是它的负责人。神父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兄弟和父亲，以及一个混在执行委员会内部工作的沙木德，则执行着叛军的谍报工作。

他们计划在某一天晚上，以手榴弹炸毁国境守卫军的特别部，然后释放一切囚犯，可能时且夺取车站。同时，在计划中成为暴动中心的主要城市里，军官们正在极大秘密下进行集中，游击匪帮则已调至本城附近的森林里，此外还有忠实负责的人，与罗马尼亚境内的彼得留拉保持密切的联系。

城里只有五个人——布尔什维克——晓得所有这些准备。

水手朱赫来在特务委员会里，已经整整五夜没有闭上一眼了，现在已是第六夜。他是那知道这一切的五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这水手正经历着一个追捕野兽，只在等候它的跳跃的人的全部感情，他晓得此刻没有惊动他们的理由。那些吸血的毒物必须一网除尽。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建设一个谁都不再感到惊恐的国家。野兽是不许惊动的。唯有猎人镇定的手和镇定的心，才能使他们在这决战中获胜。

时候渐来渐近了。

就在这个城里的什么地方，在烟幕与阴谋的迷宫里，叛徒们决定应该战胜他们——在明天晚上。

那五个事先知道这一切的布尔什维克却着了先鞭；他们的决定是，“不，就在今天晚上。”晚上，铁甲列车不拉汽笛的悄悄地驶离车厂，车厂的大门随即默默地关上。电报干线匆忙传送着密电码，在那些电报传到的时候，传到的地方，共和国的守卫者都忘记了睡觉，忍受着不许惊动蜂窝的痛楚。

阿金给查基去了电话：

“支部会议全弄妥当吗？是吗？很好。你马上和区委书记到这儿出席会议。木材问题比我们所料想的还要严重，来吧，我们一道谈谈。”查基听完阿金那急速的坚决的话语，便喃喃地对电话听筒说：

“妈的，这木材问题快把我们弄成疯子。”

两个书记从李特克搭载他们的汽车里走下来，一走上二层楼，他们当下就明白今晚会议不是要谈木材的事。在党书记的桌子上，摆着一架马克沁姆机关枪，由特务团派来的机枪手，正在忙着对付它。

各走廊上，密布着由城里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充当的守卫，全都悄默无语。在罗素巴斯的房间里，在它那紧关的房门后面，省党部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刚告结束，两架军用电话机的电线，正由临街的扇形窗上引到房里去。

人们全都低声谈话。查基在一间房间里找到阿金、丽达和密海洛。苏姆斯基也在那里，但查基开头认不出他，在为他穿长的军用多套，腰带下还结着一支带套的手枪。丽达的装扮跟她前时当连指导员时一模一样，戴着红军军帽，着黄色的马裤，皮带上挂着一支盒子枪。

“这是怎么回事啊？”查基看后惊愕地问。

“这是实际的警备。我们快到你们区里去，在第五十兵学校作紧急的集合。所有的小兄弟们在开完小组会议后，直接走到那儿，最要注意的，是竭力使我们的行动不被别人发觉。”

茂密的森林里死寂无声。巨大的橡树都是百年的巨人。池子已在牛蒡和水草掩蔽之下入睡了。四面小径空无一人，在森林的核心，周围绕以高大的白墙，是前时干部学校的楼房——现在已改为红军第五军团的军官学校。夜已深了。楼上没有一丝灯光。从外面望去，一切都静寂，任何走过这楼房的人，必以为里面的人都已熟睡。但是，为什么直通天井的那两扇高大的铁门开着呢？那两个像巨大青蛙一样蹲在那儿的，又是什么东西呢？但是，由铁路工人住宅区各部分到这学校里集合的人，却知道一有夜警，里面就没有一个人睡觉。他们是在开完小组会议，经过一番简单的解释之后就径直走来的。他们走的时候默不作声。每组决不超过三人，在各人的口袋里，全放着一只折合的，上面写着“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或“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字样的卡片。没有呈验这些小卡片的人，决不能通过那铁门。

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厅里很亮，各面窗子都挂上帆布的窗帷。布尔什维克们团聚在那里，静静地卷着烟卷抽起来，拿这假的黑夜警备的措施在相互开玩笑，他们中有许多人都相信这是真正的黑夜警备，以为不过是集合起来，藉以训练和考验特务队的纪律而已。但那些有过真正的战斗经验的人，却觉得这气氛不像是假的。一切都那么静悄悄地进行，军校学生在编队时，也用极低的口令指挥，连机关枪也已搬了出来，而且在整个房子外面，又看不见一点灯火。

“好像有什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是不是？”保尔走近杜巴瓦，这样低声问他。

杜巴瓦跟一个保尔不认得的女青年坐在窗台上。保尔二三天前也会在查基那里见过她。

杜巴瓦开玩笑的在保尔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

“怎么，你是不是说，你的心已给吓冷了？好的，现在我们可以教你怎样打仗了。怎么，你们两个不认得吗？”杜巴瓦朝那少女点了点头，“她的名字叫安娜，我不晓得她姓什么。她是负责宣传中心的。”

那少女一面听着杜巴瓦的滑稽的介绍，一面注视着保尔，她用手掠了掠从紫堇色头巾上掉落来的头发。当她的眼睛与保尔的碰见时，双方一直斗视了好几秒钟。她那蓝黑色的眼睛冒着挑战的光芒，密密的睫毛就像黑蛾的翅膀。保尔的眼睛转向杜巴瓦，他觉得面孔红热，他皱起眉头来了——他自己心里很恼乱。

大厅里起了一阵喧哗，苏姆斯基爬到椅子上，喊道：

“第一大队的队员在这厅里站队。快一点，同志们，快一点！”

朱赫来，罗素巴斯和阿金走进厅里来。他们刚刚到。厅里挤满着站队的人。

罗素巴斯——一个笨重的人——站在演习的机关枪的铁台上，举起一只手臂，说道：

“同志们，我们今天集合在这儿，是为着一桩严重的和我们的职责攸关的工作。今天我要说的，甚至在昨天都不能说，因为这是极重大的军事秘密。明天晚上，在这城市，在全乌克兰，就要发生反革命的大暴动。本城此刻正充满着退伍的军官，匪帮则在城的周围集合。某些阴谋者甚至混至我们的装甲车师团里，充当司机。但这阴谋已给特务委员会（反革命肃清委员会）发觉，因此我们把整个党的和青年团的组织武装起来。第一和第二共产党大队将和红军士官学校的实习队以及特务委员会的部队共同行动。学生实习队已经开动了。同志们，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配备武装和整列队伍一切行动由朱赫来同志负责指挥，各指挥官向他领受各自的详细的指示。我想用不着对共产党大队指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我们应在今天防止明天的叛乱。”

一刻钟后，两个大队已在军校的天井里站好队伍，配好武装。朱赫来的眼睛巡视着那动也不动的行列。

在队伍前面三步，站着两个束斜皮带的人——大队长密尼洛，一个勇士，是来自高加索的铸工，另一个是政治委员阿金。在他们的左面，是第一中队的两个领袖——第一中队长苏姆斯基与政治委员乌斯金。在他们后面，是默默无声的共产党大队的行列——三百支勇猛的刺刀。

朱赫来发出信号——

“出发！”

三百个人穿过空无行人的街道。

城里已熟睡了。

当他们走到狄加耶街和利伏夫街交岔的十字路口，他们停步了。行动就在这里开始。

他们一声不响的把这地段整个包围起来。司令部便设在一家店铺的石阶上。一辆有着明

亮的 头灯的汽车，从利伏夫街开来，在司令部的对过停下。

这一回李特克是载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本城司令官——由车上跳下来，用拉脱维亚话向他儿子草草的说了几句。汽车飞也似的驶开，不一会就转了弯，开到狄米特里大街。李特克是一个笨重的人，现在他却已一无所有，只余下一副眼睛，他的双手已成为汽车车轮的舞蹈的一部份。呵，现在，他已被迫疯狂开驶了，谁也不会因为他转弯时像个狂人，把他拘禁两夜，所以他的车子就流星似的在街上飞着。

李特克只一息的功夫，就把朱赫来由镇上的这一头带到那一头。朱赫来不禁表示了他的满意，说道：

“李特克，要是你这一路不会撞倒人，你明天将得到一只金表。”

李特克高兴得魂儿出窍，回答道：

“车子这样开法，我准备给关上十天哩。……”

第一下的打击集中于作为叛徒总司令部的屋子。

第一批的俘虏和夺获的文件已送到了特务部。

在狄加耶街一条同名的弄堂里的十一号，住着一个名叫朱巴特的绅士。依照特务委员会手头的情报，这人在白色阴谋中是一个不小的脚色。他藏有企图在波多里区行动的退伍军官团的名单。李特克本人已到狄加耶街来逮捕朱伯特。那房子有着面临花园的窗，越过花园上那面高墙，就是女尼修道院。他们没有找到朱伯特。据领居说，他已一整天没有回家。他们开始搜索，发现一箱手榴弹和好些住址。李特克下了埋伏的命令，自己则暂时留在台子旁边，考查他已搜得的文件。

花园里的哨兵，是军校里的一个青年学生，他可以从他站着的地方看见那透亮的窗户。像他那样站在一个角落里是不舒服的，实在有点令人毛发悚然。

他的职责是注视那面高墙，但那面高墙离那叫人安心的窗户的亮光是太远了。况且月光，真糟糕，又仅仅发出朦胧的弱光。灌木丛在黑暗中像在蠢动。他用枪尖向周围探了探——一个人也没有。他心里想：“干什么派我到这儿呢？无论如何，决没有一个人能越过那面高墙——它实在是太高了。我倒不如到那窗户上看一看呢。”他又看了看那墙头，然后离开那个有着菌的味道的墙角。他在窗前站了一会。李特克正匆忙收拾纸头，准备离开那房间。就在这时候，一个暗影在墙头出现，那个在墙头的人可以看见窗户外面的哨兵和房间里面的李特克。那暗影以猫样的敏捷爬下墙头，攀援树身，溜到地面。他又以猫样的情静，爬近那哨兵，接着在一记迅速的殴击之下，那青年士兵直倒下去。一柄海军短剑，从他背后猛截下去，直到刀柄。

花园里的一响枪声，像在那些包围的人身上通了电流。其中六个人以沉重的脚步奔近屋里来。

李特克已经死了。他坐在桌畔的靠椅上，他那冒着鲜血的头倒在桌子上，窗户的玻璃被打破了，敌人并没有把文件夺了去。

女尼修道院旁边的枪声连珠的响。凶手已跳到大街，一面拼命朝罗罔诺夫荒地跑去，一面不断向后开枪。他并没有逃脱，一颗枪弹比他跑得更快。

通夜举行家宅检查，几百个没有登记的，或是登记证已过期的，以及藏有武装的人，都被解到特务委员会去。一个审查委员会正竭力进行甄别他们的工作。

在镇上的某些地方，阴谋者还作武力的反抗。在齐金街上，李比底失在搜查家宅时当场被人击死。索罗明克大队当晚一共损失了五个人。在特务委员会里，再也看不见老布刁什维克李特克——这真正的和忠实的共和国的守卫者了。但白军的暴动却已连根的摧毁了。

同天晚上，瓦西里神父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别的匪党的领袖也都在秀彼多夫卡被捕。这样镇上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安静。

不久之后，又一个新的敌人威胁着全城——铁道麻痹了。在行将到来的冬天中，运输的断绝将使本城备受饥饿与寒冷的威胁。一切开始看木材与五谷的供应如何而决定。

十一

朱赫来有心无意把粗短的烟斗从嘴巴抽出来，小心地用手指搅着烟斗里的烟灰，烟斗熄灭了。

十来支烟卷冒出的类色的烟，在黯黑的天花板下面盘旋着，蒙住省委主席罗素巴斯的座椅；围着圆桌坐着的各人的脸庞，似乎也已消失在灰烟之雾中。坐在罗素巴斯下面的托卡列夫，全身凭着桌子。这老人家激动地抚摸他那部剪短的胡须，不时斜睨着那个短身秃头的，用着芦笛一样响亮的高音，滔滔不断地说出连篇空如蛋谷的废话的家伙。

阿金注意到托卡列夫的斜视，这眼色使他回想起幼年时的事情——那时候他们有一只绰号“拳斗家”的公鸡，当它准备跳跃的时候，它时常斜睨着它的对手，那光景跟托卡列夫现在的一模一样。

这省委的会议已开了将近两个钟头了。那光头的家伙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的主席。他那敏捷的手指分着纸叠，然后高谈阔论起来：

“现在大家都可以明白，我刚才对各位所说的那些客观原因，使得省党委员会或铁路管理处的指示，都无从实现。我应当再说一遍，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仍然不能供应超过四百立方米突的木材。至于这个十八万立方米突的要求呢……那是……”他费了一些功夫去挑选他的形容词，“……那是乌托邦！”他说完后，就闭紧着那张小嘴巴，气愤愤地把两片薄嘴唇挤在一起。

会场上沉默了很久。朱赫来用手指甲敲了敲烟斗，把烟灰倒出来。

最后托卡列夫用他那喉腔的响亮的低音打破了沉默：

“得，赘话用不着多说。你的意思就是说：铁路林木委员会过去没有得到木材，现在没有得到木材，就是将来也不能得到木材……是不是？”

那矮个子的秃子耸了耸肩膀。说道：

“同志们，对不起，我们已把木材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陆上的运输工具……”他咳嗽了一声，用一块方格手巾揩一揩光秃的前额，揩完之后，他竭力想找寻他衣服上的口袋，但没有找到，结果终于把他的手巾塞在公文袋里面。

邓尼科从角落里说话了：

“但是，你空间已采取了什么步聚去运输木材呢？自从负责的机师和别的人员，就是那些参加叛变阴谋的人员，被捕了之后，已经过了好些日子了，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我已向铁路管理局报告了三次，”秃头转向他说，“没有运输工具，什么都没有办法。……”

托卡列夫打断他：

“这个我们已听见过了，”溶铁匠狠狠地瞪着他，“怎么，难道你把我们当傻子不成？”

这问话使秃头的脊骨冰凉，浑身冷战，他用降低的声音回答道：

“反革命者的活动，我是不能负责的。”

“但是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砍倒的木材离铁路很远吗？”阿金说。

“我听说过。但是我不能把别人辖区里的工作情形，向当局报告。”

铁路工联苏维埃主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有多少工作人员？”

“将近二百人。”

“这些废料一年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气愤愤地骂起来。

“铁路林木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着特别的突击工人的口粮，我们减削别人的所得分给

你们，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还有，我们送给工人们的那两卡车面粉，你放到那里去了？”铁路工 联苏维埃主席这样问。

这秃头现在已成为四方八面的尖锐问题的矢靶，但他完全推开他们，好像他们都只是些讨还旧欠的罗唆的债主。他像一条蠕动的鳗鱼，故意避免直接的答复。他的眼睛不敢直视旁人。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是越来越迫近了。在胆怯和激动的情形下，他只有一个愿望——尽速离开他们回家，在那里，他那个还很年青的妻子，正给他预备好一顿丰盛的夜饭，而现在她大概正在阅读小说消磨时间。

同时朱赫一来面小心地注意他一切的回答，一面在他的笔记簿上这样写道：“我认为这家伙应加以非常严密的考查，这决不是单纯的没有能力。关于他，他已经有了些证据……我们最好还是结束这场辩论，让他回去，我们再对付他。”

省委主席罗素巴斯读完了他的纸条，对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走出房间去打电话。在他回来的时候，罗素巴斯已念到决议的末段：“因恶意的怠工，解散铁路林木委员会的执行部，并将此事交有关当局作进一步的调查。”

秃头本来准备迎接更坏的形势。不错，因怠工而撤职，显然已对他的诚实起了怀疑，但这是小的事体，至于彼耶卡的事情呢，他用不着担心，因为不在他的范围内。“呸，”他对自己说，“我以为他们已找到了什么哩。”

他收集纸头，把它们放进公文袋里，安心地舒了一口气，说：

“是的，不用说，我是一个非党员的“专家，”他们有种种权利可以怀疑我，但我的良心却是纯洁的。要是我所未能完成的，那只是因为实际上是不能完成的。”

谁也没有回答他。接着秃子就走出房间，匆忙下楼，当他推开直通街道的那扇大门的时候，他放心地舒了一大口气。但是，就在门口，一个穿制服的人问道：

“公民，你尊姓？”

他的心沉下去了。呐呐地回答道：

“车……文斯基……”

现在这“局外人”已经走了，那十三个头就一齐紧紧地挤到罗素巴斯那大桌子跟前去。

“你们看，”朱赫来的指头在地图上指着，“这是波耶卡站，伐木场就在四里开外。那里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突的木材。一大队工人做了八个月，支出了极大的劳动力，结果铁路和本城还是没有燃料。这些木材，必须运到四里外的波耶卡站上去，因此至少要费一个月的功夫，用五千部车子搬运，而且还是按照一天运两趟计算。此外，最近的村庄又在十里以外，而且奥力克和他的匪帮就在附近出没。……诸位明白了这种情形吗？……你们瞧，照计划说，伐木应从这儿开始，然后沿着这路线一直到车站，但那些混蛋却在森林深处连路也没有的地方砍起来，他们就是这样来打击我们的。……这比暴动委员会的还要厉害。”

朱赫来握紧的拳头沉重的放在地图上。

围住桌子的十三人中的每一个，谁都可以清楚地想像到正向他们袭来的那种恐怖——那种朱赫来没有明说的恐怖。冬天就在门外了。医院，学校，各公共机关以及千万的人民，都将受到严寒的侵袭，而火车每星期却只能见到一次。

每个人都陷于深思中。

“同志们，”朱赫来放开拳头说道，“我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花三个月的功夫，由波耶卡站筑一条狭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去。按照这样的计划，不消六星期的功夫，就可以通到伐木场的起点。这事情我已进行了一个星期。为着完成它——”朱赫来从干燥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我们必须有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至于运输工具呢，我们在普斯赤·伏底兹有着车轨和七个轻便车头，这些是青年团发现的。它们藏在仓库里，因为在战前，曾经计划把狭轨铁道延长到城里来。但是工人们在波耶卡没有住宿的地方，当地只有一座已

经半坍的森林学校。工人们应该整批送去，每两星期掉班一次，再多恐怕就不能支持。阿金，你想把青年团团员送去怎么样？”

朱赫来没有等到回答，就继续说下去：

“青年团团员将出尽全力去做它。首先是索罗明克(车站区)的组织以及城里本身的组织。这不是一桩容易的工作，但要是我们向那些孩子们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的麻痹，他们一定会完成它。”

铁路管理局局长狐疑地摇了摇头，说道：

“难道这是办法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一秋天不停的雨，不久之后的寒冷，要铺设一条长五里的轨道，我不相信这会有什么结果……”他似乎很疲倦地说。

朱赫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坚决地截断他的话头：

“关于这一点，我请你更仔细注意，究竟关于木材问题，已经做了一些什么。我们现在要筑一条车轨到伐木场。我们不愿意坐着无所事事，让我们全给冻死。”

最后两只工具箱，已放到火车上去了，工作队员也已分别占了座位。车外下着不停的细雨。乌斯金的皮上衣湿得闪亮，大滴的水珠从衣角滚下来。

乌斯金是跑来和托卡列夫分别的，她紧紧地握住那老人家的手，对他这样说：

“我在关怀着你们，预祝成功。”

“好一个难题，他们既已给予我们，我们也需要它，”老头子从灰白眉毛下，热情地注视她。“你要好好注视这方面的事情。要是我们的工作有了停滞的话，你就给予相当的督促。你晓得，这些可恶的老太婆没有官样文章是做不成事的。得了，好姑娘，现在我应当上车了。”

他扣上外套和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上。当他刚踏上火车的时候，乌斯金就问他——这显然是随便问起的：

“怎么，难道保尔不跟你一道去吗？我怎没有看见他。”

“他昨天跟技术指导员坐小车去了，在那儿准备好接待我们。”

查基、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忙朝乌斯金和托卡列夫这面走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把短外套随便搭在肩膀上，瘦手指上夹着一根灭了根的卷烟的安娜·波哈特。乌金斯眼不转瞬的看着他们三个，然后又向托卡列夫问道：

“保尔跟你念的功课，念得怎样？”

托卡列夫迷惑地看着她：

“什么功课？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一向是照顾他的。他不知道多少次在我面前提到你，没有一次不称赞你。”

乌斯金不很相信的听着，接着又问道：

“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话吗？我应当告诉你，他曾说过，他时常到你那边，把我教给他的从头复习一遍。”

老头子笑起来了。

“我？我教他？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他到我那儿来念书过。”

汽笛尖声呼叫了。克拉维赤克从车箱上喊道：

“喂，乌斯金同声，你就让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这样是不行的；我们没有他，还能干什么呢？”

这捷克人本来还想多说几句，假如不是他看到那三个新来的人的话——他的眼睛与安娜那现出不安的神情的眼睛一刹那间互相接触，接着，当他看见她给杜巴瓦以送别的微笑的时候，他的心沉下去了，就这样他迅速地从车窗上消失了去。

雨打着他们的脸。已是深秋了，森林里那一望无际的林木都已光秃。老阴郁地站着，让褐色的苔掩住它身上的皱纹。

小站孤单地隐在树林里。它有着一个石头做的装卸货物的月台，就从这里起，一条翻掘泥路直通至森林里，人们在翻掘的泥土上像蚁群一样的忙碌着。

粘性的泥土是硬坚的，它已在脚底下被压碎。人们疯狂地掘着，铁棒和锄耙碰着石头时，发出了沉重的声音。秋雨不断的淋，寒冷的雨点透过衣服浸着他们的肉体。雨水冲坏他们的劳作，泥浆像浓粥一样从路身上滑出去。

他们的衣服浸透着泥浆，又重又冷，但他们从未停止工作，每天一直做到深晚，而被掘松的和堆成的悠长的新土的路，也一天长一天的伸进森林里。

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座牢固的石造的屋子。里面一切可以搬动的或是可以拆卸的东西，都早已被匪兵抢去了。代替炉灶的铁门的是巨大的黑穴，代替门窗的是张口的大洞里。从这些大洞里，可以看出前时桷椽的格局。唯一残留而完整的，是四间房子里地上的水门汀。每夜，那四百个人，就穿着浸透的，给污泥浆硬了的衣服，躺在这四间房子里的水门汀地上睡觉。他们挤着睡，竭力想用相互的体温来烘干它；衣服冒烟了，但仅是冒烟而已，它从来未干过。水透过窗棂的麻袋，流到地上，雨点整夜打着屋顶残存的锈铁，而冷风则不断从洞开的门上吹进来。

厨房设在东歪西倒的坡屋里，每天早上，他们在这里喝完了茶，就动身出去工作。他们吃的主要食品是索扁豆汤，和一斤半像无烟煤一样的硬面包。天天是这些，单调得厌烦，但城里所能供给的，如此而已。

工程师是一个高大、强壮，两颊有着深的皱纹的老头子，名叫巴多斯金。他的助手是万果林科，矮胖，样子粗鲁，有着肥大的鼻头。这两个都住在站长家里。托卡列夫则住在车站特务委员家中，这特务员名叫何里亚，是一个短腿的人，走起来，就像水银那样活动。

工作队以残酷的顽强忍受着他们的艰苦。路身也一天比一天的延长，虽然已有九个人开小差，几天后又又有好几个脱逃。但真正的打击是在第二个星期里：有一天晚上，由秀彼多夫卡开来的火车，没有带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消息告诉他。

工作队的党书记托卡列夫，把他的长毛腿放到地板上，坐在床沿挠着他的腋子窝。过了一会，他对自己咕嘈道：

“他们开始跟我们寻开心了，”说着，他慌忙的穿起衣服。

同时，“水银”何里亚像球一样的蹦进来。

“快，打电话给朱赫来，”托卡列夫对他说，接着老头子又转对杜瓦巴，“没有面包的事情，绝对不准你告诉任何人。”

跟下行线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之后，坚持不屈的何里亚终于和朱赫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一面听着他和电话接线员的争吵，一面局促不安的站在那儿。现在朱赫来的声音在听筒上响了，他说：

“什么，面包没有送到？我马上调查这是谁拆的烂污。你们明天一早一定可以拿到。”

在天刚透亮的时候，一辆沾满污泥的，载满装着面包的袋子的汽车，已开到车站了。小李特克从司机座位上走下来，脸色因整夜不息的驾驶而现在死样的苍白。

为完成筑路工作而进行的斗争是越来越残酷了。由铁路管理处传来的消息，说是枕木已经用尽，镇上又没有可以搬运铁轨与车头到筑路场来的工具，同时那轻便铁路的车头还需要大大加以修理。此外，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时间已快结束，但似乎没有人来换班，要叫这些业已精疲力尽的人继续做下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党员们在一间老茅屋里举行会议，借着黯暗的灯光，这会一直开到深夜。隔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赤克和别的六个动身到城里去修理车头，并询问运输车轨的事。克拉维赤克因为是做面包出身的，被派到粮食部去，其余的人则到普斯赤·伏特兹。

雨自始到终，不断的淋着。

保尔费了好大力气，方才把他的腿从淤泥里拔出来，因为觉得分外寒冷，他骤然发觉他的一只靴子的烂底，已经脱掉了。自从他来到这里以后，他不断地吃着这双烂皮靴的苦头，它永远是湿透的，永远渗进泥浆，而现在，他那赤裸的脚，已不能不踩进冷得彻骨的泥浆里去了。他实在不能再这样做下去，只好下工——一切全为了一只靴子。他从淤泥里检出一片靴底来，忧郁地看着它，而且打破了他不再咒骂的誓言。他跑到营房里去，坐在行军灶旁，卷起那满沾污泥的裤筒，让冻得麻木的双脚放在炉架子上。

看路人的妻子奥达加，已做了子的助手，正忙着在桌子上切甜菜。造化赐给这看路人的妻子的一——她又是一个青年的女人——一切都极丰盛。她的肩膀跟男人的一样宽，胸部是壮大的，臀部又粗又结实。她又善于操刀，桌子上切好的甜菜，顷刻便堆成小山一样。突然她轻蔑地看了保尔一眼，挖苦他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想找舒服，等着吃饭吗？你说，这不会太早了一点吗？小伙计，谁都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懒坯。你把脚伸到那儿去了？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呀！”

说到这里，厨子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完全烂掉了，”保尔对她这样诉说。

那厨子看了看那双烂得不成样的靴子，对奥达加点了点头，然后对保尔说：

“她的男人是个靴匠，他会代你缝起来。没有合适的靴子，你是在作践你自己啊！”

奥达加听到这话，同情地看着保尔，而且自己感到有些难为情。她对保尔说：

“我还把你当作一个懒虫哩。”

保尔微笑着，表示原谅她。她用着满内行的神气看了看他那双靴子，接着说道：

“我丈夫不会补它的。补它有什么用处呢？要你的脚不给冻坏，我还是给你一只旧套鞋吧。那套鞋给我们丢在垃圾堆里。咳，还有谁吃过这样的苦头！这几天，天就要大冷了，要这样，你就完了呵。”奥达加现在非常同情他，就放下靴子走进里面去。

一会儿，她带了一只长统的套鞋和一片帆布出来。当他那烤热了的脚包在帆布里，穿起那双套鞋时，保尔以沉默的感谢的神情，报答那位看路人的女人。

托卡列夫回来了，他气忿忿地召集党组人员到何里亚的房间，把不祥的消息告诉他们？

“一切的事情都停顿在那儿。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他们都在那里兜圈子了。孩子们，我对你们直说，情形看来是很不妙的。他们还没有召集好第二批的人员，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确实能派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来。但是大寒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管花什么样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也应在大寒开始以前赶过那沼泽，否则往后你就是用牙也啃不动它。他们尽管在城里鼓动那些无事忙得团团转的傻瓜，我们这里却必须加倍的赶快。就是得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把路轨筑成，要不然，我们还能叫布尔什维克吗？不，那只是个空幌子罢了。……”托卡列夫说的时侯，已不是用的平常那沙哑的调子，而是像紧张的钢条弹动一样的声音，在紧蹙的双眉之下，那火样的眼睛，说明了他的坚决和顽强。

他把一张折成四叠的纸头交给潘克拉托夫后，又对大家说：

“今天我们要召集一次全体党员与青年团员的非公开会议，充分说明目下的现势，明天大家一齐上工。非党的人员决定在明早加以遣散，只把我们留下来，这是省委的决议。”

保尔从那码头夫的肩膀上望过去，这样读道：“因事实的需要，全体青年团员应继续工作，拒绝换班，直到第一批木柴运出之后。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金。”

作为厨房的营房里，已没有插足的余地了，一百二十个人全挤在里头。他们有的靠壁站立，有的站在桌子上，有的甚至站在行军灶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接着托卡列夫说了几句话——他那演说的结语使所有的人都晕眩了。他说：“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明天都必须留在这里。”

那老头子的手臂做出一个姿势，表明了这个决定是不能更改的。这姿势，把大家返回城里，返回老家和挣脱污泥等希望完全打散了。

开头，人们发出的喧哗，无法加以辨别。黯淡的灯光给全体感情的激动弄得摇曳了。闹声越来越来。有的开始动情地幻想着室内的火炉，有的发怒，有的喊着疲倦。只有一个人声明他决心脱离，他那愤怒的声音从角落里带骂的喷出来：

“我一天也不愿再等下去。迫着人们做苦工，总不能没有理由。那么，我们犯的是什么罪？你们把我们关在这儿，已经两个礼拜，这已经够了。我们没有人要再做傻子了。让那些愿意留在这儿的人，到泥坑里去打滚吧。我却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声音是从奥古尼夫后面发出来的。因此奥古尼夫划了一根火柴，看看这个主张胶逃的人是 谁。火柴瞬间从黑暗里照出了一个气得扭曲了的脸和张大的嘴巴。奥古尼夫认出他是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那家伙粗声叱道：

“你侦探什么？我又不是贼，我又不躲起来。”

火柴熄灭了，潘克拉托夫全身直站起来。

“谁在那儿尽代自己着想？”他说。“谁说党的任务是做苦工？”他的声音是低沉的，他的眼睛坚决地横扫那些站在他周围的人。“同志们，我们回城里去的事是别提了。我们的地方就在这儿。如果我们躲避这工作，我们家里的人就得冻死。同志们，我们早些做完，就早些回家。但是躲避这种工作，像刚才那混蛋一般，是我们的主义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码头夫不喜作长篇的演说，然而就是这简短的演说，也给同一个叫喊的声音阻断：

“非党员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的回答。

一个穿城市短大衣的小伙子，挤到桌子跟前，把一小张卡片飞掷过去，打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落在桌上，摆在桌边。

“这是我的党证，拿不拿回，随你的便，我是不会为着这张硬纸头毁掉我自己的生命的。”

最后那句话给整个营房里突然发出的叱骂声淹没了。——“你这肮脏的小鬼！”

“他加入青年团，是为的升官发财。”

“撵他走！”

“我们把他埋了吧，这伤寒病的跳虱子！”

那小家伙低着头，朝门口走去。大家都让开，好像回避传染病病人一样的放他出去。他一走出，门就砰然关上。潘克拉托夫揉着那硬卡，放在油灯的火焰上，着了火的硬卡变成一卷黑色的灰管子。

树林里响着一记步枪的枪声。

有一匹马和一个骑者，从东歪西倒的营房外面，跌进树林里，接着就消失在夜的黑暗中。人们从学校里和营房里跑了出来，其中有一个踢着一块塞在门隙里的木橛子。他们擦了一根火柴。用大衣的下摆遮挡住风，借着火光，他们看见上面这样写着：——“你们全给滚出这车站，从何处来，滚回何处去。任何一个留在这里的人，当心脑袋吃子弹。我们决计一点不留情的把你们杀个干净，限期到明天晚上为止。”

签名的是“大头目赤斯诺克。”他曾经是奥力克匪帮里的人物。

马儿谨慎地踏在柔软的雪上。马蹄时时踹着藏在雪下的树枝，发出尖脆的响声，那马就畏惧地打一个响鼻子，闪到旁边去，但是一记打在它那低垂的耳朵上的鞭子，又使它急步上前，追上前面的马。

有十来个骑者已翻过山坡，在坡的那一面是一片黑色的，没有雪盖的地面。他们就在这

里把马勒住，马蹬相碰，发出叮■的声音。领头者那匹两岁的马，经过这长途的艰苦的奔驰，正浑身冒汗，不住在颤抖。

领头的人指着那破屋了，对他们说：

“他们住在那里的人，真他妈的多。我想我们只吓一吓他们就得。头目的命令是看看他们是否全在明天滚蛋，要不然，这些工人阶级的猪猡，是会弄到木材的。”

他们排成单行，没着那单轨的铁道，朝车站跑去，马儿缓缓地走到学校旁边的空地上。他们始终隐匿在树林后面，没有跑到露天的田野里。

一阵齐发的枪声撕破了黑夜的沉寂，雪片像松鼠群似的，从那在月光下亮得像银一样的桦树枝上，密密地飞了下来。子弹掠过树林，钻进颓坏的泥壁，把潘克拉托夫带得来的嵌在窗子上的玻璃，震得粉碎。

这排枪惊醒那些睡在水门汀上的人们，他们爬了起来，但是在房间里嗡嗡飞翔的不祥之虫，立刻又使他们恐怖地躺下去。互相的压着身子。

“你到哪里去？”杜巴瓦抓住保尔的外套，这样问。

“出去。”

“快躺下来，你这傻子，你一出去，他们就马上打死你。”杜巴瓦急急地低声说。

他们全倒卧在大门的旁边。杜巴瓦直挺着身子，一只手臂伸到门边——手枪紧握在他的那只手上。保尔蹲着身子，他那急忙的手指正扳着公事枪的枪巢。他装了五粒进去。他摸了一摸子弹，已经没有了，因此他把枪巢转进去。

接着，射击骤然停止，死寂使人心惊。杜巴瓦低声对那些卧倒的人，发出这样的命令：

“兄弟们，谁有枪的，这边来！”

保尔小心地推开门。空地上毫无人影，只有纷纷落下的雪片，缓缓地盘旋着，而那些骑马的人，却已经策马驰去了。

在离波耶卡站三哩的地方，筑路人正愤怒地攻击着地面；他们是打算从一座堵住路线的小丘中，开出一条路来的。

在路的两旁，各有七个人在站岗守望，他们随手带着何里亚的骑枪，保尔的，潘克拉托夫的，杜巴瓦和柯莫托夫的手枪——这是他们所有的全部武器。

工程师巴多斯金正坐在斜坡上，把数字记在笔记簿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因为万果林科已给匪帮的枪弹吓慌，宁可犯法，在当天早上返回城里去。

过了一会，巴多斯金转对站在他旁边的柯莫托夫说：

“要从这里开出一条路来，至少需要两星期的时间。地面已冻得铁一样的硬。”

柯莫托夫一向是个阴沉的，坏脾气的人，现在他狠狠地嚼着他的口髭的尖端，回答道：

“我们离完工的日期——总只有二十五天，现在，单开这么一节路，你就要半个月。”

“自然，这只是书面上的估计，”巴多斯金说。“从我有生以来，压根儿就不曾在这样的情形下筑过路，而且也不曾跟着这样的人筑过路。也许是我估计错；我已估计错两趟了。”

就在这时候，朱赫来，阿金和潘克拉托夫走到筑路的地方来。他们一走到斜坡，就被人们发觉。

保尔正与特洛非并肩工作，特洛非是个斜眼的小伙子，穿一件破烂的露出肘节的厚绒线衫，曾经在车厂里当过旋盘匠。保尔死命用肘节顶着他，指着坡下的人喊道：

“你瞧，谁来了？”说着，他就丢下铲子走下斜坡，在帽遮的下面，他那双眼睛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握他的手，握的时间比谁都要长。

“你好啊，保尔，好弟弟。你这么褴褛的装束，就像小叫化，真叫我认不出来。”

潘克拉托夫讥讽地笑了笑。

“他那五个足指头倒安顿得不错，扎上破布又套上套鞋。而且，一个开小差的家伙临走还偷去了他的大衣。奥古尼夫是他们的公社的社员，把他的短上衣送给保尔——没有关系，保尔是一个热血的青年。他所能得的暖和，是在水门汀地板上躺它一个星期，接着，要是你们愿意，他还会躺在棺材里去——”潘克拉托夫痛心地对阿金这样说。

正在掘土的奥古尼夫，阻断他的话头说道：

“我们是不让保尔病倒的。要是叫我们出主意，那就让他当厨子，做奥达加的一名后备火头军。如果他不是傻瓜，他在那里不但可以装满肚皮，还可以得到温暖——不是在火炉边，就是在奥达加身上。”

塌鼻子的奥里尼夫半眯着他那忧郁的眼睛，同时大伙都开心地哄笑起来——这是当天第一次的大笑。

朱赫来察看了斜坡之后，便和托卡列夫，巴多斯金坐雪撬到伐木处去。但不久就返回来。大伙仍旧在斜坡上顽强地掘着土。当他看见锄头的闪光，和在紧张的劳动中弯着的脊背时，他低声对阿金说：

“用不着开群众大会的。这里用不着鼓励谁。托卡列夫，你说的对，这些人不是代价所能衡量的，钢铁就是这样炼出来的呵。”

朱赫来看着这些筑路工人，眼睛里现出敬佩与严肃的和爱护的骄矜。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不久之前的叛乱的前夜，曾经荷起钢做的枪，而现在，他们又都抱着一个志愿，把钢做的铁轨这动脉，通到那古老的木柴的泉源——那温暖的与生命的泉源去。

工程师巴多斯金终于以适当的礼貌和有利的理由，使朱赫来明白了。没有两星期的时间，要他们开出这条路来是不可能的。朱赫来小心听了之后，心里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把这些青年们撤退下来，调到斜坡那一面去工作，至于这个小山岗呢，让我们另外用别的办法来对付它。”

他走到车站上，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接通电话。何里亚在门口守卫，他听到后面朱赫来那低沉的声音：

“马上摇电话到本区参谋部长那里，用我的名义请他们普守列夫斯基团队立刻调到此地来。我们必须把这里的匪帮肃清。此外，再派来一部铁甲列车和一些工兵。别的事情由我在这里自己办理。今晚我就回来。叫李特克在午夜时候把汽车开到车站。”

在营房里，当阿金做了简单的演说之后，朱赫来便站起身来，开始说话，很亲切的讨论了一个钟头。他告诉他们说，规定的完工的日期，即一月一日，是不能延宕的。他说：

“自此以后，我们要在军事状态上进行工作。党员们要组成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工作队，以杜巴瓦同志为队长。六个筑路小队各各分担一定的工作。现在把余下来的全部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小队负担一段。全部的工作都必须在一月一日完工。最早完成他们的工作的小队，特准回到城里休息，除此之外，省委常委会将向乌克兰中执会推荐，以红旗章奖励该队最得力的人员。”

各小队队长已经派定，第一小队是潘克拉托夫；第二小队是杜巴瓦；第三小队是柯莫托夫；第四小队是拉古丁；第五小队是保尔；第六小队是奥古尼夫。

“至于筑路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用这话结束他的演说，“即全部工作的组织者与监察者，当然继续由安东·尼基伏洛维齐·托卡列夫同志负责。”

就像一大群鸟突然飞出一样，营房里发出一阵劈啪的掌声，那些板起来的脸孔也现出了笑纹。这十分严肃的人的古怪而亲切的结语，已把听众们紧张的注意，消解在一阵愉快的笑声中。

有二十个左右的人，送阿金和赤赫来坐上摩托轨道车。当朱赫来和保尔告别的时候，他看见他那满堆着雪的套鞋，因此低声对他说：

“我会送一双靴子给你。你的脚还没有给冻烂吧？”

“看样子很像是冻坏了，两脚已经有一点肿，”保尔这样说，他想起一个老早就想提出的要求，因此，他问道：“你能不能给我几粒子弹？可用的子弹只有三粒了。”

朱赫来只好非常伤心地摇了摇头，但当他看见保尔眼睛里那失望的神情，他立刻毫不踌躇地解下他的盒子枪。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他说。

保尔开头简直不相信他已得到他梦想了那么久的东西，但朱赫来已把皮带套在他的肩膀上。

“拿去，拿去吧，”他说，“我晓得你的眼睛老早就看中它。只要你小心用它，别打你的自家人。这里还有满满的三排子弹一起给你。”

许多欣羡的眼睛都盯住保尔。有谁说道：

“保尔，来吧，我拿一对靴子和你交换——外加一件短皮袄。”

潘克拉托夫也跟着大伙一起揶揄他，用肘节推他的后背说：

“小鬼，别傻，和他换靴子吧。要是你再穿这套餐，一定活不到今年的圣诞节的。”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正踏在轨道车的踏板上，膝盖托着纸头，他就在纸头上面写着他刚才给予保尔的那支手枪的许可证。

大清早，一部铁甲列车琅■地转过岔道，开到车站上来。放出来的白得像天鹅毛的水蒸气，盘旋上升，像一卷卷丰美的羽毛，荡漾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从装甲列车的车厢里面，走出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后，这三个工兵已在小丘的斜坡上，埋下了两个光滑的像大南瓜一样的金属物，并且从那两个东西上面引出了两条长长的火药线。接着，他们开了一响信号枪，所有的人都慌忙离开这个现在是危险物的小丘，躲到四面八方去。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根火药线的线头，它冒出了一朵小小的灯光的火焰。

每个人的心，一下子都十分紧张。他们苦恼地等待了好几秒钟；接着大地战抖了，一个可怖的力量把小丘的各个斜坡的顶上部分炸开了，巨大的泥块朝天上抛去。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的还要厉害。惊人的震响在森林的旷地起了回应，其中还杂着无数由炸裂的小丘上发出的闹声。

原来是小丘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一个巨大的地坑。在周围十几码内外那像糖一样纯白的雪地上，满撒着松碎的泥。筑路的工人，立刻提起锄头和铲子，匆忙朝那爆炸后出现的泥坑跑去。

从朱赫来走后，争夺锦标的顽强的斗争开始了。

还在天亮之前保尔已悄悄地，不惊醒别人的起了身，移动着他那简直已僵硬了的四肢，独自走到厨房里，预备好开水和热茶，然后才回去叫醒他同队的伙伴。

当其他各队的人，都已醒来时，院子里已经亮了。

在营房里喝早茶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过人群，走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的伙伴们坐着的桌子跟前，对他说：

“杜巴瓦，你想想，保尔那家伙和他那一帮，已在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起身了，你大概会相信，他们也许已筑好了二十码。伙伴们都说，他鼓动他们到了这地步，以致他们那一伙都夸说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完工。他把我们大伙都看作傻瓜。但是，对不起，我想我们的花样比他们还来得多哩。”潘克拉托夫说着现出非常愤慨的样子。

杜巴瓦顽皮地在微笑。他心里十分明白，为什么铁路工场那一队的行动，会这样刺伤这内河码头夫书记的感情。这一点，就是杜巴瓦自己也是感到的；保尔显然已狡猾地向他们全体挑战了。

“不管够朋友不够朋友，无论如何，这是战斗，你晓得，”潘克拉托夫说。

傍午时候，保尔那一小队的兴奋工作突然停止了。站在枪架子前面的步哨，看见森林里

出现了一队马兵，他立刻开枪示警。

“兄弟们，拿枪呀！匪帮进攻我们了！”保尔这样喊，一面抛下锄头，走到他挂着盒子枪的树木跟前去。

全队的人们都拿着他们所有的武器，直挺挺地倒卧在铁轨旁边的雪地上。接着，那些带头的骑兵们都摇着皮帽，其中有一个高声喊道：

“同志们，停住，都是自家人！……”

有五十多个布琼尼的骑兵，帽遮上嵌着鲜红的星徽，正策马朝铁道跑来。

原来这是普守列夫斯基团队派来照顾筑路工作的小队，保尔注意到那指挥官的坐骑，只是一只耳朵。这可爱的，鼻头有一片白斑的灰色马，不肯停下来，一直的跳着，跟那骑手开玩笑。当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手抓住它的辔头，它立刻吓得退到后面去。

“格尼达克，好姑娘，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呵！我的独耳的好美人，你倒平安活到现在哩。”

他亲昵地抱住它的纤细的头颈，一面抚摸着它那掀动的鼻孔。骑队的指挥官仔细看他一看，认出他是保尔，于是惊奇地喊道：

“哎哟，原来是保尔·柯察金！……他能够认出这老牝马，可是连可怜的老朋友谢里达看也不看一眼。你好吗，老兄弟？”

在镇上，同志们尽所有的能力帮助筑路工作，得到了很明显的效果。查基把区委员会所有的人送到波耶卡站，索罗明克已经只剩下女人了。查基还设法从铁路技术专门学校的新学生里面，弄到一批人送出去。当他向阿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道：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和那些女普罗列塔利亚了。我想委派拉古丁代替我的职位，这样我可以在门口贴上一张‘妇女部’的字条，然后我也到波耶卡去。让我独自一个留在那些女人中

间，实在有点不便；我相信那些喜鹊们一定私下谈着这事情，说道：‘你们瞧，他把大家都打发走，只留下他自己一个，这老滑头，’或者还要说别的叫人难为情的话。我一定要你答应我，准我也去吧。”

阿金一味笑着拒绝答应他。

新来的人已到了波耶卡，其中有六十个是铁路学校的学生，朱赫来设法叫铁路管理局派四部客车，开到波耶卡，让他们住宿。

杜巴瓦的那一个小队被派到普斯赤·伏底兹去，负责运带狭轨车头和六十五辆狭轨的敞车，这任务也为他们所担负的工作的一部分。

在出发之前，杜巴瓦向托卡列夫提议叫克拉维赤克来，把一些新到的人分给他，以便继续工作。托卡列夫当下就做，没有猜想到使杜巴瓦想到那捷克人的真正的原因。原因是这样的，那些新从索罗明克来的人，带来了安娜写给他的一张便条。安娜这样写道：

“德米特里：克拉维赤克和我已拿到一大批你的宣传品。我们给你，给我们全体英勇的突击工作者以热烈的敬礼。你，你们全体，实在是十分光荣的！我们深愿你们个个身体强健和精力饱满。昨天，我们已把最后的一批木柴送进火炉里。克拉维赤克也向你们致最高敬礼。他是一个第一等的同志。代你们烘面包的就是他，他不信任面包房里所有的人。筛面粉，揉面团，全都由他亲手做。他找到了一些好面粉，烘制了怪出色的好面包，一点也不像我们领到的那样。每到晚上，大伙都来看我——拉古丁，阿久兴，克拉维赤克，有时查基也来，功课进步得很缓，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谈天，特别时常谈到你们。女孩子们因为托卡列夫禁止她们到筑路区去，全很生气。他们自信都是能够跟你们一样吃苦的。达利亚说，她要穿她爸爸的服装，出其不意的去看看老头儿托卡列夫，看他是否赶走她！她是很可能这样做的。我衷心向你这黑眼睛致敬。

暴风雪突然刮起来了。灰色的低飞的云层蒙住天空，大雪密密的下，入晚，大风在烟囱

周围 怒号；在树林里，它追逐飘荡的旋卷的雪花，发出凄厉的呜咽，林木也不息地颠摆着。

狂风彻夜呼号，虽然他们整夜的升着火炉，但所有的人都冷得刺骨。这半坍的房子是留不住热气的。隔天清早，他们踏着深厚的雪出发工作，耀眼的太阳挂在树梢，天空没有半块云彩。

保尔那一小队竭力打扫他们地段里的积雪。只有到现在，保尔才晓得，饥饿与寒冷是多么的难受。奥古尼夫那旧的短褂不会使他暖和，而他那只套鞋还钻进了雪，它好几次掉落在深的积雪中，另一只皮鞋也快要粉碎了。而且，因为他睡在水门汀上，脖子上已生了两个大的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手帕送给他做围巾。

他是瘦了，两只眼睛网着红丝。他狂暴地用一柄阔大的木铲子把雪刮走。就在这时候，一列客车驶进车站，快断气的火车好不容易才把列车拖到这里，它的煤水车里已没有半根木柴，炉火也渐渐熄灭了。

那开车的对站长喊道：

“给我们木柴，我们便开。如果没有，就让它此刻还能动弹的时候，开到旁边的侧线上去。”

列车终于退到侧线去，他们把这情形告诉那些沮丧的客人。满车子的人都同声叹息或咒骂。

“你去和那个沿着月台走来的老头子商量商量吧，”站长对那些管车人说。“他是这里的负责人。要是他答应，他可以用滑车给你们运来一些木头。他们是拿木材做枕木的。”

管车人就跑去问托卡列夫老头子。老头子这样回答。

“要是你们出代价，我可以给你们木柴。你们别忘记，这些是我们的筑路材料。我们的工作给积雪阻拦了。你们车厢里有五六百个客人，妇女和小孩子们可以留在车里，其他的人大家都拿把铲子清除积雪，一直做到晚上。如果他们答应这样做，他们可以拿到木柴。如果不，就让他们在那儿等到新年再说吧。”

保尔听见他的一个伙伴在他后面惊奇的叫道：

“瞧，一大群人来了。看呀，还有女人呢！”

保尔转过身来。

“这里有二百只手，”托卡列夫走近来，对他说，“派他们一些工作，别让他们偷懒。”

保尔把工作派给这些新来的人。有一个高身材，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外套，戴一顶温暖的羔皮帽，非常愤怒的转动着手上的铲子。接着，他转对站在他旁边的，那一个戴着一顶翻皮的海豹帽子的青年女子咕嘈道：我是不铲雪的，而且谁也没有权力叫我这样做。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要是他们高兴，请我领导工作，我倒可以答应下来，但是铲雪的事情，决不是你或是我份内的事，这在合同里是没有明文规定的。这老头子违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头？”他向靠近的一个工人这样问。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你为什么不工作？”

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全身从脚到头的打量一番，然后反问道：

“你算是什么？”

“我是一个工人，”保尔回答。

“那么，你我没有话说，叫工头来吧。……”

保尔翻眼看了看他，说道：

“要是你不肯做，你就别做。只是车票没有我们戳洞，可就上不了车，这是我们的主任的命令。”保尔又转向那女子问道，“女公民，你也拒绝工作吗？”

霎时间，他呆住了，因为她正是冬妮亚·杜曼诺夫！

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这褴褛的人是保尔。那就是保尔——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一只脚穿破靴，一只脚穿着一只古怪的套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龌龊的毛巾，脸孔长久没有修洗。只有他那双眼睛跟从前一样，永远是那样明亮的，这保尔的眼睛。这个像叫化子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之前还是她那么热爱的人！世事变得多么快啊！

冬妮亚是刚刚结婚的，这回正和她的丈夫到一个大城市里去，因为他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个重要的职位；想不到她竟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她青年时代的恋人。她不晓得要不要和他握手——究竟万西里对这会不会起反感呢？保尔现在竟下贱到这地步，真是不幸的事情，显然，这青年火夫除开做掘地工人之外，决不会有更大的出息的。

然而，她还是踌躇不决，她的双颊烧得通红；同时，那青年绅士已给这衣衫褴褛的流氓气昏了，因为他竟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老婆，在他看来，这显然是骄横的行为，因此他抛掉铲子，走到冬妮亚跟前，说道：

“冬妮亚，让我们走吧。要是我再看这拉查隆尼一眼，我就会忍不住的。”

“我也许是拉查隆尼，不过你不外是差点被他割破喉咙的布尔乔亚吧了。”保尔是读过《求斯壁·格里波的》这小说的，他晓得他所说的那个拉查隆尼，就用低沉的声音这样回答他。接着，他看着冬妮亚，用干脆而响亮的声调对她说道：“杜曼诺夫同志，拿起铲子，站到队伍里来，别学这胖水牛的样子。请原谅我说的这话，自然，我不知道他同你是什么关系。”保尔说道，残酷地笑了笑。

这时候，保尔看到了冬妮亚那双皮袄里的雪靴，添着说：

“不过，我倒不劝你站在这儿。几天前，匪徒还来光顾过呢。”说着他转身走到自己人那里去了，他那套鞋每走一步便拍里拍拉的响。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然影响了那工程师，冬妮亚也终于说服她的丈夫，使他留下来工作。

傍晚，当工作完了的时候，他们回到车站去。冬妮亚的丈夫匆忙走在前头，好在车上占住好的位子，冬妮亚在轨道边站着，让所有的人走过。最后一个是保尔，他已疲倦得要命，边走边拄着铲子。

“保尔——你好吗？”冬妮亚对他说，“实在说，我从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可怜。难道你不该在现政府中弄到更好一点的差事，只好作掘地的事情吗？我以为你早就做了委员或是别的什么同样的职事了。你的生活怎么变得这样恶劣呵。……”

她的步子跟不上他。当她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站住，惊奇地回头看看她说：

“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你还是那么粗鲁，”冬妮亚的脸红到耳朵尖。

保尔攥住铲子，大踏步上前。只有在走了好几步路之后，他才回答道：

“不，杜曼诺夫同志，依我说来，我的‘粗鲁’比你们的礼貌还要豪爽些。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它倒是过得满好的。只是你的生活变得比我所想的还要腐烂。一两年前，你还好一点；那时候，你还不怕羞，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呢，倒遍身发出臭丸子的味道。说句良心话，现在我和你之间，已再也没有共同的地方了。”

保尔接到他哥哥阿尔青的信。信上说他就要结婚，要保尔无论如何回家一趟。

一阵风把保尔手上那张信纸吹走了。他没有参加他哥哥的婚礼的缘份——难道离开工作的事情，尚有考虑的余地？单在昨天，潘克拉托夫那家伙已赶上他本队了，而且正用一种叫大家惊奇的哪率走在前头。还搬运夫已稳占第一天，他那惯常的沉静现在已完全消失了；他不断鼓动码头工人以一种绝对疯狂的速率工作着。

巴多斯金以无言的狂热注视着这一切。他时时挠着头皮，对自己说：“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

么人？他们从那里得到这种特殊的精力？不是吗，要是天气再这样晴个七八天，我们就可以到达伐木场了！俗语说得真对：活到老，学到老，到头才晓得自己是木头。这些人的工作实在打破了一切的计算和标准。”

克拉维赤克带着他最后的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先去看托卡列夫，然后就来看望保尔。他们互相热烈问好。接着，克拉维赤克微微一笑，从麻袋里摸出一件瑞典制的好看的黄色的衬皮里短大衣，他用手掌拍着那弹性的皮面对保尔说：

“这一件是给你的。你猜得出这是谁给你的吗？呵，你这木头，好好想一想呀！这是丽达·乌斯金同志送给你的，为着不让你这蠢驴子活活给冻死。这本来是奥辛斯基同志送给她的礼物——她接上手立刻就交给我，说：——拿给柯察金吧。（阿金曾经告诉她说，你在大冷天工作，连皮衣都没有。）这倒叫奥辛斯基的鼻子有点皱起来。他说：‘呵，要是你喜欢，我还可以把一件全身的外套送给这位同志。’但丽达对他笑着说：‘不必，你用不着麻烦，我想他穿短的更便于工作。’这就是那件短大衣，拿去！”

保尔紧捧着这珍贵的礼物，惊异地注视着它，然后有点踌躇的把它披在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暖和。

丽达在日记里记道：

“十二月二十日

大风雪。又飞云，又刮风。波耶卡的人们就要达到目的了，但是寒冷与大风雪阻住他们。他们陷在雪里了。要开掘冻硬的土地是非常困难的。只余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据托卡列夫报告，筑路队里发现伤寒，已有三个人染着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产青年团市委全体会开会，波耶卡没有人来出席。离波耶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帮使运粮的列车出轨。奉粮食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全体筑路工人都调到出事地点去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波耶卡送到城里来。其中之一就是奥古尼夫。我到车站上去一趟，看见几个尸体从由哈科夫开来的列车的缓冲机上拖下来。医院里很冷，可诅咒的大风雪，它要刮到什么时候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来。下面的消息是证实了。

奥力克匪帮昨夜率领他全部的匪军袭击波耶卡。匪帮和我们对战了两小时。因为匪帮切断交通，直到今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实的消息。匪帮是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伤，枪弹贯穿他的胸膛。今天就要把他送来。那夜做守卫队队长的克拉维赤克被砍，受了重伤，他一看见匪帮，便发出警报，一面还射击进攻的敌人。他还没有逃到学校里，便被砍倒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有一列铁甲车和两队骑兵在那里防守。

潘克拉托夫升任筑路队的主任。日间普守列夫斯基团队在格鲁波可姆村包围了一部分匪军，把他们杀个精光。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别的受伤的人们运到了，他们都被安顿在实习医院里。医生答应无论如何救活老头子托卡列夫，他正昏迷不省人事，别的人没有性命的危险。

共产党省委和我们接到波耶卡来的电报：“我们，狭轨铁路的建筑者，‘保卫苏维埃政权’铁甲列车队的队员，以及骑兵团队的红军，在这里召开会议，共同向你们保证，虽然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决定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大家正紧张的从事工作。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会议主席保尔，记录白列静。”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殡葬了克拉维赤克。

贵重的木柴现在已经近在咫尺了，但工作越来越缓，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守去几十只有用的手。有一天保尔像喝酒似的，弯着腿，摇晃着身子走到车站。他发热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不过今天热度可比往常来得厉害。

这吮吸着他那小队的血液的病症，现在又进攻了保尔他本人。他那健壮的身体对抗着它，一连五天，他觉得他还有力气从那铺稻草的水门汀地面上爬起来，跟别人一道出发工作。但是不管是那件皮大衣，或是朱赫来送给他，现在已套在那生了冻疮的脚上的毡靴，都不能救助他。他每走一步，就像什么东西猛刺着他的胸口，他的牙齿因发热而打抖，双眼饱含着泪水，树木似乎在旋转，跳着奇异而昏狂的舞蹈。

他只想设法走到车站。一阵不平常的喧闹声把他惊住了。他用力睁开眼睛一看，看见一列长长的跟车站一样长的列车——在那些敞车上面，有着小的机车，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忙着装卸那些东西。他再走几步，身子就失去平衡。他只觉得他的头正昏晕地栽到地面上。雪片非常舒适地冷却他那烧热的面颊。

几点钟后，他们才找到他，把他送到营房里。他的呼吸非常困难，而且已经谁也不认得了。由列车上请了来的医师，诊断的结果说是肺炎又兼伤寒。热度一百零六度点七。至于骨关节炎和脖子上那两个痈疮，——这些都是小事情，医师说，单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已够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

潘克拉托夫和随着列车到来的杜巴瓦，尽他们的全力救护他。他们托柯汗斯基——保尔的同乡——把他运回秀波多卡夫去。但只有在柯察金那一小队的全体队员，特别是何里亚的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能够设法把柯汗斯基和不省人事的保尔，送到那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去。车上的客人死也不让他们上车——他们是害怕伤寒的——他们威胁着说，只要车一开动，他们就把他抛到车厢外面。但何里亚对着那些说这话的人的面孔，摇着他的公事枪，大声叱道：

“这病人是不会传染的。我们甚至不惜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滚下车，让他一个走。你们这些无赖，别忘记，要是谁敢动他一动，我通知沿线人员，列车一到，就把你们扔到牢里。柯汗斯基，这是保尔的手枪，要是谁敢移动保尔，你就直射他。”何里亚这样威胁他们说。

列车开动了。在荒凉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近杜巴瓦，说：

“你以为怎样，他能活吗？”

没有回答。

“唉，这个是出乎我们能力之外的。”潘克拉托夫接着说，“杜巴瓦，现在一切都得我们负责了。来吧，今天晚上我们应当把机车弄下来，明早好升火试一试。”

何里亚一直摇电话给沿线每个反革命肃清委员会的朋友，要求他们阻止列车上的客人把那病人抬出来，只有在他得到他每个朋友的肯定的回答，表示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之后，他方才上床睡觉。

列车到了接轨站，一个无名的美发青年的尸体给抬到月台上。谁也不认得他，也不晓得他因何病症致死。车站上反革命肃清委员会的卫兵，记起何里亚的请求，慌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把他抬下，但当他看到这青年实在已经死了，才把他抬到月台，移进车站的陈尸所，并且立刻给波耶卡的何里亚通电话。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同志的死耗告诉他。波耶卡又发出一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把保尔的死讯通知他们。

同时，柯汗斯基把保尔——虽然病危，却还活着——送到他家里，接着，他自己也害起热病病倒了。

丽达·乌斯金记着日记。这是她一月八日的记事：

“为什么我是这样绝望地不幸。我刚刚哭过；谁会想到丽达·乌斯金竟会哭而且哭得这么悲伤！难道眼泪永久是意志薄弱的象征吗。这悲哀为什么来？今天为什么悲哀？今天流泪的

原因是一种难堪的悲哀?今天是胜利的日子。寒冷的恐怖是克服了,铁路上也已获得充分的宝贵的木材,我也刚从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回来。这是个全城苏维埃的扩大会议,那些建造铁路的英雄们全体参加。胜利,是的,但已有两个人献出了他的生命:克拉维赤克和保尔·柯察金。保尔的死使我发现了真情;对于我,他比我所想的还要亲爱。”

“明天我要写信到哈科夫,要求调到乌克兰青年团中委会上工作。日记就在这里中止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再写呢?”

十二

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越过死的边界返回生来的第四次。一个月后,苍白而又消瘦的他,已能够勉强撑起颤抖的双腿,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他的母亲搀扶着他走到窗口,他就凭着窗棂,久久的向街上凝望。春雪开始在融化,新春初次的温暖已到了院子里来。在窗外樱桃树的枝丫上,一只灰胸的麻雀,正在啄着自身的羽毛,时时斜着它那狡猾的小眼睛,向保尔窥探。

“哦,你我俩就这样渡过了冬天吗?”保尔低声的说,一面用指头敲着玻璃窗。

他的母亲吃惊地瞪着他,问道:

“保尔,你在跟谁说话?”

“我和那麻雀说话。……现在它已飞走了,这狡猾的小东西。”他疲弱地笑了笑。

到了盛春时节,保尔开始想回到城里去。现在他已能够着实地走路了,不过他体内还残留着很严重的病根。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骤然间脊椎上的一阵剧痛,把他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方才挨到房间里。隔天医生给他作了一次周详的诊察,发觉在他的脊骨上有着一个深陷的坑,他惊奇地问他道:

“这个是怎样得来的?”

“医生,这是给石子路上的石头轧伤的伤痕。在罗夫纳的城外,一块三寸厚的石子刚好轧在我的后背上。……”

“那么,一直到现在,你怎么能走路呢?一向碍事吗?”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又继续骑马。直到现在方才第一次发作。”

那医生皱着眉头,把那陷坑再诊查一次。

“不,不,孩子,这决不是好玩意啊。脊骨上是不许有这样的毛病的。柯察金同志,你应当包扎起来。”

他怀着同情和不禁流露出来的担心,眼看着他的病人包扎起来。

阿尔青住在他老婆的家里。他老婆是一个难看的少妇,名叫史娇莎。这是一个贫农的家庭。有一天,保尔去看阿尔青。一个龌龊的斗鸡眼的小孩,正在污秽的小天井里跑。他一看见保尔,便毫不怕生的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聚精会神的挖着鼻子。问道:

“你要干什么?说不定是来偷东西的吧?你顶好还是快逃,我妈的脾气是顶凶的。”

接着,破旧而低矮的草屋的小窗推开了,阿尔青叫道:

“来呀,保尔弟弟。”

一个脸色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妇人,正在灶头忙着。她冷冷地瞟了保尔一眼,让他走过,继续烧她的菜。

两个留着粗短的小猪尾的女孩,高踞在灶头,用着野蛮人的好奇眼光,从那优越的地位上窥视着。

阿尔青靠桌子坐着,似乎很难为情。他的这头亲事,他母亲和保尔本人都不赞成。虽然他是个世代相袭的普罗列塔利亚,不知道为什么竟和石匠的女儿,结交已三年的美丽的嘉莉亚——她本人是个女裁缝——断绝了关系,而屈服在难看的史娇莎的诱惑之下,赘人这没有一个作工人的五口之家。当他做完车厂里的工作之后,便把所有的精力,花费在犁耙

上，以恢复那贫瘠的农务。

阿尔青晓得保尔是不赞成这种他认为是退入“小布尔乔亚世界”的背弃行为的，因此他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他周围一切事物所取的态度。

他们两人坐了一会，说些平常见面时的寒暄话，接着保尔便起身告辞，但阿尔青阻住他：

“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吃饭，史娇莎马上就拿牛奶来了。你明天就走吧？弟弟，你身体还很软弱呢！”

史娇莎走进房间来，与保尔握了手，便叫阿尔青到打鼓场上帮她抬什么东西，留下保尔独自一个和那不很饶舌的老太婆在一起。教堂的钟声从窗户送了进来。那老太婆便尖酸地喃喃自语道：

“呵，我主耶稣，我尽忙些倒霉事情，连祷告也没有功夫了！”她把脖子上的围巾拿下来，又斜睨着那客人一眼，走到房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正放着暗淡的因经久而黯黑的圣像。就在圣像跟前，她叠着两个瘦削的指头，在身上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她用于瘪的嘴唇喃喃念着。

在天井里，小孩正跳到一只垂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用一双赤脚拼命踢它，双手紧拉住猪鬃，高声叱着那只一边哀叫一边扭着身子的畜牲：

“嘟鸣、开步走！”

接着，他又啐了一口，喊道：

“站住！”

那只猪载着小孩在天井里四处奔跑，它竭力想摇他下来，但那斗鸡眼的小流氓却骑得很紧妥，一动也不动。

老太婆的祈祷做到一半就停住，她探头到窗外，叱道：

“马上跳下来，要不，你会给摔死的，你这顽皮的小东西。”

最后，那只猪终于把那个骑者摔下来，老太婆很满意的回到圣像眼前，脸上做出虔诚的样子，继续祷告道：“愿主的国来到……”

那哭泣的小孩在门中出现了。他用袖口擦着碰伤的鼻子，因为擦痛，哭着喊道：

“奶奶，我要酪饼。”

老太婆狠狠地转过身来。

“你这斜眼的小鬼，”她叱道，“你就不让我作祷告，我马上就拿酪饼给你。……”她从凳子上抓起一条皮鞭，那小鬼立刻就跑了。灶头上面那两个小女孩发出低声的窃笑。老太婆又转过身去作第三次的祈祷。

保尔不想等他的哥哥回来，起身走了。当他临走关上那小门的时候，他注意到那老太婆的头，又从草屋上面的小窗探出来，监视着他走。

他不明白在这样的家里，究竟是什么诱惑了阿尔青。现在他怎么也摆脱不掉了。史娇莎每年会养一个小孩，而阿尔青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像一只钻进牛粪堆里的甲虫。他甚至还会把车厂的工作丢弃的。

当他在秀彼多夫卡那荒凉的街上行走的时候，他心里想：“我还想把他拉进政治生活里来呢。”但他是高兴的，因为他明天就要回到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一切仍在那儿的大城。这大城以它的力，以它的搏动的生命，以奔波不息的人的洪流，以电车的轰隆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引诱他；而最最引诱他的，乃是巨石砌成的建筑，煤烟熏黑的溶炉，机械，以及传导带那柔和的沙沙之声等的混合物。他的心神已飞到有巨大的飞轮以疯狂的速率旋动的地方，空气中散播着机油的气味的地方，他一向就在这生活中长大，它已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对它感到了非凡的亲切。但这里却是一个僻静的小镇，当他在街上行走时，他感到空虚的怅惘。他的生活的根早已从这里拔去了，只有大城市使他感到亲切，那里有着活跃的

同伴，而且，还有着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间已走到松林跟前了，他在三岔路口站了一会儿。在他的右面，用高高的尖头木栅与松林隔开的，是阴沉沉的老监狱，在牢狱的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房子。就在这地方，在这空旷的广场上，娃莲和她的同志们曾经在绞刑台的绳结下噎了气。他在当时树起绞架的那地方，站了一会，默默地陷在深思中，然后走到陡斜的地方去。他走下削急的斜坡，转到同志们埋身的那小广场去。

不知道是哪个悼念死者的人，用枞枝装饰那一系列坟墓，因此在这小小的墓地上，围上了一面绿色的短垣。悬崖的上面笔直的松树高耸着，幼嫩的青草，绿茵似的铺遍了那斜坡。这儿是小镇的近郊，又悄静又沉寂，只有树林的轻微的低语。他的同伴就曾英勇地在这儿献上他们的生命，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是奴役的开始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保尔的手缓缓地摘下头上的帽子，他的心充满着，充满着向外流溢的难堪的悲伤。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与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而作的斗争。”保尔感到了赶紧工作的迫切的欲求，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充分利用他的生命，这生命是随时都会因疾病或是什么悲惨的意外而突然结束的。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念，离开了他的同志们的墓场。

悲哀的母亲在家里给他的儿子料理出门的行装。保尔偷偷窥视她，看见她的双眼正噙住眼泪。

“保尔，亲爱的，你不能留在这儿吗？我这么大年纪，你们把我孤零零地丢在这儿。为什么城市会那样引诱你？这里也一样可以生活呀？是不是那里有你看上睛的截发的小鹁鸪？你瞧，你们谁也不对我这样的老太婆说半句话。阿尔青的亲事一点也不对我讲，你呢……只有在你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她低声的告诉着，一面把她孩子那些破烂的东西放到一个洁净的布袋里去。

保尔抱住他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来，说道：

“妈妈，亲爱的，鹁鸪是没有的。您老人家晓得鸟类都寻找他们的同类吗？那么，你把我当什么，难道我是雄鹁鸪吗？”

他把他母亲说得只好笑了。

“妈妈，我起过誓，在我们没有把这世界的布尔乔亚消灭以前，我是不找女人的。你说什么，还要等好久吗？不，妈妈，他们不会支持得长久的。……”

他开始对他母亲叙说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世界。但他的母亲回答说：

“不，保尔，我决不会活到亲眼看见你们那神话的世界实现的。……你们的公公也是跟你一样冲动的，他是一个水手，一个真正的好汉，愿上帝保佑他！当年在塞把斯托波尔打仗的时候，他战到没手没脚才回家，但老了却死在穷苦里。他的脾气很倔强，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木棒子，敲一个官吏的头，以致在牢里坐了一整年，我看你就正和你的公公差不多。……”

“呵，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不快乐的分别呢？来吧，请你把手风琴拿给我，我已经长远没有拉过它了。”

他把头倚到那一系列由青贝壳做成的琴键上；奏出来的新鲜的乐声，引起了她母亲的惊奇。现在他奏的跟过去不同了。它没有轻率的旋律的气分，没有粗猛的音阶的段落，也没有使这青年手风琴家名震全镇的那吉卜西人的狂放。他的演奏现在来得坚定，嘹亮而和谐，它比过去更加深刻了。

保尔独自一个到车站去。

他劝他母亲别去送行，他不愿意看她在分别时下泪。车厢里缓缓挤起来了，保尔占了一

个上层搁板，因此可以看见下面走道上那喧嚷争闹的人们。

包裹一个接一个的拖进来，全给塞在下层座位的下面。列车缓缓开动了，他们全都静下来，并且跟往常一样，开始吃起东西了。

保尔很快就入睡了。

他要去访问的第一所房子是在市中心。他一步一步的走上天桥。一切都是那么熟识，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手顺溜着那光滑的栏杆，慢慢爬了上来。到了桥顶，他站了一会。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夜，当着他那被魅惑的眼睛，在深不可测的高空里，裸呈伟大的奇观。暗黑展开着墨色的天鹅绒，掩盖了地平线，无数星星正发散亮光，闪着磷色的光辉，织就美艳的花采。下面，在大地与苍穹衔接的模糊的地方，城里的万家灯火散布在黑暗里。

有几个人朝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边走边谈，那响亮的激动的呼声，打破了夜的静寂。保尔不再注视城里的灯光，回过头走下桥去。

当他在省“乞卡”的通行处求见朱赫来的时候，值班的人员对他说，他早已走了。那个人用许多问题盘问保尔，等到他证实这青年人的确认得朱赫来之后，才对他讲朱赫来两个月前已调到塔什干，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不在询问详细，就一声不响的转身走出去。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不得不在那建筑物的石级上坐了下来。

一辆电车开了过去，街上随处充溢着辘辘的车声。在人行道上，是一股无尽的人的洪流。这城市真的非常生动，街上随处响着妇女们的快乐的笑声，一阵一阵的谈话声，男子的低音，青年的次中音，以及老年人那沙哑的声音。人的洪流是无尽止的，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照耀得通明的电车，街车的头灯，对面戏院那绕着广告牌的电灯，都是这样耀眼。到处是人，到处是没有完的话声。这就是大都市的夜呵。

街上这种繁忙与闹声，多少减轻了他因朱赫来的不在而起的失望。但是，他往那里去呢？回索罗明克——他的许多朋友都在那儿，——去是太远了，他的心不自觉地想到另一条路——相离不远的大学院路——的一座房子去。自然，他可以到那儿去。到底，除朱赫来之外，他最想去看看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而且在那儿，他还可以在阿金或密海洛的房间里过夜的。

远远地他就看见楼上角落里那间房子有着灯光。他竭力使他镇定，推开了那扇橡木的大门。他在楼梯上站了好一会。他可以听见丽达房间里的人声。有人正在那儿弹着奇达。“哈哈！”他对自己说，“现在她连奇达也准许弹了，规则倒有点松弛了呢。”他轻轻地敲了门。他感到十分冲动，因此紧紧地咬紧自己的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妇人，年纪很轻，发上垂着卷发。她讶疑地看着保尔。

“你找谁？”

那妇人没有把门关上。保尔掠了一睛，看到那不熟悉的布置与家俱，心里早已明白了，但他还是问道：

“我要找丽达·乌斯金同志。”

“她早不在这里了。正月里他到哈科夫去，后来我又听说，她已从哈科夫上莫斯科去了。”那陌生妇人这样回答：

“那么，阿金同志还住在这里吗？是否他她走了？”

“他也走了，现在他是敖德萨青年团的省委书记。”

保尔只好转身走开。回城市来的喜悦已多少褪色了。现在他不能不严重地考虑如何过夜的问题。

“要是你再这样挨个的去找老朋友，就是走破了脚，你也不会找到一个的。”他控制了自己的失望，独自这样嘟哝起来。然而他还是决定再去碰一次运气——不妨再找一找潘克拉托夫，这码头工人住在内河码头的附近，要找他究竟比到索罗明克去来得近些。

最后，非常疲乏的保尔，终于走到潘克拉托夫家的门口，在那曾经油成赭色的门上敲了

敲，同时肯定地对他自己说：“要是他也不在这儿，我就放弃一切的计划，躺在船上睡它一夜再说。”

一个老太婆来开门，她蒙着一条在颚下打结的头巾，完全是农民的装扮。她就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潘克拉托夫在家吗？”

“他刚回来。你找他吗？”

她不认得保尔，回过头去，喊道：

“仁卡，有人找你！”

保尔跟着她走到房间里，把包袱放在地板上。潘克拉托夫在桌子上回过头来。他正忙着吃饭——嘴巴里满塞着一块面包，对客人说道：

“如果你有事情找我。就请你坐下来，有话尽说，同时我还得把这碗甜菜吃下去，我整天除白开水之外，什么也没下肚。”说着，他便拿起一柄大木匙。

保尔在他旁边一只没有坐垫的椅子上坐下来。他脱下帽子，照例拿着它擦拭前额。“难道我真变得那么厉害。”他自己心里这样想，“连他也不认得我吗？”

潘克拉托夫吃了两匙甜菜汤，没有听见客人开口，就转过头来，说道：

“喂，朋友，有什么事情，请说吧。”

他手里拿着一块面包，正想送进口里，突然在半路停下来，迷惑地凝视着：

“什么？……等一下。呸！你这骗子！”

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急得通红，保尔忍不住笑出声来。

“保尔！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是死了！等一等，你叫什么名字？”

给他这一叫，他的姊姊和母亲都从隔壁房间跑进来，接着他们三个都十分高兴，认出他的确是真正的保尔·柯察金。

当他们全家都熟睡的时候，潘克拉托夫还把四个月来的各种事情告诉保尔：

“查基、杜巴瓦和密海洛在冬天就到哈科夫去。所有这些家伙，不是到别的地方，就是进共产主义大学！查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备班，密海洛则进的一年级。我们去的一共十五个。我想我应当把脑袋充实充实，它实在太空虚了，因此也报了名。但是，你信不信，那考试委员会却丢了我，好像拿到一颗热煤球似的。”

潘克拉托夫有点气愤的吹了吹鼻子，接着又说下去。

“起初我的事情很顺利，各种条件都合格：党证有的，党工作的履历也很充分，至于地位和出身，那更不成问题。但是事情弄到政治试验的时候，可就把我弄糟了。

“我和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吵了起来。他问我一个很无谓的小问题。他说，‘告诉我，潘克拉托夫同志，你对哲学的见解怎样？’你是晓得我的，什么见解，我一点也没有。可是我当时却想起，我们有过一个搬运夫，那家伙是中学出身的，一个流浪汉，只为着想吹牛皮才当码头夫。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在希腊，那些非常博学 and 智识高深的人都叫做哲学家。其中有一个，我把他的名字忘记了，一生住在桶里，还做出诸如此类的无聊事情……那个能够用四十种不同方法，证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的人，就是他们中间最有能耐的学者。换句话说，他们全是些草包。我把那中学生告诉我的想了起来，因此对自己说：‘考试委员会这家伙倒从右翼来包围我了。’他在那里狡猾地窥探我。因此我直接了当的说道：‘哲学，只是空口说白话，想在你眼睛上撒一把灰。同志们，我一点也不想花功夫去弄这胡说八道的东西。至于党史呢，那倒是另一桩事情，我愿意全心全意的研究它。’这么一来，他们就要我说出，究竟我从哪儿得到这些关于哲学的高贵的见解。我就把那中学生说的话，再添油加酱的说出来。他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我入学的事情就这么完结了。当时我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把我当傻子吗？’我拿了帽子就走。

“后来，我在省党委员会里，遇到那位问我的考试委员，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我才晓

得那 中学生说的话，实在牛头不对马嘴，哲学原来是一种伟大的东西，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杜巴瓦和查基却考进了。杜巴瓦以前念过不少时候的书，查基却比我好不了许多。不用 说这是他的勋章帮了他的忙。无论如何，目下只有我一个不得其所。他们开始叫我做码头上 的各种事务工作。以前，我总要和码头主任起冲突，忙着各种青年工作，现在我自己倒做起 码头主任来了。这样的事情目下有的是，譬如，你找到一个真正的懒虫，或是一个天生的傻 子，你叫他当书记和码头主任，一面不断的训练他监督他。我不是说他们在作弄我，关于 我的事情，往后我们可以再谈。”

“我还应当告诉你一些别的什么消息呢？阿金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党地方委员会里始终没有 调动工作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杜夫达·托卡列夫做了索罗明克匹党委的书记。你们公社的 社员奥古尼夫，则担任区青年团的工作。达莉亚参加政治教育部。车厂里你原来的职位，已 由一个叫杰维泰夫的顶替。这个人我不大晓得他，只在省委员会里见过面。他似乎非常得意 ，不过可靠倒还可靠。此外，你也许还记得安娜·波哈特吧，她也在索罗明克，负责区党委 的妇女部。别的人我早已告诉你了。保尔，现在党员念书的人非常多。老干部现在都在省立 苏维埃党校上课。他们答应明年送我入学。”

他们两个到了下半夜方才上床睡觉。隔天清早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到码头上去了。他 的妹妹杜西亚，一个很高的，样子很像她哥哥的女孩子，请他吃了早餐，一边很快乐地和他 谈谈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一个轮船上的司机，正在海程中间。保尔临走的时候， 杜西亚非常殷勤的对他说，“别忘记，我们等着你回来吃中饭呢。”

省委会办事处跟从前一样的活动和喧闹。保尔在走道上徘徊了一会儿，想找到一个熟人，但 没找到，因此他走到书记室去。

委员会的书记，穿着一件蓝色的俄罗斯紧身便服，正坐在一只大台子旁边。他头也不抬地匆 忙斜睨保尔一下，继续写他的字。保尔在他的台子前面坐下，小心地注视这个接替阿金的人 。

当这位穿便服的书记在他的文字后头点上一个圈点之后，他便问保尔道：

“你有什么事情吗？”

保尔把他的经过叙说了一遍，末了对他说：

“同志，请在团员名单上添上我的名字，再把我派到车厂里。并且请你给我一些必要的 指示 。”

那书记倒靠在他的椅子上，含糊地回答道：

“自然，我们应当把你的名字添上去，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再把你送到车厂去，倒就 有点 为难，因为杰维泰夫已在那儿负责工作了；他最近又当选了地方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另派你 到别处去工作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车厂里去不会妨碍杰维泰夫的工作的。我只是到那儿做我本行的事情，而不是去 做车 厂的书记，而且就我目下身体还很不好的事实看来，我请你不要把我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

那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条上匆匆写了几个字。“把这带给杜夫达同志，他会把这件 事弄 好的。”

在人事部里，杜夫达正忙着叱责他的助手。保尔听他们两个吵了一会儿，但接着，当他 发觉 这争吵简直没有个完，他就在这负责人争得面红耳热的时候，拦住他说道：

“杜夫达，等下你还可以告诉他的。这里有话对你说，让我们先把我的证件办好吧。”

杜夫达接了条子，仔细地看了好一会，接着又看了看保尔。最后他总算把这事情弄明白

了。他说：

“啊！原来如此，你并没有死！但是现在我们要怎样对付这件事呢？我们早已把你的名字从团员名单上删了去，我亲自把你的党证送回中央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你又错过了全俄罗斯的团员登记。依据团中央的指令，所有没有进行登记的人都失掉资格，开除团籍。因此你现在只有一路可走——跟别的人一样重新加入青年团。”他的口气是很坚决的。

保尔有点不开心。他皱着眉头对他说：

“呵，你还是照老样子做事吗？你是一个青年人，但比地方档库里的老耗鼠还要糊涂。瓦洛达，老朋友，你什么时候才会长进一点呢？”

杜夫达跳了起来，好像什么东西咬了他一样。

“你居然倒教我如何办事来了，好大的口气。我是对我的工作负责的。指令要人遵守，不是要人违犯。至于你骂我‘耗子’，我要依法叫你说明理由。”

杜夫达摆出恐吓的神气这样说，又把一卷没有拆过的信件示威似的推到前头，意思就是说，这事情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保尔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口，但他想了一想，又转回来，收回那张放在杜夫达前面桌子上的书记的字条。杜夫达偷偷地窥视他，这坏脾气的，长着一对宽大的顺风耳朵的少年“老头”，样子很不开心，同时看起来又很好笑。

“好的，”保尔用一种挑战而又镇定的调子对他说，“我准备接受‘破坏统计工作’的罪名，不过我倒要请教你，你凭什么想去控告已经死了而事先没有宣布他要死的人呢？而且你总晓得，这对那些心想病死的人是不会有效果的。关于这桩事情，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令。”

杜夫达的助手听了这话，再也不能保持中立，突然的笑了起来。杜夫达的铅笔尖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在地板上，但想不出话来回答保尔。

就在这时候，一大群人边说边笑，喧嚷嚷嚷的走进房间来，奥古尼夫也在他们中间。喜悦的惊奇和问话是没有完的。几分钟后，另一群团员又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奥加·游令妮夫，她是丽达·乌斯金的好朋友。她满怀热情的久久握住保尔的手，不过她的眼睛里，同时又含着感伤的表情。

保尔又不得不把他的经过，从头到底的叙述一遍。同志们真挚的喜悦，他们相互间那宝贵的友谊与同情，以及牢固的握手与亲切的拍肩，实在都是心感的，也使保尔暂时忘记了杜夫达。但是最后他终于把他和杜夫达的谈话告诉了他们。大伙立刻怒嚷起来，奥加瞪了杜夫达一眼，走进书记室去。奥古尼夫伸手勾住保尔的肩膀，说道：

“让我们去看尼达纳夫吧，他会使他开窍的。”

大伙跟着奥加走进去。奥加在那儿气狠狠地说：

“应当把他开除，送他到码头上，在潘克拉托夫管理下做一年码头夫。”

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和蔼地微笑着，倾听奥古尼夫、奥加和别的人所提出的调走杜夫达的要求，然后这样安慰他们说：

“柯察金恢复党籍的事是用不着讨论的，他马上就可以领到党证。我也同意你们所说的话，杜夫达是个一窍不能的家伙。这是他基本的弱点。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把索引弄得非常整齐。一直到现在，在我工作过的地方，青年团的档案与数字全都一塌糊涂，简直没有一个数字能叫人相信。但这地方的统计却做得十分出色，你们自己晓得，杜夫达有时一直做到半夜。因此，我以为要调走他虽然非常容易，只要我们有把握可以找到一个头等的活动的人来代替他；但要是只能找到一个不可靠的办事人员，我们虽然失去了官样文章，但也失去了我们的记录。让杜夫达做下去吧，我要好好和他谈一下。暂时是如此，往后我们看情形如何再说。”

奥古尼夫同意这决定，他对保尔说道：

“保尔，老朋友，让我们到索罗明克去吧。今天，一向也是如此，我们在俱乐部里召开青年团活动份子的大会，他们没有一个晓得你的情形，因此我们可以宣布：‘现在，柯察金同志要说话，’叫他们大家吃惊一下。保尔，没有死，再好没有。要是你真的死了，你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好处呢？”奥古尼夫说道，扬起双臂抱着保尔，把他转到走道上。

“你来吗，奥加？”

“你的意思怎样呢？”

虽然潘克拉托夫家里的人等着他，保尔可没有回去吃饭；到了夜里，保尔还是没有回去。奥古尼夫已把他的朋友带回家来。他在“苏维埃家”里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他尽力用好的东西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大卷报纸和两大本青年团区委会部务会议的记事簿放在他面前，对他说：

“你最好把这些看一遍。当你害了伤寒倒在床上的时候，已有大股的水从这里的桥下流过去了。你看看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现在的情形又是什么样子。天快黑的时候我就回来，我们再一道到俱乐部去——要是你累了的话，你躺下去，睡它一会儿。”

奥古尼夫把许多文件、笔记和书信塞进他的口袋里——他根本就讨厌公文袋，一向把它丢在床底下的地板上——临走之前，在房里兜了一圈，方才出门。当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房里地板上满是打开的报纸，一叠书从床底下给拖出来，其中有些堆在桌面，而保尔则躺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发出的文件，这些是他从奥古尼夫的枕头下找出来的。

“你这流氓，你把我的房间弄成什么样子？”奥古尼夫装着生气的样子这样喊道。“喂，缓点，同志，缓一点，你干什么偷读秘密的文件？你简直把我的房间翻遍了。”

保尔微微一笑，把他正在读的那文件放下来，说道：

碰巧这一件刚好不是秘密的，不过，你围在灯子上当灯罩的那一张，倒才是不应公开的。你瞧，它连边上都给烧焦了！”

奥古尼夫把那张纸头拿下来，注视着那题目，接着他拍着自己的前额，喊了起来：

“怎么的？我一直找了它三天，真糟糕，怎也找不着。现在我记起来了。岂不是，前天瓦林杰夫拿它当灯罩，后来他自己动手找，找到垂头丧气还是找不到。”

奥古尼夫拿了那张纸头，非常小心地折叠它，然后把它塞在被窝里。

“往后我们要好好安顿这些东西，”他保证着说。“现在让我们吃了饭到俱乐部去吧。好兄弟，保尔，坐到桌边这儿来。”

奥古尼夫从一口袋里拖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长长的里海干鱼，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了两条面包。他把纸头移到桌子的一边去，又在空的地方铺了一张报纸，然后把干鱼头拧出来，在桌子上把鱼敲碎。奥古尼夫这才坐下来，他的下巴开始有力地咀嚼着，同时，在正经中带着玩笑的，把最近的各项新闻告诉保尔。

奥古尼夫带着保尔穿过办公处的门，走到讲坛的后面。在大厅的角落里，讲坛的右面，钢琴的旁边，塔莉亚和安娜坐在铁路青年团员那围得紧紧的圆圈里面。在安娜对面椅子上摇着身子的是瓦林杰夫——车厂里青年团的书记——他那红润的脸庞好像一只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稻谷色的，身上穿一件曾经是黑色的，但现在已烂得可以的皮紧身衣。在他旁边，随便地靠在钢琴上的是杰维泰夫——一个褐色头发的，双唇齐整的漂亮的青年人，衬衫的领子没有扣上。

当奥古尼夫走近他们的时候，他听见安娜说：

“有些人总是想尽方法，使新同志难以参加进来。杰维泰夫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杰维泰夫带着冷冷地轻蔑安娜的语气，直率地回答道：

“青年团可不是敲门砖呵！”

这时候塔莉亚看见了奥古尼夫，便喊道：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今天多神气，就像一个擦干净的铜茶壶！”

他们把他拖进圈子里面，纷纷向他提出问题：

“这会儿你上哪儿去了？”

“现在开会不好吗？”

奥古尼夫伸出只手上下的摇着，叫大家静下来。

“乖儿子们，静下来吧，”他说。“托卡列夫马上就到，他一到我们就开会。”

“他就在那儿。”安娜指着朝他们走来的托卡列夫，党区委书记，这样说。

奥古尼夫走过去迎他，对他说道：

“老伯伯，跟我到后台来一下子，让你见一见你认得的一个人。”他说着就拖托卡列夫朝后台走去。

奥古尼夫双手狠命地敲着钟，以致那些最饶舌的人也立刻停止谈话。在托卡列夫后面，为密密的绿色的枞树枝所围绕的，是共产党宣言作者那长发纷披像狮子一样的人头。当奥古尼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的眼睛，凝视着那站在围栏后面没有被会众看见的保尔。

“同志们，”奥古尼夫开始说，“在我们开始依照议事程序，讨论组织任务问题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让他说几句话，托卡列夫和我都同意，应该让他说一说。”会场里发出许多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古尼夫地提高声音喊道，“现在，我请保尔·柯察金对你们作一个见面的演说。”

会场里一百人中，至少有八十人是认得保尔的，因此当那个大家熟识的高个而苍白的青年人，在讲坛前面出现并开始说话时，会场上立刻发出热烈的鼓掌与喜悦的叫声。

“亲爱的同志们，”他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止不住感情的流露。“亲亲的朋友们，事情变化很快，现在我又回来，与大家一道工作了。回到这里，我非常快乐，我看见前面坐着许多老朋友。奥古尼夫拿会议记录簿给我看过，我晓得索罗明克青年团已比过去大了百分之三十；车厂里的铁路工人，也不再浪费功夫去制造卷烟点火器，而且废车堆栈正在彻底的以修理，一切都富有生气。所有这些表示我国正在复兴，而且越来越强。我们是有朝气蓬勃的合理的！你们瞧，一个死了几次的人能够这样子吗？”说到这里，他脸上浮上快乐的微笑。

当保尔走下讲坛，朝会场里安娜与塔莉亚坐着的那个角落走去的时候，全厅正响起致敬的呼声。他应接不暇地与许多人握手，朋友们也移动位子，给保尔腾出一个座位来。塔莉亚的手放在保尔手外面，用力紧紧地握住它。安娜的眼睛睁得挺大，她的睫毛在颤动，她的注视含着惊讶与欢迎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的过去了。

这实在不能叫它做普通的工作日。每一天都带来了新的什么，而当保尔早上拟定他当天的工作日程时，他时常感到失望，因为时间太短，不够分配，不能不把他决定要做的一部分事情搁置下来。

保尔是跟奥古尼夫住在一起的。他已开始工厂里工作，做一个助理电机装配员。奥古尼夫本来不同意保尔暂时摆脱领导的工作、在保尔还没有说服他之前，他们两个曾做过很久的争论。

“我们现在正缺少人手，你倒说让你在厂里再等一些时。你别拿健康做理由，我自己害了伤寒病之后，有一个月没有手杖就走不了路，但我还是做着区委的工作。保尔，我是晓得你的，我也晓得你不是为着健康的问题。那么，撇开它不提，你真正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奥古尼夫这样固执地问。

“真正的理由是，我想认真的读一点书。”

奥古尼夫胜利地喊道：

“呵，原来如此！你想念书，难道你以为我就不想念书吗？老兄，这完全是你彻底的利己

主义。我们大家都得转轮子，你却躲在旁边做书蠢虫。不，好兄弟，从明天起，请你当组织部指导员吧。”

经过很久的争论之后，奥古尼夫终于让步了。他说：

“我让你歇两个月，这个你得感谢我。只为了你和杰维泰夫合不来，他倒的确是一个很自恃的家伙。”

杰维泰夫对保尔回到厂里，的确应付得非常小心。他认为保尔的回来，正是争领导权的斗争的开始，又因为他怀着病态的野心，他准备加以对抗。但是，只过了几天，他已开始认清这假定是错误的。当保尔听到厂里执行部决定推举他时，他找了杰维泰夫，以他与奥古尼夫事先的约定为理由，劝杰维泰夫把他本人的名字从议事簿上涂去。在厂里的青年团中，保尔是负责政治理论组的，但他从不借此插足理事会。尽管保尔正式放弃领导工作，他在厂里的影响仍有显著的增加。有好几次，他不动声色地，以同志的态度，帮助杰维泰夫渡过了很大的难关。

接着，有一天，当杰维泰夫走进厂里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了一惊，因为全体青年团员和约莫三十几个非党员的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清涤多年积留下来的油垢，和扫除一切的废物和垃圾。保尔本人正用一只饱含油垢的扫帚，使劲地刮着地上的水门汀。

“干什么要这样大扫除呢？”杰维泰夫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讨厌在肮脏里工作。这地方二十年来就没有洗扫过：我们打算在一星期内把它就成一个新工厂。”保尔说。

杰维泰夫耸耸肩膀走出去。那些电气技术人员对这工作还不满意，他们又开始动手清理天井。厂里那露天的大院子，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什么样的废物都倾倒在哪儿。——锈铁、铁轨、防冲器、轴箱堆得像山一样——千万吨的铁在日晒雨淋之下腐蚀。但是这进攻垃圾堆的工作，却为管理处所阻止，理由是——“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天井不会漏水在我们头上的。”

这样，电气技术人员只好在工厂前面，用砖头砌成一个小小的方堍，还用粗铁丝编了一个刮皮靴的垫子，放在上面，大家对这都很满意，至于内部的清除工作，在晚上放工后仍然继续进行。当主任机师史特里兹一星期后走进来的时候，全厂已经焕然一新。那些嵌着铁框的巨大的玻璃窗，因为积在上面的多年的油垢和灰尘已被清除，现在正透进太阳的光线。阳光射到机器房里，使擦拭干净的铜器的表面，发出耀眼的亮光。那沉重的铸造机械工具的机件，已油上鲜明的绿色，有人甚至还在轮辐上漆上黄色的条纹。史特里兹站着点了点头：

“嗯……好……”他说。

在厂房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人正在那里结束油漆的工作。史特里兹走上前去，碰到手里正拿着一听调好的油漆的保尔。因此他拦住他问道：

“等一等，老朋友。你们这样做，我完全赞成，不过你们的油漆是从哪里弄来的？你晓得，我曾经宣布，没有得到我特别的准许，绝对禁止动用油漆，因为我们正缺少这些东西。油漆火车头，比你们现在做的还要重要得多。”

“我们这些油漆是从丢掉的空听子里拾得来的，”保尔这样回答。“我们花了两天功夫，在垃圾堆里找空听子，然后再设法从那里面刮出二十五磅的油漆来。一切都是按照规章的，机师同志。”

“嗯……”史特里兹又这样嗯一声，不过这回倒不点难为情。接着他又说道：“那么，做你的吧。嗯……好……好……不管怎样，我觉得这倒满有趣。……你怎样来说明这种要求工厂洁净的——呵，我认为我应该说是，自发的愿望呢？我猜想你们这些工作全是在放工后做的吧？”

保尔听出这位主任机师的声音里正含着一种真实的愤怒。

“是的，”保尔说。“你以为怎样呢？”

“呵，自然，自然，但是……”

“史特里兹同志，我要补充你的‘但是’……什么人告诉过你，说布尔什维克故意不消除龃龉呢？只要你再等一些时候，我们会把一切都弄好。那时候还有更多的事情让你看到和叫你佩服的。”保尔说完后，就小心地兜着它——这样油漆才不会沾着他——径自朝门口走去。

但是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直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那三位女职员混得很熟，而且还借助各种宣传手段的运用，使他结果终于一如所望，得到随意检阅各种书籍的许可。他可以安着扶梯，爬上那巨大的书架，一本翻过一本的，一直翻它几个钟头，去找寻一些有趣的而又有用的书。图书馆的书多半是老的。书架上只有一小部分是新书。其中有好些是内战时期的书籍和小册子——马克思的《资本论》，《铁踵》和别的。在老书中保尔找到一本叫做《斯巴达斯克》的小说。他花了两上晚上读了它，回头又把它带回来，跟那些高尔基的作品排在一起。他逐渐地把那些最有趣的，与他的思想最接近的书排在一起。图书馆的女职员从未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对这是毫不关心的。

一桩初头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事情，突然冲破了厂里青年团那单调的沉寂——中部修理厂小组执行部委员君士坦丁·费定，一个麻脸矮鼻的懒惰的青年，当他在铁板上钻孔时，毁了一支贵重美国的钻子。毁坏钻子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那可耻的粗心。不，更恶劣的，这几乎可说是他故意毁坏的。

这事情发生在一天早上。厂里工人老班长柯多洛夫，要费定在铁板上钻一些孔。费定开头说他不愿意做这件事，但当柯多洛夫坚持之后，他拿了铁板开始工作。一分钟后，柯多洛夫就注意到费定在钻孔时没有给钻子涂上油，因此他跑到钻机前面，把它关住。

“什么，你是瞎子，还是昨天刚来的？”他这样叱着费定，因为他晓得如果这样用下去，那钻子马上就要坏的。

但费定反骂他，而且开始钻机钻下去。当柯多洛夫跑去告诉厂长的时候，费定一面让钻机继续钻，一面跑去找寻注油器，他以为这样一来，等到谁来调查时，一切都可以弄得妥贴了。但等他找到注油器跑回来，那钻子因为过热早已断了。因此厂长提出报告，要求开除费定，但青年团执行部公然袒护他。他们的理由是柯多洛夫始终竭力压迫青年团员。管理处却坚持开除，因此这件事移到全厂执行部办理。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全厂执行部的五个委员中，有三个袒护费定，同意把他调到别部工作。杰维泰夫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委员则认为费定的行动是该受处分的。

杰维泰夫是一个“解放了的工人。”由行业说来，他是一个铁工，但由于他过去四个月来的才干，他在领导青年工人的工作中很为突出，因而成为区青年团与地方委员会执行部的一个委员。他曾在引擎间作锻铁的工作，别的部门对他很是生疏。从他刚刚开始负责领导工作的时候起，他就把一切的事权紧紧的操在他个人手中。他是一个自恃的决断的人，一开头就操纵一切，抑制别人的自发性，甚至在他本人还不能充分驾驭他的工作时，他已经着手剥夺他的同伴的主动了，就连房间的布置，也是在他个人的监督之下进行的。

现在，他正在主持会议，独自得意地靠着一只由青年团俱乐部搬了来的有垫子的围椅。这会议是禁止旁听的。当党组织部长柯莫托夫正要说话的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门是下闩的。杰维泰夫有点动气，蹙着眉头。外面又敲门了，齐理诺夫起身走去开门。门外是保尔，齐理诺夫就让他进来。

保尔正走到一只没有人坐的凳子上去，杰维泰夫就喊着他说：

“柯察金，这是执行部本身的会议。”

保尔的面孔红了起来，就缓缓地转向着台子，说道：

“我晓得的，我对你们关于费定事件的意见，很感兴趣。我想提出一件与这直接有关的

新的事情。呵，你们是不是反对我出席呢？

“我并不完全反对，不过，你要晓得，只有执行部的委员才能出席机密会议。要是有一大群人参加，那就不能讨论问题。不过现在你既然来了，你就无妨坐下。”

保尔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蔑视，对他的两眉之间的前额上，现出一条深刻的皱纹。柯莫托夫很生气，说道：

“为什么这样注重形式呢？”

但保尔用姿势阻住他。自己在条凳上坐下去。

“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柯莫托夫说，“关于柯多洛夫，不错，像他那样的个人主义者，决不是我们这类的人，不过，同时我们的纪律倒也坏得可以。如果青年团团员都开始毁坏钻子，我们马上就会没有工具。这给非党的青年，做出了一个绝对恶劣的模样。我想应给费定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杰维泰夫没有让他说完，就表示反对。在听了十分钟的讨论之后，保尔已明白执行部所采取的态度。当他们行将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允许他发言。他说：

“同志们，我想对费定事件发表一点意见。”他的声音比他所希望的还要严厉。

“费定的事情只是一个象征；”他说，“实际的情形比费定这件事还要严重。我昨天搜集了几个数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簿。“这些数字是我从考勤簿上得来的。请诸位小心听一下：青年团员有百分之二十二每天要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成为一种定律。有百分之十七的青年团员，每月有一或两天定规完全不来厂工作。但非党的青年，这种懒怠却只占百分之十四。数字是比惩罚还要坏的。我曾顺手把别的数字记下来，成年党员每月逃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而迟到的一向都占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逃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再就损坏工具而论，——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青年团员的工作，比正式党员要坏得多，比非党的青年工人也要坏。

“但是，并非各处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对炼铁部只有歆羡而已，电气部的情形也挺不错，其他各部分也多少来得正常。依我的意见，柯莫托夫同志关于纪律所说的话，只说到应说的一部分而已。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矫正我们表现在数字中的错误。我不想煽动诸位，也不是想为这事开个煽动大会，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应该用最大可能的严格精神来进攻这懒怠的和腐败的倾向。老工人们都公然说，有工头的时候，工作要来得好，当他们被迫替资本家工作的时候，一般说来，还要精确得多。现在他们自己都是工头了，已经没有藉口了。这主要不是费定一人的过错，也不是任何个别工人的过错，这过错我们大家都得负责任，因为我们照理应该与这种罪恶斗争，现在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拿这个或是那个做藉口，来袒护费定那样的人们。

“沙莫林和波蒂尼克刚才说费定是‘最好的一个。’你们还可以说他是一个模范人物：一个活动的青年团团员，参加各项业余的社会活动。至于钻孔机呢——算了吧他毁断了它，这算得什么呢？谁不会毁过东西呢。真是多管闲事。他是最好的一个，而且是我们中的一个——柯多洛夫这家伙却不是自己人。……依我看来，向来似乎就没有人曾经努力，想把柯多洛夫吸收进党来。他时常找寻过错，不错，不过我们别忘记，他做这样的工作已做了三十年！当他找寻过错时，他没有什么政治动机，这在他倒是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党外的人，但他却顾惜国家的财产，而毁坏贵重的工具的，却是自己人中的一个。

“我们要怎样去改善这种颠倒的状态呢？我相信，我们的第一记拳头应该打自己，我提议我们应把费定作懒怠的工人和生产组织的破坏者，把他从青年团开除出去。我提议我们应该把这些写在壁报上，非常公开的，一点也不怕引起谈论的，把这些数字在一篇社论里发表出来。我们的力量是够大的，我们有强大的后盾，因为青年团团员的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有六十个参加过波耶卡的筑路工作，这是一个最可靠的训练学校。在他

们的协助和合作之下，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应当一刀两断的，把我们对目前事件所取的妥协态度抛弃掉。”

保尔一向虽是个沉着和静默的人，这席话却说得尖锐很猛烈；杰维泰夫至此才初次认清了保尔的本色。同样杰维泰夫也很知道，保尔说的话是十分正确的，但一种不断戒备的感情却阻碍了他。他把保尔的干涉看作是他对整个组织状态的严厉的批评，——因而也就损害了他本人的威信，所以他决定反攻保尔。在反驳时，他首先直接斥责保尔袒护着柯多洛夫的孟什维克主义。

激烈的争论一直继续了三个钟头。当最后大家的意见一致倾向保尔方面，杰维泰夫终于给不可推翻的事实逻辑所击败，而失去了大多数的赞同的时候，杰维泰夫就采取一种荒谬的手段——他违反民主的方法坚持保尔应在最后表决之前离开房间。

“很好，我就走，不过杰维泰夫同志，这对你倒不是怎样有利的东西，我应当警告你，如果你不顾一切，坚持按照你的办法做去，明天我就把这件事向全体大会提出，我相信那时候你决不会得到多数的赞成。杰维泰夫，你显然是错的。照我的意思，柯莫托夫同志，你应当在党全体会议上，甚至在下届全体大会的例会上，把这件事提出来。”

杰维泰夫气势汹汹地说道：

“什么，你想吓我吗？用不着你多说，我自会向全体会议提出的，而且我们还要当众宣布你的一些事情。要是你自己不想工作，你是妨碍别人。”

保尔把门带上，用手擦擦热得发烧的前额，一面穿过空洞的办事处，走到门口。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接着他点了一支香烟，朝巴蒂耶夫山托卡列夫所住那间小屋子走去。

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饭。他叫保尔坐下一道吃，喊道：

“达丽亚，给小弟弟盛一碗汤来。现在，你把一切的消息告诉我们吧，我们都在等着听呢。”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则和他的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玉米汤放在保尔面前，然后就掀起她的白围裙擦擦湿嘴唇，用亲切的声音说：

“亲爱的，你就跟在家一样的吃吧。”

从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做事情的时候，保尔时常到他家里来，坐到很晚才走。但这一趟的拜访，倒还是他回城里来以后的第一次。

老旋盘工专心地听着保尔所讲的一切。他自己不说话，只是十分恳切地一边听，一边缓缓移动着他的汤匙，不时发出咯咯的喉音。过了一会，他抹干了胡子，清了清喉咙后，问保尔道：

“自然，你是对的。现在正是我们清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铁路工厂是本区里的主要事业，清算工作，应当由它开始。你就是这样和杰维泰夫起冲突吗？这真糟糕。他是一个自大的青年。你跟别的一些孩子们搅得好一些吗？现在，你究竟在铁路工厂里做些什么事呢？”

“我是在工联里面的。我做什么吗——呵，我是随处进行煽动工作的。在党组织里面，我负责一个政治学习组。”

“在执行部里面呢？”

保尔对这问话不能作个简单的答覆，他说：

“现在，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原——而且需要读一点书——我还没有正式参加领导的工作。”

“呵，老朋友，毛病正好出在这地方！”托卡列喊着说，“幸好你的身体真的还没有十分复原，要不然的话，你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现在你究竟怎么样，好了一点吗？”

“好了一点。”保尔说。

“那么，你应当开始常态的工作。花样是玩不得的。照你那样子，怎么也做不好事情。”

谁也不会和我的意见两样——你是在躲避责任，这是你瞒不住的。明天你要把这事情办好，至于奥古尼夫呢，我要和他谈一谈。”托卡列夫真的感到烦恼了。

“别对奥古尼夫说，是我自己叫他不要把我放到执行部里去的。”保尔这样说。

托卡列夫轻蔑地嘘了一下，说道：

“你叫他，他也赞成，是不是？唉，我真不晓得要怎样对付你们这些青年团员。……来，来，孩子们我们照老规矩……你读几段新闻给我听听吧，我这双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执行部通过了青年团执行部多数同意的意见。因此党和青年团现在已担负起一桩重要而困难的工作——拿他们自己的工作作为劳动风纪的模范。杰维泰夫受到执行部一番大大的斥责，开头他还是挺着脖子不服输，但党书记拉巴京弄得他无话可说，后来他终于半承认他的错误。

隔天，铁路工厂各厂的壁报，登着一些吸引工人注意的文章。他们大声念着，而且做了热烈的讨论，当天晚上，在青年团那有点异样的热闹的会议上，这些文章成为大家谈论的唯一的话题。

费定被开除了，一个新的同志被派到执行部来，担任政治指导员一职。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大会静默地而且分外耐性地倾听着尼达诺夫的演说，他谈到铁路工厂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及他们新的任务。会议结束之后，保尔在外面等候杰维泰夫。

“让我们一道走走吧，我们有一两桩事情应当谈一谈。”保尔对杰维泰夫这样说。

“什么事情呢？”杰维泰夫问他，口气很冷淡。

保尔把他的手臂勾住杰维泰夫的，两人走了几步，走到一只凳子跟前。保尔坐下来，说道：

“让我们在这里坐一分钟吧。”

杰维泰夫的卷烟，在迅速的抽吸之下，一亮一灭。

“我问你，杰维泰夫，”保尔说：“你为什么老反对我呢？”

几分钟的沉默。接着杰维泰夫佯装惊诧的，用一种不确定的声音说道：“呵，你要和我应谈的就是这事情。我想那是为了工作。”

保尔的一只手沉重地放在对方的膝头上。

“我说，同志，你别装模做样。只有外交家方才那样摆架子。现在请你给我一个率直的回答——我有什么事情叫你讨厌？”

杰维泰夫掩不住他的局促不安。

“干什么这样固执呢？你说我反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拒绝参加执行部，现在你倒要我说明我为什么老拒绝你。”

保尔的声音并没有失去诚恳的调子，他的手还是按住杰维泰夫的膝头，十分冲动地说道：

“呵，要是你不说，我倒要说。你认为我一向堵住你的路，你认为我在抢书记做，是不是？要是你心里不这样想的话，那么对费定的事情就不会有不同意见——难道是我错了？现在，这种关系已把我们的工作整个毁了。如果它只毁了你我两个，那就用不着重视它，我对你心里所想的，一点也不介意，明天我们还是照常在一起工作的。我请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俩并没有决裂的理由。我们俩都是劳动阶级的儿子。如果你真的关心我们的事业，把你的手伸给我，明天开始，我们做个好朋友。要不然，要是你仍然固执着你一向所想的那些无聊的想头，一味的想吵闹下去，那么，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它在我们的工作中所促成的每一桩破坏，都要引起你我正面的斗争。现在，我的手就在这儿——这还是你的朋友的手，要是你这时候握住它的话。”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觉到，杰维泰夫那只长着硬茧的手，正和他的紧紧地握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在区委办事处刚结束了工作，屋里渐渐静下来，只有托卡列夫还在办公。他正坐在一个靠椅上，看着新的文件。门外有人在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这样喊。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表格摊在他的前面。

“这是什么？”

“老伯伯，这是不负责的终止，也是时间的告一段落。我想，要是你同意，我要求你的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一眼那表格的标题，又望一望站在他前面那青年人，然后一声不响地拿起笔来。在那写着“推荐柯察金·保尔·安特列维齐同志为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候补党员之审定人党名及身份”项内，填上粗划的“一九〇三号”和他的简单的签名。

“写好了，孩子。我只想对你说：我晓得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老头儿丢脸的。”

房间里是闷气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的离开那儿，到索罗明克的栗色胡同去。

汗从杰维泰失的脸上成串的流下来，他说：

“保尔，好心一点，结束吧，我累死了。”

嘉芝和别的人们也附和他，因此保尔把书合上，当天的读书会就这样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那架老式的“厄里克生电话机”立刻烦躁地急响起来，杰维泰夫跑去接听，竭力想在嘈杂的人声中听清对方的话。接着他放下听筒，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有两辆车子——波兰领事馆乘坐的客车。他们的电灯灭了，可是列车一点钟后立刻就要开，保尔，你带工具箱去修理修理吧。这是紧要的公事。”

那两辆晃亮的国际客车，停在第一号的月台上。一只有着大窗的卧车灯火辉煌，另一只却一团黑暗。保尔走到那华丽的卧车前面，正握住把手准备走上去，突然，有一个人突然由后面墙壁那儿跳上来，挣住他的肩膀。

“公民，你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个熟识的声音，保尔转过身去，只有到这时候，阿久兴方才认出保尔，他的手从他的肩膀上溜下来，他的声音也没有方才那样严厉，虽然他的眼睛还是疑惑地注视着他的工具箱。

“老朋友，你要上哪儿去的？”

保尔做了一番简单的说明。另一个人在他后面的车厢里走出来。他对保尔说：

“我马上就把管车人叫来。”

保尔跟着管车人走进车厢里，许多穿着时髦的旅行衣的人正坐在那儿。一个穿着玫瑰花瓣样的时装的妇人，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门，正和一个站在她前面的高身的官员在谈话。保尔一走进去，他们的谈话就马上停止。

保尔迅速地检查了开关上的接线，没有找到毛病，但仍然继续检查下去。那肥胖的管车人紧紧地跟着他，他身上的巨大的铜钮扣，刻着一只一个头的鹰鸟。

“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毛病，电池也没有坏，让我们到那只客车里去，毛病一定出在那儿。”保尔这样说。

那管车人开了门上的锁，两个人就踏进阴暗的走廊上。保尔用着手电筒找到出毛病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颗灯泡亮了，一阵灰暗的淡光泻在走廊上。

保尔转身对那个一直监视着他的人说：

“你还得把这一间开一开，让我好换灯泡；他们都已给烧坏了。”

“那么，我得找太太去，钥匙在她那里。”管车人不答应保尔独自留在那儿，临走带他一走儿走。

那女人走到那一间去，保尔跟在她后面。管车人站在门口，把门完全堵住。那贵妇人坐

在椅子的一角上，撩了撩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注视着保尔的工作。那管车人做出卑贱的样子，觉得他很难叫他的粗脖子好好地弯下去，说道：

“太太，您答应我出去一会吗？上校要喝杯酒哩。”

“随便，你走吧。”那女人用娇滴滴的声音缓缓回答。

灯光没有照到那女人的脸，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头和臂膀，恍惚都是象牙做成的。保尔敏捷地用着旋螺钉的凿子，换好了灯泡，车间里立刻明亮起来。接着他又须修理另一只恰好在那女人坐着的位子上面的电灯，因此他站在她面前，对她说：

“我还得修理这一只。”

“呵，自然，让我走开。”她说着非常流利的俄国话，轻盈地站起身来，但还是紧紧地站在他的旁边。

现在，保尔可以看见一切了。那熟识的弓样的眉毛，那傲慢的双唇，一点也没有错，她是妮莉·李士真斯基。这律师的女儿，不自觉地注视到保尔的惊愕的瞥视。但保尔虽然认得她，她却并没有注意到修理匠——这四年来变得这么快的修理匠，正是她那多事的邻居。她轻蔑地耸一耸眉毛，作为对他的惊讶的表情的回答，并且走到门边，但仍然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皮拖鞋的后跟敲着地板。保尔开始动手修理第二盏灯。当他卸下灯泡的时候，他不顾妮莉·李士真斯基，甚至还出乎他本意料之外，意用波兰话问道：

“维多也在这儿吗？”

他问的时候没有转过身来，所以他不能看见她的脸，但那长久的静默说明了她的惊讶。接着，她问道：

“呵，你认得我的兄弟吗？”

“我可以说我 very 知道他。毕竟我们曾经是邻居啊，”保尔说，转过身朝对她。

她吃了一惊。

“什么，你是保尔耶……”

“是的，”保尔说。“那娘姨的孩子。”

“你长得多快呵，我只记得你是一个小无赖。”她现出公然的侮蔑的神情，从头到脚的看他一遍，接着她又说：“你问维多干什么呢？就我所知，你和他不会在一起过。”她用她那歌唱的高音这样说。

旋螺钉的凿子不断地在转。保尔说：

“有一小笔债还没有还清；你看见维多的时候，请对他说，我还是希望还这一笔债。”

她晓得这‘债’是什么意思。那彼得留拉兵士的事件，她完全知道，但是一种拿他寻开心的念头，驱使她这样说：

“告诉我，我们的屋子是否真的已给抢个精光，而且全给毁了？无论如何，我相信那凉亭和所有的花园，一定是毁了。”

保尔气得一声不响，过了一会，他方才回答道：

“那屋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我们怎么会毁坏它呢？”

“呵嚯！想不到他们也使得你神气起来了，”她讥讽地冷笑着说。“不过你别忘记，这是波兰代表团的一辆客车，而我正是这车间的主妇，你呢，还是跟向来一样，是个用人。你到这里来给我修理电灯，好让我舒服地坐在这客厅里看看书报。你的母亲一向替我们洗衣裳，你也时常代我们挑水。现在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你的情形也还是如此。”

她怀着扬扬得意的恶意这样说。保尔继续修理着电线的那一头，过了一会，他现在赤裸裸的轻蔑的神情，俯视那波兰妇人，说道：

“公民，我是怎样也不会替你敲一颗锈钉子的，但是资产阶级既然发明了所谓外交，我们也仍然保持着我们的目的，我们不会砍下别人的头，也不会跟你一样，说出那些齷齪难

听的话。”

她的面颊顿时赤红起来。她说：

“要是你们能够夺取华沙，你要拿我怎么样呢？拿我切成肉片呢，还是拿我当娘姨？”

她站在门口，身子俯向前面，她那敏感的鼻孔——闻惯古柯麻醉剂的——正在颤动。接着客厅里的电灯统统亮了。保尔挺直身子，说道：

“你这样的人能派什么用场？用不着我们的军力，你自己会死的，古柯剂就会弄死你。我甚至还不高兴拿你这样的妇人当娼妓呢！”

他双手拿了工具箱，只两步就走到门口。她躲到一旁让他走过。当他走到走廊的尽头时，他听见她低低地用波兰话骂道：

“Przekletyj bolszewiki!”（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保尔在到图书馆去的路上，遇到了嘉芝·琦丽诺夫。她紧紧地拉住保尔那俄罗斯紧身衣的袖口，开玩笑地堵住他说：

“你这么匆匆忙忙的到哪儿去？呵，是研究政治去吗？”

“到图书馆去，亲爱的，”他说，“让我走吧。”

他照着她的办法，轻轻地挣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到步道的一边去，嘉芝拿下他的双手，一面跟他一道走，一面说道：

“保尔，听呀，你是不能成天读书的。……别的你知道吗？今天晚上，让我们两个参加琦娜·格兰第家的晚会去吧。女朋友们一向老是要我带你去参加。你呢，除开政治之外，别的都不知道。你难道永远不需要一点娱乐，调剂调剂一下？岂不是，保尔，要是你今天晚上停止阅读，你的头脑就要清爽得多。”她想尽心事的竭力去说服他。

“这是什么样的晚会呢？在那里干些什么呢？”

“在那里干些什么呢？”嘉芝开玩笑地仿着他说。“得，我们不做祷告，只是玩儿，如此而已。你是会玩巴扬琴的，是不是？可惜我从来就没有听见你弹过。那么就请你弹一下，让我听一听。琦娜的叔叔有一只巴扬琴，可惜他弹得太不像样。我们那些女朋友都很喜欢你，你却成天把功夫花在书本上。我问你，什么地方规定着，青年团员是不应该有一点娱乐的？跟我去吧。求你答应，别叫我把唾沫都说干了；如果这回你不答应我，我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大眼睛的漆工嘉芝，是一个好同志，而且又是一个好的青年团员，保尔不愿意使她太伤心：因此，虽然觉得不习惯和有点别扭，最终还是同意了。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挤满了人，十分热闹。大人们为了不妨碍年轻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在这个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凉台上大约聚集了十五个姑娘和小伙子。当卡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走到凉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玩一种叫“喂鸽子”的游戏了。在凉台的正中间放了两把椅子，背告着背。由主持这个游戏的女孩点两个人的名字，被点名的小伙子和姑娘就在椅子上坐下。主持喊“喂鸽子吧！”背靠背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就转过头去，尽量让嘴唇碰到一起，当众相互亲吻。后来又玩“丢戒指”和“邮差送信”，而每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玩“邮差送信”的时候，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不是在灯光明亮的凉台上，而移到暂是熄了灯的房间了，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感到不满足的人，还可以玩另一种游戏：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上，放上一套纸牌。纸牌名叫“花弄情”。保尔旁边坐着的是一个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名叫穆拉，一对蓝眼睛从开始脉脉传情地望着保尔，递给他一张牌，轻声地说：

“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曾见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当时没有直接参加，但从没有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当他和小城市里市民的生活永远脱离之后，这样的晚会在在他看来就有点荒唐可笑了。

此时此刻，一张“花弄情”的纸牌已经放在他手里了。

在“紫罗兰”牌的背面，他看到上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并不感到害羞，也直视着他的眼睛。

保尔问道：“为什么？”

这问话是有点不对题的，但莫拉早已准备好她的笑语，所以随口答道：

“玫瑰。”她递给他第二张牌。

在玫瑰的反面，他看到：“你是我的意中人。”他把它还给那女孩，而且尽力使他的口气格外温和的问道：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时间花在这无聊的玩意上面？”

莫拉很不高兴，茫然地不晓得要怎样回答他。她很扫兴地撅着嘴唇，对他说道：

“你喜欢我告诉你吗？”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他骤然想要确切知道他的对手究竟是谁，因此他接续地提出了一串 的问话，莫拉也很高兴的回答他。几分钟后，他晓得她正要进中学，她的父亲是一个车辆检 查员。他还知道她早已认得他，而且很久就想和他见面。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问。

“莫拉·瓦林杰夫。”

“你的哥哥是铁路工厂党组织的书记吗？”

“是的。”

现在保尔已晓得和他谈话的人是谁了。瓦林杰夫是区里最活跃的青年团员的一个，但他显然 没有充分注意到他的妹妹，所以她渐渐地变成一个无聊的小布尔乔亚的小姐。去年她开始参 加她的朋友们的集会。她在她哥哥处遇见保尔许多次。现在她感觉到这位保尔并不赞成她的 行为，当别人叫她“喂鸽子”的时候，她一看见保尔脸上那讥讽的微笑就坚决地拒绝他们。

他们两个又坐了一会，莫拉把她的事情全告诉他，接着嘉芝跑到保尔跟前，说道：

“要是我们把巴扬带着来，你高兴弹它吗？”话刚说完，她便很顽皮的睁着她那对大眼睛， 问道：“啊，你们两个已经互相认得了吗？”

保尔叫嘉芝在他旁边坐下，利用着周围的笑声和谈话声，他对她说：

“我不会弹它的。莫拉和我就要走了。”

“呵嚯！讨厌了吗？是不是？”嘉芝故意拉长着声音说。

“是的，”保尔回答。“我真忍不住，告诉我，这里面除开你我之外，还有别的青年团员 吗？还是只有你我俩看到这嗜好鸽子的勾当？”

“他们已结束这无聊的玩意了，”嘉芝使他安心的说。“我们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起身来。

“好，好女孩，跳你的舞吧，可是我和瓦林杰夫无论如何还是要走的。”

一天晚上，奥古尼夫在保尔床前来回的踱了许多时候，显然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大为激动。 后来，他终于在保尔的床头坐下来，一只手盖住保尔正在阅读的那本书。

“我说，保尔，我有一桩事情应当告诉你。一方面，那完全是无理的，但另一方面，倒 又完 全相反，塔莉亚和我曾有过约会，你晓得，我是曾经时常想到她的。……”他呆呆地 尽搔着 他的头皮，过一会，看到他的朋友没有笑他，他又鼓起勇气来。”后来，塔莉亚…… 这么说 吧……换句话说……得，我不愿意拿这事麻烦你，我想，那是很明白的。昨天我们 决心试一 试运气，看看我们是否配得起来。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们两个都已到了有资格 加以决定的 年龄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塔莉亚建立起我的生活。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 意见。”

保尔想了一会。接着他说：

“涅克，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同样的出身。别的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的确是一个好女孩子。……我想事情是非常明白了。”

隔天，保尔把他的东西搬到厂里的男工宿舍去；几天之后，安娜·波哈特举行了一个亲切的不备食物的晚会。他们一个为庆贺塔莉亚与奥古尼夫的同志的结合的共产主义者的晚会。在这晚会里，人们追述往事，朗诵他们读过的最动人的作品，又有着许多很优美的合唱。军歌在夜晚的空气中传到远方，后来嘉芝和莫拉把巴扬带来了，那深沉的低音的弦线以及合奏的银丝的调子，响遍了整个的房间。那天晚上，保尔弹得十分出色，而当瘦长的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开始跳舞的时候，保尔更忘却自己，琴声获得了新的力量，奏出了火样的调子。这乐器叙说了过去，叙说了骚动的年头以及亲爱的今日，叙说了他们亲身经历的喜悦与斗争。当手风琴交给瓦林杰夫之后，瓦林杰夫就拉着轻快的舞蹈的调子。这时候开始作旋风一样的舞蹈的人，正是保尔。在疯狂的南方的舞蹈中，保尔做了第三次的，也是一生最后一次跳舞。

十三

国境线上对竖着两根界标，沉默而且敌对，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树得很牢，柱面刨得很光，而且像警察岗亭一样的油着黑色的与白色的线条；在它的顶上，是一只独头的紧紧地抓住系杆的猛禽。它的双翼伸展，似乎正要用它的利爪去抓住那油着线条的界标；同时，它又伸着它那只要动的钩嘴——这种独头的嗜食腐肉的恶鸟——凶猛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另一根界标树在六步开外，这一根是巨大的圆形的橡木柱，深深地插进地里面，在它的顶上，是一面有着槌子与镰刀的铁牌，这两根界标虽然都树在平原上，但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却有着一条鸿沟。除非你要冒性命的危险，否则要走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国境。从黑海边，经数千公里直至远北，直到北冰洋，那些在铁牌上标着伟大的劳动的标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沉默的哨兵，像不动的链一样的绵延着。

小镇贝兹多夫位在森林的深处。它离国境是十公里，对面是波兰的小镇柯里克。“国境保卫团”N战队的防区，就在斯拉瓦特镇到安那保里镇之间。

国境界标的长链走过雪盖的平原，穿进森林的旷地，跃入幽深的峡谷，接着又爬上来，像界石一样的站立在凸起的高原上，然后他们又走到河边，从那高高的河岸上，凝望异国那雪盖的原野。

一个身材高大，戴着雄伟的军帽的人，离开那带着槌子与镰刀的界标，沉重地缓缓地依着他的节拍大步的走。天气非常冷，雪在他的毡靴下面吱吱作响。他身上穿着绿领绿袖的灰色陆军大衣，足蹬长统毡靴。在大衣的外面，又披着一件高领子的阔大的羊皮外套。他的头发暖温温的缚着一顶布帽子。手上戴着五指不分的皮手套。那羊皮外套一直遮到脚跟，即使外面刮着大风雪，里面还是温暖的。在外套的外面，是步枪的子弹带。当他抽着那马虎卷成的卷烟，在哨线上来回走着的时候，他那像硬的圆筒一样围着全身的外套，就不断的括着地面的积雪。在广大的平原上，站在这苏维埃国境上的哨兵，相互的距离是一公里，这样他们互相间都可以望见。

在那一边，沿着他自己的哨线，斜对着红军卫兵走下来的，是波兰的哨兵。他穿着粗制的军靴，绿灰色的制服和制裤，上面是一件有着两排发亮的钮扣的黑外套。他的帽子上嵌着一只白鹰，在他的肩章上又是白鹰，在他的硬领的两片反领上，也是白鹰。但那些鹰鸟并不曾使他不冷些，外面凛冽的寒气一直刺着他的骨头。他走的时候，一边敲着足后跟，一边摸着麻木的耳朵。他那只戴着薄手套的手，已经冻得僵硬。波兰哨兵在当值的时候，一分钟也不能站定，如果他一停步，寒气马上就捉牢他的骨节，所以只好无时无刻不断的走动。现在那两个哨兵相互并列了，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一边的国境线上，与苏维埃哨兵平行的走。

国境上是禁止谈话的，但当你四周是一片荒原，别的人又远在一公里外的時候，谁知道

那两个人究竟是默默而行，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那波兰人很想抽烟但他把自来火掉在后面的军营里，忘了带来。风正从苏维埃那面顺着吹，而最最恼人的，是它又带来了苏维埃哨兵的卷烟的香味。那波兰人不再摸着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有一个军曹或是长官骑着马前来巡视，而且他说说不定会突然地从洼地里走上来。但是四面一个人也没有。雪在阳光底下眩眼地闪亮，天空没有半片雪花在飞舞。

最先破坏公法的神圣的，是那个波兰人。他把枪尖上插着一柄像短剑一样的刺刀的法国速射步枪，挂到肩膀上去，然后从他的外套的口袋里，费力地摸出——他的手指头已经冻得那样僵硬呵——一包蹩脚的香烟来，用波兰语说道：

“同志，对不起，请把自来火丢过来。”

那苏维埃哨兵听到了他说的这句话，可是国境勤务的军令，禁止士兵与边境的任何人员交谈，而且他也不大明白他所说的话。因此他继续他的巡逻，他穿着的那双温暖而柔软的毡靴，正有力的踩着已被压碎的积雪。

接着，那波兰人又说话了，这回是用俄语说：

“布尔什维克同志，丢给我一盒自来火，点一支香烟。”

那苏维埃哨兵在边界上紧紧地注视着他的邻人。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寒气已经钻进那波兰人的骨髓里了。虽然他是一个该咒骂的布尔乔亚士兵，毕竟他过的是凄惨的生活。在冷天里，派出这样的穿着可怜的薄薄的布外套的一个人，叫他像做戏的狗熊一样的团团转，而且还没有可以点香烟的火柴——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他懒得回头看看有没有人会见到他，他把一盒自来火丢了去。

那波兰人拾了洋火，划了一根又一根，直到最后方才把香烟点着，因为他的手指都已给冻麻了。那自来火用同样的方法从那边丢了过来。接着苏维埃哨兵忘记了自己，打破了那法规，对他说道：

“留着吧，我有的是。”

但是，从波兰那方面，传来了如下的回话：

“不，谢谢您，为了藏着这一小盒自来火，我就得坐上两年牢。”

那苏维埃哨兵看了看那盒子。上面印着一架飞机，代替飞机的推进机的，是一只有力的拳头。他又看见，那香烟是“哀的美顿书”牌的。“是的，”他对自己说。“他说的对。这是他们吃不消的。”

波兰哨兵继续与苏维埃哨兵并行巡逻——在这荒凉的平原上，他感到非常孤独。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儿的脚步十分轻匀。那深色的两岁马，已在它鼻孔周围的马毛上，蒙上了一层白霜，一阵阵的白色水汽，正从它鼻子里冒出来，溶化在空气里。

大队长骑着那匹斑纹的马，一面神气地走着，一面玩着它的辔头，它那纤细的脖子是整洁的。两个骑者都穿着灰色的外套，腰上束着皮带，每只袖口都有三块红色的方块，不过大队长加维里洛夫的衣袖有着绿色的反边，另一个却是红色的。加维里洛夫是负责指挥防区长达七十公里以上的大队的指挥官，他的同伴则是由贝兹多夫来的客人——边防军某大队的政治委员柯察金。

夜里曾下过大雪，积雪宁静而且柔软，没有兽蹄和人的足印。那两个骑者从狭长的树林里走到空旷的平野上来。约在侧面四十步开外，有着另一对界标。这时候，加维里洛夫突然把马勒住。保尔拉转马身，想找出他骤然勒马原因。他看见加维里洛夫在马鞍上，侧着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列古怪的迹犯，好像有人用有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的脚迹，它在走的时候，故意叫后脚踏在前脚脚印上，而且还兜了许多古怪的圈子，使人无从追寻它。要说出这些脚印从什么地方来是困难的。但大队长勒马察看的并不是这些。在这些脚印的两步之外，另有着一些已被雪盖上了的脚印。这是一个

人的足迹，那个人不想搅乱他自己的脚印，他一直朝树林里走去，他的足迹清楚地说明了他是从波兰那方面来的。大队长骑马前行，循着那个人的脚印，走到哨兵线上。在波兰方面，那足迹在十几步开外就不见了。

“夜里有人越过边界来了，”大队长这样嘟哝道。“这回又是穿过第三分队的防区。在早晨的报告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真是该死！”

加维里洛夫的小胡子有些是灰白的，现在，由他自己的呼吸凝成的白霜，把它弄得像银的一样；它们正冷硬硬地吊在他的嘴唇上面。

有两个人正朝着骑者走过来。一个是小身材的黝黑的人，他枪上那支法兰西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另一个是高大的，身上披着羊皮的外套。斑马感到它的骑者的两个膝头，正往它的腹上一夹，因此它疾驰向前，立刻他们就走到那两个人的面前。苏维埃哨兵扯一扯他的来福枪的皮带，一面把香烟屁股吐在雪地上。

“同志，你好吗？你这地段有什么消息没有？”大队长伸手给那哨兵——他是这样高，大队长的腰简直不用弯下去。那高个子迅速挣下他手上的手套，和大队长握了手。

那波兰兵从不远的地方看见他们。两个红军军官——他晓得他们臂上那三块方块，正说明他们都是少校级的——向一个普通的兵士问好，好像他们都是朋友一样！立刻，他恍惚看见他自己正和他的查克鲁斯克少校握手，但这想头是如此荒唐，以致他竟不安地向四周望了一望。

“我刚刚接班，大队长同志。”苏维埃哨兵这样报告说。

“你看见那儿的足印吗？”

“还没有看见。”

“夜里，由早上两点到六点，这里是谁值班的？”

“苏洛丁科，大队长同志。”

“好，你得留神，眼睛要睁大一点。”

他临走还严肃地警告那个哨兵说：

“你尽可能不要跟那些波兰兵并排来往的走！”

当马儿正缓缓地沿着由边界是到贝兹多夫的大路走去的时候，大队长对保尔说：

“这边界的事务，时时都得用你的眼睛。这是没有停断的工作。白天要偷越边界不怎样容易，但到了晚上，你就得竖起你的耳朵，不管你怎样抖擞精神，你还不免有错过的地方。请你自己想一想，柯察金同志，我负责的这一段边境，恰巧在四个乡村的中间，这就使工作格外困难，无论怎样配置哨兵线，遇到有了婚礼或是碰到什么节日，亲戚们就越过任何警戒线，集合在一起。这也是可想而知的情况，因为边界两旁的农家，相离只有几步路。同样，我们也不能阻止一切的走私，比方一个老太婆，偷带了两瓶波兰出产的九十度的朱勃罗夫卡醇酒，这是小事情，可是还有许多出大薪水雇用职员的大规模走私者。你知道那些波兰人在干什么吗？他们已开始在各个边界的乡村里，开设一些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你在那里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自然，这个决不是为那些一贫如洗的农民们开办的。”

保尔满有兴味地听着大队长所说的话。看守边界的生活就像不间断的侦探工作一样。他问道：

“告诉我，加维里洛夫同志，这事情只限于运输走私品吗？”

大队长厌烦地回答道：“就是这么回事儿。……”

贝兹多夫是一个极小的镇，是那些死气沉沉的村镇中的一个，从前是属于准许犹太人居住的地带的。镇上有三百家人家挤在一起，还有一个空旷的市场，约莫有二十来家可怜的小店子。市场上是很肮脏的，到处堆着马粪。在小镇的周围，挤聚着许多农民的住宅。犹太人住区里，在到屠宰场去的路上，有一个老犹太会堂，是一座忧郁而惨淡的建筑物。

有一天，拉毕看见，在通至牧师屋子的门口那儿，贴着一张新的标贴：“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贝兹多夫区委员会。”有一点是明白的——这标贴决不是好的东西。他继续走他的路，陷在深思中，直到他走到他的会堂的门口，他方才看见会堂门上，贴着一张小的布告，上面写着：“今晚在俱乐部里召开工人阶级青年的群众大会。热行委员会主席李西真同志和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出席演说。闭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举行演奏。”拉毕愤愤地把那张布告撕下来。对他自己说：“这样看来，它已经开始了。”

贝兹多夫镇那矮矮的小教堂的周围，绕着一座大的花园，在花园的中央是牧师的住宅。这间过去牧师和他的妻子曾经住在那儿，过着沉滞而厌倦的，互相嫌恶的生活的住宅，所有各间房间，都已跟它前时的主人的生活一样，腐烂而且颓败。现在，那被尊敬的主人前时只有在盛大节日，才用以接待客人的大客厅，已经改为贝兹多夫党委员会的办会处，天天挤满着许多的人。在大厅右面的一间小房间，门上有着粉笔书写的字样：“区青年团。”保尔每天就在那里花去他一部分的时间，因为他是新组成的区青年团的书记，又是准备编练为红军的国防军第二大队的政治委员。

从安娜·波哈特家里那亲切的晚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八个月了，但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保尔把一叠公文推到一边，靠着椅子沉思起来。屋子里静悄悄地——夜已深了，办公处里再无别人。区党委员会书记特洛费莫夫刚刚走开，他是最后走的，现在只留下保尔一个。窗户上已披着寒气凝成的奇特的霜花。桌上摆着一盏油灯。火炉是热的。沉思中的保尔回想起了新近的事情。

八月里，火车工厂里的青年团，派他担任组织青年的工作，随着修理车开到厄卡特林诺拉斯夫，一直到秋深时候，他始终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由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修理干涉军引起的各项破坏——烧掉的和破碎的车辆。

他们的路线引着他们由辛尼尔涅可夫到了波洛格，在那儿，在这曾为马赫诺匪邦的王国的地方，到处是毁坏与劫掠的遗迹。在哥里埃·波里埃，他们曾花了一星期的功夫去修理抽水厂的石造建筑物，和镇补炸药炸得一塌糊涂的水槽。保尔本人是一个电器装配工，旋盘匠的工作在他是外行的，但无数次的辛苦劳作，已使他善于使用螺旋钳了。接着，到了晚秋，列车又开回车厂，整个工厂欢迎这一百五十个同事的回来。

到了初冬，木筏开始顺着河水流下，但河水因秋霖而泛滥，它冲散了木筏，许多宝贵的木材散失了。索罗明克又派出工作团去挥救木材。保尔为了不愿落后，竭力掩饰他的怕冷。一星期后，当河岸上山积的木材越来越高的时候，冰冷的河水与凛冽的秋寒，唤醒了睡在他血液里的敌人，热病使他卧倒了。有两星期之久，他不断为风湿痛所蹂躏，等到他从医院回到工厂来，他只能坐在他的钳砧上勉强工作。管事的主任着了忧郁地摇摇头。过了几天，毫无偏见的委员团宣布保尔不适工作，解雇他，并给他一些俸金。他愤愤地把俸金拒绝了。

保尔非常伤心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他走路的时候必须拄着手杖，每动一动就痛得厉害。以前，他的母亲曾几次写信叫他去看她。现在他想起那老妇人，和当他们临别的时候她所说的话来：“我只有在你受伤和害病的时候，才看见你。”

他走到省党委员会，领了两张卷在一起的证明书——一张是青年团的，一张是党的——为着避免触景伤情，他只和一两个朋友告别，就动身回家看他的母亲。有半个月，她不断用热气和按摩治他那双肿胀的脚腿，一个月后，他没有手仗也能走路了。于是喜悦又再度浮上心头，黄昏变成了黎明。有一天，列车把它载到省党部的中央办事处，三天之后，组织部就交给他一张委任状，派他做负责监督地方训练部队与进行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一星期后，他已到了雪掩的小镇贝兹多夫，做了第二大队的政治委员。青年团地方委员会，

又叫他负责在这 新城区里把散在各地的青年团支部联系起来，创立一个组织。这样，他的生活又遇到一些崭新的事情了。

外面是热的。樱桃树的一支枝杆，从执行委员会主席办公处的窗口，伸了进来，办公处对面的罗马天主教堂的尖塔上，那金黄的十字架，在阳光下，就像一朵火。外面那一片花园上，有一小群跟周围的青草一样碧绿的，毛茸茸的鹅雏，正在窗子底下找寻食物；这些是办公处 看守人的妻子饲养的。

纵火和来福枪的枪声，已经成为过去了。尼古拉·李希真被派到国境区来。生活静静地流着。傍晚时候，他正在研读着长篇的报告，但他刚刚接到的电报，又使他的往事的记忆复活了。那简略的电文这样说：

“绝对机密，贝兹多夫执委主席李希真。国境发现波兰派来大批匪团，可能扰乱国境区。应 采自卫手段。移走价值钱物至边界中心区，勿滞留税收款项。”

从他的窗户望过去，李希真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办公处来的人，他看见了保尔·柯察金。一分钟后，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握了保尔的手；两个人靠在一起，谈了一个钟头。当保尔离开的时候，已经过午了。李希真的小妹妹尼奥拉——保尔一向叫她安妮奥卡——正从花园上走过来。她是一个怕羞的小女孩，那样的庄重跟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平常她看见了保尔，总是微微一笑，这一回，她在羞怯怯地问候了保尔之后，就把前额的发往后一拢，问道：

“尼克一个人在那儿呢？玛丽亚·密海洛夫娜等他吃饭等了好久了。”

“安妮奥卡，你喊他去吧，里面没有别的人，”保尔说。

隔天，远在天亮之前，三部由壮马拉着的车子开到办事处来。随车的人用极低的声音谈话。许多密封的袋子由财务部搬出来，放在车子上，几分钟后，已可以听到车轮隆隆地驶去的声音。一队由保尔率领的武装卫队，在车子的周围保护。他们安全地到了四十公里外——其中有二十五公里是穿过森林的——的边界中心区，把公文和钱币储放在当地财务部的保险箱里。

但是，几天之后，一个骑者由国境猛驰而来，他和他那匹溅着白沫的马，都叫贝兹多夫的闲荡者张大着嘴巴。在执行委员会办事处的门口，那骑者沉重地跨下马来，藏起他的军刀，踏着他那双厚重的靴子，锵锵地走上石级去。李希真皱着眉头，收下那骑者带来的信，在信封上签了他的名字。接着，那骑者不让他的马儿有喘息的机会，立刻跃上马鞍，沿原路缓驰而去。

那封信的内容，只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知道，不过贝兹多夫小镇那些舒适的市民们，却有着灵敏的鼻头。当地三个小商人中，有两个完完全全是小的走私者，这种行业给他们造成一种提防危险性的本能。

太阳正向天顶移动。热气渗进最深入的各个角落，一切的生物都已躲到各样的屋顶下，连狗也躺在庇檐下面，热得懒洋洋地想睡觉。看起来，好像一切的生物都已离开这个村庄，只有 一只猪，在井边的泥坑里，非常快乐地嗷嗷在叫。

保尔解开了马，为了忍住膝头上的创痛，他咬着嘴唇，骑了上去。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住阳光，微笑着对保尔说：

“下次再见，政治委员同志。”

马儿不耐烦地踩着地面，伸着它的脖子顶住轡头。保尔回答道：

“再见，赖绮亭同志。就这样决定，明天上第一课。”

马儿感觉到轡头松了，立刻疾步向前。就在这时候，一阵惨厉的呼号传进保尔的耳朵。那是一个女人的嘶叫，就像这地方的村妇们遇到失火时的嘶叫一样。保尔用力猛拉轡头，坐马连忙兜转身来，他看见一个年青的农妇由村外跑了过来。赖绮亭跑到路上，阻住了她；

人们也 开始在门口出现，他们多数是老人，因为年壮力强的人都已到农场上去。

“啊，好人们呵，他们做出多可怕的事情啦！你们不知道的，你们不知道的！”

当保尔的马载着他走近那两个女人时，有一群人已围住那青年农妇，用手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口，接连不断地问她许多惊人的问题，但是要从她那昏乱的叫喊中听出理由来是不可能的。她只是不断地嚷着：“他们已经杀死了他！他们冒死的打。”接着一个有着曲胡须的老头子，一边走一边提着他的裤筒，笨拙地跳过来，叱道：

“别这样瞎吵！像一个发狂的老太婆！那儿？什么事情？怎么来的？我的天，你别再吵了；好好说出来，你这混蛋！”

这样，那女人便哭着说道：

“我们这一村和波多夫齐……打起来……在田地的边界上。波多夫齐的人正在杀我们的人。”

现在，他们晓得事情是多么可怕了，老妇人在街上开始号啕，老人们则开始悲叹。这消息像电样传遍整个村庄，传到每个天井里：“波多夫齐大伙的人，正用镰刀杀死我们的人呀！”于是每个会走路的人，都冲出他们的家，携带叉耙、斧头，或只是木棍，朝那个正在作着血战的地方奔去——这为着田界的争斗是每年都要发生的。

保尔是那么狠命地鞭着他的黑马，所以它一开头立刻就是疾驰；当他追过那些奔跑的农民的时候，他的呼叫更使马用着疯狂的步伐疾飞上前。它的耳朵紧贴在头上，越来越跑得快。小山上的风车，张开它的帆，好像是挡住他的去路的巨臂。从风车向右走下去，就是近河的低平的草地；向左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风从裸麦的海上掠过，像在抚摸它。那儿是悄静的，可是热得难熬，而人的喊声，就从远处，从下面，从河流看起来像是一条曝在阳光下银蛇的那地方，传了过来。

马用着疯狂的步伐飞下斜坡。保尔晓得，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它的蹄，他们俩全不会活命。但是现在要拉住这畜牲已不可能，因此他只好紧紧伏在它的背上，听风从他的耳畔呼啸而过。

他们俩又以同样发狂的速率，奔到了草场。有一群人正在那儿，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做着凶猛的厮杀。一个黝黑而结实的农民，正在对付一个倒在地上的对手，用他那沉重的靴子践踏他，猛踢他。保尔用着马的全力冲进厮杀的人群里，驱散了他们。接着，当他们大伙还来不及集合的时候，他猛兜着他的坐骑，再度冲到那些野蛮的畜牲中，他晓得要驱散血战的人群，只有应用同样野蛮的手段，以引起他们的恐惧。他凶猛地叱道：

“你们这些猪猡，滚开去！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该死的流氓！”

他从皮套子里抽出他的毛瑟枪，在一个气势汹汹的人的脸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开了一响，有一些人毛下各自的镰刀逃走了。军事委员保尔，就用着这方法，一面骑马绕着草场狂跃，一面不断叱骂他们，终于把他们驱散了。现在人们正朝各方面跑开，竭力想躲避法律对他们方才的行为的处罚，和那一个武装的，气愤得可怕的，从天上飞下来的人。

不久之后，地方法院的人民审判官，到了波多夫齐来，他靠着审问证人的帮助，经过好久的努力，才把祸首查出来。在那一次厮杀中，没有人致死。那些受伤的人也已复原。人民法官非常耐性地尽力向那些站在他前面的乖戾的农民说明他们的厮杀是多么野蛮，多么难以想像。接着，他们不能完全保持缄默，其中有一个说：

“法官同志，那完全是界线的过错，我们的界线给搅乱了。我们每一年都为着那些界线械斗的。”

一星期后，调查团穿过草场，勘定那争执的界线，并钉上木桩。一个因为天热和走了许多路，浑身冒汗的年纪大的调查员，卷着他的软尺，对保尔说：

“这件事我已干了三十年了。这些界线，随处都可以引起打架。只要你有看那分割这些

草场的界线，真是难以相信的！就是醉鬼也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至于那些耕地呢？一片只有三步宽，这一片绕着那一片，要分清楚它们，就够叫你发狂。还不止这样呢，每一年分了又分，越分越小——儿子跟他阿爸的分开来，那一小片又再一分两。我可以向你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田地只好变成界线，再没有可以耕种的地方。岂不是吗，今天有百分之十的耕地已给界线占去了。”

“调查员同志，”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再没有好好地田地用作界线的”

那老头子谦逊地对那青年人笑了笑，说道：

“我晓得，你是在想着共产主义社会哩。不过，你晓得，这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情。”

“你听说过布丹诺夫集体农场吗？”

“呵，你想到的就是它。”

“是的。”

“我见过那农场……但那是例外，柯察金同志。”

调查团的人员继续工作，有两个青年人正在钉着木桩。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工作，以保证那些木桩，不会和那些好容易才找出来的，冒在草地的半烂的界标，有一寸的差错。

马车夫，一个长舌头的老头儿，在抽了他的拖马以后，就转过身来对他的客人说：

“你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些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本地搅起来的一样的事情，那完完全是新鲜的。你们可以说，所有这些事情的首魁，是一个女教员，人家叫她赖绮亭，说不定你们也知道她。她还只是一个顶嫩的姑娘呢，但她可是一个地道的作恶人。她把乡村里的妇人们都搅了起来，开会啦，结社啦，闹得妇人们没有一刻的安宁。要是你有点发火，给你老婆一记耳光——这个你总是免不了的——在从前，她只好揉着面孔不作声，但是现在呢，不行，甚至在你动手之前，你也不能够叫她闭嘴。他们开始说，把你带到人民法庭上去，那些年纪轻一点的，还说到离婚，向你引用所有的法律。拿我的老女人说吧，向来是一个真正少说话的老太婆，现在她就是一个代表。这好似一种管理妇女的老长辈，村里到处的人都来看她。开头的时候，我很想拿马鞭来好好抽她一顿，后来我决定还是让她去。滚他妈的那些事情。不过，提到管理家务，和别的各种事情来，她倒是我的一个好老婆。”

他搔着他那从解开的衬衫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随便在马腹上抽了一鞭。那两个乘客是拉瓦里金和莉达·波里维齐。他们两个在波多夫齐都有事情——莉达跟派到苏维埃去的女代表作了谈话，拉瓦里金却和当地的党组进行了组织工作。莉达突然好奇地问那老车夫道：

“那么，你喜欢那些青年团员吗？”

他摸了摸他那稀疏的胡须，想了一会，回答道：

“不，不很喜欢。青年是一个玩儿的时候，做做战或者是搅别的。我自己就是满喜欢玩的。当那些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孩子们是在做着玩，但后来可又出意料。人家告诉我，他们对喝酒、凶暴一类的事情挺严厉，他们最关心的是操练。只是他们做得太过火，譬如，打算把教堂改做俱乐部。这样的事情是不行的，老人们非常担心，都反对他们这样做。别的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他们错在只接受村里的穷人，那些给人当雇工的，或是种地种得不好，有钱人家的儿子，他们一个也不收。”

马车下了山坡，驶到村里学校的门口。看守人安顿好那两个旅客，她自己睡在阁楼上。莉达和拉瓦里金是开完了长拖拖的会议后回来的。草屋里一片暗黑。莉达脱下她的长靴，爬上草床，一秒钟后就睡熟了。但拉瓦里金的手的粗鲁的触动惊醒了她。——他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她喊道：

“你找什么呀？”

“哎，莉达，你吵什么呢……我独自一个这样躺着，很感到闷气，真是！你难道不晓得还有比打鼾更好玩的事情？”

“你马上撒手，下床去，滚你的！”她说着猛力把他一推。她从来就受不了拉瓦里金的色情的媚笑，现在很想好好地辱骂他一顿，但睡意克服了她，她的眼睛又闭上了。

“你为什么害臊呢？”他说。“你以为这算是知识份子的行为吗？或者，你也许是从“良家小组”的学院里出身的吧？……你的意思不是说我相信你吗？别做傻瓜，莉达。要是你真的是时髦的人，你应当首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你要睡多久都听便。”

他甚至认为没有多说话的必要。他没有顾忌的再坐到她的床沿上，伸手去挣她的肩膀，好像他有权利要求他所需要的一样。

立刻她惊醒了，喊道：

“滚你的蛋！”接着她又说：“我说，明天我准要告诉柯察金。”

拉瓦里金挣住她的臂膀，低声吓吓她：

“我才管你的柯察金。你别饶舌，不管你怎样说，我还是要你。”

他们两个做了短时的斗争；在黑暗中，发出了一记有力的掌击声。接着一记，接着一记。……拉里瓦金飞起来了。莉达在暗中摸到了门，推开他走到外面去。她站在月光下，气得发狂，同时拉瓦里金正粗暴地喊着她：

“马上进来，你这傻瓜！”

他带着他的铺盖到房檐下去，在外面过了后半夜，莉达则关上门，下了门，自己蜷得像圆球一样睡在床上。

隔天早上，拉瓦里金在回家的路上，坐上车夫的位子，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他心里想：“真他妈的糟糕，这好家伙，十九要去告诉柯察金。可恶的小傻瓜。要是她单是漂亮就好了，可是，事实上，真他妈的太蠢了点儿。我应当不顾一切的跟她和好，要不然，后患是不可设想的。柯察金本来就对我不正眼相看了。”因此，他掉了座位，坐到莉达的旁边，佯装难为情的样子，他的眼睛差不多是忧郁的，他对他的行为，作了有点复杂的充分的解说，而且表示了充分的后悔。结果他成功了，当他们快到小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那件事告诉别人。

在边境的乡村里，青年团的组织一个接一个的成立起来。青年团区党部对那些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炮，给予极大的注意。保尔和莉达整天都在那些农村中。拉瓦里金是不喜欢农村工作的，他跟那些农村的少年们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好感，而且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但保尔和莉达却觉得那是非常简单和自然的事情。莉达时常混在农村的少女们中间，跟她们中的许多个做了朋友，而且后来从不曾和他们失去联系；她能够使他们对青年团的生活和工作，感到兴趣。保尔是区里所有的青年们都认得的。第二大队——保尔的大队——已可以得到一千六百个准备作军事勤务的青年。

在那些农村的户外聚会中，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帮助的巨大，是从来所没有的。保尔的手风琴已使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他那魅惑的琴声，使乌克兰农村的许多青年，走上了人生的道路，雄壮的军歌使他们激烈而热情，乌克兰民歌的忧郁之声，又使他们怜爱而柔顺。他们倾听着手风琴与它的演奏者——以前是铁路工厂的工人，现在是政治委员与青年团的书记。他的歌声，和他对他们所说的话语溶成为一个整体，深结在他们的心中；农村里已可以听到新的歌声，而在他们的茅屋里，也藏着不仅是诗篇与梦的说明者之类的新的书籍了。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了；他们所应提防的，已不仅是国境的哨兵，因为苏维埃政府现在已有了许多年青的朋友和真诚的助手。真的，青年伙伴们有时竟由于热情，想胜过国境的哨兵，使保尔不得不干涉他们的行动。

有一天，波多夫齐党小组书记柯里沙·柯洛瓦科，一个蓝眼睛的急性的青年，和坚决的

反宗教的辩论家，由他自己的线索，得到走私物品将于某夜运交当地磨坊主的消息。他便把全组召集起来，以他们的操枪和两支刺刀为武装，在该天晚上谨慎地包围磨坊，等待他们的战利品。同时，国境哨兵队的“格伯乌”（政治警察），也探知走私活动的消息，召集了他们的人员。两队在夜间竟发生冲突，幸好国境哨兵很镇定，青年团人员，在由此而引起的战斗中没遭到死伤。“格伯乌”人员仅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押送到三里外的邻村去，把他们关了起来。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保尔正和加维里洛夫在一起。隔天早上，大队长便把他刚才接获的报告告诉他。保尔就立刻策马去营救他的伙伴们。“格伯乌”的军官笑着把经过的始末告诉他，接着说：

“这就是我们的处置，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孩子，我们不愿意责罚他们，但为着使他们往后不做我们的工作，你应该吓一吓他们。”

哨兵打开仓门，那十一个小家伙便从泥地上立起来，狼狈地站在那儿，两只脚不住的互相掉动着。那“格伯乌”人员做出一个绝望姿势，说道：

“你瞧他们这样子。他们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现在我只好把他们交给法庭审判。”

格里沙听着动火了。

“沙哈洛夫同志，我们把什么事情搅坏了呢？我们只想尽我们的力量，帮助苏维埃政府。我们的眼睛老早就盯着那只偷运私货的白鼬了，可是你们却把我们关起来？好像我们是强盗似的。”他说着愤愤地把身子转过去。

保尔和沙哈洛夫两个，好容易板着脸孔，跟他们作了一番严肃的谈话，这样，他们两个的态度方才缓和下来。沙哈洛夫转对保尔说：

“如果你负责保证他们往后不再作国境的工作，但在别的其他方面协助我们，那么，我认为这事情已告结束。”

“好的，”保尔说，“我代他们担保。我希望他们不再坍我的台。”

那一组就一路唱着歌的回到波多夫齐去。这件事情村里没有声张，但磨坊主不久就由正式部队加以逮捕。

德国革命的回声，传到县里来了；汉堡巷战的炮声，已在这边界的区域起了反应，好些燥急者渐感不安，人们热切地阅读着报纸，十月的风从西面吹来了。

向县青年团申请准许加入红军为志愿兵的人，就像一股洪流，保尔竭力对付各青年团小组派出的代表，向他们说明苏联是采取和平政策的，他无论如何没有与邻国作战的意向。

这说明没有什么效果，每逢星期天，各小组的青年团员，就到贝兹多夫集合，在长老教会的大花园上，举行县团员的大会。有一天中午，波多夫齐青年团小组，仿着军队，成排开到县党委员会所在地的大天井里来。保尔从窗口望见他们，立刻走了出去。

在柯洛瓦科领导之下，足上登着长靴，背上挽着大袋的十一个少年正成队站在门口。

保尔大吃一惊，问道：

“格里沙，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柯洛瓦科没有回答，只向他眨着眼睛，他们两个就走进屋里去。当莉达、拉瓦里金，和别的两个走上来之后，柯洛瓦科就把门关上，狠狠地攒着他那无色的眉毛，说道：

“同志们，我正实行一次试验的动员。今天，我向我的组员宣布，县里发来一个电报，不用说这是非常机密的，宣布我国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就要开始，而且马上还要和波兰资产阶级开战。这样我就对他们说，莫斯科已发出命令，叫所有的青年团员开到前线，那些害怕的可以明说，他们可以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战争的事情，不过每一个必须自备一只大面包和一片腌肉，如果他们没有腌肉，就带些大蒜或洋葱，半个钟头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接着，我又对他们说，我们先开到县里去，再由县里开到省城，我

们就在那里领到 我们的武装。不用说，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说，‘别问，按照我说的做吧。’我还说，谁拒绝的，应该写他本人的拒绝书，因为这是自愿的。大家接着分散开去，我当时提心吊胆，恐怕结果也许一个也不来。要是这样，我只好解散这小组，到别的什么地方做 工作去。

“就这样我坐在村外等着。不久，一个接一个的来了。我可以看出，他们中有些是哭过的，不过竭力掩住它。他们中的每一个，一总十个，全都来了。一个逃避的也没有。由此，你们可以晓得，我们波多夫齐的党小组是怎样的一个！”他骄傲地结束，临末还用拳头拍着他的胸脯。

当莉达开始训责他这一举动的时候，他惊愕地张着嘴巴看着她。

“你教训我的是什么呢？我只告诉你，这是一个顶好的试验。为着更像真些，我还带领他们到省城去，可是他们已有点累了，现在才让他们回家。不过，柯察金同志，你应当向他们作一个合适的演说。要不然，那就不好办了。……告诉他们说动员令已经延期，而且对他们勇敢地服从小组的号召，加以充分的适当的鼓励”

这一年边界原十月纪念，比往常举行的更加热烈。保尔被选为边界各村十月纪念委员会的主席，开头在波多夫齐举行大会，有五千男女由邻近三个乡村里走来参加，然后列成长达四分之一哩的纵队，由民团大队和音乐队领头，举着巨大的红旗，从波多夫齐开至边界。纵队守着非常严整的秩序，开始作直趋国境的巡行，而以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划分为两的乡村为终点。

边境的波兰兵从来没见过这种景象。大队长加维里洛夫和保尔骑马走在最前头，后面是声震远近的乐队，然后就是旗手和不断歌唱的巡行者的行列。农村青年穿着他们最好的衣裳，成年男女的脸孔是庄严的，老人们则现出骄傲的神色，少女的笑声漾着银音的涟漪。人的巨流从肉眼所能及的远处流来，这水流的堤岸就是国界，但没有一只脚踏过界线，越出苏维埃的国土。

苏维埃哨兵们以欢喜的微笑迎接这游行队；波兰士兵却现出惊慌和羞惭。虽然这一次沿着边界的游行，事先曾正式通知波兰的指挥部，可是那边仍然发生相当的纷扰。宪兵派遣队四处巡逻，边界的哨兵比平常多了五倍，还有隐匿在洼地里，准备应付任何事变的后备队。但吱吱喳喳的无限愉快的游行队，始终沿着边界巡行，在空中飘扬着它的歌唱。

在某个小丘上，站着个波兰哨兵。苏维埃人民的游行队正朝他走去。进行曲的第一声传进他的耳朵，他放下肩膀上的步枪，枪柄碰着左足，向大队行了敬礼。保尔清清楚楚地听见他低声喊道：

“康闵(公社)万岁！”

保尔从那个人的眼睛晓得了，他就是喊出这一句的人。一个同志！在波兰军的外套之后，跳着一颗同情巡行的群众的心。因此保尔用波兰语轻声回答他：

“万岁，同志！”

他们走到另一个波兰哨兵的前面。这一个有着灰色的小胡子，在军帽的镍做的帽遮下面，露出一对无光彩的和无表情的眼睛。保尔依然为他刚才听到的喊声所感动，便像是自说自话一样的，用波兰语说道：

“日安，同志。”

但是没有回答。加维里洛夫脸上浮上了微笑。显然，这事的始末他全已注意到了。

“你的希望太大了，”他对保尔说。“他们在这边界上，有着步兵，也有着宪兵。你没有注意到他袖口上的条纹吗？他是一个宪兵呀。”

现在游行队的前头正走下小丘，朝一个被划分为两的乡村走去。属于苏维埃的那半个，正准备给这游行队以盛大的欢迎。所有的人都集合在那座跨过界河的小桥附近。青年男女们沿路列成一条人的夹道。在波兰方面，屋顶上挤满着入神地注视这一切的人们，还有许

多农民，站在门口或是茅屋的篱笆的旁边。

当游行队走到青年人的夹道的时候，它奏起了《国际歌》，接着，许多青年小伙子和白发老头儿，在一个粗粗搭成的，饰着青翠的草木的讲台上，发表了一些动人的演说。保尔也说话了，他用的是乌克兰话，每一句都飘过河去，传进对面那些波兰人的耳朵。但波兰当局不让这些演说打动他们的心，一队宪兵开了过来，用皮鞭赶他们回屋里去，同时还朝屋顶开了几枪。

街道上空无一人了，屋顶上的青年们也给予子弹驱走了。所有这些都从苏维埃方面看见，大伙全蹙着眉头。有一个老头儿被青年们抬到讲台上，他是一个老的牧人，他的感情已给愤怒激动得完全不由自主，他大声喊道：

“好的，孩子们，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他们向来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但是，现在呢，在我们的乡村里，用鞭子抽着我们这样的事情，已经没有了。我们已消灭了大地主和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已消灭了抽打我们的后背的鞭子。孩子们，好好看顾我们现在所有的政府。我是一个老头子，我不晓得怎样演说，但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倒有许多。在沙皇下面，我们过的全是死臭的生活，就像一头挽着车子的牛，它得到的只有鞭打，同样……”他朝着小河挥动那皮包骨头的拳头，扑扑簌簌地流下了两行眼泪——这正是孩子们和老人们流下的那种眼泪。

格里沙·柯洛瓦科接着他走了上去。当加维里洛夫听着他那激乱的演说的时候，他勒转马头，看看那边是否注意到他所说的话。但对岸空无一人，甚至连桥头当值的兵哨也撤去了。

将近十一月底，一个秋天的雨夜，匪首安东尼奥克和他随身的七个人，结束了他们所拖的血迹，这恶鬼到梅丹别墅参加一个富有的外来地主的婚礼。克罗林斯基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就乘机捉了他。

妇女们的闲谈，把外来地主的大农庄里那些客人，泄漏了出来，全个党组——十二个人全都通知——立刻准备妥当，以他们所有的武器为武装。他们驾着轻车赶到梅丹别墅的花园，同时又派出一个特使，以最快的速率驰到贝兹多夫去报告。这特派信使在西马基碰到费拉托夫派遣队，大队立刻飞奔而来。这时候克罗林斯基的青年们已包围那庄宅，他们和安东尼奥克匪帮之间，已开始了枪火的初度的接触。

安东尼奥克和他的部属，躲在旁边一间小屋里，可以由此射杀每个被看见的人。他企图突围，但克罗林斯基的青年们把他们赶回去，还击伤了他们七个人中的一个。安东尼奥克身陷困境已不只一次，以往每次他都毫未负伤的脱逃，——手榴弹与黑暗是他的两个救星。这回，他也许仍能够逃脱的，因为克罗林斯基的青年们已有两人死伤，可是费拉托夫恰好在这时候火速赶到。这样，安东尼奥克看出，他已陷于真正无路可逃的绝境了。夜里，他们仍然从那小屋的每个窗户，狙击包围他们的人，直到天亮时候，安东尼奥克方才被捕。七个人中一个也没投降。这消灭一个匪帮的战斗，牺牲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中三个正是克罗林斯基的青年团员。

保尔的大队奉召作秋季的地方演习。大队决定在一天内，冒着不停的大雨，开到二十五哩外的扎营地；这使他们由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大队长高瑟夫和他的政治委员是骑马代步的，他们属下那八百个人走到军营时，差不多都已走不动了，因此他们立刻躺下睡觉。

演习是在隔天清早开始的。这新到的大队必须接受点查，并在阅兵场上操演。过了一会，许多骑马的人由参谋部奔驰而来，已领到用具和枪支的大队开始编队了。大队长高瑟夫和保尔过去对他们的大队曾下过很大的功夫，所以都相信它是合格的。

当正式的检阅已经完了，大队已表现了它对操练和编队的的能力之后，一个脸孔漂亮脾气恶劣的司令官，严厉地责问保尔道：

“你为什么骑马？大队的队长和政治委员，在演习时是不许骑马的。我现在命令你把马

交到马厩去，始终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晓得，如果他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他那双脚甚至连步行半哩路也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怎样向这个身上挂着许多皮带的考究打扮的人说明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仅仅这样答道：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晓得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他的拒绝，因此低声说道：

“我两只脚都发肿，要是我下马步行，我就有一个星期走不了路。其次，同志，我还不晓得你是什么人？”

“第一，我是你所属的联队的参谋长，第二，我再一次命令你下马。你也许不合格，不过你到军队里来，可不是我的过错。”

保尔觉得他好像吃了一记耳光。他猛拉着马的辔头，但高瑟夫那强有力的手阻止了它。有几分钟，忍耐与被侮的愤激，在他在内心斗争着。但保尔已不再是一个红军战士，可以任随自己的冲动，由这一队到那一队去了。他是一个大队的政治委员，而这大队当时正在他在后面。这将是关系多么重大的军纪的榜样。毕竟，他并不是为这个气量狭窄的小人物而训练它的部队的。所以他双脚离了马蹬，跳下马来，忍着关节上的剧痛，走到右翼方面去。

随后几天的天气非常好。演习渐将结束了。在第五天，他们已到了最后目的地秀彼多夫卡附近的地方。贝兹多夫大队的奉命由里克孟托维齐村的侧面去夺取车站。因为保尔对这地方十分熟悉，所以他把所有的捷径告诉高瑟夫。大队分为两部份，神不知鬼不觉地作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并在“我们的！”的喊声下冲入了车站。依据第三者的意见，这行动是非常成功的。车站已被贝兹多夫大队占领了，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判定损失一半的兵员，而且退到森林里去。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大队。他和第三小队的队长及其政治委员，正站在街中布置他的兵员，就在这时候，一个红军士兵跑到他面前，上气不接下气的问道：

“委员同志，大队长想问你，要不要在平行的叉道上的布下机关枪的阵地。委员团马上就要到的。”

保尔和队长们走到叉道那边去。联队司令官早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高瑟夫行动的成功，战败的大队代表们，都呆呆地站在那儿，甚至不敢稍作分辩。高瑟夫说：

“那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这地方的人，这行动是他指挥的。”

联队总参谋长骑马走到保尔面前，讥讽地说：

“同志，你那双脚毕竟走得满不错，我想，你骑马不过是出出风头罢。”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保尔的表情使他收住了。

当他走了的时候，保尔悄悄地问高瑟夫道：

“你晓得他的名字吗？”

“忘掉他算了，你不要记挂这恶棍。我想，他的名字叫楚亚宁——革命前是一个尉官。”

保尔那一天好几次竭力回想他曾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他怎也想不出来。

演习完毕了，大队带着极高的荣誉返回贝兹多夫，保尔却跟他的母亲住了两日。

保尔实在是累极了。他把马留在阿尔青的地方。他从早到晚的睡了两个整天，只到了第三日才到工厂里去看阿尔青。在煤烟熏黑的厂房里，有着一股亲切的味道，他贪婪地嗅着那夹着煤炭的空气。那些孩提时期的环境，都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份，而现在正强烈地诱惑着他。他已长远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尖锐的嘶声了，就像碧蓝无边的大海，激动了一个久别之后重回海上的水手一样，这火夫和装配工，此刻感觉到他本人的出身之地，正在引诱

着他。有好些时候，他完全不能够控制这种感情。

他发觉他和他的哥哥相互之间，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他注意到阿尔青的额上，又添了一条皱纹。阿尔青正在对付一架可以移动的起动机。他已有了第二个孩子了。生活在他显然是难以对付的，但他没有诉苦，虽然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他们两个一起做了一两个钟头之后，就分别了。在岔路上，保尔勒马回顾车站，呆望了许久，方才策马以最快速率穿过森林回家。

森林里的路现在都很安全。大小的匪帮都已给苏维埃当局肃清，他们的巢穴也被烧毁，周围各乡村的生活，已更加平静了。

当天中午，保尔缓驰的马进入了贝兹多夫，莉达在区委员会办事处外面，给他一个热烈的欢迎：

“到底你终于来了，我们长远在思念你啦。”她说着伸出一只手臂勾住他的肩膀，跟他一道走了进去。

“你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你曾经到格鲁西夫卡去吗？那里的情形怎样呢？”

当他坐在长椅子上伸着懒腿的时候，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昨天，”她说。“赖绮亭已得到批准，做了候补党员，这一定可以大大的加强我们波多夫齐的小姐。赖绮亭是一个好女孩，我十分喜欢她。至于教导的事情呢，你瞧，我们早已停顿了，他们中有些人已走在我们的前头了。”

现在，有三个人晚上时常在李希真的房子里，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这三个是李希真本人，保尔和新任区党委书记里契可夫。他们总是关上那扇通连另一间房间的房门——安妮奥步和李希真的妻子，大概已在那房子里睡着了，——一齐低着头研读波克罗夫斯基的小本的《俄国史》。李希真只有在夜里才有读书的功夫。每当保尔从巡视周围各村回来的时候，时常叫他吃惊的，是他两个所读的，早已走在他的前头了。

有一天，从波多夫齐传来了消息：格里沙·柯洛瓦科在夜里被人暗杀了。

当保尔听到之后，他忘了双腿的疼痛，只几分钟便走到马厩。他用疯狂的速率装好马鞍，随后使用马鞭猛抽着马腹的两边，向国境奔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阔大的草屋里，格里沙躺在一只桌子上，周围缀着绿叶和锤子镰刀的红旗。在当局到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许进去；一个国境卫兵和一个青年团员站在门口守卫。

保尔走了进去，掀开覆在格里沙脸上的那面红旗。他躺在那儿，头儿歪向一帝，面色死白，双眼睁开，残留着最后的苦痛的表情。他的后脑已给锐利的凶器击碎了，现在下面正视着松树的绿叶。是谁加害这个少年，这柯洛瓦科寡妇的独子，这父亲死于革命的孤儿呢？柯洛瓦科的父亲曾经代那磨坊主人做过工，后来参加了村里的“贫人会。”

孩子死了的消息，使那可可怜的老妇人立刻昏倒下去，因此她的邻居们，不得不在她的儿子保持着他的死的秘密而悄默地睡在那儿的时候，尽力去看顾她。格里沙的死使村里大为震动，这年青的青年团的领袖和农村劳动者的保护人，已证明他有着远比敌人为多的友人。赖绮亭大大地被他的死所震动，她关在房子里不断哭泣；当保尔跑去看她的时候，她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来。保尔沉重地坐在一只椅子上，低低地问道：

“同志，你的意思怎样？是谁杀害他？”

“除开磨坊主那一群外，还有谁，”她说。“不要忘记，阻碍他们的走私的，就是格里沙。”

两村所有的人都参加格里沙葬礼，保尔领着他的大队和整个的青年团，来与他们的同志诀别。加维里洛夫把二百五十名国境卫兵，排列在村苏维埃前面的方场上；在悲恸的葬歌声中，他们抬出那个覆着红旗的棺材，把它放在方场的中央，在那里，他们已在前时埋葬布尔维克游击队的坟墓的旁边，掘好了一个安葬他的墓穴。

格里沙的死，已使所有那些与他为同一主义而奋斗的人，更密切地团结起来，而劳动级

与贫农的青年，也应允给党以全力的援助。每个演说的人，都愤怒地请求杀死那些凶手，并且要求不但应破获他们，还应带他们到这广场上，当众审判，好使每个人认清他们的敌人的面孔。

接着他们放了三排排枪，又在那新掘的墓穴的地面上，安放了新砍下来的常青树。那天晚上，一个新的书记选了出来，那就是赖绮亭。同时保尔又从国境“格伯乌”分站处，得到他们正在搜索凶手的消息。

一星期后，第二次苏维埃区大会已在贝兹多夫戏院开幕。李希真非常严重肃地开始作如下的胜利的报告：

“同志们，我很高兴，我能够向本届大会报告，过去一年，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已在 本区巩固地确立了苏维埃的威权，并且肃清了一切的匪帮，破坏了走私的贸易。许多贫穷者的健全的组织，例如青年团，已在各村成立了，同时党的组织也已扩大。最近富农在波多夫 齐的暴行，杀害了我们的同志柯洛瓦科，这案件也业已破获，凶手——磨坊的主人和他的侄子——也已被捕，不久将由法院的巡回法庭加以审讯。村代表全体已向我建议，要求大会通过一个决案，请求判决这些恐怖匪贼的死刑。”

会场立刻响着如下的呼声：

“赞成，判处苏维埃政权敌人的死刑！”

莉达在一个侧门的门口在现了，并向保尔招手。当他走到走廊去的时候，她把一封上面盖着“紧急要件”的字样的信交给他。他拆了开来。

“贝兹多夫青年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党委会决定召回柯察金同志，调在省党委会管辖下负责重要的青年团的工作。”

保尔已不能不和他做了一整年工作的本区告别了。在区党委员会的事先的会议中，曾经讨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是擢升柯察金同志为正式党员，第二是在他卸除区青年团书记职责之后，将他的工作作了一个报告。李希真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给他一个亲切的拥抱。当他的马由天井走到街上的时候，十二响枪声给他一个临别的敬礼。

十四

一九二四年以一阵短期的酷寒，表示它在历史上的出现。正年凶猛地蹂躏着雪掩的大地，而下半月又刮着飓风和长期的大风雪。西南的铁路系统都深埋在雪下，人们不得不知这疯狂的天气进行着残酷的斗争。抓雪的铁耙掘着山样的积雪，给列车开出一条路来。冻雪与狂风又破坏了雪盖的电报线，在十二线中，只有三条——印度——欧洲的和其他的两条干线——可以通报。

在秀彼多夫卡交轨站总站里，三只摩司电报机不断地作着固执的、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能分辨的低语。女电报生都是年青的，他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只收了二十基罗米突的电报，但同一办公处里的那个老头子，却已开始着他的第三十万基罗米突的工作记录了。他不像他们一样讨厌阅读那些纸条，碰到难解的字眼，也不用皱着眉头。他只倾听着那机器的达达……的响声，记下一个一个的电码。他正这样写着：

“发至所有各站，所有各站，所有各站。”

当他记下的时候，他对着自己说：“这又是一通关于与积雪斗争的通知罢，”就在这里候，风在户外呼啸，刮着手一样大的雪片掷向窗户。在他看来，恍惚有人在外面敲门，因此他不禁回转头，玻璃窗上那美丽的、精巧的雪花，引起了他的叹赏。世上绝没有人能作出这么美好的雕刻，绘就这么一种狂想的枝叶的花纹。这注视是这样吸诱了他，以致他没有听到那机器的响声，当他回过头来时，他不得不拿起纸条来重读了：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五时五十分。”

他慌忙记了下来，把纸条丢开，然后又用手托着头，开始倾听起来……

“在高尔基城逝世……”

他缓缓地记了下来。无数的电讯，快乐的和悲哀原，没有一个不是他最先听到，然后才是别人的喜悦与悲哀。他对那些短促的不完整的短句的意义，早已完全不加思索了；他只是收下来，把它记在纸上，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内容。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某一个人死了，现在正把这消息告诉某一些人。他已完全忘记了，这电报是用通常布告的用语——“发至所有各站，所有各站……”——开头的。受讯机继续地滴笃地响，这老电报员把那些滴笃声译成了如下的安：

“乌…拉…底…米…尔…伊…里…奇…”

这没有使他感动。他是疲倦的。某一地方，某一个人——名：乌拉底米尔，姓：伊里奇——已经死了，而他正在把那悲惨的字记了下来，——这些字对某一个人是悲惨的，他将因绝望与忧伤而号哭；但它无论如何没有感动他，他只是个非自愿的旁观者。受讯机继续响下去，几点之后又是一划，几点之后又是一划，这老人从那些熟识的滴笃声中，晓得另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于是他写下去——“L，”这个字之后接着是一个“E。”在“E”字之后，他小心地写下一个“N，”随即又添上一个“I”字，最后一个字母自动地跳出来，那就是“N，”接着受讯机打出了一个顿号，这老电报员的眼睛，只用一秒钟的十分之一的的时间，在这些字母上一霎，便写上一个字——“LENIN”（列宁）

同时，受讯机还继续滴笃地响下去，可是这老电报员的思想却碰到了一个熟识的字，因此他回想了一下。他又朝那个字看了看。这是个什么字？列宁？他的眼睛注视着那电报的全文。他瞪着那些字，呆了好一会。接着，在他三十年的服务中，他第一次不相信他所写的。他核对了三次，但那些字非常固执，毫无变动：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五时五十分，乌拉底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高尔基城逝世。”

那老头子跳了起来，手里拿着那弯曲的纸条儿，狠命盯着它。那两码长的小纸条绝对证实了他开头所不能相信的。他那死白的面孔，转对着他那两个女同事，她们从他的嘴唇上，听到一声吃惊的叫声：

“列宁死了！”

这巨大的丧失的消息，从敞开的大门溜出了机器房，又以大风雪一样的速度横扫了车站；它跃进狂飞的雪花中，在铁道和交叉点上面旋卷着，然后像一阵刺骨的冷风，吹入了火车工厂那一扇半开的大铁门。

在工厂里，有一只火车头正摆在第一修理地坑的上面；紧急的修理队正在修理他。老头子波力道夫斯基自己走进车头下面的地坑里，把破坏的地方告诉机工们。布鲁克和阿尔青两个，正忙着锤直火室里的铁条，布鲁克拿着它们放在砧子上，阿尔青则使着铁锤。这一两年来，查哈尔已老了许多，他所经历的一切，已在他的前额刻上了一条粗大的皱纹；他额角上的头发已变白了，肩膀也已低垂，那双退却的眼睛业已蒙上了阴翳。

在开着的门的狭缝里，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了，但傍晚的阴暗吞没了他。铁锤的重击声淹没了那个人的第一声叫喊，但当他走近火车头周围的人们之后，阿尔青的铁锤突然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死了！”

那铁锤缓缓地和他的肩膀上落下来，阿尔青的一只手轻轻地把它放在水门汀地上。

“你说什么呀？”阿尔青的一只手，像一把钳子一样的，咬住那个带来这惊人消息的人的皮外套，那个人浑身是雪，喘着气重复地说，不过这回用着阴沉的变调地声音：

“是的，同志们，列宁死了！”

因为那个人没有高喊，这回阿尔青方才明白那可怖的真相，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认出那个人是谁——他是党团的书记。

人们从地坑里爬上来，沉默地听知那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人的死耗。接着，在右面，在大

门那边，一只车头嘶叫了起来，使他们全都吃了一惊，从车站的远处，立刻传来了另一声应声，然从又是一声。……电力站的汽笛，随即用着像榴霰弹的飞射一样锐厉的尖叫，附和了它们那有力的警报的呼喊。稍后，即将开往基辅的“S”快车的嘹亮而铿锵的汽笛，又淹没了电力厂的叫声。

在秀彼多夫卡——华沙直开列车的波兰火车头上，一个机师——他晓得所有这些汽笛叫声的意义——在再倾听了几分钟之后，便缓缓举起手臂来，拉下了那放开汽笛活塞的小缝，这可叫一个“格伯乌”人员吃了一惊。那个机师晓得，如果他这样做，那是他最后一次的拉笛，往后他再也不能在这路上作工了，但他的手仍然没有离开那小缝，他的机车发出的笛声，惊动了那些坐在柔软的座位上的，波兰搭客和外交家。

车站工厂里充满了人。他们从所有四个门走了进来，当那巨大的修理厂已挤得满满之后，那悲伤的消息发表了。说话的是秀彼多夫卡区共产党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勃林，他说：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是死了——列宁是死了。党已受到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那个创立了和教育了与我们的敌人坚决对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已经死了。党的和我们阶级的领袖的死，应当是号召我们无产阶级的优秀子孙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里来的喇叭。”

葬礼进行曲的悲声响了起来，几百个人都脱下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流过眼泪的阿尔青，感到他的喉咙已经哽咽，他那巨大的肩膀正在战颤。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墙壁，好像容不下那么巨大的人群。外面是冷得刺骨，门口所有的松树都已披上厚雪，结着冰柱，但在那大厂里，许多荷兰火炉的热气，以及六百个参加党纪念大会的人的呼吸，却使空气叫人窒息。

大厅里没有惯常的嗡嗡的人声，没有惯常的谈话的暗流。难堪的悲伤已哑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只作着无声的谈话，而且从那千百只眼睛里，可以看到悲伤与惊惶，就像一群船员失去了那个知道浅滩的舵工，而船正被狂风刮到海上去一样。

执委们也一样沉默地走到主席团台子周围的位子去。高大的西洛登科小心地拿起那只铃子，轻轻摇了一下，又把它放下去，但这个已经够了，渐渐地会场已被难堪的死寂的占据了。

党团书记西洛登科在报告之后，立刻站起身来，说道：

“一群工人已请求大会考虑由三十七个人签名的宣言，”他接着就念着那篇宣言：

“西南铁路线秀彼多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铁路工会公鉴：我们的领袖的死，是要求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号召，我们请求准许在本次大会上表明，并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下面是两行签名。西洛登科念着它，每念好一个名字便停顿一下，使听众们有时间可以暗记那熟识的名字。

“波力道夫斯基，斯丹尼斯拉夫·西孟多维齐，——火车司机，服务三十六年。”

会场上有着表示赞成的人声。

“柯察金，阿尔青·安得列维齐，旋盘工，服务十七年。布鲁克，查哈尔·费力波维齐，火车司机，服务二十一年。”

当讲坛上那个人念着那些名子的时候，大厅里的人声渐来渐大了，他们晓得所有那些，都是特出的铁路工人的名字。

当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走上讲坛时，全场静得可以听见小针落地的声音。老头子波力道夫斯基在叙述他的生涯的时候，他本人不禁大为感动。

“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我们全都晓得，从前一个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过着奴隶的生活，死了像一个叫化子。得，我将承认一件事，当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老头儿，肩膀上又挑着家庭的重担，所以我当时从没有看到入党的路。我虽然

从未帮过敌人，可是我也不是个战士。一九〇五我是在华沙的工厂里的，我做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与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那时候我还年青，而且是一个暴躁的家伙。但翻旧帐没有用处。我可以告诉你们，伊里奇的死，已使我心里明白了。我们已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已用不着再说我年纪老了。让别的人，比我会说话的人说吧，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我能够向你们说的话只有一句：布尔什维克和我是走同一条路的。”

那老司机的白发的头。固执地扭向一边，他那对眼睛，在灰色的眉毛下面，紧紧地毫不畏缩地注视着会场的人群，等候着他们的裁决。没有人举手对这矮小的头发苍的老头子说个“不”字，而当执委们要求非党员们发表意见时，也没有人不表示赞成。因此波力道夫斯基在离开讲坛时，成了一个党员。

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晓得，一桩不平常的事情正在进行中。在老司机刚才站立的地方，阿尔青那魁梧的身子隆然出现。这装配工不晓得怎样去对付他那双长手臂，因此他摸着那只有两片耳罩的打鸟帽。他那份边上已脱了毛的羊皮短外套，完全解开，里面的灰色军衣的领子，两粒铜纽扣都已扣上，使他的样子像节日那样的整齐。他面对着大厅，突然间看到一个面熟的妇女的脸孔——石匠女儿嘉莉亚正混在他的紧急修理队的伙伴中间。她给他一个宽恕的微笑，那微笑里面含着赞成，而且在她的嘴角上，还有着半隐半露的，只能加以意会的另一种表情。这时候阿尔青听见西洛登科说：

“阿尔青，把你的生活告诉大家吧。”

这时柯察金觉得难于开头。他不惯在大会发表演说，也只在这时候，他才明白他还不晓得应该怎样把生活早已告诉了他的一切事情，告诉会众们。他觉得很难把字句凑拢来，同时他又十分激动，以至不能好好的说。这些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不过他心里十分明白，他的生活已突然转变了，他正朝着使他那萎缩而荒芜的生活能够感到温暖和赋有意义的方向，走上最后的一步了。他开始说：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四个。”

会场里是死寂的，六百个人正小心地倾听这有着鹰鼻和一双隐在黑色眉毛的天蓬下面的眼睛的、高大的工头所说的话。他接着说下去：

“我的母亲到外面阔人家里面娘姨。我不大记得我的爸爸，他和我的母亲合不来，他时常喝着过量的酒。因此我们只和母亲一道过活。她常是无法养活我们。她一月只拿到四卢布，东家管饭，就为了这报酬，她一天从早忙到晚。我侥幸能在初级小学里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读和写，但到了我九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没有法子，叫我到车床厂里当学徒——为着学会这行业，我做了三年，没有丝毫报酬，只吃东家的饭。那里的老板是一个德国人，名叫福斯德。他当初不是好心收容我的，因为我年纪太小，但是我那时候已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而且母亲还比我原来年龄多说了两岁，我给那德国人做了三年，什么也没有学到，只代老板作些零星的事情，像买瓦特加酒之类……他自己时常胡乱喝酒……或是买木材，或是到铁厂里去。他的老婆拿我当她的小厮，叫我倒脏水，削马铃薯。她什么事情都要踢我，还时常拿踢我寻开心，要是我没有马上猜出她的脾气，她就当面给你二三记拳头；她时常因为她的男人喝酒，大发脾气。要是我逃走的话，我要向那里逃呢？我能够向谁诉苦呢？我的母亲远在三十哩外，而且，不管怎样，她并没有一个可以容我的家。在厂里也不会好些。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那混蛋，总是拿损我来寻开心。他会说‘小家伙，把铁条给我拿过来，就在那，’他指着烧铁炉所在的那个角落里。我就挣了那块铁条——这才晓得那铁条是刚刚打过的，刚从炉里拿出来，它黑黑的搁在那里，可是热得可以烫断你的指头。我痛得大声号哭，而他却笑得捧住肚子。

“我忍受不住，结果我就逃回家。但母亲不要我在家；她只是哭着把我带回德国人那里。在第三年，他们方才教我一点本事，但还是不断敲打我，因此我又再逃走，到斯培洛康士坦丁诺夫去。我在那里一家腊肠厂里找到事情，有二年左右一味洗着肉肠，过着狗一样的

生活。后来老板赌纸牌把工厂赌输了，清还了我们四个月的欠薪，这样我又失去了这腐臭的事情。我很感激那里铁路工厂里的一个工人，他可怜我，晓得我在铁厂做过工，所以他自己假装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荐到厂里去。他们按照高度，把我当十七岁收了下來，我就做了旋盘工的助手。我在这里做工已经九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的生活，至于现在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

阿尔青用帽指指前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他必须说到更重要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最难说的一部分——他不能等到别人问他之后再說，因此攢着那对浓厚的眉毛，继续說下去：

“谁都有权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风暴的开头做了布尔什维克。我能回答他们什么呢？那不是年龄的关系，我离年纪老还远得很，然而我却没有找到正路。我用不着掩饰，我们是错过正路的，老实說，我们都应该在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在德国进攻我们的时候开始走这条路的。有一个水手叫朱赫来的，他曾多少和我们谈起这事情。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手里才拿了来福枪。后来这事情结束了，我们把白军赶进黑海去，这样我们就兜了一个圈了，回家里来。”

“接着就是结婚，以及孩子……我让家事牵住了我。但是现在，我们的同志列宁已经死了，党已发出了号召。我回顾自己的生治，看出它所缺少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保卫苏维埃，我们还应当像一家人一样加入它，以代替列宁，使苏维埃世界跟铁山一样永存下去，否则就不足保卫一切的事物。成为布尔什维克是我们的义务——可不是，难道他不是我们自己的党吗？”

阿尔青·柯察金，就这样简单地但又十分诚恳地结束了他的演说，他对他刚才那种奇怪的说法虽然有点难为情，但他觉得肩膀上的重担已给推开，因此直到站在那儿等待质问。

“也许有人要提出问题吧，”西洛登科对会众說。

工人们中有点激动，但没有立刻的反映，过了一会，一个由机器房直接走来参加，浑身黑得像甲板的火夫，坚决地喊道：

“我们还要问他什么呢？难道我们大家对他不够清楚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胖的铁匠奇里加，给热气和神经的紧张弄得满脸血红，用着像是害了感冒一样的沙声，喊道：

“他这种人不是怕死的，他会是坚强的人。让我们表决吧，西洛登科！”

就在这时候，由后面青年团员坐着的凳子上，有一个人——在半暗中不能够认出他——站起来說：

“柯察金·阿尔青同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种地，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他的地位会不会使他背离无产阶级的心理。”

会场上对这问话稍稍现出不赞成的波动，有人叱道：

“说得简单明白些。”

但阿尔青已开始回答了，他說：

“不错，同志。那青年說的挺对，我种过地的。这是十分确实的事情，但它并没有使我失去工人阶段的意识。从今天起，所有这些都完结了我要把我的家庭搬到工厂附近来，那时候就不会有什么怀疑了。无论如何，这种地的事情已把我窒闷死了。”

当阿尔青看见举手的时候，他的心又跳起来了，可是当他走回座位去的时候，他已经挺着身子走，觉得浑身十分轻松了。他听见西洛登科在他后面說：

“全体赞成”

查哈尔·布鲁克——薛尔基与娃莲的父亲——是第三个占据主席座位的人。他是不擅长说话的，这个波力道夫斯基的老助手，本身多年来就是一个司机，当他快结束他的演说，

当他提到他近来的生活的时候，他的话声放低，但是会众们全都听得见。他说：

“我有一个义务，那就是完成我的儿子们的工作。他们的死，并不是为着叫我坐在后门口哭泣的。然而我始终不曾因孩子们的死而下了决心，只有到了现在，我们的领袖的死，才打开了我的眼睛。别提起过去，让我们的生活从今天起重新开始！”

查哈尔被他脑里复活的记忆所恼乱，他紧紧地蹙着双眉，当全体举手毫未提出严厉的问题就接受他入党者之后，他的眼睛又有光彩了，他的白头又抬起来了。

这一批新入党的检查，一直继续到深夜。只有他们中那些一向以他们的生活，表明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的最优秀的出色人物，才被吸收到党里来。

列宁的死使千万的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丧亡，至多只是砍去了根基稳固的大树的一叉，并未削弱布尔什维克的行列。

十五

两个人站在饭店礼堂的门口。其中一个架着夹鼻眼镜的高个子，戴着写上“纠察”二字的红色臂章。丽达·乌斯金问道：

“请问乌克兰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开会吗？”

“是的，你有何公共？”那高个子客气地回答。

“请让我进去”丽达说。

那高个子堵住了半边门从头到脚的打量着丽达一番，说道：

“让我看一看你的身份证好吗？只有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才能进去的。”

丽达从她皮包里拿出一张印成金黄色的票子，那高个子念着：“（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于是他的客气消失了，马上现出殷勤和亲热来，他对她说：

“对不起你可以在左手边那里找到空位子的。”

丽达在一列列的坐椅中间走着，找到一个空位坐了下去。虽然会议已将近结束了。她开始倾听主席所说的话，那声音在她听来似乎是挺熟悉的。

“同志们，参加全俄大会的代表以及苏维埃的代表已选出来了。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钟头，请诸位再把各人的身份证呈交检查。”

这时候丽达认出了阿金——他正在念着名单。念到每一个人，就有一只拿着红的或白的身份证的手举上来。丽达聚精会神地听。骤然有了一个熟识的名子——潘克拉托夫——她找着那只高举的手，但在人头的大海，无法看清那码头工的熟识的脸孔。名单很快地念了下去，又有一个熟识的名字“奥古尼夫，”接着，紧凑上去的是另一个“查基，”查基她可以看见。他坐在离她不远处，身子刚好半朝着她。他的侧相挑起了她的记忆。……是的，现在她记起他了，他就是查基；她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名单继续念下去，直到最后，其中有一个名字使她大吃一惊——柯察金。在她前面很远处，有一只手臂举上来又放下去。多么古怪，她竟迫切地想去看着那个不相识的，与她死去的同志同姓名的人。她的眼睛一刻不离那方向，竭力想看到他，但所有的后脑勺看来全是一样。因此她站起身，沿着通廊走到前排去。这时候阿金已念完了名单，接着就是一阵椅子后移嘈杂声和响亮的谈话声与年青的笑声。同时阿金正竭力控制那闹声，高喊道：

“同志们，别迟到。记住，大剧院……七点钟……”

出口处非常拥挤，丽达心想，在这一股人的洪流中，她大概找不着那些刚才她听到他们的名字的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金，再由他找到别人。她朝他走去，让最后的一批代表从她旁边走过。接着，她听见在她后面有人说道：

“好，柯察金，老朋友，现在我们应当跟过去一样好好的干。”

然后她又听到一个声音，那么亲热的，那么难忘的声音在回答：

“是的，让我们干下去。”

她回转身一看，她看见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人，穿着褐色的紧身军装，横腰紧紧地束着一条狭边的高加索皮带。她张大眼睛瞪着他，当他的双臂深情地搂着她，他那含糊而颤抖的声音喊着“丽达！”的时候，她晓得他真正是保尔。

“你还活着？”她不知不觉叫了起来。

这简单的问话已告诉他一切了。这些时候，她始终不晓得，关于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的。礼堂早已空了，从那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外面捷维斯卡耶街大道上的闹声。时钟已清楚地敲了六下，他们两个恍惚还是刚见面似的。可是时钟已警告他们，应动身到“大剧院”（布尔什剧院）去了。

当他们已经沿着宽大的楼梯走向街上去的时候，她从头到脚打量着保尔。现在他已比她高过半个头。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加拘束，更加男子气。她对他说：

“你想一想，我甚至还没有问你，你现在究竟做什么工作。”

“我是区青委会的书记。”

他们走到外面，混在迅速开过的车辆的闹声，和行人的走动与话声中间。在到剧院去的路上，他们不大说话，但全想着同样的事情。剧院已被一片人海包围了——这是骚动不息的、冲击着那巨大的石造建筑物的海——每个人都竭力想走进红军士兵守卫着的那走道。但他们不让别人，只让代表们走过，而代表们也不得不骄傲地高摇着他们的身份证，走过那严密守卫着的走廊。

那人海尽是青年团的团员。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参观证，仍然想不顾一切进去、参加大会的开幕礼。那些有急智的人，设法混进真正代表们中间去，摇着一张红纸头冒充身份证，希图侥幸跑到会场的门口，有的人还打算混进会场里去。但他们一碰到值班的中央委员或是纠查员，——他们在那里指挥参观者走上花楼，代表们走进大厅——就只好回到外面来，使别的“无票”者大为快意。那剧院甚至连那些想进的人的二十分之一，也是容纳不下的。

丽达和保尔用了极大的力气走到会场的门口。代表们不断乘着电车和汽车赶了来，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士兵——青年团自己的人——开始难以维持秩序了，他们被挤到墙边去，同时到处是响亮的人声：

“挤过去，兄弟们，挤过去！”

“叫卓伯林出来，叫萨沙·柯沙列夫出来，他们会领我们进去的！”

“挤过去，伙伴们，我们胜利了……”

一个眼睛敏锐的带着“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臂章的青年，和保尔、丽达同时挤过了大门，在呈验了证书之后，就一直朝正厅走去。一转眼间，他已在代表的水流中消失了。丽达指着花厅后面的座位，说道：

“请我们坐在这儿吧。”

他们在一个角落里找到座位。

“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虽然这是旧时的事情，我想你曾回答它——为什么当时你要放弃跟我学习的功课以及继续我们的友谊呢？”

他从会面的最初的瞬间，就预料到这个问题了，然而这问话此刻还是使他昏乱。他们的眼睛互相接触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断绝的原因的。他说：

“丽达，我想你是知道的。这是三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别无他法，只有痛责保尔当时的行为。保尔·柯察金终生一直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而在大错中有一桩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丽达微笑了。

“一个怪动人的序言，”她说，“但我所要求的是回答！”

“该责备的不仅我一个，”保尔轻声回答。“牛虻和他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是该斥责的。

这本描写男性典型的，坚毅的，革命精神强烈的，大无畏而且彻底献身于我们的工作的人物 的书，给我一个异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怀着一个要跟他们完全一样的愿望。所以，你明白，我使了我对你的感情成为牛虻式的。现在在我看来，这是荒唐，不仅荒唐，而且可厌”。

“换句话说，是不是你对《牛虻》的评价过高？”

“不，丽达，老实说，并不。评价过高的，只是那种苦痛地考验着一个人的意志的，无谓的 悲剧成分。但就《牛虻》的本质，就他的坚毅，他那种无限制的忍受辛苦的力量，以及那种 能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拥护的。我拥护那种认为个人的事物丝毫不能与全 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的典型。”

“保尔，我们只有引为遗憾，这谈话不幸竟在它早应该谈的三年之后。”丽达说，她有点心 不在焉的笑了笑，好像正在想着别的事情似的。

“丽达，你因为我对于你，一向够不上比同志进一步而懊悔，是不是？”

“不，你一向可以比同志进一步。”

“那么，事情还来得及补救。”

“以经迟一点了牛虻同志。”

丽达对她自己开的玩笑笑了笑，说明道：

“我现在已有一个小女孩了。我的小女孩有一个父亲，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 谐地 住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她的手指放在他的手臂上。这是表示对他关切的一种动作，但她立刻看出这是不需要的。是 的，在这三年来，他已经长大了，而且不仅是在肉体上。她晓得她说的话使他难过——他的 眼睛告诉了她——但他毫无表情的对她说：

“然而，我所得的还是无限地多过我所失的。”

他们站了起来，已经应该到更前面找寻位子了。他们跑到乌克兰代表所在的花厅去。

乐队演奏了，巨大的旗帜燃着红色，电炬的大家喊着：“未来是我们的。”花厅里，包厢 里， 楼厅上，有着千万的人，他们在这剧院化成为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强大的力的转换者。这 大剧场，把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的青年卫士的精英，容纳在它的围墙里面。千万只眼睛，全 都反映着厚重的帷幕上那同一的燃烧的标语——“未来是我们的。”

同时，人们仍不断的流了进来。再过几分点，那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就会揭开，而情绪火 热的 卓伯林，对着这惊人的壮观，一时间将失去他的镇定，然后他就会开始说：

“我宣布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届大会开幕。”

保尔从未这么显著地或是这么深刻地感到革命的伟大与力量，也从未感到这么无可形容 的骄 傲与无可匹敌的喜悦，现在生活已使他，作为战士和建设者的他，得到布尔什维克主 义的青 年卫兵的胜利的凯旋了。

大会需索它的参加者的全部时间，从早晨直到深夜。保尔只在某一次的最后会议中，再 看见 丽达一次。他看见她混在一群乌克兰人中间。他们谈了一会，丽达对他说：

“明天大会一结束，我就动身。我不能确定我们有没有一个临别的谈话的机会。因此我 已把 我过去记述我们的事情的二本日记，和一封给你的信，准备好了。你读完之后，寄还 给我。 那些东西会把我没有机会告诉你的一切事情告诉你的。”

他握着她的手，给她一个烫热的注视，好像要把她的面孔印在他的记忆上似的。隔天， 他们 如约在大门口会面，丽达给他一个包裹和一封缄封的信。周围有着许多的人，所以他们 十分 约束地互相道了再见。他可以从她那朦胧的双眼中寻出巨大的温暖和多少的忧郁。 一天之后， 火车载着他们各自东西。

有几只客车挤满着乌克兰的代表们，保尔是在基辅组的。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已睡 熟， 奥古尼夫在他旁边正发出轻轻的鼾声的时候，保尔移近灯光，打开了那封信。

“我最亲爱的保尔，我本来可以亲自告诉你，但这样做来得容易些。我只希望一点：我

不喜欢我们在大会开头所说的话，在你的生活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我晓得你是很坚强的，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话。关于生活，我不是从形式上着眼的，在个人关系中，有时也能有例外（虽然，真的非常少）如果它是真正深刻的感情的结蒂的话。你就是该得这种例外的，然而我却把我最初的冲动收回来，我不想偿还我们的青春的宿债。我不以为这会给我们更大的幸福。不过，保尔，你对你自己不应那样严酷。生活不但有斗争，而且有着产生良好的感情的快乐。

“至于你以后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指它的基本的满足，我是不会不安的。丽达。”

保尔怀着缥缈的思想，把那封信撕成碎片；他把手伸到窗外，让激动的风把那些碎片从手里吹出去。到了早上，那两本日记也已念完了，他又把它们装在包裹里，扎了起来。

两年过去了。

心平气和的时代已渡过了许多的日月；在那些日子里，生活——看来似乎是单调的——是激烈的，五色缤纷的。而且时常带来了新的事物。一个伟大国家的子民，一亿六千万人，第一次地成了他们自己那广大的土地与丰饶的富源的主人，而且正为着恢复被战争所蹂躏的经济，作着英勇而紧张的努力。国家已越来越强，它的力量已越来越大了；还在昨天，工厂的烟囱，因被弃置而现出绝望与惨淡；而今天，人们已可以看见它们正喷出一阵阵的煤烟。

这两年，在保尔·柯察金是两个迅速运动的年头，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走过。他不能够清静过活，也没有在每天清早打着呵欠，或是准时在晚上十时睡觉，他不断地过着匆忙的生活，不仅是独自一个人匆忙，还迫切地督促别人如此。

他是吝啬睡眠的时间的，在深夜里，时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透着亮光，人们在那里围桌而坐，做着阅读与研究的工作。在这两年中，他已念完了《资本论》的第三卷，认识了复杂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机构。

拉瓦里金到保尔区里来了，省委提议由他接替区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工作，派了他来。当他到来的时候，保尔恰好在外地，执行部就在保尔缺席的时候，派他到一个分区里去。等到保尔回来晓得了这事情，他一声不响。一个月后，保尔就到拉瓦里金分区里巡察。他看到的并不多，但下面这样事情却是值得重视的：拉瓦里金平日喝酒，并拉拢所有的坏份子，面好的份子却无所事事。保尔把所有这些报告给执行部。当执行部别的同志们，全都主张严厉惩戒拉瓦里金的时候，保尔提出的意见却使他们吃了一惊。他说：

“我主张开除他，并剥夺他以后再度要求入党的权利。”

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惩罚太重，但保尔再度要求道：

“这流氓是应当开除的，我们已经给这个腐化的高等学校出身的小东西一个做人的机会了，然而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以党作为幌子。”保尔接着便叙述贝兹多夫的插曲——拉瓦里金和女同志莉达某天晚间发生冲突的事情。

拉瓦里金高声叱道：

“我对柯察金的叙述提出坚决的抗议。这是一种私仇，谁都可以捏造反对我的籍口。让柯察金拿出真实证据来。我也可以编造事实，说他干着走私的勾当——请问你们会不会为这开除他？不，让他拿出真实的证据来。”

“你等一等吧，我们会拿出证据来的，”保尔说。

拉瓦里金离开了房间。半个钟头后，保尔胜利了。执行部通过了这样的决案：“拉瓦里金非青年团所能容，立即开除。”

当夏季到来的时候，保尔的朋友相继来到外面渡他们的假日。那些不健康的都到海边去。他们在夏季刚刚到临的时候，就梦想着休息了，保尔让他的同志们走，竭力使他们得到特别票子和赴疗养院的便利，他们在走的时候虽然苍白而且疲劳，但都是快乐的。他们的工作接着就落在保尔的肩膀上，而他也担负起来，像一只拖着车子上山的驯顺的马一样。他

们回来的时候将带着黝黑的面孔，健旺的精神和饱满的精力，那时候又将轮到别的一批人。因此整个夏天他们即使缺少什么人，但生活是不会停步的，保尔也就没有一天不在办公。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是恨死秋天和冬天的，这两个季节对他就是更大的肉体的磨难。因此他特别躁急地等候着本年的夏天。他的身体正在逐年衰弱中，但他觉得，甚至就是对他自己，也苦痛地难于承认这一点。现在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他自己承认，无力忍受繁剧工作的艰苦，换句话说，自认他是一个病人；否则就是继续工作，直到他完全病倒。他选定了后一条路。

有一天，在区党执委会执行部里，一个负责本区卫生事务的医生，也是秘密工作时期的老党员，名叫巴德力克的老头子，坐在保尔旁边，对他说道：

“柯察金，你的气色很不好。你曾到‘医务委员会’诊察过吗？大概是没有，是不是？我想我就记不起来。不过，好兄弟，你自己应当好好治一下。星期四下半天你到我那儿来一趟吧。”

保尔没有去。他很忙。可是巴德力克可没有忘记他，有一天，他把保尔捉住了。经过一番辛苦的检验之后（巴德力克本身以神经病理学家参予检查，）能过了如下的意见书：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应立即给假，俾在克里米亚从事长期的治疗与调养，否则严重的后果决难避免。”后面就是很长的一串拉丁文的病名表。

保尔只从这病名表推测出，主要的病症并不在他的双脚，而在乎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害。

巴德力克亲自将委员会的诊断书送给党的执行部，大家对立刻解除保尔工作一点，全都赞成。但他本人提议，等到负责区青年团委员会组织部的斯比尼夫回来之后，他本人方才离开。他害怕把委员会交给不很可靠的人。这一点巴德力克虽然反对，但医务委员会都表示同意。

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将渡着他一生的第一次假日了。在他的台子的抽屉里，放着他那张厄帕托利亚疗养院的入院证。现在他的工作比平常更努力，还召集了区青年团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为着使他能安心离开，他一点也不顾惜他自己。就在他离别的，行将初次看见他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后，竟发生了一桩丑恶的意外事件，一件他想也不曾想到过的事情。

在公毕之后，他走近党宣传部的办公处，坐在书架后面关着的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部开会。他走进的时候，办公处空无一人，不久之后，才有几个人走了进来，他在书架后面，虽然看不到他们，但由声音认出了他们中的一个。那就是负责本区财务兼工业的，高身而漂亮的，有着军人风度的法罗。

保尔一向总听到法罗是一个酒鬼，无时不在追逐漂亮女性的传说。过去，法罗曾有一个时候是非正式的红军士兵，他夸有一只银表，据他所说，是拉柯夫斯基本人在一九一八年送给他的；他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就笑着告诉人家说，他曾经怎样在一天内，砍下十二个马赫诺匪帮喽■的头。保尔对这真是听不下去。有一次，一个年青的青年团女团员，哭着走到保尔跟前，诉说法罗怎样答应与她结婚，但和她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甚至竟不和她说一句。当这件事提到法纪委员会的时候，法罗设法摆脱了她，而那个女孩子又没有什么实据；可是保尔却相信她所说的话。

那些走进办公处来的人，不知道保尔坐在那儿。他们中有一个说：

“喂，法罗，你这狗，情形怎样呢？你最近的征服者是谁？”

问话的人是格里波夫，波罗朋友之一，是和他同一类型的人。不知道为了那种理由，格里波夫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宣传员，虽然他是一个极端浅薄和昏昧的人，事实上甚至可说是一个出色的白痴。但他对自己的宣传家的美名，却十分自满，一有机会，不论是适当的或

是不适当的，他总是要提到它。

“孩子，应当恭贺我！昨天我已叫那个叫柯萝泰芙的姑娘听话了。你一向不是说我怎么也不会成功吗？不，小家伙，当我看中一个娘儿的时候，我可以向你打赌，那……”他用一句龌龊的句子结束他的话。

保尔立刻感到一阵神经的寒战——这是极端愤怒的征象。柯萝泰芙这女孩子是负责区妇女部的，她和保尔同一时刻到本区来，由于共同的工作，保尔成了她的好朋友。因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党工作人员，她对别的一切妇女，事实上，是对任何一个到她那里请教或求助的人，都是敏感的和殷勤的。她向来很被委员会全体所尊重。她是独身的。法罗所说的，无疑就是她。

“这是真的吗，法罗？”格里波夫问。“我实在不敢相信。”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吗？那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呢？比柯萝泰芙更难弄的娘儿们我还弄到手哩。你只要晓得怎样去弄。每个女人都要求一种特殊的接近她的方法。有的当天就让你弄到手，不用说，这些都是废料。别的呢，你得追上一个月。主要的事情是要晓得她们个人的心理，你时时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接近她。好兄弟，这正是我全部的秘诀，自然，我是一个专家。”他咯咯地笑起来，直到自满使他喘不过气来。那些听者就开始逗着他叙述详细的情形。保尔站起身来，握紧着他的拳头，他觉得他的心正在疯狂地跳动。

“自然，谁也不能想单用花言巧语，就能弄到柯萝泰芙的，我可不能丢开她，特别是因为我 和格里波夫打了一箱波特酒的赌。因此我开始表演了……许多次顺便跑去看看她。我看出她正在戒备我。她心里记着外间关于我的种种传说——说不定她已听到什么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因此我想由后方进攻她。哈，哈！我开始叙说许多事情，我怎样参加战争，杀了那么多的人，怎样做了这么个流浪汉，一向又怎样忍受过多的忧愁，从未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合式的女人，以致过着这么孤独的可怜虫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体贴我，或是对我表同情。……一直这样哭诉，一味哭诉下去。一句话，进攻她的弱点。不用说，我遇到了许多的麻烦。有一次，我甚至想索性放弃她，结束这场滑稽的表演；但是，这在我是一桩主义上的事情，此所以我仍然继续下去。到了最后，她让我握住她的小蹄子。接着这么忍耐的结果，我发觉我得到的不是一个妇人，而是一个处女。哈，哈！太有趣了。”法罗还把他那令人作恶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保尔怎也记不清楚当时他怎样起来痛斥法罗，他大声骂他：

“你这畜牲！”

法罗立刻回骂道：

“你骂谁畜牲！指我还是指你？你这偷听人家说话的臭东西！”

保尔显然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罗——他有点喝醉酒——就抓住他的胸口，给他一拳，叱道：

“你以为你能够这样侮辱我吗？”

接着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保尔拿起一只橡木条凳，只一下便把法罗打倒下去。保尔是把手枪留在办公处里的，只在这一情形下，法罗方才没有丧命。然而他已打伤别人了，因此在他动身赴克里米亚的那一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整个党的组织在城里的戏院里集合，这件事已惊动了所有的人，这次的审问也就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而辩论的中心就是党员行为的一般道德的问题。本来是法庭案件的实际事实，反因党员行为，个人关系，以及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而让居次要地位。这案子已成为这些问题的象征了。

法罗本人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的。他骄横地微笑着说，这案子应由普通法庭处理，而柯察金将因此项殴打被判罚苦役。他坚决拒绝审讯，喊道：

“什么？你们打算利用我这案子来做笑谈吗？对不起，办不到的。你们可以共同商量对付

我的方法。至于妇女们对我的攻击呢，理由很简单，要是你们想知道，我可以这样说，这只是我没有照她们的意思殷勤招待她们。这是得不偿失的，要是现在是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照我自己的方法，和柯察金这疯子算算帐。这件事你们没有我在这儿也可以进行的。”说完了他就离开了法庭。

当法庭主席要求保尔叙述经过的时候，他平和地说着，虽然谁都可以看出，他是在竭力抑制他自己的。他说：

“这里讨论的每桩事情，全是因为我没有约束我自己才发生的。从前，我曾用我的拳头代替我的脑袋，但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这回的事是意外的，在法罗的头挨打之后，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事情。这样的举动在我近数年来还是第一次。我痛责我自己的行动，虽然，说句实话，他的挨打是应该的。在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中，法罗是一个反常的可恶的现象。我不明白，而且永远不明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同时又是这样的一个淫棍，这样一个流氓。这意外的事件，已使我们全体谈论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了，这是整个事件的唯一的积极的结果。”

绝大多数的党员赞成开除法罗出党。格里波夫受到严厉的申斥，并警告他往后不许再作伪证。别的参加谈话的人则被提名，并加训斥。

巴德力克把保尔的神经的状态告诉法庭，当党代表提议保尔也应加以申斥时，全体会众都表示剧烈的反对，因此党代表撤回他的要求，保尔也就被判无罪。

几天之后，列车载着保尔上哈科夫去。区党委员会因保尔坚决的申请，同意把这件事交给乌克兰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理。他得到一封公正的品行证明书之后，就动身出发。

乌克兰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恰好就是阿金。保尔跑去看他，把事实的经过告诉了他。在保尔的品行证明书中，说到他“对党异常忠实”之后，接着就是：——阿金念道：

“保持着党员的适当的身分，但在极少有的情形下，脾气暴躁，甚至自身完全失去控制。此点的原因，乃是他的神经系统已有了严重的伤害。”

“呵，保尔，好朋友，好朋友，”阿金说。“他们到底已把那一件事，记录在别的方面都很良好的证明书中。可是你用不着耽心，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体最健康的人们中，有时也发生的。你到南方把身体治好吧。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决定你到哪里工作。”阿金握住他的手，紧紧地摇着。

中央委员会疗养院——“康闵纳特”（“公社主义者。”）玫瑰的花圃，闪烁的喷泉，巨大的花园，建筑物的盖着蔓藤的白壁。白色的服装与浴衣。一个青年女医生记下他的姓名。在边角地段一间阔大的房间里，一只白得眩眼的床，洁净而且万分静定，保尔换了衣裳，接着洗了一个提神的澡，然后慌忙赶到海边去。

在他面前，是一片伟丽而静定的，碧蓝而无边的光滑的大理石的海。它在眼光所能及的远处，与淡蓝色的云天相连。涟波映着熔化的阳光，现出鳞比的火焰。远处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隐现着。他的肺深深地吸着提神的新鲜的海风；他的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伟大而横陈的碧蓝的水的世界。小小的涟波在海岸的金色细砂上喃喃，亲切地朝他的脚上缓缓爬过来。

十六

在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的隔壁有一座附属于中央全科医院的大花园。病人们由海滨回疗养院的时候，总打从这医院走过。保尔很喜欢沐着杉树的浓荫，躺在花园尽头靠近灰色的石灰石墙的地方。他在那儿不但引不起别人的讨厌，还可以静看小径上川流不息的行人。此外，在晚上，它又是一个避开恼人的闹声——这是任何大的海滨浴场所难免的——静听音乐的好地点。

这一天，保尔又跑到那幽僻的角落去，舒服地躺在一只竹做的摇椅上打瞌睡。他刚洗完海水浴，阳光和海水已使他疲累了。他的土耳其毛巾和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放在旁边另一只摇椅上。在疗养院里的头几天，他的心神始终不宁，而且不断头痛。医师们还正在研究他那复杂而古怪的病症。可是许多次的检查和诊察，已引起他的厌烦。病房的女医生，一个讨人喜欢的年青的党员，名字很古怪，叫耶路撒冷齐克的，现在临到要看他的时候，已不易找到他了，但每一次，她还是捺着性子说服他，叫他一道到另一个专门医师那里去。

“同志，说句实话，我讨厌这一套，”他说。“我一天总得有五次对付他们那相同的唠叨的问话。他们不是问‘你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就是问‘你的祖父是不是生过风湿病？’……滚他的蛋，他们生什么病，我怎会知道，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们。当他们想叫我承认，我曾生过淋病或是别的更恶劣的病症的时候，老实说，我有时真想敲破他们的秃脑袋。我说，别逼人太甚，要不然，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整整六个星期都这样诊察我，我准要变成一个公共的危险份子。”

耶路撒冷齐克医生笑着，用玩笑回答他；几分钟后，她就偷偷地用手臂扣着他的手臂，一面对他说个有趣的故事，一面带着他上外科医师那里去。

可是今天不会有检查的。此刻离晚饭还有一个钟头。不久，保尔在半睡中听到了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他心里想：“他们会以为我是睡了，走开去的。”希望落了空；摇椅吱吱地响，那个人坐了下来。随即一阵微香告诉他，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女人。他睁开眼睛。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件白得眩眼的外衫，两只黝黑的大腿，和一双穿着山羊皮拖鞋的足。接着，他又看到一个头发修得很短的细小的头，两颗眼睛，和一排锐利的细小的白色的牙齿。

那女人有点怕羞的对她一笑，说道：

“对不起，说不定我打搅了你呢？”

保尔一声不响，这是很不客气的，因为他还盼望着她会走开。但是，她跟着又问道：

“这是你的书吗？”——她拿起那本书，翻了一翻。

“是的，是我的。”

经过了一分钟的静默。接着她又问：

“同志，请告诉我，你是住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里的吗？”

保尔现出不耐烦，心里想道：“她干什么到这儿来？这就叫做休息吗？等下她准定要问我生的是什么毛病。我还是走吧。”因此他粗鲁地回答道：

“不，不是的。”

“可是，我想我曾经在哪里见过你。”那女人说。

保尔已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他听到后面有一个女性的低音在问道：

“杜拉，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的？”

一个黝黑的，肥胖的和美发的，穿着疗养院的浴衣的少女，在摇椅的边沿上坐下。她掠了保尔一眼，跟着就问道：

“同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曾在哈科夫工作吗？”

“是的，我曾在哈科夫做过事情。”保尔已决定结束这没有完的谈话了。

“你做的什么事情呢？”

“开垃圾车！”他随口回答，可是这回答使他自己禁不住扑嗤一声笑出来。

“同志，你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是特别有礼貌的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科夫市党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的杜拉·罗德金，往后有许多次，总提起他们这个喜剧式的友谊的开始。

有一天，保尔为着听某次午后音乐会的演奏，到了泰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去，在那里，他无意间碰到了查基。

尽管说来奇怪，使他们能够见面的乃是狐步舞。当一个女中音歌女唱完了那只《夜燃烧着爱的狂喜》的歌典之后，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接着就在舞台上出现，那男的戴一项红色的歌剧高帽子，上身有着十分干净的白领，白袖和领带，下半身却几乎全裸，只在屁股上围着一圈彩色的穗条。一句话，是野人的笨拙的模仿者。那个女的只是玩具，身上堆着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一对怪物开始在舞台上缓缓移动，跳着一种扭屁股的狐步舞，这使那些成群站在疗养院观众的围椅和睡床后面的，有着牛一样的粗脖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中等阶级，开心得哼出“哼哼”的声音来。

比这更丑恶的样子，实在是难以想像的。那个戴着滑稽的歌剧高帽子的大块头，和那个扭着淫猥的姿势的女人，互相对凸着身子。保尔后面一个龅龅的大胖子开始喘息了。就在他刚已转身走开的时候，突然间，在靠近舞台的前排的地方，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叱道：

“这样的卖淫，够了！滚你们的蛋吧！”

保尔看出，他就查基。

琴师的乐声中断了，四弦琴吱哑一下就沉默了，舞台上那两个舞蹈者也停止了他们的摇摆。接着就是一阵推砸椅子的猛烈的闹声和叱责干涉者的咒骂声：

“猪猡，拆散这么一出好戏！”

“整个欧洲都在跳舞！”

“捣乱份子！”

就在这时候，车尔波维芝乌克兰青年团的书记，一个名叫芝班诺夫的青年，把每只手的两个指头，夹进嘴巴里，吹出一阵尖锐的口哨。别的人们也附和他，弄得旁观的人，简直以为舞台上那两个家伙，都已给他们吹走了。过了一会，被嘘的报告员，一个像挨打的小厮模样的人，跑到前台上，对观众宣布说，他们马上就离开。

保尔跑到前头去找查基。当天晚上，他们两个在保尔房间里谈了两个钟头。查基是在一个区委员会里负责宣传鼓动部的。他对保尔说：

“你晓得我已结了婚吗？我们马上就要养个女孩，或者是一个男孩。”

“呵嚯，”保尔说，“她是谁？”

查基从他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我认得她吗？”

那就是安娜·波哈特。……

一分钟后，杜拉和别的一群人走进保尔的房间来。查基把门关了。杜拉的眼睛盯着他身上 的勋章，问保尔道：

“这位是你的同志？他是不是党员？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保尔给这直率的问话呆住了，但他还是简单的对她说明了查基是个什么样的人，杜拉跟着就说：

“那么，他可以留在这里。这些同志是刚从莫斯科来的。他们会把最近党的消息告诉我们。”停了一下，她又说：“我们决定在你的房间里举行一次特殊的秘密的集会。”

房间里所有的人，除保尔和查基之外，全是老布尔什维克。一个莫斯科地方的党员，名叫巴塔西夫的，把有关托洛茨基，齐维诺夫，和卡美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各种事情告诉了他们。临末，巴塔西夫说：

“在这个紧张的时期，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绝对坚守我们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这会议的三天之后，疗养院已空无一人。跟别人一样，保而也提前走了。

他在青年团中委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担任该区的书记。还不到一

一个星期，该区的青年团员，已经听到他的第一次演说了。

深秋时候，区党委员会的汽车，载着保尔和别的两个工作人员，在由城外回来的路上，滑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三个人全都受伤，保尔的右腿已被轧碎。

几天之后，保尔给送到哈科夫外科学院去，外科医生们在检验了他的肿胀的右腿和拍好了X光之后，决定立刻动手术。保尔表示同意。那个率领医师团的胖教授说：

“好，就定在明天早上。”他说完起身就走，别的人也跟着他出去。

一间光亮的单人房间，洁净无尘，有着医院所特有的，他长久没有闻过的味道。他向周围看了看。一只披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一只条凳，如此而已。一个看护捧着晚餐进来。他回掉了她。他半坐在床上，写他的信。腿上的痛阻挠他的思索，他也不想吃东西。当他的信已写了四分之一的时候，寝室的门悄悄地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青年女人，走近他的床边。她一只手挽着一只纸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头和一支铅笔。她说：

“我是你的病房的医生；今天我是值日。我应该填这张表，请你回答我所有的问话。”

她甜蜜地笑了一笑。这微笑减轻了询问的不快。整整有一个钟头，保尔不但把他自己的，还把他的祖先们的事情告诉了她。

手术室里有好些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外科用具闪着亮光：一张狭长的桌子下面装着一只大盆。施行手术的准备正在暗里急速进行中。保尔向周围看了看。一个小妹妹正在安放刀针和小镊子。他的病房医生巴赞娜芙博士，开始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她说：

“柯察金同志。别看，你的神经说不定经不起……”

“谁的神经呵？”保尔冷冷地笑着问。

几分钟后，他的脸已完全面罩蒙蔽了，那教授对他说：

“别害怕，我们就要给你上麻药。你用鼻孔深深吸气，一二三数下去。”

从面罩下面发出了一阵被窒息的声音，回答道：

“好。我事先向你们道歉，恐怕会不自觉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出来。接着，令人窒息的，味道难闻的第一滴麻药水滴下去了。保尔深深喘了一口气，竭力想念得清楚。这样，他便踏入了他的悲剧的第一幕。

陈尔青差不多把信封撕成两半，然后笨拙地把信纸打开来——他非常的激动，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他的眼睛跳过了第一行，慌忙看完它，一气把它吞下去：

“亲爱的阿尔青！我们相互维得见面，一年至多只有一两次。可是见面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为着和旧的一刀两断，你和你的家，已从秀彼多夫卡搬到喀查丁的车厂去。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和史娇莎跟她的家庭那种落伍的小布尔乔亚的心理，以及别的一切，一刀两断。要改变史娇莎那种人是不容易的，我恐怕你就是这样做的，也不会成功。你又说，“人到岁数一多，要学习就很困难。”可是你学习的成绩倒并不坏，你那样固执不肯放弃车厂的工作去做镇苏维埃的主席，也是错的。你难道没有参加为建立苏维埃政府而作的战斗吗？那么，还是负起你的责任吧。从明天起，往后你要接受镇苏维埃的工作，而且马上就开始了。”

“现在说我自己的事情，情形有点不妙。我已开始浪费太多的时间住在医院里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我已失去了许多的血和精力，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和工作已失了联系，我发现了一种叫做“忍耐”的新的职业。我已忍受了实在是过分的痛苦，而结果乃是一一右膝已成残废，身上添了许多缝线，而最后就是一个新的发展！他们告诉我，七年前我背脊上所受的暗伤，现在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我已准备忍受一切，只要我能够回到我原来在队伍里的岗位上去。”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离掉队伍更使我恐惧的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到它。此所以我答应一切，可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起色，相反，景色越来越是惨淡。在经过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立刻就恢复工作，但是不久他们又把我带回来。现在我刚收到进厄帕托里亚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我明天就动身。阿尔青，别着急，他们不能那么轻易地埋掉我。我本人有着足够三生的生命。我们，哥哥，你和我，还要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要注意你的健康，别想过份的急图上进，否则以后修理，要使党花极大的代价。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可是经过一切却并不是为了在医院里作客。祝好。保尔。”

和阿尔青攥着他那双浓眉，读着他弟弟的来信，同时保尔在医院里正和巴赞娜芙博士告别。她握住他的手，问道：

“那么，你明天就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吗？你打算怎样过法呢，在你上车之前？”

“我想等杜拉同志来，今天和今天晚上，我就住在她家里，明天她送我上车。”

巴赞娜芙博士是认得杜拉的，因为杜拉时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巴赞娜芙说，“我们曾约过，在你动身之前会一会我的爸爸，你忘了没有？我已把你的病情全部告诉他，我很想让他看一看你。这件事可以约在今天晚上。”

保尔立刻同意。当天晚上，伊林娜·巴赞娜芙就带着他走进她爸爸那巨大的手术室。

这著名的医生给保尔一次小心的诊察；伊林娜也在场，她还把医院里的X光照片和分析报告带来了，保尔不禁注意到，伊林娜的面色，在她爸爸用拉丁语作了一次长篇的回答之后，突然变得灰白。他注视着老教授那个大而光秃的头，竭力想探索出他那双锐敏的眼睛的神色，但老教授是深不可测的。在保尔起身的时候，老教授十分亲切地和他道了再见——他说明他不得不赶去开会，诊断的结果由他的女儿告诉他。

保尔躺在伊林娜的房间里——这是一间布置富有优雅的风趣的房间——等着她说话。但她不晓得要怎样开头，也不晓得要怎样说才好，她实在是很难措辞的。她的父亲已告诉她说，就眼前而论，保尔体内正发作的那种特殊的破坏的炎肿性的病症，是无药可治的。他反对采用外科手术。他说：“完全瘫痪的悲剧，正在等着这个青年人，我们完全没有法子阻止它。”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伊林娜觉得不能把一切都告诉保尔；她只泄漏一部分的病情，而且说得十分谨慎。她说：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厄帕托里亚的泥土，会使你迅速得到健康，到了秋天，你就可以恢复你的工作了。”

但是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两颗非常锐敏的眼睛正在窥视她。保尔跟着说：

“你说出来的跟你避免说出来的，相差非常远，不过，我已晓得我的病情非常的严重。别忘记，我时常要求你要对我十分忠实。什么事情你都用不着瞒我，我听了不会昏晕，也不会自杀，可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将来如何。”

伊林娜和他开个玩笑，把他的探问岔开去。

那天晚上，保尔并没有晓得他真实的病情。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伊林娜·巴赞娜芙亲切地对他说：

“别忘记，柯察金同志，我是你的一个朋友。你将来什么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忙或是我的意见，请写信给我。我愿意随时为你尽力。”

她从窗口目送那高大的穿着皮外套的人，用力拄着手杖，缓缓地由门口，走到他招呼了的那辆缓行的四轮马车去。

又是厄帕托里亚，又是南部的热天和戴着绣金边的便帽的晒黑的人们。汽车在十分钟内，已把旅客们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筑成的两层楼的建筑——迈纳克疗养院。

医师领他们到他们的房间里。当他领了保尔到第十一号房间的时候，他问保尔道：

“同志，你的入院证是属于那一类的？”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尔回答。

“那么，我们让你和厄伯纳尔同志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德国人，要求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人的同伴。”

那医师一面说，一面敲门。他们听到里面送出一个发音很不准确的“请进”。

保尔放下提箱，转对着那个躺在床上，有着生动的蓝眼睛的美发的人。那德国人给他一个温情的微笑。

几分钟后，保尔已坐在那德国人的床上，大家开始用那种国际的语言，作着生动的谈话了——在这谈话中，话语是次要的，一切难懂的字句，全用猜度，手势和模仿，也就是不成文的“Esperanto”（世界语）的一切秘诀，帮着说明。保尔已晓得厄伯纳尔是一个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厄伯纳尔屁股上曾中了一枪，现在旧创复发，使他病倒。尽管创口疼痛，他还保持着活泼的精神，所以立即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本来不需要一个更好的同伴。他不是成天对人嗟叹自身的命运和诉说自己的苦痛的人，相反，他要使你忘却你自己的病情。他心里想：“糟糕的，是我连一点德文也不懂。”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只摇椅，一张竹桌和两只病人坐椅。五个病人，每天在诊治之后，就在这儿消磨一整天；别的病人都叫他们做“共产国际执委会。”

厄伯纳尔斜靠在一只病人坐椅上，另一只坐着完全禁止用脚的保尔。其他三个人，一个是笨重的爱沙尼亚人，名叫魏曼，克里米亚共和国人民贸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个是有着淡红色眼睛的，像十八岁少女的青年妇人，名叫玛莎的拉特人（来多尼亚人；）另一个是李定涅夫，由西伯利亚来的，高大魁梧，鬓角业已灰白的人。事实上，他们代表五种民族——一个德国人，一个爱沙尼亚人，一个拉特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则是乌克兰人。玛莎和魏曼说的是德语，厄伯纳尔请他们做翻译。保尔与厄伯纳尔因同居聚在一起；玛莎与魏曼又因语言相通和厄伯纳尔相近，而最初联结保尔与李定涅夫的，乃是下棋。

在李定涅夫到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棋赛的冠军，他在经过一番紧张的斗争之后，把魏曼的锦标夺了过来。魏曼一经挫败，对付事物已失去了他往常那沉着的态度，而且很久不肯饶恕打败他的保尔。不久，一个年纪大的人出现了——他虽然已五十岁，看来还十分年青——他向保尔挑战。保尔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危险，沉着地开棋，想牺牲一子以取得优势，李定涅夫对这一着的回击，是推进他的中卒。因为是冠军，保尔不能不和每一个新的棋手下一局，所以每次都有许多旁观的人。还早在下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已发觉李定涅夫那些沉着推进的卒棋正在围困他，他晓得他已遇到一个危险的敌手，后悔他开头不该那样粗心。经过三个钟头的紧张角斗之后，尽管他竭尽全部精力，保尔还是被迫让位。他比周围所有的人更早地看出他自己的失败，他向他的敌手掠了一眼，李定涅夫回报他的，是一个和蔼的慈爱的微笑。显然，他也已看出这一局是他得胜的了。但非常冲动和亟望保尔失败的，丝毫不想掩饰这一点的魏曼，却还没有看出来。

“我是时常坚持到最后一着的，”保尔说。

这句话只李定涅夫一个人懂得，他同意地点了点头。

在五天之内，保尔和李定涅夫下了十局，输了七盘，赢了两盘，一盘是和局。

魏曼得意洋洋了。他高声喊道：

“好！谢谢你，李定涅夫同志；你已把他打得体无完肤了！活该！他打败了我们所有的人，可是结果另一个老手却叫他栽了一个筋斗！哈哈哈！”

他又转身对那个失败了征服者，问道：

“喂，吃败仗的味道怎样？”

保尔棋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他只懂得棋战战略的皮相；一个起码的棋战的“好”手，自然要输给一个懂得一切棋盘秘密的名家。保尔虽失去了冠军的荣衔，倒交到一个非常相

近的亲 爱的朋友，那就是李定涅夫。这两个人发觉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日期；保尔的出生正和李定 涅夫的入党同年，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的代表，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战士，另一个是布尔 什维克的青卫军。一个有着生活与政治的伟大经验，经历了多年的地下工作，沙皇监狱以及 其后的重要的国家施政工作；另一个却有着火烈的青春和足以耗尽别的许多人的一生的八年 斗争。而且这年老的和年青的两个，又各怀着雄心，害着重病。

一到晚上，保尔和厄伯纳尔的房间便做了俱尔部。这俱乐部是一切政治新闻的泉源。十一号 病室的晚会是生动的。魏曼时常想叙述一个龌龊的故事——他是最喜欢这种故事的人——而 每次，他总是同进受到玛莎与保尔的攻击。玛莎是用精巧而辛辣的讥刺奚落他，要是不奏效，保尔便加入进去。比方，玛莎有一天这样说：

“魏曼，你应当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大家不见得都能欣赏你的‘幽默’……”

保尔接着就插嘴道：

“我完全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会……”

魏曼就努着他的厚嘴唇，轻蔑地溜动他那对狭小的眼睛，说道：

“我们应当在中央政治教育部里设一个道德总监，叫保尔做监督主任。我是可以原谅玛莎的，她有着女性的本份的敌对，但保尔呢，倒想叫他自己装做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就像一个青 年团的小宝贝似的。……无论如何，我是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的。……”

在双方关于共产主义伦理作了这个特别热闹的舌战之后，龌龊故事的问题便提交全体讨论。玛莎把已提出的各种意见翻译给厄伯纳尔听，结果厄伯纳尔用着德语和不到家的俄语说道：

“我同意保尔，色情狂在趣事是不很好的。”

魏曼被迫后退了。他竭力以打趣掩护他的退却，可是从此之后，他不再讲叙这一类的事了。

保尔开头以为玛莎是一个青年团员。在他看来，她似乎只有十九岁。有一天，在和她谈话的 时候，他才晓得她今年已三十一岁了。自一九一七年起，她已是一个党员，而且一直是一个 活跃的拉特的党员。保尔当时的惊讶是可以想见的。一九一八年，白党已判她枪决，但苏维 埃政府以别的白军俘虏赎换了她，现在她在《真理报》里工作，同时已经修完了她的大学的 课程。保尔怎也想不出，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不过这个时常来看厄伯纳尔的细小的拉 特妇人，已成为“五人团”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份子。老党员伊列特，另一个拉 特人，时常叫 她窘恼的打趣说：

“要沉着些，玛莎，可怜的老奥左尔在莫斯科不知道怎样过呢。这种举动是完全不行的！”

每天早晨，在起身钟快要响的时候，疗养院里总有着吵人的雄鸡在啼声——厄伯纳尔是一个 第一等的口技家。院里的职员竭力想寻出这只离群的公鸡，怎也找不到，厄伯纳尔对这非常 高兴。

一个月后，保尔的病况突然转坏，医师们嘱咐他睡在床上。这使厄伯纳尔难过起来，因 为他 是非常喜欢这个从来不诉苦的，生气蓬勃和精力沸腾的，年纪这么轻就丧失健康的青年布尔 什维克的。当玛莎告诉厄伯纳尔，说医师们已指出保尔的悲惨的将来的时候，厄伯 纳尔听了 十分恼乱。

在疗养院里，保尔是始终被禁止步行的。他竭力不让旁人看出他的痛苦，只有玛莎从他 双颊 那不平常的灰白猜了出来。在他离院之前一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中委会的一封信，通知他 的假期延长两个月。又说据疗养院报告，就他目下的身体而论，恢复工作是完全谈 不到的。中委会还随便信汇来了一笔钱。保尔受到这初次的打击，正如他在学习拳斗时受到朱赫来的 初次的打击一样，虽然倒下去，可是立刻就爬起来。

差不多同时，他又收到一封他母亲寄来的意外的信。老太太在信里告诉他说，她有一位

老朋友奥宾娜·秋昌住在离厄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小港口上，他们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所以奥宾娜老太太很盼望保尔能去看他们。这封意外的信，在保尔的生涯中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全疗养院的人都到港口亲切欢送保尔。厄伯纳尔亲热地搂着他，像兄弟一样的亲吻他。玛莎没有在场，所以保尔没有和她告别就走了。隔天早上，一部载着保尔离开码头的四轮马车，驶到一座有着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那个陪他的人，进去问问秋昌家里否住在那里。

秋昌家一总有五个人：母亲奥宾娜·秋昌，是一个肥胖的上了年纪的妇人。有一对阔大而抑郁的眼睛，衰老的面孔上残留着前时美貌的余韵；她的两个女儿，罗莉和达雅，还有罗莉的小男孩，和那个在合作社里任事的，肥胖而又愠怒，很像一只野猪的老头子。小女儿达雅，做着普通工人的工作，大女儿罗莉本是一个打字员，最近刚和她的丈夫分居，因为她丈夫是一个暴汉和醉鬼，又兼失业。她成天在家，忙着照顾她的小男孩，和帮她母亲料理家务。奥宾娜老太太还有一个名叫乔治的儿子，但此刻他还住在列宁格勒。

秋昌家给保尔一个亲切的欢迎；只有那老头儿赏给保尔一个谨慎的，甚至可说是恶毒的颜色。保尔耐性地把他所知道的柯察金家的事情，全告诉他母亲的老朋友，同时也尽可能了解她和她家的生活的情形。

罗莉已经是二十二岁了，有着赭色的简便剪成的短发和阔大的脸。她立刻成了保尔的好朋友，很乐意把她家的全部的秘密告诉他。保尔由她嘴里，晓得老头儿以暴虐而无情的巨掌，控制了整家庭，并且消灭一切的主动，或是一切的主动意志的表现。他是一个谰诈的，气量小和心胸窄的人。为了镇压全个家庭，他失去了女儿们的情爱，而他妻子，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反对暴虐行为的斗争之后，也痛恨着他。女儿们是站在母亲方面的，不断的家庭的吵闹，使他们的整个生活变得惨淡，因此过着的日子，充满着各种没有完的大小的侮辱和伤害。

乔治是她第二个孩子。由罗莉的叙述看来，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个只晓得吃好菜，喝好酒和穿漂亮衣裳的自负而傲慢的家伙。他念完了高等学校的课程之后，为了他是他母亲的宠儿，他立刻向她要钱到莫斯科去。他说：

“我要进大学。罗莉可以卖掉她的戒指，你可以卖掉旧的服饰。我只要钱。至于你们怎样去弄到钱，我全不管。”

他很知道他的母亲不会拒绝他，所以他无耻地尽量利用她这个弱点。他对待姊妹们很傲慢，但姊妹们自认他们是低级的人物，倒对他是殷勤；现在他的母亲还是把她从老头子处弄得来的每个铜板，连同达雅的收入一齐寄给他。至于这位小白脸呢，他可没有考上大学，现在正和他的叔叔住在一起，很不寂寞，还用电话迫着他的母亲要钱。

直到那天晚上，保尔方才见到达雅。她的母亲跑到客厅去低声对她说客人已经到了。当介绍她和保尔见面的时刻，她害羞地和保尔握手，面孔红到耳朵尖。保尔有好几秒钟握住她那强壮的起茧的手。她年纪十八岁，虽不漂亮，但粉红色的眼睛，修长得恰好的有点像蒙古佛像的双眉，整齐的鼻孔和鲜丽的双唇，却使她很动人；她的工人罩衫紧紧地绷着她那丰满的年青的胸脯。

姊妹俩住在两间狭小的房间里。达雅的小房间放着一只小铁床，一只上面摆着许多玩具和一面镜子的衣柜，壁上挂着十几张照相和风景书片。窗台上陈列着两只花盆，种着深红的天竹葵和苍白的玫瑰花。淡蓝的带子束住薄纱的窗帘。罗莉打趣她说道：

“达雅向来不让男性的代表们看她的房间的，可是，你瞧，她为你破了例哩。”

当夜全家在老头子那一半的屋里喝茶。达雅留在她的房间里，可以听得见他们的谈话。他的爸爸故意不断用调羹搅看茶里的糖，一面从眼镜后面打量着坐在他前面的客人，说道：

“我诅咒这些新的家庭的法律；他们高兴就结婚，高兴就离婚。完全自由。”他喘了一口气，在阵咳嗽发作之后，就指着罗莉说：“比方说，这位年青的太太，她一点也没有征求别人的同意，就和那个流氓结婚，回头，也是不问别人，又和他离婚了；现在，人家以为我们会满高兴的养活一个陌生人的后裔呢。丢脸的事没有个完！”

罗莉痛楚地涨红着脸，她的眼睛避开保尔，因为饱含着眼泪。保尔接着就说：

“什么，你认为她应当继续和那寄生虫住下去吗？”他的眼睛一直瞪着那老头儿，闪着两朵小小的愤怒的火焰。

“她在嫁给他之前，照理应当多想一想。”那老头子说。

接着母亲插嘴了。她好不容易才抑住她的气愤，说道：

“你干什么要在一位生人面前谈起这种事情。找别的事情谈谈吧。”

老头子立刻转对她，啐了一口，说：

“我晓得我谈的是什么。打什么时候起，你以为我吃得下你的教训呢？”

那天晚上，保尔躺了好久，一直想着秋昌家的事情。机缘已把他带到他们中间来了，现在他正是一幕家庭战剧的无意的客串者。他不晓得怎样才能够帮助那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摆脱他们的束缚。他自己的困难使他难以走动，他的未来充满着许多问号，而且他一向就从未像现在这样难以有所作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老太太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那老头子。可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能负责组织这个家庭革命，因为再过几天，他就得离开他们，说不定将永远不会和他们再见。那么，他就让一切听其自然，避不搅起这狭隘的大屋子里的灰尘吗？

老头子的讨厌的印象使他无法休息。他拟了许多计划，然而似乎都没有实行的可能。隔天是星期日，当保尔由镇上回来的时候，他发觉达雅独自在家。别的人都到外面访问一些亲戚。保尔跑进她的房间里，因为非常疲倦，不客气地坐下去。他问她为什么从不到外面溜达，或是找些消遣。她低声回答道：

“我只是不想去。”

他接着想起昨夜所做的事情，决定把他所考虑的告诉她。为着使他们的谈话能在别人回来之前结束，他劈头就触到本题，对她说道：

“你听，达雅，你我两个可以坦白地亲密地互相倾谈”——他直接使用了俄文亲密的“你”字——“干什么我们俩要讲这些东方的礼貌呢？我马上就要离开你，我恰在最不幸的时候认得你，我自己正搅得糊里糊涂，要不然，情形一定会两样。要是这情形发生在一年之前，我们大伙一定干脆的离开这儿。像你和罗莉这样的工人，到处可以找到工作。你们只好割弃你们的爸爸，世上谁也不会使他的头脑清楚的。可是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我自己还不晓得本人的将来如何，可以说，我已被解除武装。那么，怎么办呢？我要设法恢复我的工作。医院们关于我的病情，说过许多可笑的话，朋友们也叫我无限期的治疗下去。我们得先把这件事弄好再说。……然后我就和我的母亲保持接触，那时候我们再考虑如何结束你们这事情。不管怎样，我决不会丢开你们不管。只有一点，达雅，你们大伙，特别是你，必须彻底改变你们的生活。你有这样做的力量或是这样做的愿望没有？”

她抬起头来，大声回答道：

“愿望是有的、可不晓得怎么才会有力量。”

保尔明白她的踌躇，他说：

“达雅，亲爱的，这个你别着急。你既然有愿望，自然会有力量。现在请你回答我另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家庭，是否真的很厌倦？”

这问话出乎她的意外，她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她说：

“我很代我的母亲难过。父亲已欺负了她一辈子，现在又多了一个乔治，我实在很代她难过。……虽然她对我还没有对乔治那样喜欢……”

这星期日他们相互说了许多话，在别人快要回来之前，保尔开玩笑的说：

“奇怪的是老头子到现在还没有把你嫁出去！”

她做出一个吃惊的姿势，说道：

“我不决结婚。罗莉的事情就是对我的教训。我死也不愿意嫁人。”

保尔不顾忌地笑了笑，说：

“这宣言是否是对生命的宣言呢？要是有一个大胆的小伙子出场，我说的是，一个满不错的小伙子——那时候怎样办？”

“就是这样也不。他们在追你的时候会是满不错的。”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叫她静下来。

“很好。同样，独身生活也不是坏事情。我只想说的是，你对我们年青人未免残酷一些。好在你还没有怀疑我在对你求婚，否则，我就有点难以下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他那冰冷的手，抚摸着她的臂膀。

“你们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做妻子的，”她温柔地说，“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处？”

几天之后，火车正载着保尔到哈科夫。

达雅，罗莉和她们的母亲以及姨子罗莎都到车站送行。当他们道着再见的时候，奥宾娜要他答应不但不要忘记她的孩子们，而且要他设法帮他们跳出火坑。他们像亲骨肉一样分手，达雅的眼睛是润湿的。保尔在很远的地方，还可以认出罗莉摇着的手帕和达雅那条纹的罩衫。

他在哈科夫跟彼得·诺维诃夫住在一道——他是多少有意不麻烦杜拉的。休息了一会之后，他就坐车到中委会，在那里等着阿金。当别人一走开的时候，他立刻要求委派工作，可是阿金坚决地摇摇头，说：

“保尔，这不成！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委会已有决定，决定这样说：‘由于保尔·柯察金病状的严重，应将他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恢复工作一事，毋庸考虑。’”“呵，这些医师们。还有不这样说的吗？”保尔说。“你听，我要求你的，是派我到什么地方工作！疗养院那些鬼勾当，是一点也没有用处的。”

阿金不听他的话。他说：

“我怎也不能违反决定。你明白，亲爱的保尔，你总可以明白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保尔是这样坚持，使得阿金实在难以拒绝他，结果他又同意给他找一个工作。隔天，他已在中委会秘书处机要科里工作了。他心里想，只要他重新开始工作，那么，他所已失去的精力就会完全恢复。但只在第一天，他已看见他的错误。他整整八个钟头毫不间断的坐在办公室里，为的只是他没有力气跑下三层楼去吃饭。他感到四肢，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不断地麻木，有时甚至整个身体都不听他摆布，而且他还觉得发热。接着，有一天，当他应当动身去办公的时候，他竟完全爬不起来，等到发作过了以后，他忍痛出去，可是已经迟到了一个钟头。结果他终因不断迟到而受到斥责，这时候，他已晓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的开始——他已不配参加实际工作了。

阿金曾两次帮助他，调他到别部份工作，但结果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有二个月，他又一直睡在床上。那时候他想起上次分别时伊林娜·巴赞娜芙所说的话，就写信给她。她当天就来看他，他还由她嘴里知道了他最关心的事情——他可以不必一定上疗养院去。他想对这件事情开个玩笑，但这玩笑有点乏味：

“这么说来，我的事情是不值得医治的了。”

当他的身体又好了一点的时候，他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这回阿金坚决拒绝他。他坚持着保尔应上疗养院去。保尔却用沉郁的声音回答道：

“决不，这有什么用处？我从权威方面知道这一点。看样子我只好拿一笔津贴实行退休，可是我决不这样干。你们不能够阻止我工作。我只有二十四岁，我不愿意带着一个残废的领养老金人的簿子，明知无用，还是走遍各个医院，以打发我余下的日子。你应该给我找一个找能做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做事，或是住在什么机关里面。……只有一点，别叫我当抄写员，在簿子上记数目字。我所需要的工作应当合我的意，我还不是失常的人。”

他的声音是恼乱的，而且分明是固执的，阿金很晓得这个直到最近还是浑身活气的青年人的感情。他明白保尔的生命悲剧，也知道像保尔这样把整个生命献给党的人，一朝脱离一切关系，放弃斗争，跑到后方，实在是很可怕的，因此他决心尽力帮助他。他说：

“很好，保尔，只要你不着急，明天书记局有会议，我会提出这问题。我答应尽我的力量。”

保尔勉强站起身来，伸手给阿金。

“阿金，”他说，“你能想像那赶我到一角，把我挤成一片薄饼的生命么？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用着突发的力量，抓住阿金的手紧压着他的胸脯，这样阿金可以感到那迅速而又微弱的跳跃——“只要它还在跳动，你们不能叫我离开党。能使我停止工作的，只有死亡。好兄弟，你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阿金没有回答。他晓得这决不是虚妄的造作，而是一个重伤的战士的呼号。他了解像保尔这样的人，是不能以别的何种方法叙说或是表达的。

两天之后，阿金告诉保尔说，某个中央刊物的编辑部里，有个负责的位置，但必须看他是否真的适合“文字战线”的工作。编辑委员会给保尔一个预试的机会。助理编辑，一个有着长期的革命前非法工作的经验，又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委会主席团的一员的妇人，询问保尔许多问题：

“同志，你受过什么教育？”

“初等小学三年。”

“没有进过党的政治训练班？”

“没有！”

“呵，就这而论，也有未曾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好新闻记者的。阿金同志很夸将你。我们可以把在家工作，不必住在这里的职务分给你，这个我们大家会设法调整它。但是我心里想到的工作，需要广泛的知识，特别是在文学和语文方面的知识。”

这话已告诉保尔，失败就在他的前面。经过了半个钟头的谈话，已证实他知道的实在太少了，而当他写完了一篇文章之后，那助理编辑用她的红铅笔，把犯下文体毛病的全文的四化发之三划掉，还指出许多拼音错误的地方。她说：

“柯察金同志，你显出极大的希望。如果你积极努力，你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你的文章表现出你还没有真正懂得俄文。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你向来没有学习的机会。非常抱歉的是我不能不说，我们不能任用你。我再说一句，你显出极大的希望，如果你的文章加以修改，一点也不改变它的内容，它将是第一等的。但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修改别人的文章的人。”

保尔靠着他的手杖，站起身来。他的右眉毛在搐动着，他说：

“不错，我完全同意你的话。我怎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呢？我一向是一个出色的火夫，后来又是一个满好的装配匠。我一向又很能够骑马，能够鼓动青年团员，但在你们这个战线，我却是一个不合适的粗手。”他和她道了日安之后就走出去。

在走廊转弯的地方，他差点摔下去。一个臂下挟着纸夹的女人扶了他。

“同志，怎么回事？”她喊着，“你是这么苍白呵！”

几秒钟后，他完全恢复过来，就客气地离开那陌生人，沉重地拄着他的手杖走出去。

从那天起，保尔就每况愈下。找工作是不用想了，整天不能不睡在床上的次数已越来越

多。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要求“中央社会保险”给他一笔养老费。与收到养老费同时，他还收到劳动残废人的证书，中央委员会给他些钱，并且还给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的私人权利。

接着他收到玛莎一封信，请他跟她住在一起休养。即使没有接到她的邀请，保尔也想到莫斯科去，希望万一能在全联邦中委会里找到工作，这就是说，希望能找到不着走动的工作。但在莫斯科，也是一样，所有的人尽是劝他医治，并答应把他送到好的医院去。他拒绝这提议。

在玛莎和她的朋友娜达·彼得逊同住的那间楼房里，保尔已过了十几天，他时常整天独自在家，因为娜达和玛莎两人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保尔成天只好读书——玛莎有着许多的书。这两个女的晚上都在家里，有时他们一些朋友也来看看他们。

接着，他又收到由黑港口发来的信——秋昌家邀请他上他们那里。生命把它的绳结越拉越紧，他们还盼望着他的帮助。有一天早上，保尔走出哥西亚尼克胡同那悄静的楼房，列车迅速载着他朝着海，向南方，远离那阴湿而又多雨的秋天，到南克里米亚那温暖的海岸去。

他注视电报杆飞闪过去。他的眉毛紧攒在一起，他那对深黑的眼睛现出深刻的顽强的神情。

十七

在他下面，海浪冲激着一堆杂乱的破裂的礁石，由辽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抚摸着他的脸。海港的沿岸是个不规则的弓形，由一面用铁条的水门汀筑成的防堤挡着海浪。山脉的斜坡在这里和海相接，小镇那许多细小的房子，就零落地散布在山坡上。

在城外，那座老的公园是悄静的。荒芜的小径掩着蔓草，给秋天扫下来的枯黄的枫叶，缓缓地落在路面上。一个波斯人出身的老年马车夫，载着保尔上这儿来；当地扶着那陌生的乘客走下车子之后，他禁不住问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没有女人，又没有战院。你要在这儿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还是让我载你回去吧，同志。”

但保尔付了车钱，那老头也就走了。

周围一个人也看不见。他在内海的岸边找到一个位子，坐了下去，让现在已经无力的阳光照到他脸上。他特地跑到这悄静的地方来，考虑生活是怎样一个情形，应该怎样处理这生活。现在已经是他作一下总结并且作一个决定的时候了。

在这一次，也是他的第二次的访问中，秋昌家的冲突已经成熟了。当那老头子听到他来了的时候，他非常愤怒，家里起了一次可怕的吵闹，领导这次反对老暴君的叛变的，自然是保尔。老头儿突然遇到他老婆和女儿们的强烈的反抗，从他到来的第一天起，全家就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那座通到老头子那边去的门已给钉上了，另一间小的厢房，则租给保尔居住。老头子每星期来向他预支房钱。不久，他似乎表示妥协了，因为他明白，女孩子们一宣告生活独立，他的皮包就怎也不会有钱光顾。为着外交的理由，他们的母亲仍和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从未在屋子的另一半露过脸，他想避免碰到那个可恨的干涉者，可是每当保尔一到花园或天井去的时候，他就像火车头一样的冒着烟，吹着气。

老头子在未到合作社做事之前，操着两种行业——鞋匠和木匠，就是现在，他一有空，还在用披屋改成的作坊里，做这两项事情，弄一点钱。为了吵扰他的住客，现在他把他的凳子移支保尔住的房子的窗口下面，非常高兴地狠命的敲着钉子，晓得这样可以阻挠他的读书。他时常低声对自己说：

你等着好了，我要把你熏出去……”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汽船的烟柱像一条黑云似的在舒展。成群的海鸥嘶叫着攒进海里去。保尔双手捧着他的头，沉浸在阴郁思索中。

他的全部生涯，由孩提时代到最近几天，像电一样在他前闪过。他是否很好的过了这二十四年的生涯，还是错过了它？他想了一年又一年，像一个铁面无私的判官，逐年加以评判，结果他非常满足地自己承认，他的生活过的还不算怎样坏。它充满着许多的错误，愚蠢的错误，年轻的错误，虽然大半是无知的错误；但主要的是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中，他并没有睡觉，他晓得在那争夺政权的铁的斗争中，怎样去尽他的本份，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还有着他的几滴鲜血。

此外，他始终没有放弃斗争，只有到了被迫之后方才如此，但是现在呢，他已负伤，被迫退出前线了，而且只有一条路——进入后方的医院。他想起在华沙附近，一粒子弹射倒了一个人，那个人刚好倒在马蹄的下面。同志们当时匆忙绑扎他的伤口，把他送给红十字的人员，随后就赶去攻击敌人。那战队并未因丧失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着伟大的思想而作的斗争，就像这一样，而且应当像这一样。不错，它有例外。他曾看过好些失去双脚的机关枪手，坐在带着机枪的小车上，这些人是敌人碰到的最可怕的战士，他们的机枪扫着死亡与损害，而他们的铁样的容忍和眼力的锐厉，使他们成为战队的的光荣。但他们是稀有的，像这样的人。

现在，已受了伤，永远没有返回队伍的希望的，要怎么办呢？他不是曾经叫伊林娜·巴赞娜承认他的将来是极惨淡的吗？他要怎么办？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像一个摆在他前面的吓人的黑洞。到底为什么要生活，当他现在已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进行斗争的才能？在现在，在他的忧郁的将来，他的生命还有什么用处？他要怎样对付它？只为着吃喝和呼吸吗？只做一个无助的证人，目击同志在斗争中前进吗？只做他的同志们中的一个赘累吗？他 shouldn't 抛弃这个现在已背叛了他的肉体呢？朝他的心口开一枪——让它完结！他以往的日子过得还算光荣，所以他应当能够在适当的时期结束它。谁能斥责一个不愿挨过不幸生涯的战士？他的手伸进口袋里，摸着那光滑的勃朗宁手枪，他的手指做着射击的姿势——紧紧地抓着枪柄。缓缓地把手枪从袋里摸出来，他大声对自己说：

“谁想到你会有这样的下场？”

枪口轻蔑地瞪着他的脸。接着，他把手枪放在膝头，狠命地诅咒，并且对自己说：

“孩子，你是一个假英雄！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杀他自己！这是最怯懦的也是最容易的出路。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叫别人知道你有过这个想头。即使到了生活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找出活下去的方法来。使你的生命有用处吧！”

他站起身走到路上。一个驱着牛车下坡往城里去的农民，搭载了，一到城里，他在一个街角买到一份当地的报纸。在报上，他看到城里党员们在“底米安·贝丁尼俱乐部”开会的消息。那天，他直到深夜才回来，他不知不觉地在那会议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说。

达雅没有好好睡。她很着急，因为保尔出去了那样久。他很少说到他自己，但她感觉到他正在过着一个痛苦的时期。当她双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的时候，她听到敲门声。她把一件短衫披在肩膀上，跑出去开门。

罗莉正在她的房里熟睡，喃喃地说着梦话。达雅看见保尔，十分开心，等到他一走进屋里，便低声对他说：

“我正在为你焦急死啦。”

保尔也低声回答道：

“达雅，亲爱的，我是不会出毛病的，除非我死了。怎么，罗莉睡了吗？是不是？你晓得，我一点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你。让我们到你的房里去坐吧，要不然，我们会吵醒罗莉。”

达雅踌躇了。什么，在深里坐着对谈？要是她母亲知道了，她会有什么想头？然而她不能把这告诉他，否则他会伤心的。他要告诉她的究竟是什么？但是，甚至在她这样想的时候，

她 还是带着他走进她的房间里。

他们坐在阴暗的房间里，相互是离得这样近，以至她可以听见他的呼吸。他用镇定的声音说 道：

“达雅，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有时曾经很迷惘——究竟活下去还是不；可是今天，我召集 了一次我个人的“政治部会议，”通过一个极端重要决议案。你别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吃惊。 ”

他接着便把他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经历，以及他坐在城外公园里时心中所想的大部分事情告 诉了她。

“我的情境就是如此，现在我要说到最重要的部分。你的家庭的故事还刚在开始。你应当离 开这儿，到空气新鲜的地方，你要尽可能离开这个沉滞的地洞。让生活重新开始吧。我既然 已卷入这混战里面，那么，就让我们硬干到底。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都很空白，我已决心给 它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你愿意做我的伴侣，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非常激动地听着他的话，到了临末这一句，完全出她意料之外，使她大吃一惊。他 跟着又说：

“我不是要你今天答复我，达雅。首先，你得好好想它一想。像我这样，一点也没有平常那 种求婚的殷勤，就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使得你很窘。可是那种花言巧语有什么用处呢？这儿 是我的手，你瞧，在这儿。……要是你这次相信了，那末你就不会受骗了。我有许多 你所需 要的东西，同样，你也有许多是我需要的。我已经决定：我们的结合要一直继续到 了你成为 一个真正的人，成为 我们自己的一个，我一定要使你做到这一点，否则我 就一 钱不值。在这之前，我们应当互相黏结。一到了你长成，你将不受一切的束缚。谁晓得， 也许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废人，你应当知道，到了那时候，我决不愿意拖死你。”他 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又用一种非常温和而又亲切的声音继续说道：

“在此刻，在这儿，我把我的友谊和爱情献给你。”

他始终握住她的指头，而且好像她已说了“好的”一样的镇定。

“你不会骗我吗？你不会在你讨厌了我的时候把我丢掉吗？”

“达雅，话语不是保证。你只能相信——相信你我这样的人不会对不起他们的朋友。” 他不 伤心地添着说，“除非他们对不起我。”

“我今天什么也不说，”她说，“这些都是这样出我意料之外。”

他站起身来。

“睡吧，达雅；天就快亮了。”

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里，不解衣裳的躺下去。他的头儿一靠着枕头，立刻就睡熟了。

在他的房间的窗台上，堆着许多由党图书馆里借来的书，许多的报纸和记满笔记的簿子。她 母亲给他一张床，两只椅子，在通到达雅房间的那扇门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插 着许 多小的黑旗与红旗。当地党委会向保尔保证，他们可以继续供给他许多的书，不久之 后，他 就开始收到大扎的书籍。罗莉看见他成天念着记着，时常觉得惊奇，他从天亮到夜 晚。只在 吃饭时候停了一会儿。每天晚上，当他和姊妹俩在罗莉房里吃晚饭时，他时常把 他读过的东 西告诉他们。

保尔能有这么多的闲功夫，没有担任半项职事，这在八年来还是第一次，他怀着一个初 学习 者的无餍的渴望，不断阅读，一天甚至读了十八个钟头。

他的健康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是很难说的，假如达雅有一天没有这样简洁地对他说：

“我已把我的衣柜移开，所以连接你我两间房间的房门已可以打开了。要是你有什么事 情要 找我，你可以直接跑进来，用不着走过罗莉的房间。”

保尔的脸现出光彩，达雅给他一高兴的微笑——他们的结合是完成了。

母亲已开始注意到达雅的隐秘的快乐了：她的眼睛虽然因爱情的火而显得那样明亮，但

在她们的下面，现在却有着两块精致的更浓的黑迹，这是不眠之夜的结果。同样，小屋也更加时常听到“吉他”的乐声和达雅的歌。在小屋里醒来，她觉得烦恼，因为他的爱情好似是偷来的。她时常因为很细微的声音而吃惊，听见母亲的脚步声而惊讶。还有一点，也很使她不安：要是她母亲问她，为什么夜里她不把房门关上，她要怎样回答。保尔看出她的心理，便温柔地叫她安心的这样说：

“你怕什么呢？要是你能辨别清楚，那么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安心的睡吧，谁也没有权力阻止我们的共同生活的。”

她把面颊紧靠着他的胸口，双手抱着她的爱人安心地熟睡了。他一动也不动的久久躺在那儿，静听着她的呼吸，生怕扰醒她的安睡。他对这个把性命付托给他的少女，是怀着充分的深情的。

最初晓得达雅眼睛之所以那样明亮的，是她的姊妹，从那天起，她们俩就疏远了。不久她的母亲也知道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猜到了。她立刻表示反对。她没有料想到保尔·柯察金会这样。有一天，她对罗莉说：

“他不是我们的达雅的配偶。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

她心里开始充满着各种不安的思想，然而她没有决心和保尔谈这桩事情。

接着城里的青年人开始来访问保尔了，小房间里有时挤满着人。那老头子听到了像一群蜂那样的嗡嗡声——有时还唱着克里米亚的歌和合唱，以及保尔那得意的调子。这是举行党团工人积极份子的小组会议，是保尔写信要求参加宣传工作后，党委交给保尔负责的。

他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现在他的双手又再推着轮子了，而生活呢，在走了许多意外的方向之后，又再趋向它的正常的轨道了。保尔现在正梦想着利用研究和文学以恢复他的实际的党的工作。

但生活带来的阻碍，一个接着一个。他完全抵当了它们，只有一件事使他惶急——他要多少时候，才能克服这些障碍达到他的目标？有一天，那个名落孙山的大学毕业生乔治·秋昌，带着一个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他毫不踌躇地站在他爸爸方面，而且还连同他老婆的母亲——他们是反苏维埃的——开始挑起许多麻烦来，不惜以一切代价把保尔赶出去，并使他和达雅隔绝。

在乔治回家二星期之后，罗莉在邻近的县城里找到工作，把她的母亲和小孩子带到那儿去。保尔和达雅接着也搬到相距很远的一个沿海的小城去。

阿尔青很少接到他弟弟的来信，但是每次，他一看见镇苏维埃办公处是他的台子上，摆着一只上面有熟悉而富有棱角的笔迹的信封，他就要失去平常的安定的心情。这一回，当他撕开信封的时候，他又用温和的喉音对自己说道：

“啊，保尔，保尔弟弟。但愿我们俩能在一起，你对各项事情的意见，我是多么的欢迎呵！”

保尔在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阿尔青哥哥：我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诉你。我想，我给你写信跟别的任何人写信是不同的，你知道我，而且明白我信上的每一个字。这一次，我在健康前线的斗争中，不断地受到生命的强有力的压迫。打击接着打击。在一次打击之后，我好容易快要爬起来，但另一记比上一次更无情的又接着来了。最最坏的，是我什么都不能做。开头，我在左臂不能动弹；这是一个打击，可是在我快能够走动之前——只是在我的房间里——我的两只脚又叫我躺下，现在甚至要下床走到桌边也万分的困难。但最糟糕的是，我几乎准定还要害别的病症。我实在不晓得怎样才算个了结。

“现在，我从未离开屋子；我只能从窗子看到海的一角。我既有不听我摆布的背叛的肉体，又有着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一种从来未停息地拉着我趋向你们全体，趋向劳

动，趋向目下正在整个前线迈进的大军，趋向正铸造钢人的长城的所在等等的意志——世上还有比一个人而兼有这两者更为可怖的悲剧吗？

“我仍然相信我将归队，在勇猛奋进的党中，我的刺刀将和别人的在一起。我不得不相信，而且我没有不信的权利。十年来青年团和党在抵抗的艺术中教育了我，我们的领袖的话语也向我指出：“世上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克服的堡垒的。”

“现在我过的是研究的生活。书，书，此外还是书。阿尔青，我已经做了许多。我阅读了我们所有的古典文学的作品，又念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第一学程，而且考试及格。晚上，我举行党青年的小组会，我随过那些同志与党的实际工作取得联系。此外，还有我亲爱的达雅，她的成长与她的进步，是的，不错，还有她的爱以及她对我的亲切的照顾。我们非常美满地一起过活。我们的预算表是简单明了的——每星期三十二卢布，这是我的俸金和她的薪水。她正沿着我的路准备入党，以前她曾经做过女佣，现在在一家餐室里洗盘碟。（这小镇上是没有工厂的。）

“上天，达雅得意地拿她充当妇女部分的第一代表的委任证给我看。这证书对于她，决不是一张硬的纸头。我注意着在她内部一个新人的诞生，并尽我的所能给予帮助。终有一天，一个大的工厂与一个工人的集体，就会决定这新人的外形。只要我们还是留在这儿，她依然沿着那唯一可以实行的路径走去。……你亲爱的弟弟保尔。”

生活循着它的惯常的路径，达雅做她的工，保尔读他的书。但当他刚刚开始党小组的工作的时候，一个新的不幸悄悄地侵袭了他——瘫痪症完全剥夺了他两只脚的作用。现在能活动的只有右手了。经过长期的和完全无效的努力之后，他晓得他实在再也不能走动了，这时候他紧咬着双唇，直到它出血。达雅在掩盖她的失望以及由于无力救助他而起的苦痛上，现出极大的毅力。保尔像是犯罪一样的微笑对她说：

“达雅，亲爱的，你我除离婚外，别无办法。这一点在我们的约定中是没有的。亲亲，今天我要非常郑重的考虑它一下。”

她不愿听他的话。要抑制她的啜泣是很难的。她的头挤着他的胸脯，强自抑制的啜泣使她浑身战颤。

不久，阿尔青晓得了他弟弟的病情，写封信给他们的母亲，她老人家立刻抛弃一切，跑来看看保尔。现在母亲，保尔和达雅三个住在一起；这老太太跟她的媳妇很合得来。保尔呢，依然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在阴雨的冬天里，有一天晚上，达雅带着新的胜利的消息回家来——她被选为镇苏维埃的委员。从那天起，保尔就开始不常看见她。达雅时常由她洗着盘碟的疗养院的厨房，迳自上苏维埃的妇女部去，通常大半要到深夜才回家。因皮非常疲倦，虽然有着许多的事情可以告诉保尔。她可以成为候补党员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为了这，她正十分兴奋地不断准备着。

接着新的不幸又来了。疾病正继续着它的工作。保尔的右眼发炎，热痛难熬，不久又延及左眼。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明白了什么叫做盲目——房间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黑纱。现在，一个可怕的障碍——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似乎是不能克服的——已横挡住他的进路，阻止他继续的进步。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无限失望，但他本人却以冷酷的镇定对付它，并且坚决地对他说：

“我应当等着看看。如果事实果真是，不管怎样都没有继续进步的可能，如果我直到现在，为着寻出进行工作的方法所尽的一切努力，都为盲所目取消，如果我再也无法重归党的行列——那末，自杀是唯一的办法。”

他写了许多信给他的朋友，他们都回信给他，劝他坚定和继续奋斗。就在这些可怖的日子中，有一天晚上，达雅怀着万分的快乐的兴奋，跑回家来，说道：

“保尔，亲爱的，我现在是一个候补党员了！”

当保尔听着她叙述党小组如何接受这位新同志的经过的时候，他回想起当初他本人入党时的情形，他使劲地握着她的手，对她说：

“呵，达雅同志，现在你我俩个终于组成一个党组了！”

隔天，保尔写封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看他。当天晚上，一辆满身泥泞的车子开近来，一个有着大胡子的中年的拉特人吴默尔，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怎样，生活好吧？干什么躲起来呢？阁下，起来吧，我们要马上送你到乡下去。”他说着大声笑起来。

区委书记和保尔谈了两个钟头，甚至忘记了他晚上有着部务会议。他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一边听着保尔的兴奋的话语，临末他说道：

“请你把这关于党小组的谈话收起来吧。你所需要的是休息，把你的眼睛给治好。这毛病也许还可以挽救；说不定你应当到莫科一趟；你对这一点有何意见呢？好好考虑一下吧。”

保尔堵住他的话，说道：

“吴默尔同志，我所需要的是人，活泼的人，我不能独自过活。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与活人接触。给我找一个青年人来，越是年轻越好。在你们的乡村里，他们都变得非常左倾，直接以共产公社为目标；他们嫌集体农场不够味。要是你不再留神注意这事情，那就难怪青年团员还不会走就想飞了。至于我呢，我还是老样子。”

吴默尔突然站住：

“我怎会晓得这些事情？奇怪，这消息还刚是今天由区里传到的呢！”

“同志，你完全忘记了我那年轻的妻子吗？”保尔微笑着说。“你们昨天接受她入党。这是她告诉我的。”

“什么，柯察金，那个大姐吗？原来她是你的老婆！哈哈，这在我倒是一个新鲜的新闻……”

吴默尔在想了一会之后，便用于轻拍他的前额，说道：

“呵，有了，我晓得我们可以派谁来，那就是，里奥夫·伯辛尼夫！你怎也找不出一个比他好的同志来。你们俩的气质实在是大同小异。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一只两相的高电压变压器。你晓得，我曾经是一个电器师，所以我拿这来作比。里奥夫可以给你装一只无线电收音机，因为他是无线电专家。信不信由你，我有时呆在他那里，一直听到早上两点钟，弄到连我的老婆也起了疑心，叫我老混蛋，问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混到那么晚。”

保尔笑着问道：

“这伯辛尼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吴默尔来回的走累了，就坐下来，说道：

“伯辛尼夫是我们的公证人，可是他做公证人，正如要我做舞妓一样的外行。不久以前，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他在一九一二年就参加革命运动，从十月革命起就入党。内战时期他在军团范围内工作——在第二骑兵军团负责革命法庭，肃清了高加索地方的“白”虱与兹洛巴匪帮，接着又到过察里青，到了南部前线，到了远东，在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中工作。是一个地道的好勇斗狠的人。后来肺病使他病倒，因此由远东到这儿来。就在高加索这儿，做了临时法庭的主席，后来又做区法院的副主席。不久他的肺病非常沉重，在病足致命的威胁之下，他们送他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特别的公证人的经过。公证人的职事十分清闲，而且，不错，他也还活着。这样，他们后来就悄悄地让他参加小组，接着又叫他参加区委，再后又叫他负起政治学校的职务，再后又叫他参加高加索委员会，以至任何麻烦的或棘手的问题的任何重要的任务，都准定有他参加。除此之外，他又是一个猎枪的好手，又是一个热心的无线电迷，虽然他只有半个肺，可是他一点也不像害肺病的样子，精力倒非常饱满，我相信有一天，他总要在由区委会办事处赶到法院去的路上死

去了。”

保尔听到这里，就插嘴提出一个严厉的问题：

“你们干什么要派这么多的工作给他做？他在这儿的工作，比起他未来之前，反要繁重得多。”

吴默尔歪着头，定着眼睛瞪保尔，说道：

“要是我们给你一个小姐，派你一些工作，伯辛尼夫一定要说‘你们干什么要派这么多的工作给他做？’而他对他自己呢，倒这样说：‘轰轰烈烈干它一年，比闲在医院里五年要强得多。’显然的，只有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能够救下我们的同志的性命。”

“这是对的，”保尔说。“我也赞成活动一年强过养病五年的意见，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未免罪过地挥霍了我们所有的力量。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不够英勇的，因为其中还有原始的和不负责的倾向存在。只有到现在，我才认清了我过去实在没有那样忽视我的健康的权利。我已发觉，这是一点也不英勇的。如果我以往不是这么一个斯巴达派，我很可能再活几年。总之，左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情况基本危险之一。”

吴默尔沉在思索中。接着他说：

“这是你现在说的话，可是如果你明天能下床来，你就把它忘个干净……”

保尔一声不响。

两天之后的晚上，里奥夫·伯辛尼夫来看保尔。他直到半夜才。里奥夫离开他的新朋友时感觉到他好像已会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隔天早上，有几个人爬到屋顶上去架设天线，同时里奥夫一面在房里装设，一面对他讲述些他经验过的有趣的故事。保尔不能看见他，但依照达雅的叙述，他知道里奥夫是一个美发的。有淡蓝色眼睛的，身体高大和举动敏捷的人，也就是说，这跟保尔在他们会面的最初的瞬间所想像的一模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盏灯红起来了，里奥夫像举行开幕礼一样隆重地把听筒递给保尔。大气中有着一些杂声，接着是像鸟的啁啾一样的海港电报的电码声，在某一地方——显然是在附近——又传来了轮船电讯的电气火花的声音。然后，蓄电器和线圈从杂乱的闹声中，寻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楚响亮的沉着而自信的话声，说道：

“哈■，哈■，这是莫斯科的广播。……”

这小小的电机及其天线，可以收听六十个世界电站的播音。保尔长期被隔绝的生活，现在突然从听筒的鼓膜冲了出来，使他感到它那巨大的搏动。里奥夫·伯辛尼夫已经十分疲倦，当他看见保尔的眼睛现出喜悦的神情时，他微笑了。

大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睡熟了，达雅不断说着梦话。她直到很晚才回家，又疲乏冷颤。保尔很少看到她。她的工作越是积极，她闲空的晚上就越少，这使保尔想起伯辛尼夫某次所说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的同志，他们相互就很少见面的机会。这有两点好处：彼此不会互相厌烦，而且又没有时间吵架。”

他能够表示反对吗？他早就应该料到这一点。过去，曾有许多天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给了他，比现在有了更多的温存与照顾。但当时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却是他的学生和党的同志。他明白她越发走上党的道路，她就越少有自己的时间。他是坦然接受这必然的结果的。

党准许他加入小组，于是每天晚上，他屋子里又有着营营的人声。保尔与这些青年人接触的时间，在他是一种新的毅力的泉源。除此之外，他的母亲在任何时候简直无法叫他放下听筒，喂他食物。无线电正把盲目所夺去的一些东西给予他，他已有研究的可能，而且在不断的鼓励之下，他已经能够忘却那不住毁害他的身体的剧痛，忘却眼睛的炎肿。以及生命所显示给他的一切的粗厉与残酷。

当他由天线收听到由马尼托斯特洛发出的消息，晓得那些接替他同代者的岗位的青年同

志们，已得到光荣的成就时，他异常的快乐。他想像到跟大群的海豹一样残酷的大风雪，以及乌拉山的可怕严寒。狂风彻夜怒吼，青年团员的第二代的派遣队，整夜在风雪的窒息之下，藉着弧光灯的红光，爬到那巨大建筑物的顶上，把世界最大的联合工厂的第一部分，从风雪之下救了出来，基辅青年团的第一代，冒着风雪而完成的取木的工作，现在比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祖国已长成了，人民也已长成了。

在聂泊河上大水冲破了钢堤倾泻而入淹没了机器与活人迅速出动去堵截大水的又是青年团员，在经过雨天的苦战，毫无休息与睡眠之后，他们终于驱退反叛的大水，叫它穿起原先的钢甲。在这可怖的斗争中，青年团的新一代又迈进了，而在那些英雄中，保尔喜悦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潘克拉托夫。

十八

他们到莫斯科了，在政府某部档库的库房里住了几天，是档库主任正竭力帮忙保尔住进一家特别的疗养院。只有到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他有着健康和年青的时候，坚毅是一桩比较简单和容易的事，但在生命正把你击伤的时候，那倒是桩光荣的事情。达雅对他说：

“保尔，在我们动身之前，我收到母亲一封信，信上说父亲已被合作社开除，现在他正在某一建筑工程中做个木匠。”

保尔听了稍微有点惊动。

现在，一年半已过去了，那是十八个难以形容的受苦的月份。疗养院里的奥巴枢教授十分肯定地告诉保尔说，他的视力是无法恢复的。将来眼睛的发炎停止后，他或者要在瞳孔上开刀。为着使炎肿减退，他提议施用外科手术。他请求保尔的同意，保尔表示医生们认为可以做的，他都答应。

当他睡在手术台上，他的脖子被割开，并将甲状腺附近的腺管移支的时候，死神曾前后三次以她的黑翼掠过他。但保尔的生命是顽强的。每次，经过几个可怕的焦虑的钟头之后，达雅发觉她那可爱的人，面色死白，可是仍然活着，而且跟以前一样的十分可爱。她对她说：

“亲爱的，你别代我焦急，他们不会这么容易地结果我。我还要再活一些时候，装装傻子。就我的健康而论，他们这样做是满对的，但他们要证实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残废，那却大错特错。我们往后就会知道的。”

保尔现在已坚决地决定了，他要走上可以使他与那些正在建设新文化的人一道前进的路。

冬天过去了，春天已推开糊上的窗，而贫血的由最末一次的手术恢复过来了的保尔·柯察金，感觉到他再也不能住在医院里了。许多月来，混在活人的受难，病人的呻吟以及讨厌者的祷告中间，比之挨受他自己的苦痛还要难受。当医生提议再作一次手术的时候，他冰冷地坚决地回答道：

“不要了。已经够受了，我已把我自己的大部分献给科学，让其余部分留给我自己吧。”

当天保尔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请求帮助他留在莫斯科，因为他的许多好朋友都在当地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没有再继续流荡的理由。他向党请求帮助，这是第一次，莫斯科苏维埃答应给他一间房间。他满怀着一个永远不再回来的希望离开了医院。

那矮小的房子，是在克罗波特尼街附近一条僻静的弄堂里，在他看来，这是最高的舒适了，虽然，夜半醒来，他还是不相信他已离开了医院。达雅现在已是正式的党员。她很努力工作，尽管她个人生活上的全部悲剧。她并未落在别的突击工人的后头。她所工作的那一组挑在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妇，信任她，推荐她出席工厂委员会！这个现在已成为完全的布尔什维克的同伴的光荣，实在大大地减轻了保尔的苦痛。

伊林娜·巴赞娜芙有一天来看保尔，她是为了公务到莫斯科来的，他们谈了好久。保尔非常热烈地把他想走的，以便在往后返回党工作者的队伍的路径告诉她。她注意到保尔鬓上的银色的发丝，温和地对他说：

“我可以看见你已经历了许许多多，但你仍然没有失去你那不可熄灭的热情。自然，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听到你决心开始你在这五年来不断准备着的工作，我实在很高兴。可是你打算怎样着手呢？”

保尔微笑，使她安心地说：

“明天一个同志给我带来一只硬纸板做成的框子。我没有引导是不能写字的，否则这一行混着那一行。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想出一个办法，现在办法已经有了，那就是硬板中间凿了一些小缝，使我的铅笔能顺直的写。当你看不见你所写的字的时候，写字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可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对这很有把握。我已长远做不了事情，现在正开始缓缓的写，每个字都写得很仔细，结果倒也满不错。”

他开始工作了。他的计划是写一个关于柯多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团的故事。题目是从它本身得来的，那就是《暴风雨的儿子们》。从那天起，他就把全部心神贯注在这本书的创作上面。

缓缓地，一行又一行，有许多页写成了。什么事情都被忘却，而他所描写的物事，以及创作工作的起始的苦楚，都奴役了他——那些栩栩如生的，难以忘怀的景象，是这么清楚地重现出来，以致他感到无法把它们写在纸上。字句显得那样的死白、呆板和欠缺感情。他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句的每个字，都必须加以回想，而当记忆失去了线索时，工作就中断了。他的母亲惶骇地窥视着他的心神的紧张。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必须背诵每一整页，或甚至每一章，有许多次，他的母亲真的以为他的儿子已经发疯。她时常等到他进去收拾溜在地板上的纸头的时候，怯怯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难道不好做别的事情么？谁听说过一个人不做别的只是写？……”

他对她的关心笑了起来，并叫她放心的说，他还没有到全然发狂的地步。

他计划的著作已有三章完成了，保尔把它送给柯多夫斯基师团的一些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不久就得到称赞的回答，但在寄回来的时候，原稿竟在邮政局遗失了！六个月来的劳作已丢掉了。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非常后悔他当时没有留下复稿。

当他把遗失的事告诉李定涅夫时，李定涅夫就说：

“你这家伙，做事干什么这样粗心？牛乳泼了，哭也没用。从重新开始吧。”

“可是，巴夫洛维齐，你知不知道，这是把我六个月的劳作偷去啦。我每天紧张的做了八个钟头。该死，我们现在还有这种麻木不仁的事情。”

李定涅夫竭力的安慰他。他又被迫开始工作了。李定涅夫拿了他的原稿，完全把它用打字机重打出来，六个星期后，第一章又重新写成了。

保尔和他母亲以及达雅，跟一家姓阿力克赛夫的分租一间统楼。他家的大儿子阿历山大，是城里青年团某一分区的书记，他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名字叫嘉莉亚，刚从工厂工人的学校里毕业。嘉莉亚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少女。保尔请他的母亲问问她，看她是否答应帮忙保尔，做他的笔记员。嘉莉亚很高兴地答应，并且跑过来看他，她听到保尔正在写一篇小说，就一面微笑一面表示极愿帮忙的说道：

“柯察金同志，我极喜欢帮你忙。这和给我父亲写着告诉房客保持房间干净的无聊通知完全不同。”

从这天起，文学工作就以双倍的速度向前迈进，一个月内，保尔完成之多，连他本人也为之吃惊。嘉莉亚，由于她本人的同情与自愿，也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她的铅笔在纸上悄悄地滑过。她时时把她最喜欢的一段，给他念了几遍，对他的成功表示真挚的欢喜。屋子里相信他的工作的，差不多只有她一个，别的人们都认为这是徒劳无功的，这只是他在无

所事事之中，想找出一些消磨过日的方法吧了。

接着曾因职务外出的李定涅夫，返回莫斯科来。当他读了第一章的时候，他说：

“干下去，孩子！你会胜利的！保尔同志，你曾获得伟大的成就。我坚决相信，你想重新参加党的实际工作的梦，不久就会实现。儿子，千万别丧气。”

现在嘉莉亚按时的来，她的铅笔在纸上簌簌作响；而叙说那些可纪念的过去的字句，堆满了一张又是一张。当保尔凝神深思，为那些回忆所感动的时候。嘉莉亚就会窥视着他，看到他的睫毛的颤动，以及那一对现出各种不同的表情的眼睛，这些正是他的思想的活动的反映。要是说他真的盲目，那是难以相信的，他那对纯洁的未被染污的瞳孔，是这么的生动。当日里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嘉莉亚就把记下来的念给他听，他在留神谛听的时候，总是紧蹙着眉头。

“同志，你为什么皱眉头呢？”她时常这样问，“可不是，它写得顶好呢。”

“呵，不，不是的，嘉莉亚。”他也总是这样回答。

当他不满意记下的部分的时候，他就拿起纸头和纸框子，自己动手写，有时因为纸框子压得他抽筋，他痛恨它，把它抛出去。有时，由于他对那剥夺了他的视力的生命，发出极端的愤怒，他就会折断铅笔的笔尖，一枝接一枝，并且咬着他的嘴唇，直到它出血。

当工作行将结束，被压抑的感情，就会更容易地冲毁他那一向小心翼翼的意志。那些被压抑的感情就是忧郁以及怨恨，因为他欠缺一连串热烈而善感的，差不多别的任何一个男女都有权利拥有而独他没有的东西。要是他屈服于那些感情中之一，那么事情就会得到悲剧的结果。

深夜的时候，达雅由工厂里回家来，她跟保尔的母亲交换了几句耳语之后，就径自上床去。

最后的一章写成了，嘉莉亚费了几天，把全篇小说念给他听。隔天原稿就寄给列宁格勒的文化宣传部。如果他们觉得它有存在的价值，他们就会把它送到印刷所，然后……想到这里，他的心砰砰急跳起来。然后……那将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这是由长年的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得来的。这本书的命运将决定保尔的命运。如果原稿被退回来，那么，他就完了。如果它只受到批评，如果它失败的处所，可以由他往后的修改而除去的话，那么，他就会马上再度开始他的攻击工作。

把那沉重的包裹送到邮局去的，是他的母亲。保尔一生从未怀着那么苦痛的紧张心情等着一封信。他从早到晚等邮班，可是列宁格勒仍然没有回音。出版者的沉默越来越发迫煞人，失败的预兆也就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暗自承认，如果书稿被无条件的拒绝，那就是他的灭亡。那时无法再活下去，活下去已毫无意义。

这时，他不禁想起了效外海滨公园里他一度想自杀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

“为了挣脱这个铁环，为了能够归队，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竭尽全力了吗？”

他的回答说：

“是的，我似乎已经用尽了一切力量。”

许多天过去了，就在等待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他那比儿子还焦急不安的母亲突然在房门口便激动地喊道：

“列宁格勒来消息了!!!”

这是州委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纸上只有极简短的几句话：

“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保尔的心脏加速跳动，他梦寐以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铁环已被砸碎，现在他已经拿起新的武器，又重新回到战斗的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